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从苦力到巨子——李叔同传奇



小 引

个体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和新创造出来的东西，某种绝对性的东西，一切行动完全是他的独有物……单个的人最终总要给自己获得其行动的意义，因为他也完全个人地解释这些流传下来的语句。公式的阐释者至少是个人的，即使他没有创造公式；他作为阐释者一直还在创造着。

——尼采

1973 年金秋，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她的又一个生日。

北京秋天依旧那样美丽。天高气爽。空气中透着节日的喜庆。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等重要场所一如往日，照旧升起了醒目的五星红旗；只是在这一天，那飘扬的旗帜特别具有深长的意味。长安街被装点得格外鲜艳。红色的基调倾诉着亘古福祉的音律，也彪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为了自由而流淌的鲜血。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为了张扬其恢宏气度，不但邀请了各国嘉宾、驻华使节、全国劳模、行业先进，还请来了那些早先“出嫁”的海外华侨“回娘家”过节。

宾客云集，高朋满座。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一切的过去都在此时得到了解释。

这是一个仪式性场合，一切错综疑症都在此刻有了注疏。

……

国庆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节目当属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和晚上的国宾宴会。晚上 7 时整，周恩来，这位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总理，这位被世界各国，哪怕是敌对国也不得不钦佩其卓越才能的外交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他频频与客人们挥手致意，不停地与朋友们举杯。他来到海外华人、华侨跟前与各位代表一一握手，不停地说：“欢迎您！”但当他与一位高高个头、略显清瘦的华侨握手时，周总理说：“感谢您！”这外交辞令上的细微变化立即引起在场人们的注意。人们清楚地知道，两个字的差异并非总理为了避免语辞单调所做的表述调整。人们也清楚地知道，这更不是周总理偶然的语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坚信不疑，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外交家，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其深刻的寓意。于是，宴会之后，许多华人、华侨都向这位“受到总理特殊礼遇”的人询问，为什么周总理与我们握手时都说“欢迎您”，对你却说“感谢您”呢？此人却笑而不语，仿佛要留下一个谜底让后人去猜、去品、去悟。

1965 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变动的巨大“阵痛”的前夜。黑云压城城欲摧。每个人的心中都压着一块铅。人民共和国这艘大船就像在波涛汹涌的恶浪中颠簸。

形势的严峻并不时时事事会呈现在历史的影集里。是年仲夏，上海市委的贵宾厅里，出现了几位衣着朴素，举止明显带有南洋气息，言语间携着一些令人一下子就能辨别出闽南方言口音的客人。上海市的头面人物已事先得到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上海方面予以“特殊关照”。在这几个人中间，有一位便是著名的新加坡侨领李光前先生。此时的李光前先生已是重病缠身，被新加坡医院、香港玛丽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香港玛丽医院甚至断定李先生的生命至多只能维持 3 个月到半年。这件事被李先生的一位挚友

了解后，他凭借着自己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交情，向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反映，力陈利弊，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用中医技术挽救或延长李先生的生命。这样做不仅能够海外华侨中造成良好影响，而且可以使中医在世界上赢得更多承认。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专门就李光前先生的治疗问题作了批示，一行人在北京时，周总理还在百忙中抽空会见了他们。

于是也就有了上海的那一幕场景。

不知是上方的指令过于简洁硬朗，以至于许多细节被遗漏了呢，还是压根就没有必要让下面知道得那么多。结果是，不管这一拨人走到哪里，都由当地的头面人物出来接待。接待的规格又出奇地高。在广州是这样，在北京是这样，到了上海也是这样。这一切甚至令李光前先生也诧异不已。他着实没有想到，他的这位朋友在中国竟有如此之大的面子。

一行人初到上海，就由一位姓刘的副市长出面宴请。更令人蹊跷的是，恰在他们到上海不久，巴基斯坦总统到上海访问，上海市委在安排巴国总统的宴会名单上也有此人名字。只是谁都不清楚这样一个神秘人物究竟何许人也。一切都讳莫如深。偶尔听到私下有人在问：“这人是谁？”却从未听到有人很有把握地给予肯定回答。

故事是人讲述的，因而被人的叙述逻辑编排着；目的是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得顺畅，按照人们的心理期待去演绎。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事先被规定好了，事前交待清楚了。每一个角色该做什么，角色本身知道，听众读者也知道。尽管这种“知道”并不是指如神仙那样未卜先知，事无巨细，了如指掌，而是指其中存在着一种交流关系明确前提下的人际活动规则。比如老师有千千万万，个性迥异；但是，一旦老师面对学生，关系就确定下来，老师必然按照特定社会下的逻辑进行表演。同样，伙计和老板的关系一俟确认，双方也要在一个事先被规定的逻辑下进行表演。这便是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便是社会的伦理道德。

然而，发生在上海的那一幕“故事”则完全没有规则！没有规则的原因并非故事没有人物和角色，乃是其中有一位在场者的身份很诡秘，大家都还未来得及挑明，还来不及了解，故事就开始了。因此，许多人都蒙在鼓里，许多人在行事上还把握不住分寸。想象一下吧，当你还没有工夫了解到你所要打交道的对象，他猛然已经站到了你的眼前，你能露出一张什么样的笑脸去面对，必定是不自然的难看！想必当时地方上的不少官员就是用那样的笑脸去迎接这位客人的。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

5 月，时近端午节。中国的农人们正忙于准备包粽子。

中国西南边陲的傣族聚居地——西双版纳。

旖旎的风光，撩拨着游人观光客的情致。来自远方的客人乘兴纷至沓来。他们来领略一方未受文明“污染”的自然神韵，感受少数民族醇酒一般的纯朴善良。

在互不相识的游客中，有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他由一位一眼便能识别出的异族少妇引携着，款款地在风景秀丽的傣寨行走。

老人嘴里轻轻地诉说着，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少妇早被眼前如画般的风景所吸引，忘情地陶醉在美的感受中了。

边疆的天气少女的脸，先时还玲珑剔透的天空、骤然之间就下起了瓢泼

大雨。更让人们愁恼的是，那雨一经下落，便没有停歇的打算；淅淅沥沥，一下就是好几天。版纳的5月，梅雨时节，雾霭连绵。原本就不够先进的空中交通工具——飞机很快宣布停飞。

老人和其他游客一样，无能为力地呆在旅馆里，眼巴巴地企盼着天公作美，雨过天晴。无奈，老天没有作出丝毫慈悲姿态。

泰国公司方面，一个电文接着一个电文送到老人的手上。其中一张电文写明：“有重要客户欲见董事长！”老人心急如焚！

连续几天猖獗的淫雨终于下累了。天，总算放晴。憋了几天的游客急着要回家。可是，一天一班从西双版纳飞往昆明的苏制“伊尔”小飞机却容不得积压数日，且归心似箭的旅客们。

紧张而压抑的情绪蓦地在游客中蔓延开来，谁似乎都无法解决让什么人先走的难题。难题就这样一级一级地送到了上面的某一级。很快，候机厅里传来了来自“上级”的通知，大意为：根据目前的特殊情况，上级做出让重要旅客先走的决定。一切显得合情合理。为难的是，“上级”又没有讲清楚什么样的旅客属于“重要旅客”。于是大家纷纷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可以证明自己为“重要旅客”的东西。有的拿出身份证，有的拿出单位介绍信，有的拿出记者证……然而，绝大多数都受到民航检查部门的质疑。

老人是海外华侨，按一般常理，除了其护照以外，并无其他可以证明身份的物件。只可惜，此情此景，护照是不管用的。要知道，海外有5000多万华人华侨，而这个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估算。老人从容地来到检查人员面前，他并没有拿他的护照，而是从他的提包里慢慢地拿出一张相片。检查人员看过之后，立即恭恭敬敬地将老人扶进候机厅。

原来，相片上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与老人亲切交谈的情景。任何人一眼便能从相片判断出杨尚昆主席与老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请读者不要误解，以为老人怀揣着一张与中国国家主席的合影在大陆到处炫耀。事实上，尽管老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的私交很好，包括何香凝、周恩来、廖承志、王震、乔石、杨尚昆、李鹏等，但是他从不为此炫耀。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度邀请他回国参加国庆40周年庆祝活动，在盛大的国庆招待宴会上，他被安排与王震、李鹏、郑依姆、吴学谦、秦基伟、周世中、蔡明裕（日本）同席。宴会后，国家主席杨尚昆单独并长时间会见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交往亦有过几十年的历史，莫言老人从不开口向政府索取任何“好处”，即使是政府的各级部门多次主动提出给他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以一些特殊照顾，都被老人婉言谢绝。相反，老人在其数十年的人生旅程中，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耗了他大量钱财，费了他不少心血，老人从不计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他的为人做事在中国依然鲜为人知的原因吧。机场的一幕是老人一生中屈指可数的一二次。若不是情急无奈，不如此便不足以解燃眉之急，相信相片会永远地作为私人物品珍藏在他的相册中，或悬挂在宅屋里而成为个人历史记忆和记录的一部分。

故事讲述到此，似乎可以收尾。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切尚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刻，一切也都还在混乱之中；因此，故事也就出现了一波未平又来一波的转折。

从西双版纳来到昆明，老人匆匆回到旅馆，请旅馆的总台帮助办理将他们回程票提前到当日，或者重新购买两张当日从昆明到泰国清迈的航班机

票。服务台小姐电话联系的结果是：最近几天的机票已经全部售出。老人当即请导游小姐设法购买黑市票，只要能买到两张昆明到清迈的当日机票，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

热心的导游小姐急急地去了，她回到旅行社，请同行们一并努力，无论如何也要弄到这两张票。

半天过去，导游小姐一脸沮丧地回到旅馆。她终究没能带回那两张票。春城的天气飕飕地凉，春天的凉爽将导游小姐挂在脸上的汗珠很快地变成印迹，成了一张淡淡的花脸。老人宽慰着她……

几分钟过去，老人悠悠地从钱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上面一串阿拉伯数字。这是他到北京时，一位好朋友留给他的，并嘱咐：“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与这个号码联系。”

老人再一次把导游小姐叫到身边，请她按照纸条上的号码给打一个电话，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对方。

小姐无可奈何地拿着那张小纸条去了，脸上却残着狐疑。心里一定叨咕不已：“我已将在昆明的所有地头蛇全部搬尽，尚且没法弄到这两张票，凭这一张破纸条，一串电话号码能有什么用？”

电话拨通，小姐懒懒地叙述情委，最后干脆通牒式地抛出一句：“到底有没有今天去清迈的票？”

对方回答更干脆：“你来拿！”

导游小姐带着疑团去了。

约摸半个小时，小姐回来了。她边把两张当日飞往清迈的机票交给与老人同行的那位异族少妇，边絮絮叨叨，像是在对人说，又像自言自语：“我按照电话里说的，到了一家办公室，把你们的票给那个人，那个人就带着我到民航售票处，二话没说，把票往桌子上一甩：‘改日子！’就把票办好了。”

“哎，老人家，你那个朋友是谁呀？这么厉害！”姑娘很正色地问。

“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就是我们刚来时请我们吃饭的那个。”老人淡淡地回答。

姑娘没有继续再追问下去，或许她感觉到上次请这老头吃饭的那个“官”派头太大；或许她始终觉得这外国老头神秘兮兮的，不便深究。

当日下午，那个泰国少妇搀扶着老人上了飞往清迈的航班。他们人走了，却留下几个令好些普通老百姓不解的谜。

1993年6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广州举行仪式，授予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华侨国家“一等功臣”称号，并颁发一枚国家一级和平勋章和一册证书。而在此之前，他已受到过国家的多次嘉奖，曾多次被国家评为一、二、三等功臣。在中国，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这位一直未露“庐山真面目”的老头究竟何许人也？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一位绝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人都鲜为知晓，侨居泰国的马来西亚籍华人李引桐先生。

他，

一生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

一生有过各种各样曲折故事；

一生游遍五大洲四大洋；

一生为国家做过许许多多的好事；

一生有过穷人局促和富人奢侈的双重经历；
一生拥有许多国家元首级的至交，也有数不清的下里巴人挚友；
一生创造过企业的辉煌，也有过面临破产的窘迫；
一生有过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举，也时常为朋友的误解而苦恼；
一生有过多次冒险行动，结果都安然无恙；
一生捧红过不少明星，自己却默默无闻；
一生发生两次致命的中风，而今竟依旧穿梭巡行于各国之间；
一生为家乡花了数不清的钱，乡亲们铭记着，他却早已淡忘；
一生具有为人的肝胆豪气，也有资本家的秉性；
一生少不了朋友间的平易，也经常挥洒着专断；
一生做过各式各样的事情，却从不在乎他人怎样评说；

■ ■ ■ ■ ■

我
在这里
所要做的
就是
讲述
这个人的
传奇故事

前 言

本书所写的人与书店柜台上摆放的传记人物不一样：前者你不认识，后者则多数早已非常著名。

本书所写的事与图书馆书架上的历史著述不大一样：前者也许你闻所未闻，后者则多数不再使你感到新奇。

如果那些先前你不认识的人不值得你去认识，你或许会说：“去他的，别来烦我。”

如果那些先前你未了解到的事不值得你去了解，你或许会说：“走开，别浪费我的时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本书所记述的这个人，实在值得你去认识；因为他能教会你怎样从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成长为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而且还快快活活。本书记录的这些事，实在值得你去了解；因为其中的许多事情与共和国的历史，包括外交关系、银行事务、企业制度、特区蓝图、首脑秘闻、冒险经历、政治风波、人物轶事等等都有关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披露。这些事可能与你的生活、你的朋友、你栖居的地区有关系。至少，让我们去结交一位真诚的朋友不是也很令人开心吗？

作者

第一章 苦岁少年

约束本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约束它。
——拿破仑一世

根的述说

当代生命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细胞大约有 140 亿个，而人在三岁的时候，就已形成 70%—80%。人的个性和成就与他们在孩提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李白五岁诵六甲，王勃六岁善文辞，曹植七岁能吟诗……据许多有成就人士的回顾，童年的经历恰恰是他们后来成功的一个动因，一个说明，一个解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幼稚时的记忆。李引桐的童年是痛苦的，是平凡的；童年留给他的记忆也多是痛苦的，但对他来说却是不平凡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少年时的痛苦恰恰成为一笔难以估价的财富，造就了这个不平凡的人。

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地区，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叫南安。没有什么人想去稽考它的确凿语义，也没有很多人愿意更深入地探究它的历史渊源，那只是极少数地方志编纂人员要去做的事情。但“南安”这个名字却给人以深厚历史积淀的凝重感，或许是这里的人民经历过的痛苦太多；或许有过太多恶势力的骚扰；或许这里倚山近海，各种力量都容易选择这一方土地去进行较量；或许……

“南安”寄托了多少人民的期盼啊。

不起眼的县城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也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梅山。由于小，历史上它总不断地在行政管理上被左呼右唤，就像被使唤的丫头。在宋代被称为怀德乡民寿里。元、明、清三朝为十六都。民国时期设梅山乡。解放初期先是划为第十区，后改为第十九区。1958 年成立梅山火箭人民公社。1961 年又改置梅山区，下辖四个小公社。1965 年划出九都、罗东，成立梅山公社。1984 年改社为乡。1985 年 12 月撤乡建镇至今。

梅山位于南安的东北部，境内有两座一大一小的杨梅山，梅山之名也因此而来。晋江东溪流贯全境。当地人又给流经梅山的那一截子水道取了一个同样很美丽的名字——芙蓉溪。它自北向南蜿蜒流过，溪水流至南面的大梅山受阻，飘逸地折其流向洋洋洒洒地与晋江汇合，往大海而去。

芙蓉溪流经梅山盆地中央，仿佛有了悟性，倏地拐了一个急弯，兴许是那地段确实就有灵性，水神也为之让道？这自然是后人的附会，而且这种附会被阐释得有鼻子有眼。因为就在那个水流让过的小土堆——一个与诸多美丽名字极不相称的土里土气的符号“后田”，在本世纪出了好几个大人物：其中有世界级的巨富大亨，有共产党的高官，而且李光前父亲李国专的墓地就座落在那个急弯的土坡上。还有，那一隅之地中的人民普遍长寿，耄耋之年仍神采奕奕者比比皆是……这一切又怎么能阻止那些乡里乡亲茶余饭后的神秘而浪漫的附会呢？又怎么能打得住那些乡绅老者们面对后生好奇的眼光忍不住的杜撰呢？那着实太神奇了。

1913 年 2 月 24 日子时过后，梅山镇竞丰村那个叫作后田地方的一户普通人家，一个男婴呱呱落地。发生在普通人家的寻常事，一切显得平静自然。

这个小孩根据祖上传下来的辈份，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摊到“引”字。按规矩，在李氏家族里，辈份排行早就是既定的：

汝子延字
必世为宗
大有于国
引成斯志
杨保孙贻
英贤鼎起
翊赞鸿基

这个男孩被取名为李引桐。引桐的父亲叫李国外，母亲林氏。父母膝下共有四子二女。长子李引愿，次子李引卜，引桐为三子，四子李鸠陵。长女千治，次女报姑。李国外是当地的土医生，略谙中医，在村里开了一家药铺。李国外在成家以前原也是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村人家，因为他天性很好，打小他的人品就在方圆四周有口皆碑。年青的时候他娶上一个在当地家境相对比较殷实人家的小姐为妻。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小产而去世，而按当地的风俗，妻子死了丈夫要3年以后方可再娶。好在李国外本分，不敢造次。好在他亦想图个安静，无意很快续弦。因此除了每日看管那间小药店以外，经常请教当地一位贤达绅士，半工半学。在那位绅士的指点下，李国外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长进。由于好学勤思，他后来成为村里数得上的有学问之人。他为人极善，经常为乡民义诊送药，与乡亲们的关系很是融洽，如鱼水一般。然李家亦贫，一间小药店，加之每每无偿就诊，家庭开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家里土地又不多，李国外只好不时抽空外出为人种田，赚回一些买油买米的钱，惨淡经营，勉强支撑一个不小的家。好在李国外身体很好，块头也大，一米八十几个头在小乡村显得鹤立鸡群。几年以后，李国外再度婚娶，经过了一次婚姻的不幸，以及几年的学习、经营和思考，反倒使他更加趋于成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孩子的教育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大儿子引愿并非李国外的亲生儿子，而是其大哥的幼子。因大哥家境更贫而过继给弟弟。引愿19岁那年父亲就为他成了亲。引愿成家后，父亲遂让他从家里分出去，父亲试图让孩子成亲独立生活以后能体会操持家业之艰难，以增强一个成年男人的责任感。他开始独立做起卖米生意，但他的工作直接在父亲的督促之下。父亲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他想让儿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地成就一桩事情，使孩子在对一个事业的追求中产生成就意识。这或许是一介乡村医师与一般农民的细末差别吧。而父亲的这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对小引桐的成长多多少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了支持引愿的卖米生意，父亲决计把本来就不大的药铺一分为二，一间用于卖药，另一间用来卖米。引愿后来远渡南洋，到马来西亚独立谋生去了。初到异乡经商谋生，那先前在家乡学到的做买卖的本领可算是最初交纳的第一笔“学费”；别说，还派上一些用场。有意思的是，后来年青的李引桐在南洋初涉商场时，也有过一段做大米生意的经历。或许当年在家乡时，小小少年就已深受濡染也未可知呢。有谁能想象得到，李引桐那不值一提的卖米技巧后来竟撑起了一座经营橡胶的大厦？

二儿子引卜长引桐8岁，因家境贫寒，且家务繁多，只断断续续读了5年书。大哥自立门户以后，他就彻底辍学，帮助父亲照看药店。特别在农事繁忙季节，父亲外出为人种地时，买卖上的事就由他独立支撑，故而小小年

纪也学得一些经营上的本领。二十才刚出头，引卜也步了大哥的后尘，到南洋谋生去了。

大女儿长引桐 5 岁，与千千万万的农家姑娘一样，她没有机会进到学堂读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长女千治除了学会闽南农村女性所需要学会的一切技能：针线、烹饪、帮助照料家务以外，还具备了农村妇女贤惠、忍耐和逆来顺受的品性。在她长到“年方二八”的妙龄时节，就嫁为人妻了。

三儿子引桐虽出生在苦寒人家，可打小就显露出他的聪颖和与众不同，因而倍受父母疼爱。父亲见他好动善学，有意培养他，决定让他多读些书。其他兄弟读书只要读到能粗粗识得几字就可以了，父亲却打算让他尽可能的多长些笔墨本领。因此，李引桐还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他灌输读书至上的思想。由于父亲对他特别钟爱，外出时总是把他带在身边，李引桐小小年纪就学会独立思考；不过，对他来说，“世界”只是一个小镇、一群人、一间药铺。总而言之，一个小社会。他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很早就学会了观察和思索；比如为什么有的人要欺负别人？在一个社会里，什么是“理”？自己应该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之类的问题。才到上学年纪，小引桐就被送进私塾。后又进入村办小学。由于他特别聪明，从小成绩就一直很好。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表现出对读书的特别热情。每遇考试，别人总是夜夜挑灯苦读，他却只在考试的前一两天匆匆准备，临时抱佛脚。学业上不求最好，但求通过。他去读书，是因为他知道未来要成事业不能是个文盲；是因为父亲要他去读书，他不能辜负父母的期望。他不十分努力地读书，则是因为他天性好动，而私塾式的教育带有被动学习方式，他自幼就有意见。他不喜欢受约束，他不喜欢失去自由的天性。从小他就笃信，不是所有的本事都可以在学堂学到的。

然而，在一个穷乡僻壤，一个平常人家养育的小孩，他的行为有什么人在乎，又有什么人去注意？这一切反倒使得农家少年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膨胀着他的个性。约束成了自由的副产品，自由孕育的恰好是人的创造性。几十年以后，当人们面对一个不平凡的人的时候，人们会极为惊异地发现，他的成就不正源于那少年时节放纵、扩张了的基因么？！

20 世纪初叶，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个灾难的岁月。军阀混战，匪祸连年。在中国文化史上，闽南从来便被认定为蛮荒之处。“门中一虫”既昭示其蛮夷，也表达其封闭。地域上的封闭给寻常百姓所带来的好处，是“天高皇帝远”，我自悠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人来管束。但对老百姓而言，它同时带来了生存与生活的一个坏处：盗贼肆虐。当时在闽南地区，各式各样的土匪经常到乡里打劫，或是抢财，或是抢人，年青人被抓去充作壮丁，小孩抓去后被卖掉。搞得乡里民不聊生，谈匪色变。

在小引桐 11 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庄稼收成后的一个秋夜，星星稀稀地播散在天幕上，这种诗情画意般的景致对劳累一天的农人们着实黯然失色。袅袅炊烟从农宅顶上的烟囱冉冉升起，家家户户早早就把大门紧闭。纷乱的世道，老百姓除了学会自保外还能有什么法子？

天，昏昏地暗。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接着又恢复可怖的宁静。小引桐吃过晚饭，照例来到药店陪父亲，他经常在晚上陪父亲睡在店里。

9 点刚过，小引桐正准备睡觉。突然，门外传来急急而错乱的脚步声，

异乎寻常的声响将正打算上床休息的父子俩的神经绷紧了起来。父亲拽拽孩子的衣角，压低声音：“贼来了，你赶紧躲一躲！”小引桐从床上一跃而起，拎着自己的小鞋，立即跑到墙角，将自己瘦弱的身子藏到一个大簸箕的背后。

门很快被人撞开，一群土匪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屋，那个土匪头子把父亲的长辫子缠在手上，用鞭子抽打父亲。土匪们叫叫嚷嚷，要父亲把钱拿出来。父亲当时并没有什么钱，他给人看病经常就不收钱，即使收也很少，因此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土匪见榨不出什么钱财，就要把父亲绑架走。途中恰遇叔叔闻讯赶来，见状便大呼大叫，“围过来，围过来，他们在这里！”土匪以为乡亲们来帮忙，赶忙扔下父亲，夺路而逃。

自从家被土匪打劫以后，父亲思忖着要继续经营他那间药店是不可能的了。何况土匪的这次打劫“人财两空”，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必然再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父亲决定带着引愿和引桐背井离乡去南洋，去投靠那里的亲戚。

这件事发生在 1925 年，其时李引桐才 12 岁。

高扬的藤鞭

在中国的版图上，闽南只是一个小点点。肇端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似乎很少对它有过特别的关注。历史上，在宋朝以前闽南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足以光照青史、彪炳千秋的大人物。然而，正是在这块荒蛮的土地上，却养育着一群与中原品性明显不同的人们，他们创造的闽南文化在 20 世纪中期骤然之间被全世界刮目相看。当代世界顶尖预言作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大著中，谈及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国的天堑长江，把中国人分为南北两部分。历史上，北方人追求仕途荣华，南方人则重利重商。多少年来，南方的商贾和北方的官宦一直关系不顺。南方人对官府一向畏惧，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们的财富，保持低姿态以不受贪官污吏的搜刮。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用行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生财之道。数百年来，南方的商贾阶层已习惯于这种处世原则。他们在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商业，满足于改善家族的经济状况。一旦家乡遇到灾荒，他们便背井离乡到新天地去继续这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商业的评价一直很低，在历史的文本中，包括历史、诗歌、小说、戏剧等，一般不论述商人，即使有之，也多为反面角色，狡诈、重利忘义之徒。南方的商贾阶层自然无法进入精英之列。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果实，它由一个在一方水土里养育的人群创造，也首先为这一个群体的人们所分享。在经济竞争激烈的 20 世纪，这种情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台湾那样一个小小的区域“实体”，迟迟不能与那样一个大的版图统一，与其说是政治原因所致，倒不如说是经济原因所致。而来自经济上的差别，又在很大程度上由东南沿海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品性差别所造成。

有资料显示，遍布世界的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共有 5500 万，他们的资产总额在 20000—30000 亿美元之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还是相当保守的数字。这些海外华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而闽南人、广东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五大区域祖籍地的华人占其总数的 90% 以上，他们所占有的资产总额怕没有人能够精确地估算出来……

就在这个很不起眼的闽南小镇——梅山，竟出了一个巨富李光前。顺带

一句，在 1987 年一家权威性的世界级杂志评出的当今世界华人十大巨富中，李成伟名列其中。李成伟乃李光前之子。

闽南籍华人在海外发展之初，是靠同乡宗亲的聚合、艰苦朴素、团结奋斗发展起来的。

李光前先生与李引桐系同辈宗亲，他们在乡里的宅居仅一箭之遥。当李引桐一家遭到土匪抢劫，家乡无以安身之时，他们自然想到了远在南洋的李光前。于是，父子便踏上了离家的路程。尽管在异国他乡有这么一个宗亲，可是又有谁会想象得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要离开自己生长的故乡，离开这一方早已视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土地时的那份内心苦痛和对未卜前途的担忧呢。

清早，李国外带着孩子们，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登上了旅程。家乡的雾霜还没有散尽，潮湿的空气中浸着泥土的芳香，他们边走边回眸那渐渐在眼帘中变小的村庄。李引桐在内心强烈地呼喊：故乡，我还要回来，我还要回来哟……

父子三人匆忙离家，沿着崎岖的山路走着；这时候，他们才感到离家的步伐如此地沉重，家乡的路是这般地崎岖，通往外面世界的那个山口竟是如此难行。对于小小年纪的李引桐来说，离开自己家乡更确切地说不只是身体上的考验，还有心理上的折磨。

一家三口出了梅山关卡，坐上了开往泉州的木船。不过 3 小时的行程，他们就到了泉州。

泉州，这个历史名城，明清时期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此时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早先的出海口已是淤泥堆积，取而代之的重要出海商埠口岸也早已为闽南的另一个重镇——厦门所取代。

李家父子来到泉州以后，先在亲友家里投宿，接着就到船运公司买第二天去厦门的船票。泉州往厦门的小火轮每天一班。

翌日，晨曦初露，三人就急急告别亲友上了路，匆匆的步履，让人看得出他们是在逃难！谁说不是在逃难呢，家乡的美丽景色大家都没有欣赏的兴致。

小火轮依着海岸缓缓而行，一个大烟囱“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吃力地划破海波，像一头营养不良的瘦牛，驮着沉重的牛轭，在田里犁地，它试图摆脱犁轭的羁绊，却又怎么也办不到。小火轮在海里悠悠地走着，李家三人在破旧的船舱里长时间地沉默。命运将他们抛向何方？漂泊的人儿从此开始了流浪的生涯。李引桐虽然很懂事，毕竟年岁尚小，经不起旅途的劳顿和火轮上催眠般的声响，很快就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被父亲叫醒，睁开双眼，厦门已在眼前，他还来不及揉一揉睡眼，就跟着父兄，随着人流上了码头，消失在了茫茫的人海中……

又过了几天，他们登上了一艘厦门开往新加坡的邮轮。但是父亲并没有与他们一起前往新加坡，而是留在了厦门。到底一家之主啊，梅山还有老小数口。思前想后，父亲最终还是放弃离开家乡的念头。他决计先在厦门避些日子，待风头过后再回家。他事先请厦门的亲戚买好两张船票。当时从厦门前往新加坡的船票很便宜，成年人的票价为每张 10 元。李引桐因尚未成年，买张半票，为 5 元。

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为亲人送行的人们挥动着他们的手臂，千言万语都汇到了那无助而无奈的手臂挥舞之间。李国外的心在流血，眼泪溢出了他

的眼眶，他悄悄地将它拭去，他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这一幕，尤其是不能让小引桐瞥见他心碎时的模样。孩子才 12 岁，才 12 岁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就要离开父母到异国他乡去谋生，如此撕人心肺的场面哪一个不为之动颜？

孩子似乎体会不了那么多的东西，反倒表现出了“大将”风度，面对渐渐小了的亲人身影，不停地摇着小手，他是在模仿大人的样子，抑或表达只有小孩方能体会到的情感。没有人去探究它，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这结果就是，李引桐后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人们于是相信，12 岁离家的事件在多大的意义上对这个人的生、人品和人格产生作用。

世界上有许多不朽的人格和心灵，有许多崇高的思想和行为，它们总被人们作为精神楷模和行动榜样来效法。同时人们也热衷于对这些伟人的生、轨迹进行探寻。人们试图对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进行探微。然而，善良而幼稚的人们的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具体的行为都带着历史情境中的偶然性，这种历史情境中的偶然性则是永远不能二次重复，也不能加以复制的；底片和复制出来的东西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具体的事件虽不能重复，原因与结果之间却有着强烈的逻辑性。那就是，伟人的童年多不幸。这，或许才是最具有教化意义的东西。

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行驶，时间和空间好像都失去了意义。旅客们经过一阵暂短的新奇之后，大都昏昏欲睡。有些人经不起风浪的颠簸，将腹中发了酵的浊物全都倾吐出来。李引桐全无这般痛苦，或许命运早就注定他一生要作漂泊的旅行。只是离开家乡这几天实在太劳顿了，船离开厦门不久，他怀揣着随身的小包裹睡了过去。

记不清那邮船在海上漂浮了多久，不知是谁率先一句：“到了，到了。”先前看上去没有任何生命冲动迹象的人群仿佛突然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争先恐后地做着什么，船舱里、甲板上，人头攒动。

船在靠岸，慢慢地。船上的许多人也和李引桐兄弟俩一样是初次外出，而且第一次外出就跨出了国门。更有甚者，其中不乏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彼时彼刻的忐忑心情可想而知。

铁门终于敞开，舷梯总算放下，经过几天旅途劳苦的人们前胸贴着后背接踵而下。谁也闹不清楚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新加坡海关，这个旧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门槛，正腆着雍容的大肚，颐指气使地面对一群来自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的“叫化子”移民。着急等待入关的人们蛇一般地排着长队。海关的入关手续并不复杂，一个殖民地官员手举着藤鞭进行着抽人数数的简单手续。移民的数字就在那每一下高举的藤鞭中向上累计着；每一个来自中国的人都同样领受了先挨一鞭再进别国之门的特殊“礼遇”……

打在李引桐瘦小身躯上的那一鞭，就像是一块烤红的烙铁烙在他的身上，永远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在肉体上，更在心灵深处。这种人格屈辱长时间地炙烤着他。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意识到，旧时海外华人所受的屈辱乃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祖国是个受尽屈辱的国家。也是到了后来他才意识到，海外华人要真正在人家面前扬眉吐气，只有祖国繁荣富强。

李引桐有一堂哥早在他们兄弟俩去新加坡之前就已经在陈嘉庚的一家砖窑厂管机器。20年代陈嘉庚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其产业遍布世界许多国家。李光前当时已是陈嘉庚的乘龙快婿，并出任陈嘉庚总公司的总经理。陈嘉庚也是闽南人，祖籍为厦门集美。早年在东南亚的华人企业中，地域、方言、宗亲等成了创业之初的维系纽带。一方面，老板也愿意用自己的同宗亲戚，同宗亲戚、乡里乡亲有着对企业天然的忠诚，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企业无形中成了他们共同组成的另一个家。加之，语言、风俗、习惯等大同小异，相互没有任何障碍。另一方面，家乡的亲友们也把远在南洋的富有亲戚视为自己的某种依靠，家乡一旦遇到什么天灾人祸，他们就会到南洋去投靠他们。

李引桐兄弟自然也是去投靠的。他们一去就被安排在堂哥的那个砖厂。李光前有意将自己的李氏宗亲置于他所管辖的范围。李引桐的堂哥在砖厂做经理，李引桐于是留在那里看机器。引桐毕竟年长几岁，已近成年，除了看机器以外，他还可以干些压砖、贴板之类的体力活。引桐还是个孩子，还处在贪玩的年纪；何况身体亦未发育，充其量也只能搬几块砖。

父母亲不在，哥哥得干活，自然无暇更多关照弟弟。李引桐反而经常自由自在地徜徉于大自然之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玩耍放纵。无拘无束的生活原本又极符合他的品性。他日日徘徊于山野，流连于森林，一切烦恼和忧伤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之中化为乌有。

可惜的是，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有一次，不知何故李光前到砖厂来，看到李引桐在砖厂里玩耍，便把他叫到跟前说：“小孩子，你这么一点大在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你该去读书呀。”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把他带到一所李光前曾经在那儿教过书的小学，对与之共过事的老师交待几句就走了。从此，李引桐又开始了他的新的学生生活。

当时的那所学校主要是满足华侨子弟的就学问题由华侨捐资兴建的，加之地处偏僻，因此学校很简陋，没有宿舍，晚上睡觉时就用临时搭起的帆布床。为了避免睡觉的时候从床上摔下来，学生们在睡觉之前就把桌子搬到帆布床的旁边，睡觉时把桌子当作枕头，起到固定作用。

同学们见李引桐是刚从国内来的“新客”，经常来捉弄他，问他有没有吃番薯（即红薯），有没有经常放屁……李引桐天性好强、好玩，怎受得了如此拘束枯燥的生活，怎么受得了被人奚落？！上学没几天，他就偷偷跑了。此前不久，李引桐的父亲因在家乡仍无法生存，也远渡南洋，前来投靠自己的亲戚们。李引桐逃学也不想让他的父亲知道，他不想牵连自己的父亲。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亲在那里充其量不过是一名伙计。于是，他照着记忆，找到了梅山人在新加坡聚集的地方。早年南安梅山人在新加坡最主要的行当是做碗糕生意和给人拉黄包车。李引桐就有一个亲戚在给人家拉黄包车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李引桐找到了来自梅山的工人聚集地，天天与他们厮混在一起。他们中有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劳苦工人，李引桐在这儿了解了许多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品德。

后来李光前因事再一次来到学校，发现新来的那个小孩不见了，就去寻问他的父亲，父亲也不知道孩子跑到哪里去了，正在着急。只好动员熟悉的乡亲们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梅山劳工聚集堆找到了这个小孩。李光前极为生气，他可能有生以来从未见到如此胆大，如此我行我素的孩子。李光前于是找到了李国外，说：“你这个孩子不得了，你不打，我来打。”

李引桐受到惩罚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越发“野”起来。逃，还要逃。你抓一次，我逃两次；你抓两次，我逃三次……而且越逃越远。

早先，他们住在一个小岛上，新加坡是个大岛。为了不受管教，这次李引桐决计离开小岛。他逃到轮渡，独自一人乘坐电船离开了小岛，回到堂哥所在的砖窑厂。在那里呆了些日子，觉得不是久留之地，因为李光前会不时地到处巡查，得不断地换地点方能躲开李光前的追踪。后来他决定去麻坡找他的二哥。这时二哥引卜已到麻坡去照料橡胶园。又经过一系列的“冒险”行动，他总算来到了麻坡，一头扎进了割胶工人的堆里，跟着他们学割胶，听他们讲述从家乡到南洋的辛酸故事。十几岁的孩子获得了许多在此年龄怎么也学不到的东西。

麻坡当时还是个原始森林，一望无际的苍天大树，栖息着许多猛兽，特别是老虎时常出没，也不时地伤害工人。本世纪之初，麻坡有一个橡胶园园主是个英国人，就是因为当时不断有老虎咬伤割胶工人，以至于工人们不敢在当地的橡胶园工作，纷纷逃离麻坡，橡胶园处于破产边缘，不得已低价出卖。李光前当时为买麻坡的橡胶园还与陈嘉庚有过一次不快。因为按照当时的胶园价，像麻坡那样的上好胶园，每英亩至少要卖三四百元。而英国卖主只出每英亩一二百元的出售价。李光前在得知此信息之后，迅速找到了卖主，买下了麻坡的那块胶园。他原以为这笔生意会赢得岳父大人的欢心，不料陈嘉庚得知以后大为恼怒，他把李光前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你跟我做了十几年树胶生意，你自己也每个星期到麻坡，难道不知道那个红毛（闽南语中对洋人的称呼）园是没有人要的吗？我早就知道这个红毛园要便宜出售的了，不过，这么久都没有人要买，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红毛园里有老虎，割胶工人曾被老虎咬伤，很多人都不敢去这个红毛园割胶。再便宜又有什么用。没有工人去给你割胶，到时树胶园变成茅草芭了！”我们在此插叙这段历史轶事，并不是对这桩生意的得失产生兴趣，只想说明在那个时代，麻坡的确经常有老虎出没伤人。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那块园子里，有一位同样来自闽南的少年与老虎开了一个玩笑。

李引桐偷跑到麻坡以后，经常跟着堂哥去林子里砍树。一天，他照例与往常一样，跟着堂哥去到密林深处。堂哥径自干他的活，引桐在林子里玩耍，忽然，他看见树林深处有一只小老虎，煞是可爱，看那样子才出生不久。李引桐竟把小老虎抓回家来，用绳子绑着像玩猫一样耍弄。待到工人们下工回来，看到这个少年牵着老虎在四周跑，开心得忘乎所以，工人们个个脸都吓青了，他们议论纷纷：“这孩子不得了，胆子也太大了！”因为谁都清楚，一旦母老虎回窝发现小虎崽不在，一定会到处寻找。大凡动物都有这样的特点，愈是凶猛的野兽，它对孩子愈加爱护。林中之王——老虎堪为典范。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一首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於菟”系老虎的古称，“狂啸者”此亦指老虎。看来，老虎怜子惜子的本性体现得很充分、很典型。只可惜，我们这位闽南孩子还太小，还不懂得这个道理；自然也不会懂得他与虎子开心的玩耍潜伏着多大的危险。

堂哥收工回来，见堂弟还兴致勃勃地与小老虎在戏耍，吓得六神无主。

他二话没说，赶紧责令弟弟把虎子放回到森林里去了。

在麻坡的半年中，李引桐一边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陶冶，体会着大自然给他所带来的妙趣，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堂哥在麻坡事实上干着杂活，除了看林子，砍树，还兼卖一些杂货给当地的工人们。有时也去河里捕些小鱼之类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出售。李引桐不上学，自然也就经常尾随着堂哥做这些事情。当地的主管见这小孩子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就对他说：“引桐，我看你闲着没事，干脆你到伙房去帮助烧饭，给你工钱，如何？”李引桐没有回答，主管见他犹豫不决，便接着说：“看在你堂哥的面上，加上你又是老板的亲戚，给你每月6块钱。”

这样，13岁的李引桐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尽管他并不知道“工作”中的各种规矩和关系，但他知道，既然有了一份工作，就应该干好它。所以他在伙房里还是兢兢业业地干。

此后不久，李引桐的父亲李国外也来到麻坡，因他是李光前的长辈，李光前称他为“叔叔”。李光前见李国外到来，欲为之安排一份工作，他先请李国外看胶园，李国外以不熟悉橡胶为由拒绝了。后李光前想起李国外在梅山是医生，遂建议他为胶园里的工人看病。因当时在东南亚国家，到处传播着热带病。特别是华人移民，刚到不久，水土不服，时常染上莫名疾病。加之当时在麻坡，疟疾很严重，工人们在晚上发作时，因惧怕老虎不敢上医院，要等到第二天。工人们总是整夜躺在破烂不堪的工棚里，倍受病苦煎熬。橡胶园确实也需要一个医生。李国外见这份工作很适合于自己，也就满口承诺，干起了行医的老行当。

虽然父子得以团圆，虽然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然而毕竟李国外想念故乡心切，毕竟孩子应该去读书，毕竟麻坡的条件也很差，毕竟……李国外在麻坡干了几个月以后，起了回故乡的念头。他与李光前商量以后，得到李光前的同意，并一再说让李引桐回家以后要到学堂去读书。临行前，李光前拿出600元钱给李国外，希望他用这笔钱在梅山办一所学校。

在外漂泊了一年多以后，李国外带着他的三儿子李引桐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途，带着一份游子思念，一份游子乡愁……

“我不要受穷”

李国外带着儿子回到梅山。时局仍未好转，在偏僻的山区甚至还多了地方势力的压迫，兵匪一家，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

李国外怀揣着李光前600块大洋，对于一个老实厚道的乡下人来说，这委实是令人心跳的天文数字。他时刻未忘李光前要在家乡办学的夙愿；但毕竟自己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而不敢贸然处之。他请了当地贤达李国钦等人，把李光前要在乡里办学的意愿转达给他们，同时把这笔钱如数交给他们。很快，在梅山一些有识之士的策划和运作下，学校顺利地办了起来。李凤翔出任校长，校址设在李氏家庙，并把梅山小学命名为光前小学。从此，许多原来读不起书的农家子弟都进了学校。李引桐也和孩子们一道进了光前小学学习。

光前小学在动乱的时代，在没有进一步经费支助的情况下，惨淡经营了一年多，终因国势混乱，也因为无法正常地与南洋各地亲友们取得联系而中断了经费来源，在600元告罄之后，学校宣告倒闭。1928年，李引桐转到罗

溪学校。1929 年又转到兰园学校。中途几经动荡，或时局不稳，或土匪打劫，学校停办等，他一会儿上学，一会儿辍学；一会儿走东，一会儿行西。记不起究竟读了几年的书，总算于 1931 年在兰园学校完成小学课程。

小学毕业后，李引桐考入泉州培元中学，父母反复考虑后决定把李引桐送到泉州培元中学继续学习。无奈当时家里没有钱交学费，只得再度求助于远在南洋的李光前。李光前很快汇寄来 120 块大洋。父亲见学费有了着落，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要知道在那种社会，穷人家多么希望自己有一个孩子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缘始于几千年前，肇基在中原的儒家伦理，却能掠越时空，在广大老百姓心中开花结果，实属人类一大奇迹。具体到一个边远落后的小山村，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并不十分清晰地知道，究竟读了那些“圣贤书”有什么用场，而只是隐隐约约依着古训：“读遍圣贤书，方为人上人”。不过，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因为它一直支持着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期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引桐似乎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些大人的良苦用心，有意安下心来读书。和别的孩子一样，他打点好行装，背着简陋的包袱到了泉州，去过独立的生活。

在泉州，培元中学是当地的“重点中学”。李引桐在那里结交了几个朋友，一位名叫陈启舟，后来成为农业专家，迄今仍生活在福建。两人现在都已年过八旬，仍为挚友。只要李引桐回到家乡来，都要请陈启舟到梅山或是什么地方见面，共同回首在培元那段风华正茂的快乐时光。

培元中学学习时期，是李引桐真正以自己的方式了解生活，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生活的时期，也是他的世界观渐渐成型的时期。十六七岁，青春的花季，此时的生活经历是注定对他们的未来的人格产生作用的。西方当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的研究表明，每一个人的青春期，也就是在大约 15 岁至 18 岁期间，会产生所谓的“认同危机”，即他们会以自己独立的眼光去看待现实中的事情，并会不断地在自我的心理层面里提出诸如“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们面对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等等问题。这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作为独立人格开始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开始，也是建立属于个人自我价值观的开始。这一切对他们以后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阶段里感受的事情，朋友的情谊，毫无疑问，将长时间地留驻于一个人的记忆中。

李引桐在培元的时光是愉快的，同学间的友情，无拘无束的生活，运动场上的汗水，稚气未脱的举止，对未来的憧憬构成了这一年龄的特有乐章。然而，这一时期对李引桐来说又是痛苦的。他所面对的那种生活是那样的窘迫，他所见所闻的事物又是那样的震撼心灵，以至于成了他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中学时代，李引桐还有一位朋友，名叫李昆良。当时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他的亲人在菲律宾属有钱人家，经常寄钱来。李昆良虽系富家子弟，对像李引桐这样的穷朋友却极为慷慨。时不时地与他一同外出搓一顿，或是到冰房里吃冰，或是到馆店里吃一碗炒米粉。这些“奢侈的享受”都是李引桐以前从未有机会获得的。就是李引桐成为巨富以后仍没有忘记那第一杯冰水，第一碗炒米粉是他的好朋友李昆良请他吃的。解放初期，李昆良到了香港，再见到他的儿时挚友时，李昆良的处境较为困难，李引桐就让他到自己在香港的一家公司出任经理。公司破产后，李引桐还长时期地资助过这位老朋友。

不过，其间不存在任何“礼尚往来”的交换，一切都建立在朋友的情谊之上。当然，这都是后话。

回想起两个人的少年时光，有一段故事李引桐总是津津乐道：一天晚饭过后，两位好朋友照例来到学校边的龙眼树下，谈论着刚吃过的那一顿令人回味无穷的晚餐。原来，那一天李引桐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一小碗白米饭和一小截卤猪蹄。两位朋友聚在一起，仍对那“极致的幸福”感到言犹未尽。经过充分的回味之后，李引桐对他的朋友李昆良说：“如果我以后有了钱，我要天天吃猪脚白米饭！我还要让梅山人也能吃到猪蹄和白米饭。”这仿佛是一种理想、一种承诺，或许并不会有很多人能够体会到一个穷孩子对贫苦的那般怨恨和对富裕的强烈企盼。“我不要受穷！”这是多少穷人孩子的愿望。说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好像是因实现理想而快乐，又好似是对孩提时代诺言的兑现，李引桐一生对米饭配红烧猪脚百吃不厌。即使是今天，每次李引桐回到故里，乡亲们早已心有灵犀，香喷喷的红烧猪脚已等待着先生的享用。而且，他总是喜欢与梅山的乡亲们一起分享。更令人不解的是，李引桐晚年曾两度中风，医生多次劝诫，不能吃猪肉，谁想到他每遇至此，都幽默风趣地回答：“猪蹄不是肉”。这“白马非马”的机智在逗人发笑的同时，更多让人们感到的是一种自幼而来的情结，它如此深沉、如此执著。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却狠狠地挫伤了李引桐的自尊。

又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约摸中午放学时分，李引桐背着书包从学校出来，两人在他们约定的地方碰头。李昆良突发奇想，要带他的好友到他一个有钱的亲戚家吃饭。他的这个亲戚当时在泉州任商会会长，是个很有脸面的人物。李昆良带着他的穷朋友到来时已是中午用餐时分，佣人旋即到厨房去煮了两碗面。当佣人把面端上来的时候，给李昆良少爷的那碗里盛满了上好的料，而端给少爷的穷朋友的那碗，则几乎是一碗清汤面。这种因穷便受到另一等对待的情形深深地刺痛着这个穷孩子。这件事对李引桐影响很大。他当时就发誓：“我有朝一日富了以后，一定要善待那些穷朋友。”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人格受到歧视后的另一种反应是在这位少年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呼喊：“我不要受穷！”“我不要受穷！”

培元中学美好而伴随痛楚的时光并不长久。两年过后，土匪在培元中学的所在地放了一把火，培元中学受到了空前的洗劫。可怜那些莘莘学子，未及读完学业就无校可入。大多数学生只好回乡务农去了。

不过，这次李引桐并未完全辍学。他寄住在堂姐家里。堂姐夫是个私塾先生，他一个人教几个学生。不能到培元学堂上课，李引桐就跟着堂姐夫学些东西。堂姐家的条件也不好，白日里跟着几个学生上课，晚上李引桐就与堂姐夫同挤一张小床。那种精神和肉体都受到约束的生活，对他来说无异于折磨。一些日子以后，他执意要与那些学生一道住到附近的一个破寺庙里去。堂姐拗不过他，也就任他搬到寺庙里去住了。

闽南信佛成风，不过，在动乱的年月里，人们饱受兵匪压榨，不几年还要来一次不大不小的自然灾害，人们在庙里烧过几柱香以后，生活却一如既往，久而久之，那些寺庙殿宇也就门庭冷落了。谁能料想到，破庙没有人来烧香，倒成为一群穷孩子的栖身之所。

冬天，寒风呼呼地穿过破败驳落的窗户，冷气逼到了孩子们的床前。夏季，蚊蝇骄狂着它们的肆虐。一群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不但要与贫困抗争，还

得与蚊蝇蚤虱战斗。特别是与那些虱子的搏斗，演出了一幕幕回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他们脱光了衣服，赤条条，挨件衣服地捉虱子，把虱子用指甲卡，发出“啪、啪”的响声；很多时候干脆把虱子往嘴里送，用牙齿把虱子咬死。在这种别具一格的与“自然”的斗争中，那些天真无邪的农村孩子们享受着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的乐趣。他们光溜溜，一无所有，共同在艰难的环境中求学；他们赤裸裸，不名一文，分享着与自然抗争的惬意；他们一丝不挂，嬉戏追逐，实践着集体为家的人生哲学妙谛……谁说这种人生体验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没有益处，谁说这种经历与后来的成就没有任何逻辑因果关系？“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真正的伟人大凡总与他们儿时的贫寒与苦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运不济，百姓岂能安身。动荡的时局一年紧似一年，当地的土匪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各地骚扰。学校并非圣地，即使是，土匪亦不会放过。因此，孩子们的读书也就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风声一紧，学校就放假。学校里的学生事实上学不到什么。李引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断断续续地学习，到了18岁的时候，他仍在初中读书。尽管课本上的东西没学到什么，人生体验与实际生活的能力却增加了不少。这些独特的知识对他后来的人生旅程有极大的裨益。

少年的不幸并没有把他天生的倔犟性格摧垮，反倒使他养成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事物，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人生的习惯。从小就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从小就喜欢冒险，并且敢作敢为。这些品格与素质后来为陈嘉庚、李光前等人所赏识。也因为这些品格与素质使他成就了许多其他人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促使李引桐早早地关注他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学会把周围所发生的事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还只是停留在情绪化的层面，但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已属不易。有这样三件事，他仍耿耿于怀。

李引桐有一个朋友，叫陈波。家境极其贫苦。父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陈波的姐姐外嫁他乡。女儿死不从命。可旧社会的女孩子怎能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出嫁的那一天，男方用轿子欲将新娘子强行抬走。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却无法打动人们的心。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农民，对千年遗下的祖宗法礼的认识到了近乎麻木的地步。一个姑娘在她出嫁时凄惨的恸哭声远远不足以打动乡亲们的心，也未打动她生身父母的心。姑娘被强扭进了轿子。轿子终于被抬了起来。想不到姑娘却从轿子上跳下来，哭喊着跑回家。男方立即就有几个人将她抓住，点起一堆火，让她站在火堆中间，以此种方式威胁姑娘。熊熊的烈火把姑娘团团围在中央，人们可以依稀看见姑娘通红脸上残着的泪和她那双无助的手，沙哑的哭泣声早已失去先前的尖利。火堆旁围拢一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人们。还是孩子的李引桐目睹着这惨烈的一幕，他的心在淌血！呜呼，可怜的姑娘！呜呼，我的乡亲们，你们到底怎么了？

这撼人心魄的一幕长久地刻在了这位少年的心坎上，不停地刺激他的思考。后来他慢慢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国家要强大，首先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没有这个条件，前者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百万富翁后，他创立了以自己故乡名字命名的“梅山基金会”，开宗明义：“提高乡亲的文化素质。”

第二件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引桐堂伯伯的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抓去

当兵。他的这个亲戚在部队里因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饿得皮包骨头，最终患了重病，被遣返回乡。对于这位抗日英雄，李引桐在没去见他之前将他视为很了不起的人。可是见到他的时候，着实把少年吓了一跳。这位抗日英雄的狰狞面目，那副衣衫褴褛的模样，那种风吹便要倒地的架式，那具骨瘦如柴的身躯，与少年原先的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他无法想象，如此军人竟然有本事去打仗。当时少年就斗胆与这位亲戚开了一个玩笑：“你这模样还要去打日本，怕是日本人还没打就被你吓死了！”玩笑虽近乎残酷，却让少年朦朦胧胧认识到一个道理，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国民的强大，没有强大的国民，再大的国家也是徒有虚名。

常言道：幸福的感受很相像，而不幸则各有各的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类体会幸福大致一样，体会不幸却各不相同。但是，对于旧时代的中国少年来说，尽管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最大的不幸无疑是他们国家的不幸所带给他们的苦难记忆。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李引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虽然是具体的某人、某家的事情，可这些事情的根源则来自于国家。李引桐有一个堂叔曾被抓去当壮丁。那种世道，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来抓壮丁。一伙强人，背着几杆枪，就可以到村里来绑人。大多数都是以抓壮丁为名，实际上是卖人。李引桐的堂叔被抓以后像商品一样被辗转卖给人家当苦力，侥幸跑了几次，又被抓走。最后人被榨干了，神智也不清楚了，才被放回来。可是在那样的社会里，每家每户自身难保，各家各户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又有谁有能力去帮助他人呢？李引桐的堂叔只好天天去捡烂红薯，把水挤干后贴在墙壁上，晒干了以后再吃。少年李引桐偶尔拿一点东西给他吃，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亲戚朋友的苦难像铅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作为一个农家少年，李引桐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它。他只能在心中不断地发出呐喊：“我不要受穷！”同时，一个信念也越来越坚定地在他的心中形成：我要挣钱，我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经过几年的停停歇歇，李引桐总算从培元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寒，父亲让他报考师范学校，因为只有读师范学校才能够保证顺利完成学业。加之父亲在乡里多少也算是有一点知识的，他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中将来有一个教书做先生的人。平日里学习并不特别用功的李引桐也没令父母失望，一举考上晋江东湖师范学校。此事发生在1933年。正当年青的李引桐打点行装，准备去实现父亲为他勾勒的人生蓝图的时候，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入闽，与福建的地方势力结合，成立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泉州召开，到处张灯结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那些背着枪的十九路军与以往的形形色色的兵匪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他们没有像以往的兵匪那样骚扰老百姓，百姓们自然乐得个高兴。然而，人们正沉浸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喜悦中，似乎还来不及闹清楚谁是谁，也来不及更多地体会新的人民政府给老百姓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就引来了蒋介石的飞机对泉州的狂轰滥炸。人民又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学校也宣告停办。李引桐遂成了一名永远来不及入学就读的师范“预备生”。在那样的国情和世道里，学生安心读书只是个美丽的梦。而这次事件成了李引桐再一次离开故乡，远渡南洋的直接原因。

第二章 伟大的零

为青年，伟大的零有一颗坦荡的心。

.....

青年的热情把钱箱装满.....

——赫伯特·黑克曼

初出茅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轨迹，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轨迹都不一样。这种差别的意义往往并不表现在各自不同的方式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无论是当事者抑或是其他入对这些不同之处的认识程度和水平。有些人除了他的肉体仍苟且于人世外，其余则所剩无几；有的人尽管生命奄奄，仍不止上进，仍不息进取，这正体现出生活和生命的真正价值。这种生命不歇，永无思滞者，其进取动力源于对未来的强烈渴望，并且他们总是时时刻刻将其行动的开始视为零起点。人类如果在认识上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放在零起点，在心理上、行动上都完全地放下包袱，去迎接新的挑战并做好接受失败考验的准备，那么，成功就离他不远了。相反，时时刻刻抱着过去不放，沉湎于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或曾经拥有的那么一丁点东西，驮着沉重的包袱，那么，他又能得到什么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零的起点永远是伟大的，无论是就过程还是就结果而言都如此。

太阳每天照样升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934年，21岁的李引桐再一次走出了那座熟悉的梅山山坳，踏上了远离故乡的旅程。但这一次已与上一次完全不同，他要去创业，用自己的力量和热血去描绘青春的理想，去勾画属于自我的未来.....

经过几年苦难生活的磨练，他长大了，他成了真正的男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本能地感到现在到了靠自己独立谋生的时候了。天还是那块天，地还是那角地，故乡的人困苦依然。当他最后用依恋的眼光回眸养育自己的那块贫穷土地时，心中充满了万语千言，他默默地在心中说：“故乡，你的儿子走了；他终究要回来的！”

那条蜿蜒的山路上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脚步，它通向远方，远方。

第二次只身远赴新加坡，年轻的李引桐反而没有少时的忐忑，有的只是一腔激情，创业的激情。他意识到，这是他生活的新起点，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渴望飞，渴望接受暴风雨的洗礼。这时的李引桐尽管对他的未来仍然还没有清晰的构想，但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已经拥有了健壮的体魄和饱尝苦难的经历，这才是无价的财富。他一无所有，但他相信，只要努力，他就可以拥有他所要的一切。

这一次当他再度去见李光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7年前因逃学而与李光前捉迷藏，被李光前训斥的那个李引桐了。他要来工作，要来劳动，要来靠自己的手挣钱。李光前见他已经长大，成了一个有文化的英俊青年，并有志干一番事业，非常高兴，遂有意培养他。此时的南益公司也正面临着一个迅速发展的机遇，需要有一批年轻人为之奋斗。早期的东南亚华人企业大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以亲缘、地缘和业缘相揉合。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人

们生活的共同社区内，建立起某一种行业的共有规则，将某一姓氏宗亲聚集到一起共同发展。李光前深知，南益要发展，首先要培养一批自己的中坚分子；这些公司未来栋梁之材的选择自然首先考虑李氏宗亲。恰在此时，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自己的同乡亲戚出现在他的眼前，李光前有说不尽的欣喜。但是，要干好一种行业，首先要对其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必须从最基层做起。这是对一个人重用的最好的方式，也是培养人的才能的最佳途径。南益最初主要是从事橡胶生意，要成为这方面的好手，对胶园的管理，橡胶的生长过程，橡胶的种植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品种的改造，原料的收购，与一盘、二盘、三盘间的交道与关系，橡胶价格认识和把握，期货买卖，国际市场的供需变化，与银行的信贷业务乃至国际上政治、军事、国家权力变更等都要有所了解。要达到如此境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最初级的事情做起，而且要学会用脑子去做事。

李光前立即派他到马六甲橡胶工厂去收购原料。具体的工作很简单：秤胶、看磅秤。这样他就有机会与小园丘主、割胶工人、种橡胶的农民、二盘商等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加上他少年时期在麻坡橡胶种植园的经历，他不仅很快了解到橡胶种植、生长、收成等的生产过程，而且懂得了从事天然胶生意的规则，学会了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

毋庸置疑，生活是艰苦的。公司对远道而来的华人来说就像一个特殊的“家”。虽然其中很多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但老板只有一个，他就是李光前。其他人，严格地说，都是伙计；何况李引桐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至为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学习。他每天吃住在收购站，夜晚，成群结队的蚊虫不断地对他实施“空袭”，亚热带的气温压得他透不过气，好在这一切对于一个吃惯了苦的年轻人来说，总比在家乡时时尚有生命之虞来得好。每当想起这些，眼前的困难就不显得怎么样了。他一门心思求索，孜孜不倦工作，秤橡胶的账务记录从未发生差错，深得老板赞许。

毋庸置疑，生活是简朴的。作为低级伙计，李引桐开始时的工钱为每月薪金 12 元，外加理发费每月 1 元，此外就是每天早餐公司补贴 1 角，这就是他一个月的全部收入。李引桐很满足，他知道，钱是有得挣的，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学会这一行业中的所有东西。对于微薄的薪金，他安排得周周致致。他的生活非常节俭，每天早餐只花七八分钱，除了理发和最基本的零用开销外，他还能多多少少剩余一些，他就把它们存起来，寄回闽南老家，奉养父母。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账务的认真记录，有些地方还体现出独到之处，因此很为李光前所赏识。1935 年，适逢南益事业发达，李光前准备扩大其业务规模，急需用人，于是很快就委任他当安顺分厂的财务。在一个橡胶公司的分厂里，除了分厂经理外，财务是事实上的第二把交椅。而此时的李引桐刚刚度过他的 22 岁生日，距他独立出来谋生也仅仅一年。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在芙蓉、吉隆坡等分行掌管财政，并逐渐地参与了决策。他的才能也越来越显示出来；李光前也越来越信任他。

别致的爱情方程式

爱情与婚姻，不言而喻，是两个人、两种性别共同参与的事情，就像一个方程式： $X + Y = Z$ 。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产生了感情，那么，“Z”

就成了一种结果，那就是爱情；如果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因为有了爱情，进而导致成婚姻，则“Z”便成了又一种结果，那就是婚姻。当然，此种方程式只是规则。任何规则只具有一般的逻辑意义，也就是说，它只能说明一般，并不能演绎到所有的“个别”。世界上有爱情却终不成眷属者大有人在；同样，一桩婚姻捆绑着两个没有爱情的男女也比比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假设的或曰类比的爱情方程式中，X和Y总是变量；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情境就像那些变化着的数，最终将推导出不同的结果“Z”。另外，世界也因为有了那许许多多的个体和“变数”，方显出爱情与婚姻方程式的魔术色彩和魔方性质。

爱情与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在这里，我们的主人公是其中的一半。现在到了让另一半亮相的时候。古代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对爱情和婚姻有一个精妙的观点，他借用创世神话来加以说明：造物主最先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是男女两性、阴阳两极同体，后来造物主感到如此人类本领太大，轻视神灵，于是就决定改造人类，把原先两性同体的胚子一分为二，变成了男人和女人，并让男女双方永远产生追求另一方的意愿，当双方寻找到了另一方后才因此获得完善和圆满。这就是柏拉图努力要讲述的爱情和婚姻的意义。后来经过一些文人雅士的诠释而出现的所谓“柏拉图精神式的爱情”，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谎言。

陈淑娥，少时还有一个极雅的名字，叫竹筠。她的容貌和她的名字一样姣美。同在梅山一隅天地，她出生的家境也很贫寒。家里省吃俭用，勉强供她上学，经常因没钱买书买纸，时时处在辍学的边缘。但姑娘小时候刻苦好学，聪明伶俐，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她知道，在落后的闽南乡村，父母能让闺女出来读书已经说明父母难得的开通了。为了保住自己难得的读书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读书读得比别人好，不仅要比同龄的姑娘读得好，还要比小伙子读得好她才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她这样要求自己，她也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勤奋与聪明使得她能够读到初中。在学校的时候，她考试每每名列前茅，学校也常常奖励给她笔记本、笔墨、书本之类的小奖品。别看这些小小的东西，往往能产生多种效益，它们一方面可以解决买不起书本的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另一方面，父母每当产生让女儿停学的念头时，看到自己的女儿书读得这么好，又于心不忍。就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子，竟能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顺利地读完小学。此实属不易。除了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好以外，陈淑娥对琴棋书画都有兴趣，她不但能吟诵古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左右邻里无不称赞。

陈淑娥天生丽质，性格却倔犟。这种个性到初中已经发展成为某种反抗意识。同时她也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农村的孩子多舛运，尤其是女孩子则越发如此。正当竹筠如饥似渴地吮着知识的乳汁，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她始料未及的事情，这件事情把她的反抗个性推至顶峰，也因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1936年，她好端端地在初中学习，忽然有一天父亲告诉她，说父母已为她作主，准备让她出嫁。其实，这种事情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不过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可谁曾料想到，这个16岁的农村少女却死活不肯从命。她以自己的“理”抗争千年传统的“礼”。一会儿说她还要读书，一会儿说自己年纪尚小，希望能够说服父亲改变初衷。然而父母并没有因此所动，在她父母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八妙龄，在当时的农村正是嫁人的最好时光。

父母并有违背中国几千年遗下的规矩，更何况“父母也是为了女儿好”呀。天下的父母大多作如是说。陈淑娥经过多种努力未能奏效，剩下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听从父母之命，嫁为人妻；要么离家出走！她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对一个农村少女来说是多么的不易！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壮举。

又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在绝大多数人们的眼里，它平凡得没有一丝色彩。可是，这一天对于这个普通的农家少女却极不平常。时光仿佛被粘滞，竹筠匆匆地收拾着自己的包袱，她显得那样紧张，手心里不知不觉已沁出汗水。在她看来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就悄悄地出了门。为了不让别人看出破绽，她随身只带一两件换洗衣物便急急上了路。她的步子迈得很大，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脸上却没留下特别的表情。有谁能想得到，她跨出的这一步意味着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礼教的反叛。谁又能知道，这年轻姑娘迈出家门以后，未来等着她的是什么？

毕竟，她走出了这一步。毕竟这一步是她自己情愿迈出的……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常求助的是他们的同学或者老师。陈淑娥先到惠安去找她的老师，这位老师在听了她的诉说以后非常同情她的遭遇，让她在家里暂避一些日子。在当时的社会，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多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思潮虽说来得晚了些，姗姗来迟的东西未必不绚丽，迟开的花未必就不好看。何况厦门、泉州等城市地处海陆要塞，新思想本也极易附着传播。在惠安短暂居留以后，陈淑娥又辗转来到厦门，她原先的老师为她介绍厦门的朋友，并让他们关照这位具有强烈反抗勇气的乡下女孩。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她很快在厦门稳定下来，并在厦门虎头山附近的中华中学继续她的求学生活。

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深深地体会到，经过自己奋斗得来的学习机会是多么不容易。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体悟到，自由多么美好。

在厦门的日子里，她除了学习以外，自然时常到她的同乡和同学处玩耍。在她的同学和同乡中就有李引桐的好友陈启舟，他与陈淑娥既是同学同乡，又是朋友。一次她的一个女同学拿一张相片给她看，那是一张普通的年轻人合影。相片中除了这位女同学以外，其余四个都是男孩子。她的同学指着其中一位个头高高的小伙子询问陈淑娥：“他名叫李引桐，与你同乡，也是梅山人，你可否认识？”

她回答不认识。这也难怪。李引桐和陈淑娥虽都生长在梅山，两人却并不同村。李引桐是竞丰村，陈淑娥则住在另一角——兰园。加之李引桐少时总像“游击队员”，一会几东，一会儿西，两人蜚居梅山脚下，却无缘相识。

说来也巧，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陈淑娥一见到那相片上的青年，便顿生好感。陈启舟很自然地对自己的好朋友李引桐一番形容介绍。那位好心多事的女同学，或是直觉到了什么，或是预感到了什么，或是有意撮合，便将淑娥如何抗婚，如何出走，如何聪慧，如何美丽等等一桩桩、一件件，一五一十写信告诉了当时已远在马来西亚的李引桐。陈淑娥的个性从本质上很像李引桐。风华正茂的李引桐在收到信之后，很同情她的遭遇，顿时觉得有一种共鸣。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陈淑娥，表达了他对她际遇的关注和对他抗婚的支持。陈淑娥收到信后，很是感动，她为有这样的知己而高兴，为有这样的同乡而庆幸。不久她就提笔回信，从此一对少男少女做起了笔友，开始了动人的两地书“爱情作业”。不知不觉，在短短的一年里，两人写下了数十封书信。

哦，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多么甜蜜的传递方式……

一声炮响终于打断了这一对各在天涯，未曾谋面却已成恋人的温馨。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全面进攻中国，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战乱状态。中国人民期望和平的意愿，老百姓渴望过上平静生活的美梦彻底破灭。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才17岁的竹筠，从此又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万般无奈，她于1937年底回到了梅山。慑于女儿的反叛意识和行动，依稀了解女儿已有心上人，且是一位极优秀、极有发展前途的好青年，加之国家处于战乱等多种原因，此时的父母已不再强迫女儿嫁人为妻了。陈淑娥因此在家乡过着表面上还平静，内心却很不安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远在马来西亚的李引桐考虑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战争，考虑到陈淑娥与家里曾经发生的冲突，曾写过一封信给陈淑娥，问她是否愿意到马来西亚去。在梅山的几个月里，她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想到要只身到异国他乡去过漂泊的日子，想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战争，想到要告别生她养她的父母，想到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这块土地，怎么能不思绪万千？

最后她作出决定，去和她的心上人在一起。

很快，一张由厦门到新加坡的船票寄到了她的手上。她再一次迈出了离家的脚步，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再偷偷摸摸。她坦坦然然地走了。

船到新加坡的那天，她渴望相见的心上人在码头上接她。

初到异国，一切都显得那样新奇，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一步对一个乡村女子来说，跨得确实太大了。

李引桐为了让她对新的环境有一个适应期，把陈淑娥安排在李氏的亲戚家里暂居，他们有一个令双方都能相互加深了解的时间和机会。国难当头，故乡的亲人还在战乱之中；这一对闽南后生，对他们的邂逅，对他们之间的情谊，对他们婚姻的缘分分外珍惜。加之，两人正处在怀春阶段，感情很快发展，半年之后，他们的婚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无疑，这桩婚事从根本上说，是他们自己作主的。因为，双方的父母还远在国内；因为，国家还在战乱；还因为，他们都已经长大，能够为自己的未来作主了。而在李引桐看来，像陈淑娥这样家庭背景的人选正是自己所欲寻觅的伴侣。这种强烈的意念或许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相对而言，李引桐受其父亲李国外的影响比较多。少年时期，父亲就不断向他灌输“交朋友要交穷朋友”、“娶老婆要娶穷家女子”之类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都是李引桐本人所认同的。他也确实是以此作为一种人生信条去实践的。所以尽管李引桐和陈淑娥此前并没有机会长时间地接触，但双方都彼此满意，并决定从此结为伴侣，共赴人生旅程。

1938年6月25日，李引桐和陈淑娥正式结为伉俪。其时李引桐25岁，陈淑娥18岁。尽管他们远在新加坡，尽管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之中，但这一切都不能妨碍他们对自己婚姻合法性的正当要求，同时，更不能妨碍他们对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确认。那个年代在新加坡，结婚并不需要注册登记，但他们坚持要到中国领事馆注册。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婚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是中国人。

李引桐做了新郎，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上的工作，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认真真地去度蜜月，而是边工作边尽可能地把新娘子带在自己的身边。恰好橡胶生意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身为经理的李引桐也有充分的机会带着娇

妻周游列国，去度他们自己戏称的“蜜月”。

这一对新人原本并没想过早要孩子，他们都还年青，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尤其是李引桐，立志要干一番大的事业。可是，与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李引桐在携新娘子去日本期间竟让妻子怀了孕。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高兴，多么具有浪漫色彩的年轻人的“失误”呀。尽管此事的到来，打乱了两人对生活的构想，他们仍然很高兴，那是爱情的结晶，是苦难岁月里结出的幸福果实。他们会无比珍惜。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陈淑娥从此开始了她的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

几十年以后，当李引桐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化橡胶王国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在李家后继有人的时候，当他回顾自己之所以能够集中精力和时间为国家、为家乡做那么多事情的则候，他由衷地说：“我要感谢我的太太。”

夜之眼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整个东南亚几乎全部沦入敌手。战前，李光前与英美等国家在商务上过从甚密，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的橡胶生意绝大多数都出口英美等国。南益在纽约、伦敦都设有办事处，专门从事橡胶出口业务。战争前夕，李光前本人恰到美国出席国际橡胶会议，故在战争爆发后他就留居于美国。日本侵占东南亚以后，遂将李光前在东南亚的产业悉作“敌产”没收。南益的员工大都就此“失业”，各寻出路。

为了生计，李引桐于1942年，从吉隆坡来到马六甲，同几个梅山乡亲开了一家杂货店，做起粮油买卖。然而，在日寇铁蹄下，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多数“生意”都是“违法”的，甚至含有“反抗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危险，时时都会招致不测。在那惊心动魄的岁月，在那漫漫长夜里，年青的李引桐除了一颗炽烈跳动的心，还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它在寻找生存的亮点和生活的契机，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

下面要讲的，就是发生在黑暗时代的故事。

战争时期，所有的商业传统和商业规则破坏殆尽。李引桐瞅准机会，和几个梅山乡亲做起大米生意。东南亚国家由于历史上所属系统不同，比如新马原先是英国殖民地，社会制度及商业金融属于英国系统；泰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免受了殖民者的奴役。加上东南亚各国的物产不同，泰国的大米自古闻名于世，战争期间更成为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做大米生意必然能赚大钱，只是风险太大，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另外，做大米生意是跨国性的，以当时的条件，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差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人想到了却不敢为之。此类生意天然属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同样，它也能够造就干大事业的人才。李引桐愣是选择在当时还被日本人称作是“走私”的行当。他所想到的只是：人们总要吃饭；做大米生意可以赚大钱。只要肯吃苦，只要计划得周密，生意照样可以做成。至于冒险，对他来说好像只是小菜一碟。他天生就爱冒险。他相信，真正的将帅之才只能在战争中造就，而要成为将帅之才就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

那个时候做大米生意颇有些“三角贸易”的味道。他们要事先租好木帆

船，到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载糖，后押船经马六甲海峡到马来西亚安顺；卖了糖以后再买椰子干，装船到吉塔，再把椰子干卖掉，将倒手来的钱拿来买大米。大米是从泰国来的，当时的大米处理方式很陈旧，是把米煮熟后再晒干，以防止霉烂。最后他们才辗转从古塔将大米运回马六甲。如此跨国买卖虽充满了危险，倒着实能够锻炼人。一次航行，就要有一次周密的筹划，从筹钱、调查市场行情、船务、买卖技巧到各种人际关系等等都要学会。

有一天晚上，天惨惨地黑着，海浪无情地拍打着船舷，小小的木帆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显得渺小而无助，船员们与波浪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几天的海上航运已使大家精疲力竭。当他们刚离开吉塔不久，忽然“砰”的一声，装满货物的船撞上了礁石，船头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水溢进了船里。好在刚刚离开陆地不久，他们赶紧将船靠岸，用绳子将船头绑紧，继续航行。

如此充满危险和劳顿的“海上贸易”进行了一段时间，竟还顺利。

“海上贸易”毕竟比不上陆路来得快捷。战争时期，对于大多数只追求满足生命本能和生存需求的人们来说，只要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运。至于那些困难、艰辛甚至风险都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和大多数人一样，李引桐为了生活，到处奔走。为了赚一点钱养家糊口，他还经常爬火车，倒很有一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员”的味道。他们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随身带的衣物脏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困了的时候照样睡得很香；他们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有时一连几顿没有东西吃，一旦有一点点什么可以果腹，吃起来照样很香。更重要的是，还要与日本鬼子周旋。1943年的某一天，李引桐和另外两个李氏宗亲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去装货，他们在马来西亚爬上开往泰国的货运列车，没有地方坐，他们就弄一块破布绑在车厢内睡，列车震动得厉害，大家的脚都震得麻木了，却没有一个人喊苦。每一个人都清楚，他们这是与死亡搏斗。

又一次，李引桐和另外两个闽南乡亲要到泰国进货，他们来到一个小站，爬上了一列装满木材的列车。他们刚上去，火车就启动了，他们中有一个因动作慢从徐徐开动的列车上掉了下来。几天过去了，仍不见他回来。李引桐想，他要么在摔下火车时被压死了，要么就是被日本人抓去杀头了。大家悲痛不已。不料，又过了几天，那个从火车上摔下去的乡亲大难不死，竟又走了回来。大家转悲为喜，相互叙述着他们各自的历险故事，故事中包含的苦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抗日战争后期，李引桐用经营粮油所赚到的钱在马六甲成立了一家万丰进出口公司，主要仍从事粮油买卖，兼做其他生意。主要股东为李引桐、李介民、郑学琛等人。公司的房子原是马六甲的一个华侨的私人房产，该华侨是当地华侨银行的经理，因房主是李引桐的好朋友，两人早先就住在一起，后那个华侨搬走了，就把房子留给李引桐使用；李引桐就将其作为万丰公司的办公场所。这本来纯属个人私事，原勿需因此多出一笔。然而，在人们失去自由的年代，在强盗高扬着的皮鞭和刺刀下，任何一件个人小事都可能引出人们对民族尊严的思考和认识。

事情是这样的，正当万丰公司进入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人竟看中了万丰公司的房产，意欲夺之。强盗的逻辑从来就是霸道，只要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看上，他们就要夺而取之。一天，几个日本人来到万丰公司，说要用那套房子，并命令李引桐等人限时搬走。此事激起了李引桐等人的强烈义愤。天下岂有这般道理，一个“不速之客”闯到人家

家里，把主人赶出家门。更何况，这个主人的祖国正在被同一群强盗蹂躏着。李引桐坚决不从。日本人想不到在新加坡竟还有不遵从他们意志的商人，他们大为恼怒，当场把李引桐殴打一顿，霸占了那套房产。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磨难总是双重的，一是作为人的个体尊严受到伤害；二是被奴役的那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受到凌辱。当李引桐被日本人殴打的时候，他更多地想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事过之后，当他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他更多地想到他的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他自己将如何为他的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否则，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为祖国做那么多的事情便无从索解。

第三章 无解的命题

一天智者科尼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种角豆树，于是他问那人：“这树多少年才能结果？”

那人回答：“70年。”

科尼又问：“你相信，你还能活70年吗？”

那人答道：“我在世上见过角豆树，像前人为我栽树一样，我也想为我的后人栽树。过去为我劳动，为什么人不该为未来劳动呢？不仅是同时代人应该通过社会协作取长补短，为后来的几代人劳动也是每代人的义务。”

——《犹太教法典》

一臂之力

闽人移民海外在中国历史上早成传统。据史籍记载，闽地移民大量外涌始于唐代。大约在8世纪末，由于国势强盛，中原汉族人口迅速发展，出现了人口向东南沿海大量迁徙的浪潮。福建开始从原来被认定的边疆蛮荒之地慢慢地变成一个较为富庶，人文荟萃的地方。由于五胡战乱，西域的丝绸之路被阻断，阿拉伯商人纷纷取道海路东来进行贸易活动。泉州因此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口岸之一。到了宋代，其势更旺。南宋时期，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竟多达100多个。难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宏伟秀丽的刺桐城（ZATUR）泉州，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在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如此盛景，可见一斑。福州、泉州等都成为中国重要的商港。贸易也大大地活跃起来。由于商贸的活跃，人口的迅速增加，加之海上交通的便达，出现了大量各地人员频繁交流的现象。同时也有许多人移民东南亚各国。他们中有的直接迁往东南亚，有的先移迁台湾，而后再往其他各国迁徙。到了17世纪，更是出现了一次闽人迁移东南亚各国的高潮。此后凡遇天灾人祸，都会伴随一场大规模的迁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闽南有那么多侨乡的原因。

闽人外迁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除了我们上面所列举的迁移原因外，同一地区、同一宗亲姓氏相互帮助、提携、结伴创业也是移民的特点。从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团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姓氏公会、地缘会馆、行业公会等就明显具有“地缘文化圈”的特点。特别在早期，讲同一种方言，拥同一种姓氏，信同一个神祇，享同一种风俗等成了华人地缘文化认同的主要参数。而亲缘—地缘—业缘三大指标的基础还是地缘。华人在海外创业时所依靠的本钱是勤奋、团结、朴实和忠诚，很自然地要寻找“自己人”；何况，当时的社会信息闭塞，各个团体、人群间的交往也很少，自然就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地缘文化圈。

再者，早先外出的移民，他们并没有在外面“落地生根”的打算，绝大多数人外出都是为了去赚一笔钱回来，总想要“落叶归根”。可以说，第一代海外华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外出者常常是家里的青壮年男性，女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一旦乡里，或是同一姓氏的某一个人在外面发达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乡亲、宗亲弄出来一起干。反之，乡亲们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也很自然想到去投奔他们远在海外的乡亲或宗

亲。李引桐当年远涉南洋，便是投靠其宗亲李光前。李光前的父亲早先也是因为穷困潦倒到南洋投靠亲友的……而李引桐在其事业稍有成就的时候，他很自然会对乡亲们伸出他的手。

战争时期，李引桐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吃苦和冒险精神，以其精明的才干，不仅积攒下一笔可观的积蓄，购得 100 英亩荒废的橡胶园，还结识了一批社会各个层面的朋友。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英军接管了马来西亚。东南亚各国百废待兴。

1946 年，李引桐乘战争结束之空隙，回到故里探望父母和亲人。在梅山小住之后，李引桐返回马六甲，继续他的粮油生意。

战争结束后，南益公司的财产归还给了李光前。南益公司不但恢复了其旧观，而且因战后的复兴，公司的业务日益扩大，利润猛增。李引桐回到马六甲后，李光前鉴于公司的发展，业务的扩大，急需人才，遂聘李引桐为南益公司总巡，并让他全权处理当时最为棘手却欲大力发展和扩张的泰国橡胶业务。不久任命他为泰国南暹公司的总经理。在很短的时间内，泰南的橡胶业务有了巨大的发展。

1948 年，李引桐再度回到故乡。桑梓依然游子心。

此番返乡已非昔比，李引桐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商人，他已经有能力为乡亲们做一点什么了。恰在此时，国内战火遍燃。国民党屡遭败绩，为了与共产党在最后关头决一雌雄，在南方各省到处抓壮丁，闹得闽南各地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加上老天不作美，不大不小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乡里的人逃荒的逃荒，躲避的躲避，饿死的饿死。人们纷纷寻找活路。

此前乡里就有一些年轻人给李引桐写信，诉说了家乡所发生的一切，希望他能为苦难的乡亲找一条活路。读到乡亲们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李引桐心潮澎湃。想到乡亲们正在水深火热中受煎熬，他心急如焚，当即给乡亲们回信，表示将尽其全力把一些青壮年弄到泰国。这样一方面可以逃避兵役，另一方面可以赚一些钱去解救家人在战争期间的苦难。何况，李引桐才接手不久的南退公司也需要一批以企业为家、忠诚、团结、勤奋的乡亲们来共同创业。

此次李引桐回乡的动机之一便是实际策划一批乡亲远渡南洋事宜，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李引桐的到来，给那些不愿给国民党当炮灰，却又不知如何躲避的一批梅山青年带来了一线希望。对于这些人来说，李引桐的到来，使他们免去了当兵送死之虞。因为再蠢的人在那个时候也能看出国民党是强弩之末，是秋后的蚂蚱；要是被抓去，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李引桐的到来，不啻天遣贵人于世，不少乡党奔走相告，拳拳之情、切切之义可掬。

为了把乡亲们弄到海外，李引桐做了精心的安排。到底干这样的事情属于“犯法”，搞不好他得吃官司。但他成竹在胸，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所以有能力从容应对各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为人的豪气和他的侠肝义胆，得益于他所结交的朋友。俗话说：“能者，上交县官老爷，下交流氓叫化子。”他这些年来一直浪迹社会各个阶层，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士，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各路江湖豪杰。因此，对李引桐来说，要运作这样的计划，实乃举手之劳。他事先安排好了行程，让专人具体操办。

李引桐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做事追求效果，只要能把一件事情办好，而且他确认他所要办的事情是一件善举，他就会努力地去将它完成，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他一概不在乎。何况，人性、道德伦理、价值体系都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烟消云散，新的规则却迟迟还未建立。此时的他，一门心思想的只是如何使那一批乡亲逃离危险地带，这才是他的原则。至于如何运作，他从不拘泥于规则，更莫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规则。

1948 年年初的一天。

天边刚刚出现鱼肚白。

梅山村口。

17 个梅山青年——主要为李氏宗亲——悄悄地集结。片刻之间，他们就都到齐，偶尔能听到压得很低的耳语。很快，这一群人就上了路。这群“土老冒”仿佛一夜之间成了训练有素的军人，动作是那样的利索，步伐是那样的快捷。

来不及与妻儿老小缠绵的告别，没有更多的与亲朋好友的絮语，他们匆匆地走了。有谁知道，这是在逃命呀！

按其时一般的走法，人们结伴而行，先是步行到泉州。在泉州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分搭四轮车往安海；安海小憩，便坐电船到厦门。此前则事先托人在厦门买好船票。

但此次适逢战争期间，东南亚一些国家无法接受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难民，所以他们走的是另一条途径，即利用东南亚国家之间接受移民尺度不一致以及法规不协调所留下的漏洞，先到泰国再去新马。因为当时新马对来自中国的大量移民已经有了名额上的严格限制，入海关时检查得特别严，而泰国对中国移民的限制相对略微宽松。所以先到泰国再往新马一时间成了不少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向东南亚移民的路线选择。梅山的这 17 人此次所走的也是这样的“曲线”，因此他们并没有直接购买从厦门到新加坡的船票，而是买了从厦门往汕头的船票。这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整个方案的第一步。

特殊的形势使某地骤然成为游客云集的地方，这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19 世纪，美国西部发现金矿，北美迅速出现一股淘金热，加利福尼亚一夜之间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去处。1948 年，汕头突然之间来了许多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人们，可怜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去淘金，他们是去逃难。

这一拨闽南人从梅山出发，几天后抵达汕头，时间是 1 月 27 日。其时，汕头早已人满为患。由汕头开往曼谷的船票很久以前已经售完。他们只好在汕头等待。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凡要去往东南亚各国的移民都要受到检查，确保他们没有沙眼之类的病疫才行。一切手续办妥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为了省钱，也为了大家能挨得更近一些，几十人拥在一间支着大通铺的房间，天天喝着稀粥。这时，他们才腾出时间和思绪来想家乡的好，连在家乡吃烦了的番薯都变得那样诱人，甚至吃了番薯爱放臭屁在此时此刻都令他们产生愉快的回忆。他们不知道何时还能再吃到家乡的番薯。

时间悠悠地走着，帮着买船票的人每天都带回一张苦瓜脸。一个多月过去了，正当他们为自己带出的可怜的盘缠行将用尽而忧心如焚之际，忽一天，出去买票的人回来时面呈灿烂之色，大家有数，他们得以成行了。票虽买到，却只有 9 张，也就是说，余下 8 个人得拖到下一次航班。大家急坏了。商议的结果是，既然 17 个人一起出来，就要一起走，大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那般豪气。于是，同行的李成裕出了一个主意，让大

家把身上带的钱合起来，有多少就拿多少，去贿赂船主。大家一致认为此主意好。便纷纷掏钱，多带钱的人拿出几百块，少的则只有十块。因为都是去逃难，每个人带的钱本来不多。不少人家原本就是倾家荡产送一个孩子出去活命。船主倒也不贪，得了几百块，便发了慈悲心肠，算是积一回德，也乐得为剩下的几个人开一回绿灯，让 17 个人一并上了船。

1948 年 2 月 28 日这一群来自福建省南安县梅山乡的年轻男人，与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东南沿海各省的移民，共 2000 余人，拥进了一艘名叫“大保山”的货船。7 时许，“大保山”像一只大海龟，徐徐地离开了汕头码头，向公海方向驶去。屈指算来，梅山 17 人在汕头呆了整整两个月零一天。

这是一艘典型的“货船”，不仅仅强调着人与货物等同的事实，在货轮上，人甚至成了比寻常的货物更为低贱的东西。货物是不能挤压的，上好的舱位上都放着货物，人则大多被安置于底舱。污浊的空气中充满了臭味，有人在呕吐，又有人在呕吐，从嘴角溢出的黑绿色的液体溅到了人们的身上，大家并没有什么怨言，大家都在吐，都想吐，能吐出东西已经不错了，有些人早已经把腹中的东西掏空，想吐都吐不出东西来。

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十几天，仍不知疲倦地走着。船上的人们大都已经吃喝全无，他们正在与死亡作最后的抗争，他们没有埋怨什么，冥冥之中只有期待，期待着一个没有战争的宁静乐土。

希望支撑着人们坚持下去的信心，希望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船在大海中摇啊摇，人的思绪在希望中摇啊摇……

有人晕过去了，又有人晕过去了，梅山的 17 人中已有 3 人昏厥，水饮尽了，粮用完了，同行的一个伙伴摘下指头上的戒指。这是临行前他家人交给他的家中最有价值的财物，让他在紧要的关头用。同伴们用戒指到水手那里换来了水和粮食，可昏死过去的人此时已经没有张嘴的能力，同伴们就用手把他们的嘴一一掰开，把饭捏成小团团塞进他们的嘴里。船上的淡水比金子更为宝贵，伙伴们就用弄湿的毛巾，一滴一滴地挤到他们的嘴里。同伴得救了，自己也得救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谁也不知道未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谁也闹不清，某时某刻他们中有谁会遭遇到不测；谁都明白，此时此刻，与其说是人的生命受到考验，倒不如说是对人类的品性进行考验。

船上已经有人死了，尸体被装进麻袋抛进大海。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人知道究竟慷慨的大海接纳了多少移民的灵魂。死去的多半是孤身者，此时此刻，集体的团队精神挽救了许多人。梅山 17 人互相帮助，梅山 17 人都还活着……

3 月 12 日，船上的人都忘不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大保山”在海上漂游了 13 天后驶进了曼谷湾。船上的人们无不欢呼雀跃，他们纷纷把穿在身上那些又臭又脏的毛衣扔进大海，他们知道，毛衣是再也派不上用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这种行为方式——抛弃一些随身带的东西来换取对未来幸运之神的祈求。13 天，梦幻般的日子总算有了尽头。“13”对西方人来说是不祥的数字，可对“大保山”上的人来说，它显得多么的亲切，多么的辉煌！它给了那一船濒临绝境的华工再生的机会。

来自梅山的 17 个年轻人安然抵达曼谷码头。上岸后，一支由泰国政府组织的卫生队已等待着这批来自中国的移民。卫生队免费给每一个人打预防针。完了以后来到码头边上的一排桌子前面，移民局官员挨个询问诸如姓名，年龄，从哪一国来，到哪一国去，所去之处的详细地址之类的问题。两三天

以后，一张泰国的居留证就寄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每张居留证的费用为 385 铢。此时这一拨人早已是一无所有了，所有的费用都由李引桐开支。李引桐事先拿出 5000 元给一个叫苏宝通的人，让他负责办好这件事，使这一批梅山乡亲初到泰国不至于有无家可归之感。

在这些人当中，后来绝大多数都发展得很好。可能他们中会有人忘记他们曾经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可能会有人忘记他们应该记住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但是不会有人忘记他们离家去南洋时那几个月的艰难旅程，不会有人忘记李引桐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了手。后来，在李引桐的帮助下，梅山又有几批人陆陆续续去了东南亚国家，直到 1949 年大陆解放，这种救助工作才停止。

无名英雄

1948 年，李引桐回闽南并非专程办理帮助梅山乡亲出国事宜，更不是回乡探亲。这些事不过顺带为之。其实，他在中国内战正酣之际踏上故乡的土地，是专门为完成一项他将其视之为无可推卸的使命——解决厦门大学 and 梅山的教育经费而来的。严格地说，他未受任何人的指派，完全是受到一种历史责任感的召唤。他理智地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势下，只有他具备完成此项使命的能力和条件。他来了，悄悄地来了。没有声张，没人知道。甚至历史延续到了 20 世纪末的今天，知其细节者仍寥寥无几。

为了能将此讲述清楚，必须对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作必要的交待。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闽南人自己出资办学成为一种风尚，一种现象。它不独使当地的孩童学子倍受其益，而且成为国人的楷模。其实，闽南人热衷于办教育素有传统。

陈嘉庚，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人，他的业绩早已誉满海内外。陈嘉庚先前曾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贾之一。或许没有人知道，正是这位曾经被称作首富的大亨，平日生活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在一篇自传上这样写道：“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而对待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办教育，陈嘉庚更是情有独钟，尽其所有心血和力所能及之财力。“教育救国”成为他社会责任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思想。

早在 1913 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 年，又在家乡集美建立师范学校，同时设立中学、小学和幼稚园。1919 年至 1932 年间，陆续兴办了水产航海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在集美建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村。

1919 年，陈嘉庚鉴于福建省高等教育落后之状况，决定筹办一所大学。这就是两年后正式运作的厦门大学。在筹划和运作过程中，厦门大学的所有经费由他个人承担。他亲选校址，参加校园设计，亲自到工地检查施工情况；同时，他多方奔走，物色名流出任校长，聘请人才到校任教。由于陈嘉庚倾尽心血，加之他的名望和善举感召了许多社会贤达参与其中，因此很多知名人士来到厦门大学任职任教，鲁迅、林语堂等人都在厦门大学工作过。在很短的时间内，厦门大学不仅成为福建省唯一的大学，而且其声望也很快享誉海内外，成为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学生的七所大学

之一。现在，厦门大学已成为国内著名的重点大学。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南亚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

此外，陈嘉庚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曾捐资办教育，我们无意一一罗列。

然而，发生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陈嘉庚的企业倍受打击。30 年代中期，陈嘉庚破产后，这种致力于办教育的传统则由其女婿李光前继承了下来。为兴办教育，李光前同样不遗余力，耗费毕生精力。

据统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他捐助过的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竟多达 20 余所。单是新加坡的华侨中学，他就曾为之偿还贷款 7 万余元，还专门捐了 50 万元作为学校基金。新加坡华侨中学原名“新加坡南洋中学”，是 1918 年由陈嘉庚先生首倡并创立的东南亚国家最早的华文学校。陈嘉庚破产之后，李光前继续承担起了资助华侨中学的责任。还亲任该校的董事会主席之职长达 21 年之久，整整任职 16 届。

1962 年，在原马来西亚大学基础上分别成立了新加坡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李光前出任新加坡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作了如是说：“希望本大学能负起在本社会中的责任，以符合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而为本国及邻邦服务。”他还说：“为求多种民族源流的国民精诚团结计，最好莫如给以进步和完整的教育，以及开明的思想。这样易影响各民族，使轻视他们中的异点，而重视整个大民族的利益。”充分表明了李光前的教育观。

李光前除了对其所在国的教育予以支持和捐助外，对自己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从未忘记过。1939 年，他在梅山建立了一所小学，并以其父的名字“国专”命名。后又捐资兴建了国光中学。

正是这样一位世界级大富豪，自己的生活亦极为朴素。这或许受到他的岳父陈嘉庚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是自我人格发展的结果，或许是继承了闽南人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或许三者兼而有之……最令世人诧异的是，1965 年他因病住院治疗，医生在对他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时惊讶地发现，这位富翁竟然营养不良。后来证实，这位伟人因患肝癌过早辞世与其平日里不注重营养有连带关系。

尽管李光前继续着陈嘉庚的办学方向，继承着闽南人热衷教育的传统，然而，陈嘉庚与李光前毕竟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从李光前的学识与学历来看，他似可归入儒商行列。商务上，他与英美等国家关系甚密。另外，新加坡原本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传统上受到的西方影响显然也较多。这一切势必导致李光前与陈嘉庚在政治上的差异。他们对共产主义在认识上有所不同；言及经营战略、企业管理、商业技法等，二者更有明显的不同。李光前最终从陈氏集团分离正是由于两人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所致。不过，这一切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热衷于办教育上的一致性，前提是，在实施这些公益事业的时候，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倾向相左和利益冲突。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上的差别并不会影响他们各自在公益事业方面的善德善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些不和谐。遇到这种情形，就必须有人从中斡旋或平衡。

发生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对厦门大学的修复、兴建一事，就曾出现过陈嘉庚、李光前在共谋一事时的差异。最终厦门大学的修复、兴建工程得以圆满完成，除了陈、李二人的人格、情怀、德行等个人因素外，李引桐在其中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情。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李引桐无私的奉献、临危不惧的胆识和策划技艺的精巧，就没有 50 年代厦门大学如此巨大的修复和兴建工程，厦门大学或许也就难有今天的如此成就。在当时的情境中，只有

李引桐有条件出面做此工作。

如前所述，李光前系陈嘉庚的女婿，李引桐其时身兼南益集团总巡和泰国南暹公司总经理两职，他与陈嘉庚、李光前的关系都很好。重要的是，李引桐本人与陈嘉庚、李光前在支持家乡办教育上同承一脉，他曾是李光前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曾专门陪同李光前先生到欧洲、美国考察办学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李光前先生在家乡办学思想的支持者和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他的经验和胆识也是当时唯一能够胜此重任者。可

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各种陈嘉庚、李光前传记抑或是厦门大学校史都没有出现李引桐的名字，更少有人对个中原委有详尽的阐述。李引桐默默地做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名英雄。

笔墨泼及此，读者还只是对闽南人慷慨于教育和陈嘉庚、李光前、李引桐三者的关系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要真正地切入故事的讲述仍需作一些必要的铺叙。

战争除了给人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外，也教会了人们如何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沦入日军之手，李光前因与英美过从甚密，招致日军记恨，南益的所有产业全部被作为“敌产”没收。二战结束后，虽然南益的财产归还给李光前，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风云变幻多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渐突出。为了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李光前便让南益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两个分公司在与欧美做橡胶出口生意后，将所有款项中的少部分悄悄地留存在美国的银行里。李光前之所以选择南益公司里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家分公司作这样的业务安排，主要是为了利用东南亚各国经济体制上的差异。众所周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在这些国家里，管理体制是英国式的，连新加坡执行的法律亦是英国的法律，在同一法律和经济体系范围内，上述行为是不合适的，也可以说是违法的。因为这样新加坡方面就无从了解某一家公司的全部资产账目，税务上也无法如实收缴。

但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并非属于“英国系统”，它们分别有着各自的规则。泰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这个国家的人民一方面将这些福祉归结于他们英明的君主——泰王，另一方面则庆幸佛主时时刻刻都在赐福庇荫泰族。这些背景决定着泰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行，而并不需要事事以英美的东西为主臬。

泰国的业务恰好由李引桐负责。南暹公司是南益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但是它比较特别：原因之一是泰国和新加坡遵行的商业法规和法律并非同一体系，因此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原因之二，泰国南部长时间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对于南益这样一个商业活动、法规体系、情感趋向都明显英美化的公司来说，泰南显然是一个是非之地。而李光前本人更无意于过多地将自己卷入到充满危险、政治化色彩如此浓烈的境地。可是，作为卓越的企业家，李光前很清楚泰国南部在橡胶业中的地位。他选择了李引桐，这位他当时手下最为得力、又最有胆识的助手前往负责，以使自己处在一个有钱又能赚，风险又有人担的有利地位。李引桐虽不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却倾向于共产党，尤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极“铁”，一生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加之他秉性爱冒险，也善于应付各种险情险境，因此，要派人到泰南这块是非之地，李引桐便成为当然的人选。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泰国公司享有与其他公司不同的自主权。其实，这些因素是直

接造成后来泰国南部公司独立的原因，但李光前与李引桐的关系却并未因此而恶化，两人的交情几乎可以说保持了一辈子。

李引桐充分利用了南暹据点，也利用了泰国当时急需扩大橡胶出口业务，对从事这方面的商人和业务有一些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的时机。再者，当时各方面相应的法律和法规都还很不健全，李引桐据此掌握了大量在不健全社会经商的不规则技能，大力开展橡胶出口业务。他遵照李光前的旨意，将他所属泰南公司出口到美国的款项留存了少部分在美国银行。与此大致相同的情形，南益所属的印度尼西亚公司也如法炮制。此事除了李光前、李引桐等少数几人知情外，并无他人知晓，就是陈嘉庚也全然不知。

话作两头说。

抗日战争行将结束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毁灭性的狂轰滥炸。20年代初由陈嘉庚一手建立起来的厦门大学在1945年日寇的灾难性轰炸中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全面的内战。被毁的厦门大学未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学校的教职员工无论在教学上还是生活上都面临极大的困难。

“校主”陈嘉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奈，陈嘉庚已今非昔比。破产后的陈嘉庚只能通过“集友银行”筹措有限的经费，而要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进行大规模的修建，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陈嘉庚向他女婿李光前求助。

李光前为难了……

显然，不是作为女婿的李光前对自己岳父大人的苦衷熟视无睹。李光前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且莫言是亲手提携栽培，并把爱女嫁给自己的岳父，就是一般的乡亲百姓若有难处，他李光前也总是慷慨相助，何况现在面对的是自己的岳父。想当初，李光前不名一文，父亲不过是乡村的一介小裁缝，惨淡经营仍无以为继，远涉南洋去投亲靠友。自己能有今天，也大多仰仗先辈的提携，陈嘉庚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人。他不仅是李光前的岳父，还可以说是他的恩师。

这种为难当然更不是来自投资意图不符。笔者絮絮叨叨在前面说了一大通闽南人如何热衷于办教育，陈、李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李光前当然不会反对自己的岳父修建厦门大学的意愿。

为难来自南益公司的财政？显然也不是。李光前的南益集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业务范围越做越大，不仅很快达到而且大大地超出了战前的水平。橡胶价格不断上涨。李光前瞅准时机在金融和房地产业方面也加大投资力度，生意蒸蒸日上。

这种为难来自政治方面？从当时的形势分析，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已显现出日薄西山之态，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将落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手已成定势。李光前与其岳父在政治上追求不同；李光前在政治上较为温和，与英美关系较好，作如此大的投资是否合适？

为难来自于个人情感和利益得失？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毕竟是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学校，厦门集美又是陈嘉庚的家乡。加之陈嘉庚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如此显赫，李光前就是投入再多的钱，人们都可能将此功劳记在陈嘉庚的名下。若将这笔钱投到自己的家乡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效果就完全不同。

为难缘自于李光前的性格？李光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作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性格上有脆弱的一面。此事关乎亲情、乡情，其中又附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如果拿钱到中国大陆，

英、美方面将作如何看待？不答应陈嘉庚，家乡的亲人与乡亲又作如何看待？凡此种种，千肠百结，让他怎能不踌躇？

为难来自具体操作上的难度？40年代末，西方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对中国大陆的红色政权实施经济封锁，所有的外国资本都不准进入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李光前纵然诚心资助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村的修复和建设，资金也很难进入中国，弄得不好，蚀了老本还得充哑巴。

或许还有什么别的为难之处，李光前没有言明。或许永远不便挑明，也许怎么也挑不明。凡是不能言明者便不言而喻地成了谜，让人去猜，去揣摩。所以笔者完全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李引桐凭着自己的观察力、判断力和多年跟随老板的经验，他悟到了什么，他决计帮助陈嘉庚解决难题；他决计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他老板“潜台词”式的指令，不管是否符合老板的意图；他决计再作一次冒险，去为闽南的乡亲学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决计悄悄地做完，让陈嘉庚、李光前这两位他所景仰的人分享荣誉，自己充个无名英雄——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只求把事情办好，所有评说都不在乎；他也决计把自己赚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钱也捐献出来。

他来了，他从南洋返回闽南故乡，来完成他自己所认定的历史使命，来做他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

1948年4月5日，时值清明节。

集美，陈嘉庚的家乡，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小镇。

一个清瘦高挑的青年人悄然而至，他专程来造访陈嘉庚。

此人正是李引桐。

陈、李两人虽隔着姓，隔着辈，却一见如故。因为他们都是闽南人，他们都是为家乡的教育而来，他们都从事橡胶生意。如果说陈嘉庚是第一代橡胶大王，李光前是第二代橡胶大王的话，李引桐则是橡胶行业的后起之秀。陈嘉庚是李引桐自小就崇敬的人物；而陈嘉庚对李引桐的能力和才气一点也不陌生。老少二人一见面自然亲切如故。没有更多的寒暄，双方很快就直奔主题。

先是陈嘉庚把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村的情况通报了一下。在讲到厦门大学被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时，陈嘉庚怒火中烧，强烈的民族义愤更加激起他重新把厦门大学办好的愿望。他决心不仅要修复厦门大学，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兴建，让厦门大学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时的陈嘉庚已不再是富翁，那股气度，那份风范犹存。他正以他矢志不移的决心和勇气感染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

其实，陈嘉庚心里有数，这位李光前手下的“怪才”此时此刻的出现，昭示着厦门大学修建工程的经费有了谱。陈嘉庚的一席话不过是描述厦门大学被毁的过程和惨状，以图同仇敌忾。

陈嘉庚将其修复和扩建的设想和计划大致说了一下，接下来就涉及最实质性的问题——经费。

“球”被踢了过来。

李引桐打小就养成一个习惯，凡遇重大问题和抉择，他总是一改平日里的幽默而变得少言寡语。此时，他在感受陈嘉庚的爱国热忱，他在评估陈嘉庚修建工程的费用，他在思索如何把这件涉及到诸多复杂因素的事情讲清

楚，如何最终将其圆满完成而又能让每个人、各个方面都各得其所。

青年人恭恭敬敬地聆听着，没有多余的话语。

陈嘉庚把话头推过来，此时轮到他接话茬把没有讲完的话讲完的时候了。

几秒钟的沉寂……

“南益公司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分行在美国的银行存有一笔钱，其中泰国分行的账单由我保管，每次生意之后，账单就寄到我的手里，我知道数目，也知道用途，这笔钱可用作厦门大学的修建经费。您可向您女婿作此建议，只要李光前点头，具体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操心，一切由我来处理。”

又是一阵沉默。

“梅山没有中学，国专小学和幼稚园也都要扩建。”

几句话把陈嘉庚说得笑逐颜开。他一是高兴，二是惊奇。

他能不高兴吗？一段时期以来，筹措修建厦门大学经费令他夜不能寐，坐立不安。现在好了，经费有了着落，厦门大学的教职员工们再也不要为没有校舍、没有教室担忧了。

他吃惊。他着实没有想到对面的这位貌似平常的年轻人竟想出如此精妙的主意，且思路如此之周密。

几句话把李光前未能说出口的难处一一消解了。如能按此方案操作和完成，一来同时满足了陈嘉庚、李光前办学兴国的宏愿大志；二来可保证亲友之间不致因此未能共事而生出龃龉；三来存在美国的这一笔钱除了进行厦门大学的修建工程以外，同时进行的还有梅山国光中学、国专医院等的兴建，国专小学等的扩建工程，陈嘉庚、李光前可以同时分享来自各自乡亲的感激之情；四来从美国转移外币之事由李引桐负责，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办好此事，李光前并不需要为政治差异可能给他带来的不利担忧。

老少二人的话越说越投机，他们除了就此事的大政方针进行讨论外，还对具体的运作进行商议。大致的方案为，由李引桐亲自操办将美国银行的外汇提取出来之事宜，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将其转到香港的集友银行，能做到这一步则可谓大功告成，因为从集友银行将钱转到国内就方便得多了。

二人经过缜密的酝酿之后，年轻人起身告辞。他跨出陈府门槛时，距他迈进时足足长达48个小时。这就是说，为与陈嘉庚筹划此事，李引桐在陈府呆了整整两天。

李引桐走了，去做正等待他做的事情。

清明时节雨纷纷。年轻人的身影消失在雨雾中。

一切看来都操办得异乎寻常的顺利。由于这件事情是在不同的国度、政体中进行，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泰国、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等，加之是国际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掌握了国内的局势，国民党正往台湾撤退。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政体与政体之间并无共有的准则，有些细节在此不作缕述。

不过，有一件事有必要聊作说明。因为整个事件的概貌陈嘉庚和李光前都了解，有些机构，如新加坡的南益公司和香港的集友银行当有账目记录。而在此笔者所要说明的这一件事，陈嘉庚、李光前二人并不知道，那是李引桐具体操办过程中所发生的，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他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整个事件的涉及面太宽，时间难免拖得很长。修建

经费真正陆续到位已经是 1949 年末到 1950 年初了。经李引桐之手寄到厦门大学的经费多达 3000 万元之巨。可是南益的两家存于美国银行的款项有限，而且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家分行本身的经营额也有限，橡胶生意又极受国际市场价格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也时时受到国际各种变化多端的因素制约，谁也无法保证橡胶生意可以永远赚钱。陈嘉庚这一面又为厦门大学的修建进展不断向李引桐催款；原先存在美国的钱已经用完，可陈嘉庚并不知道，李引桐看到事情已经办到这个份上，也没给李光前说明，就私下想法子解决。只要陈嘉庚需要，他就寄上，后来寄的钱中有一部分是泰国分行准备交给所在国的税款，李引桐也将其垫上了。对于陈嘉庚的要求，李引桐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原来，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政治背景、国情不一样，市场的价格也不一样。在一段时间里，美元在泰国的官价为 1 美元兑换 6 铢（泰币）；但在黑市上情形就大为不同了，1 美元可交易 24 铢。李引桐巧妙地利用市场差价，他把出口到美国所赚的外汇取出拿到黑市上进行交易，上缴给政府的税款自然以官方价格计算。另外，泰国在二战以后的几年里，政府对企业上缴的税款有一个较为宽松的规定，即企业只要先缴 20%，剩下的 80% 暂留在企业内部自行流动，半年以后再缴。于是，这两个因素，即美元的官价和黑市价的价格差和上缴给政府 20% 与 80% 的时间差就这样被李引桐利用了。他把上缴给政府税款 80% 的那一部分差额和那个“漂浮的半年”机动金额也寄给厦门大学的修建工程了。而事实上，那些款项原本是上缴给泰国政府的企业税款，严格地说，这种做法是违法的，李引桐竟也做了。

如果事情仅仅限于让李引桐承担一些风险倒也罢了，对于精明胆大的李引桐而言，冒一点这样的风险并不是头一遭。何况为了他自己的祖国，为了家乡的教育，也为了他所敬重的两位先辈陈嘉庚和李光前，他心甘情愿承受风险。

风云突变。泰国政府经过短时间 20% 和 80% 以及半年的“浮动”实验后，突然宣布取消这两项规定。原来李引桐所试图利用的两个所在国法规中的“空子”不但落了空，还因此背了一身的债。道理很简单，李引桐本来所设想的是用 80% 上缴给政府的税款到外汇市场上，利用官价和黑市价的差去“炒”。这样一来可以满足厦门大学修建款项的需要，二来可以保证企业自身的正常运行，三来可以偿付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的一道法令将李引桐的如意算盘击个粉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李引桐就此无声无息地背下了这笔债，用自己的家底去偿还。

厦门大学的修建工作经过几年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工程进展顺利。不仅修复了被日本侵略者炸毁的校舍，而且扩建了包括建南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化学馆、物理馆、厦门大学医院以及作为学生宿舍的芙蓉楼 4 座、丰庭楼 3 座、国光楼 3 座、竞丰饭厅、游泳池，还有可容纳 2 万观众的体育场等等。建筑面积达 59095 平方米。厦门大学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李引桐竭诚支持李光前在家乡兴办教育卫生事业，在家乡组织国专校董会，聘请董事长，代理建校资金的一切汇兑事务。先后兴建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国专电影院、校董会五爱楼，扩建国专小学四所学校及国专幼儿园，充实教学、医疗卫生设备，开辟交通道路，造芙蓉桥，建成了一个拥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电影院，文化教育卫生体系完整的，总

面积达 124459.90 平方米的国专学村。

历史掠过了近半个世纪。今天，厦门大学的主楼前耸立着陈嘉庚的铜像，学校还有专门的陈嘉庚纪念馆。每逢校庆，铜像前都照例有几个花圈，花圈的挽带上称陈嘉庚为“校主”。私下里或在非正规场合会不时听到关于李光前的一些事。原来的诸如图书馆、生物馆、厦门大学医院等单位改成了“成智楼”、“成义楼”、“成伟楼”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则将厦门大学作为“部委重点院校”来对待。梅山方面，以李光前父亲的名字“李国专”命名的单位很多，不过所有的人都清楚，那些钱是他的儿子李光前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梅山最大的单位之一的国光中学里，一座极辉煌气派的大楼——“光前堂”赫然而起。有很多可以被单独罗列的个例，人们通常就把这些一个一个的“个例”编织成为所谓的“历史”，好像历史果真“只是”这样，或“就是”这些。历史越是在严肃、严谨的历史学家们的笔下，有时就越发显出它的滑稽，犹如哈哈镜中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学家用他们严肃认真的态度把他们所认识到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片面性给强化了，甚至扭曲了。这当然不是历史学家的有意失误，而是因为就人的认识水平而论，无论是认识过程中情感因素的作祟，还是时空的限制，还是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一个具体的个人永远无法全面地、科学地描述和认知历史的全貌。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里，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就同一个问题进行不懈地探索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把本书的叙事也划入“具有历史性”的范畴的话，那么，笔者也想事先声明，他所阐述的也是某种历史的片面。他只希望，一些人们还未及了解的“片面”有助于帮助

读者重新去编织更加符合逻辑、更加符合情理的“历史”。

“祖国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句带有浓重湖南方言的声音，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中华的美梦。不过，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就“笑到了最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明白，巩固一个政权比夺取政权难得多。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帝国主义迅速组织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另一种攻势，其来势之猛，架势之大，大有欲置人于死地之势。他们倚仗着战场上的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推行着来势汹汹的干预性封锁政策，煞是骇人。

1950 年 6 月 25 日清晨，在美国的策划下，南、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上大动干戈。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支持南朝鲜一方，并直接派军队参战。朝鲜战争就此开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谁不知道那朝鲜战场的“项庄舞剑”，意却在那邻邦“沛公”？

与此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7 月 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了以美国司令官指挥的“统一司令部”，组成“联合国军”，专门解决远东的共产主义问题。

这些事件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从本质上仇恨共产主义，你中国共产党要搞共产主义，我就要干涉。西方资本主义尽管本身有着千差万别，他们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则是一致的。只要世界上有共产主义的存在，他们就会非常默契地携起手来剿灭之。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失去控制：21 世纪前

夕的全球混乱》中，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并称为人类两大恶魔，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与杀戮、各种势力与权力的争斗，充其量不过是幼稚园中的把戏。“大”的要“小”的听话、顺从，否则“大”的就要教训“小”的。教训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千千万万，个中道理却极为低级。美国这个国际警察看到中国竟然也搞起了共产主义，当然老大不高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连锁事件。

战争只是极端手段，伴随着同一个目的，美国还与中国的周边国家联手，实行所谓对中国“半月形”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美国就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

1950年10月17日，美国与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泰国签定了军事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泰国不得将美国提供的任何物资运出泰国；不得泄露另一方军事秘密；泰国向美国提供原料和半成品；泰国准许美国自由和充分地视察美国军事援助的使用情况等等。

1951年8月31日，美国与菲律宾季里诺政府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分别和共同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来保护和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强调“在太平洋区域对签约国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都将对其自身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双方可依照条约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存在的危险。

1951年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定了《澳新美安全条约》，规定缔约国“保持和发展它们单独和集体的军事力量”，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在受到攻击时，应采取共同行动。

同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两个冤家对头几年前还杀得如火如荼，1945年，美国还发狠地在中国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仅仅6年过后，双方竟亲善到如此这般。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眼里比10个东条英机还要可怕，是一个令西方帝国主义谈虎色变的“怪物”。

1953年，美国与李承晚缔结《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美国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共同防御条约》。

这样，“东北亚防御联盟”遂告完成。

1954年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缔结反共军事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根据条约成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同时签署的还有《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协定书》和《太平洋宪章》。条约还规定：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亦受此条约“保护”。这样，“东南亚防御联盟”也已告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欲建立的对中国全方位的经济、军事包围和封锁体系终于形成。

“黑云压城城欲摧”。新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之中。共产主义在东方仿佛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艘船，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

凡事总有两面：当一种力量以其极端的手段对另一种力量展开围剿态势，围剿对象大到国家民族的尊严，小到每一个社会个体安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民族和他们的人民就会同仇敌忾，由此所产生的能量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何况，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尽外来凌辱，好不容易获得国家独立，人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当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这65000万同胞，加上居住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华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以各种方式去支持他们的国家和祖国。

李引桐正是其中的一个。“祖国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感情，也是他的第一反应。

作为一个海外商人，李引桐对祖国的支持有其特殊的条件。

李引桐是从事橡胶生意的。在工业化时代，橡胶与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日益密切。简单地说，飞机轮子需要橡胶，汽车轮子需要橡胶，医药卫生需要橡胶，人们日常生活的鞋子等需要橡胶……问题是，中国在这以前并没有能力通过种植胶树来生产天然橡胶。当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是世界最主要的天然胶生产和出口国，其产量占世界生产和出口的80%。

有意思的是，由于行业的独特性，东南亚橡胶出口业务主要掌握在华人手中，特别集中在闽南人手中。第一代橡胶大王陈嘉庚是闽南人，第二代橡胶大王李光前是闽南人，第三代从事橡胶生意的也大多为闽南人。所以闽南人若要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就相对便利得多。

橡胶价格曾经被经济学家们当作市场经济的“晴雨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自然“消费”不起汽车，也乘坐不起飞机，橡胶价格一落千丈，橡胶生意立马跟着萧条，甚至破产。陈嘉庚的资产曾经何止千万，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尚且使之破产，何况那些中小企业了。相反，一当经济好转，胶价瞬息之间看涨，赚起钱来也就相当惬意。

胶价涨到“没有道理”的极限是什么时候？通常是战争期间。道理很简单，无论是飞机、大炮、汽车，还是医药等对橡胶的需求量都呈上升趋势。这在朝鲜战争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于是橡胶成了特种军需商品，成为美国制约、封锁中国的重要物品。

李引桐知道，国家在这个时候需要橡胶，需要钱。橡胶可以直接用于抗美援朝，飞机、大炮、汽车、医疗器械，志愿军脚上穿的胶鞋无一不要耗费大量的橡胶。国家当时没有天然橡胶，最初只能从苏联进口。而苏联并不生产天然胶，它只能到伦敦市场上去购买，然后不远万里，从西伯利亚转运到中国。如此生意，做它一宗两宗倒也罢了，在大规模的战争期间，用这样的方法显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样的举动，很快就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公开秘密，英国本来与美国沆瀣一气，因此，这条渠道也很快就被堵塞。

另有一条渠道是斯里兰卡。当时的斯里兰卡是少数的几个与中国保持关系的国家之一。斯国总统班达拉奈克亲华，自然可以给中国提供天然橡胶。只可惜，斯里兰卡本身所能种植和生产的橡胶极其有限，要供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解决抗美援朝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对橡胶的需求，自然也是力不从心。

祖国面对这样的窘境，李引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决心利用自己从事橡胶出口买卖的便利，把橡胶弄到祖国去。具体操作是利用他在香港开设的一家“南宗公司”暗中进行。

说到“南宗公司”，我们不得不稍事停留，对它稍作交待。

从事橡胶买卖的商人，著要把生意做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战略家。为什么呢？因为橡胶生意从一开始就是一桩国际性买卖。如果对国际风云的变幻不能了如指掌，如果对战争、某些国家和地区军事行动、某一大国的权力更换所引起的政策变化以及新的经济政策的出台、甚至大的疫情不能及时了解，其生意很难说能做得好。李引桐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商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一个有眼光的战略家。他早就看出中国大陆迟早要由共产党执掌大权，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其地位非其他地

区可以取代。于是，在大陆解放之前，他就有意在香港建立一个公司，成为与祖国联系的中介和桥梁。

恰在解放前夕，李引桐的少年挚友李昆良从家乡来到香港，正无所适从。李引桐从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朋友，他两肋插刀，一身的江湖义气。朋友来了，他自然全力相助。可是李昆良毕竟不能在香港老是无所事事；从长远打算，李引桐决定专门为李昆良开一家公司。这样一来让李昆良有一份工作，心理上则又不会因得朋友的好处而不踏实；二则实现李引桐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想在香港建立一个能为祖国做事方便的“桥头堡”的心愿。后来，南宗公司事实上成为李引桐与祖国取得联系的纽带。国内的许多事务也是通过李引桐各种各样的朋友交往在南宗完成的。如果说，李光前一生与李引桐关系总的来说很好的话，那么或许他对李引桐最为不满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应该就属“南宗”了。从名义上看，“南宗”仍是“南”字头，属于“南益公司”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实际在运作上却都由李引桐负责。李光前一直担心李引桐因此事与共产党在商务上的往来太多会出什么乱子。如上所述，李光前的政治倾向比较温和，尤其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当然也有所保留。而李引桐利用南宗与共产党过往甚密，他很是不满。几十年以后，正是由于“南宗公司”的问题，导致了李光前与李引桐的不快。当然，那些都是后话。

有了“南宗公司”以后，李引桐无形中就多了一条与祖国交往的特殊渠道。朝鲜战争期间，他正是通过南宗公司，将大宗国内急需的橡胶医药用品运进国内，支援“抗美援朝”。而谁都不难想象，在那样的国际环境和大背景之下，如此行动要冒生命危险。值得一提的是，李引桐为祖国所提供的特殊物品有很多都是无偿的。也就是说，他在朝鲜战争时期因胶价猛涨所赚得的一大笔钱中有一部分无偿地用于支援他的祖国了。据可靠记载，战争期间，经李引桐之手，由泰国经香港、澳门两地辗转运到国内的橡胶达 21 万吨之多。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它不是堂而皇之在法律条文之下的合法交易；也不是驾着车、开着船大摇大摆地进出几个不同国家的海关；更不是为了几个钱而进行的走私活动……这是提着脑袋，自己掏腰包只贴不赚的营生；这是怎样一种经济行为，不——它更像一种宗教行为——为了某种认定的东西去殉道，去牺牲。与其说他为他的祖国送去的东西是一种“牺牲”，莫如说他本人就是牺牲。

第四章 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蛹蝶之变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是鲲者，总想翱翔于大海；是鹏者，终要飞翔到长空。大海之于鲲，长空之于鹏就像生命的形式与内容，肉体与灵魂，不能分离分割。只有各得其所，才能称得上英雄有用武之地，方可曰“逍遥”。

生命在大自然中所焕发出的丰采是变动，决非守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便是生命的律动。日本学者藤芳诚曾写过一本题为《蜕变的经营》的书，将企业的发展与大自然生命的演变二者同置一畴。他所以用“蜕变”，正是借大自然生命律动的规则作出演绎。蝉由幼虫变成成虫时，必须蜕去旧有的皮壳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新的生机。蛹要化蝶，必须要脱其束缚在外的那一层皮壳，它才能飞，否则，美丽的蝴蝶永远也无法飞起来。

动物是这样，植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凡是体现生命意义的都必定如此。企业要不断地具有生命力，就得不断地创新，不停地“蜕变”，要不然也是死路一条。

从“南暹”到“德美行”就是一次“蜕变”。这次蜕变孕育了一个企业新的生命，也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李引桐！

如果说大自然的生命演变是一种适应生态的要求，那么，德美行对南暹的更替则是一种企业生命延续的必然。从本质上说，企业的生存本来也是对社会生态的某种适应，任何企业本来就是在一定社会生态背景之下的存在，如果这种社会生态条件消失，那么，原来在那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就要跟着起变化，或被淘汰，或由新的、更适合新的社会环境的企业机体所替代，或是原有企业在新形势下对旧有企业体制进行改造，使之“蜕变”，用新的机体去适应新的社会生态。南暹公司没有选择后者，而是选择了破产——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于是，一个更新的企业生命——德美行也就应运而生。

为什么南暹没有选择后者？这一定是所有读者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从逻辑上说，就泰南这样一块对橡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李光前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更重要的是，就李光前的财政能力而言，他也完全有能力根据企业内部问题作些调整，或是投一笔资金，或是改变一下经营方针，或是作一些人事上的变动，南暹公司就可以起死回生。然而，李光前没有这样做。当时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他不走这一着棋，李光前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在那种情况下不去冒险；他选择了“超脱”——放弃的策略，可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要说清楚其中关系，还得事先把当时方方面面枝枝蔓蔓仔仔细细地搞个明白，有些问题迄今也没有人去挑明它。仿佛在这一段历史中漫着一层迷雾，有人去揣度，有人在猜测，有人却搬弄。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这就是南

暹公司的破产、德美行的创立，李引桐从单纯的南益公司“伙计”变成了既是南益公司的“伙计”，又是德美行的“老板”双重身份的过程，这个变化并未使李光前与李引桐二人产生恶交，两人的情谊依然甚笃。这一点从我们的开篇的引子中便可窥见。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成立于佛历二四九一年，即公历1948年的南暹有限公司本不是南益开拓泰国橡胶业务的第一步棋。在此之前，原有一家南益集团在泰国南部开设的公司，名曰南泰有限公司。由于国际政治背景在泰南反映得较为尖锐，也由于企业本身经营不善等原因，南泰最终宣告破产。当时李引桐在北马负责南益集团的业务。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李光前准备物色一个能力强、有胆识、敢冒险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出来担当责任的人去接替南益在泰南的业务。李引桐成了当然的人选。可以说，李引桐到泰南主持南益业务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南益找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人；也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去那个是非之地。人们都不愿意去接一个烂摊子。

话得从远的说起。

在版图上呈细长状的泰国南部，早先一直是一块蛮荒之地，那里杂草丛生，强人出没，多民族对峙。尽管其地理条件不错，却很少有人敢去光顾。不知何时，泰国南部发现了大量锡矿藏，于是引得一批商贾劳工前往。100多年前，泰王准备开发泰南，计划从曼谷修一条铁路到南部重镇宋卡。当时英国公司承揽了这项工程。精明的英国商人到中国雇用劳工，因为中国的劳工既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肯吃苦的群体。中国劳工在广东被招收和录用，其中客家人较多。

泰国南部的自然生态又极适宜于橡胶的种植。1900年，祖上来自福建的华人后裔许沁美，一位橡胶种植业的伟大先驱，从马来西亚取来胶枳移植到泰南，开创了泰国南部的橡胶种植事业。1908年，另一位祖籍为福建的华侨陈清发取得胶种到泰东试种，获得成功。正是这两位福建人开创了泰国的橡胶种植业。这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橡胶与福建人的历史渊源关系。

早先的华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到泰国南部，他们或是乘船到马来西亚的檳城，尔后取陆路到泰国南部；或是由檳城走海路在普吉岛登陆进入泰南。蛮荒之地就像一张白纸，有志气的人就喜欢在白纸上作画。那些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奋斗的中国人除了带来了他们勤劳的双手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他们正是要在这块蛮荒之地上编织他们致富的梦。陆陆续续到来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们，不会说泰语，不会说英语，各自操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得懂的方言——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亲找亲，团抱团，默默地开始了他们的异乡创业生涯。由于行业的关系，来自闽南的福建人大多集中在橡胶和采矿两个行业。1924年，铁路开到了宋卡府的合艾市。合艾开埠，从根本上沟通了泰国的北南，便利了货运，方便了旅客，泰国南部才慢慢地发展起来。

尽管泰南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采矿业、橡胶种植业和交通的进入渐渐地有所改观，但泰南与曼谷、清迈等自古就是文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相比仍不能同日而语。何况，随着泰南锡矿的被采尽，原来从事采矿的大批劳工或离开泰南，或改弦易张，泰南经济又一度出现衰退。大批华人，特别是福建人离开了泰南，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去谋生了。然而，泰南的橡胶种植

业则一直看好。顺带说一下，根据最近的统计，泰国南部的橡胶总生产量占整个泰国橡胶产量的 89%。泰国生产和出口的天然橡胶居世界第一，而德美行则居整个泰国天然胶出口之最。不过，这已是今天的事情了。如果今天让人们去泰南工作，很多人会乐而忘返。几十年前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是蛮夷之地！到泰南形同在中国古代因什么罪之类被送往大西南等边疆地方去充军一样。

话还得从政治方面说起。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分析，泰国南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舞台。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马来西亚共产党。

马来西亚共产党，外文缩写 MPC。

1930 年在森美兰邦成立。

1942 年 1 月 1 日创建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4 年与泰国共产党在泰马边境（即泰国南部的广美地区）联合建立抗日武装部队。

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属马来西亚殖民当局实施《紧急条例》后，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主要活动地区集中在泰马边境地区。

.....

马来西亚共产党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由于受到国际反共大环境的影响，不得不转入地下或农村。东南亚许多国家在那种形势下相继出台了各种名目的反共、制共的法令和法规。比如前文提到的马来西亚当局于 40 年代末实施的《紧急条例》就是用于镇压马共的法律条文。根据此条文，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可以下令扣留、拘捕任何马共的嫌疑分子，拘留期可长达一年。这个全名为“马来亚联合邦紧急条例”的法令直到 1960 年才被宣布取消。不言而喻，对于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际遇，中国共产党以特有的方式，有限度地给予同情与支持，但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这种同情与支持更多地还是停留在道义和情感上。

在这一段时间内，泰国南部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成了没有人能够真正管辖得了的地区，各种力量、各方菩萨、各路英雄云集那里，泰南成为名副其实的“是非之地”。绝大多数的生意人不愿、不敢到那样的地方去发财。如果你生意做得好，人们或许要说你与某一方政治势力有什么瓜葛，使你陷入多数商人不愿意介入的政治漩涡之中。如果仅仅是为了挣一点钱，按一般人的思路，谁也不想提着脑袋到那种地方去玩命。从实而言，泰南的土匪的确确是强悍得有名气。总之，李光前要不是有 120% 的把握，不会去那里冒险。这是由李光前本人政治态度所决定的，也是他的个性所决定的。

李引桐则不一样，他之所以敢作敢为，是因为他生性喜欢冒险；特别是，越是风险大，他还越想一试。在政治倾向上，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泰南曾是“共匪”出没之处，他自信，凭着自己与共产党的朋友之交，在泰南他不会有事。当初李光前之所以派他到泰南，也算对他的这个下属了解得极深极透，称得上慧眼识英雄。

话还得从不同国家的财政体制的差异说起。

新马与泰国在国体上是不一样的，两国（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分治）在财政体制上也不尽相同。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属英镑系统。新加坡政府明文规定，属英镑系统的个人或者是公司的法人要到英镑区以外的地方去投资，必须事先向政府申请，政府将对其资本去向进行调查核实，

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具体在操作上，要到外国去投资，事先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外汇，并按规定注明资金的去向、用途以及详细的账务账目等等，以便纳税和核查。如果没有履行这些手续而擅自动作，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有权进行查处。即使英国政府不处罚，李光耀也要出面查处。所以，李光前在泰国的公司，泰国有账，新加坡则没有账。因为在泰国公司的法人为李引桐，李引桐是马来西亚籍的泰国侨民，做起这些事情便利得多。李光前则不行。如果新加坡方面知道李光前在泰国有财产，自然要向李光前查询：你什么时候到泰国投资的？你没有文件、没有授权书怎么会有财产？你没有向外汇部门申请哪里来的外汇？你是用什么渠道转去的资金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李光前就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泰国的情况与新加坡大不相同。泰国在历史上没有为国体上依附于哪一个西方宗主国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加之，两次世界大战泰国都未曾真正卷入，因此也没有受到破坏。又由于泰国国教为佛教，对于这一切“荫遮”和奇迹，老百姓一方面将其归功于他们的英明君主——泰王，另一方面则归结于佛主的保佑。泰国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在国体上保持着独立自主性。很自然，泰国在管理上也实行自己的一套制度。李引桐在泰国开展橡胶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泰国分行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做橡胶生意时把款项中的一部分留在美国银行，也是利用了新马与泰国在管理上的差别。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厦门大学 and 梅山在教育上的大笔经费也就无从筹措了。不过，由此引出来的责任制也就显得很独特。比如名义上南暹公司是南益公司的一个下属分公司，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有李光前、李成枫、杜定省、李引桐、李引豪、李成坡、李国光等，但其中大多数人居住在新马，真正负责的法人则是李引桐，向银行借贷毫无疑问也由李引桐去操办，新加坡方面并不知道。当然，如此之操作原本也是为了便于生意上的发展。如果生意一切顺利则大家都好，南益就可以大大的受益。也就是说，挣到的钱是属于南益的，属于李光前的。要是出了事，责任的第一承受者，毫无疑问是李引桐。理由很简单，他既是公司经理，又是法人代表，所有向银行贷款的担保都是他。银行要是追债，找的也是他李引桐。泰国政府不可能跑到新加坡去找李光前。更何况，新加坡根本没有账目可查。

从理论上说，法律最可爱的地方在于，无论是谁在面对它的时候都是平等的，法律要用“证据”说话。法律最可恨的地方在于，它经常是盲目的、呆板的，人们只需在“证据”上稍稍玩玩雕虫小技，法律顿然显得苍白无力。天底下不知有多少人“犯了法”而逍遥法外呢。比如在向银行借贷的过程中，按照规定，要有一个“担保人”，出了事就找他。至于说，借贷的人用这笔钱能够得多少好处、利益，它一律不管。当年，陈嘉庚主持谦益公司时，向银行借钱，是陈嘉庚担保。后来公司生意亏了本，担保人要赔，赔不起就用公司的财产作抵押。谦益公司最终还不起，只好宣布破产。当时李光前、陈六使却没有事。他们都是伙计，伙计是不要承担责任的。正是这个原因，陈嘉庚破产以后，李光前、陈六使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生意反而发展起来。李光前还买下了陈嘉庚的部分产业。这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害两人的感情。商务与家务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靠的是理性，后者更多讲的是情感。尽管岳父和女婿都做橡胶生意，岳父做垮了，女婿则做发了。那属于经营之道，属于法律，不妨碍翁婿感情。所以，陈嘉庚因厦门大学的修建向李光前要钱，李光前毕竟最后还是点头允诺了。南暹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上

面所说的特殊原因，万一出了事，李引桐要承当“陈嘉庚”的责任，尽管他的身份还是“伙计”。可以说，这是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境造化出的特殊事例。法律爱莫能助。它要做的只能“按照规定”办理。正是由于这些事先可想而知的结果和可能性，以及李引桐在其中所可能承当的责任之大，处境之艰难，李光前才委之以如此重任，给他以最大限度的信任，也给了李引桐以充分的自主权。他清楚，在南益，要完成如此使命，非李引桐莫属。

然而，南暹公司最终还是出了事。

众所周知，橡胶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商品。朝鲜战争期间，橡胶是西方帝国主义用于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特种物资，自然它本身也成了最为走俏的商品。所以，胶价在一段时期内上扬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橡胶商们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是，谁知道，最容易发财的生意，往往也就是最容易破财的生意，否则谁都会涌去做那种生意了。在朝鲜战争的一段时间里，天然胶的价格一度上升到历史之最，却很快地跌落下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一家橡胶企业有足够的支撑能力支撑过去了。有能力者，这个企业就得以生存，没有能力支持者就破产。这就是做生意的规则。按说，作为南益公司的一个下属，还是经受得住橡胶价格起伏的。

然而南暹在生意上没能度过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大幅度胶价下跌的险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修建厦门大学 and 梅山学村留下了大笔债务。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及此事。大致情况是，李引桐为了支援厦门大学 and 梅山学村的修建工程，曾向陈嘉庚出主意，动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分行在美国的银行里存有的那一笔钱。而印度尼西亚当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很好，在各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严密监视，加之，那里没有像李引桐这样的人，所以，尽管印度尼西亚分行在美国的银行中也留有一笔钱款，但在厦门大学 and 梅山学村的修建工程中却始终没能用上，所有的款项都是由泰国分行支付的。在此过程中，那笔留存于美国银行中的款项用尽之后，陈嘉庚并不知晓，仍不断向李引桐催索，万般无奈，李引桐乃动用原本属于企业上缴给政府税收中的 80% 暂留于企业半年的那部分延期纳税款，当时政府的动机是鼓励胶商进行进出口生意，以提高泰国橡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故而留下大部分税金用于企业资金周转。没想到泰国政府的这个给企业的特殊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宣布中止，要求企业所有税款一次性交清，谁想到李引桐早就把那笔款项汇到国内。这个点子是他本人出的，事情也是由他亲自操办的，责任也就由他一人承担。不幸的是，面对泰国政府，他又构成了违法的“漏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由于以上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到 1951 年，南暹公司欠泰国政府的税收及罚款就多达 2000 万元。

李引桐向李光前力陈利弊，希望李光前能救南暹。李引桐认为，橡胶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与朝鲜战争的形势有关，只要捱过这一段时期，公司会有起色。

这一次，李光前没有要救南暹的打算。他主意已定，放弃南暹。

或许是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把全部家产都压在橡胶生意上太危险，确实太危险！他的岳父——一代橡胶大王，最后的结局如此惨烈。朝鲜战争的前前后后，天然胶价格呈惊涛骇浪之势，大起大落，企业就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艘小船，时时都有翻覆的危险。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李光前就已开始向金融、银行、房地产等产业进行战略性的部

分转移。

或许泰南这块土地太具有“红色”色彩，是一个政治上的是非之地，李光前无意卷入。

或许，李光前感到利用新加坡与泰国两种不同财政制度的“空隙”仿佛是一支高悬于头顶的剑，时刻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尽管李引桐一再劝说，尽管李光前也深知，南暹公司的危机是暂时的，但他主意已决，毫无回心之意。

李引桐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努力一下，渡过暂时难关，泰南仍大有可为。对此他深信不疑。再说，若此时此刻打道回府，无异于败军之将。想当年，项羽兵败，宁死不肯过江东，他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呀。

最重要的是，企业经营盈亏，不啻是人生的沉沉浮浮，只有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方能获得成功。为人的道理是这样，企业经营的道理也是这样。何况，李引桐受命于危难之时，早已做好了暂时失败的准备。

经过与李光前的长时间商谈，李引桐知道说服李光前挽救南暹的希望破灭了。剩下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回到南益总公司，另谋他就。这当然也不坏。何况南暹既有亏时也有赚时，即便是亏，没有人会将责任全部推卸到李引桐一人身上。他照样可以在南益干下去，而且可以干得很好。另一个选择就是自己干。毕竟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心血，留下了许多关系，留下了许多人生的记忆。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这更符合李引桐的性格。他决计选择后者。

李光前对他这个亲戚和下属可以说了如指掌，此时此刻让他打道回府根本就不可能。于是，李光前说：“对南暹公司如有兴趣你可以接手，债务由你负责。”李引桐应允。

南暹公司从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南暹宣布破产后，李引桐与几个朋友合作，向他在银行界的老关系大城银行和盘谷银行寻求贷款帮助。在银行界，李引桐有不少至交，其中之一是泰国首屈一指的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李引桐向他们借贷了一笔款项，买下了南暹公司的产业，新创了一家公司——德美行。李引桐亲任董事长。

关于李引桐与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的关系有必要带上一笔。盘谷银行在泰国金融界鼎鼎大名。90年代初，盘谷银行在泰国国内的分行达430家、海外分行达18家，占有泰国总贷款额的29.6%，总存款的28.13%，外汇买卖的33.3%，是东南亚第一大银行。据史料记载，盘谷银行于1949年由泰国曼谷唐人街的一群潮州黄金进口商合伙创办（另有资料称，陈弼臣于144年与朋友奎济鲁吉、他因·迷颂坚、谢毅庵、洪瑞庭等人合资创办），主要创办人有陈弼臣、周秀辅、郑景云、林碧枝。陈弼臣苦力出身，为人豪爽，极讲义气，善交朋友。他不仅广为结交大商家、企业家，而且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互惠互利。李引桐与陈弼臣在性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在交往中成为好朋友本不足为奇。另外，盘谷银行在创始之初仅拥有排屋2间、职员23人。而当时无论是南暹还是德美行对盘谷银行来说都是大的客户。尤其是做进出口橡胶业务，需要大笔的外汇流通，更是银行不可多得的争取伙伴。40年代末50年代初，可以说，南暹、德美行之于盘谷银行就像是哥哥之于小弟弟。更何况李引桐和陈弼臣两人交情甚好，所以，南暹破产后，李引桐向陈弼臣借贷无论从二人的交情而论抑或是从双方的发展前景来看都是互惠互利的“生意”。

从南暹到德美行，这是李引桐人生的重要一步，也是他在橡胶经营上从协办到独立主办的转变。

这是一个从蛹到蝶的蜕变；

一个由鲲到鹏的蜕变；

一个凤凰涅槃后的再生。

吾“力”之外

世间最强大者是谁？是神还是人？

这个问题极不容易回答。

很多人小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人们在无助的时候，期望得到在我之外的“异力”帮助。于是便有了神。

据说人类还在“童年”的时候，对自身的来源充满好奇，却又不知道自己这个肉身缘何而存在，就认为寰宇之间有一个造物主。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论是口传历史还是文字历史都有一个创世神话，它们无例外地都将世界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个于我之外的“存在”。戏谑地说，即使是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的作息时间仍然沿用“神”制定的体制。因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当初神造天地万物的劳作时间，礼拜六礼拜日是神的休息日。人是神造出来的，自然要服从神制定的规矩。据说人类还在“童年”的时候，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充满着恐惧。天界何以会下雨、打雷？为什么会出现火山喷发、地震海啸之类令人们惧怕且又陷入类于无助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开始相信在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可怕的力量。在这些力量面前，人显得那样渺小、无力，人们认定驱使这些东西的一定是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是什么样子呢？人们自然没有机会一睹其面目，就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神。神可以翻江倒海、推波助澜、驱策雷电……人们因此对它们顶礼膜拜，希望它们能根据人类的意愿赐福禳灾，保佑平安。

这样，在可溯的历史和可及的疆域，宗教就成了一个与人类密不可分的东西留存下来。

闽南人素有信教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只要到厦门的南普陀走一遭，这个结论就可以得出。这里的人们很相信观音菩萨的神力。据说“观世音”可以用“眼睛”看到发源于民间的“声音”。否则她怎么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呢？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声音都是用耳朵听的，却始终看不到。神就“神”在这里！所以，这里有许多人很是热衷于到庙宇里去求神拜佛。当然，那些迫于生计出奔南洋的闽南人，除了把自己的肉身带到南洋外，也带去了这种信神求佛的习惯和风俗。

李引桐是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并不说明他有什么超凡之处，而是在他的生涯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不是神，却是人——是自己和那些难兄难弟们。

早年还在家乡的时候，土匪来打劫，善良的父亲被捉走，小小的李引桐躲在角落，他曾喊天喊地，喊神喊灵，神灵并没有救他，观音毕竟没能“观”到他的声音。他的堂姐被人掳去强做新娘，逃跑后再度被抓，用火焚灼，她哭天号地，李引桐也为他的堂姐在心灵深处呼喊，那观世音也没有“观”到。甚至，当年他们那些穷孩子读书没处安身，栖身在观音庙里，许多穷家弟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莫非就在观音菩萨眼皮子底下她也“看”不到？从此

李引桐就不信神不信佛了。

说来也巧，李引桐至交陈启舟的太太是一位笃信上帝的女性。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她亲眼目睹李引桐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一直试图使他信教，更有意思的是，她直到晚年，还写信给李引桐，说一定要到上帝那儿去传一个口讯，让上帝在李引桐死后把他接到天堂上来。面对这样一个上帝的信徒，李引桐倒也愉快地与她交流看法，对于她所提的问题也总是乐于回答，他说，我尊重你的信仰，如果依你所说真有上帝的话，我也尊敬上帝。但是我只相信现实。你要让我死了以后上天堂，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上不了天堂，因为我不相信有什么天堂；如果有的话，那我现在就天天生活在天堂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李引桐不是共产党员，但在这个层面上他着实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层次，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至于民间信仰之类的东西，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每个人有一些独特的观念是很正常的事，但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人，能够生出一种比较独特的价值系统，却很不容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价值会全面地体现在那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尽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他们的文化行为会普遍地体现那个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特征，让人很容易看出他们是来自某一个社会层面的，因为他们的共有特征太明显。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作“集体无意识”。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够突破旧有传统价值体系所形成的羁绊，并相当自信地自成一格，那将对社会的进步很有意义。

东南亚华人最大的五个区域群落——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都来自中国的东南沿海。从其文化形态来分析，虽然这些地缘文化圈中都渗透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内涵，但与中原地区的表现形式则明显不同。最外在的两个差异为语言和信仰，而这两项又构成人们作文化认同时的外在依据。方言的差别显在外面，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殊，对信仰上的差异的了解则得多费点气力。

其实，这五大区域群落在信仰上也有明显的特征：第一，以血缘为纽带扩大的家庭范围的祖先崇拜。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以“血缘关系经济”为特征的，所有儿子和孙子，哪怕他们自己有了家庭，仍然不妨碍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这样的家庭里，除了那个年纪最长的男性拥有权威外，借助“祖先”的维系力不可缺少。尤其在异国他乡，华人家里的那个神坛、神龛、祖先牌位等便具有一种秘密的符号力量。祖先祭祀仪式遂成每一家庭每年最为重要的事件。第二，如果说，华人家族、家庭的精神维系是祖先崇拜的话，那么体现在以方言为叙事手段的区域团体间的内在联系标志，就是在同一区域范围大家认同的某一个“神仙”，以图借用其异力禳助或庇荫。因此，东南亚华人圈内的“神仙”非常之多，且互不搭界。为了对德美行有较全面的了解，笔者曾多次到泰国进行调查。1995年春天我在泰南作长时间逗留，春节期间在泰国的南部城市合艾参加了许多当地华人组织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一个叫“万神游行”的隆重庆典令我难以忘怀。当地的华人以区域方言为单位抬着自己崇拜的“神仙”出来游行。这些“神仙”的名目多得令人瞠目，有八洞仙师、林府姑娘、宋大峰祖师、伽蓝菩萨、福德伯公、富贵佛祖、田府之佛、北斗星君、三宝祖公、齐天佛祖、萨加牟尼、观音菩萨等等。这种交织着儒、释、道和区域色彩的“神仙”们，虽然不免给人以杂烩拼盘的感觉，对绝大多数海外华人来说却不可少。因为一则这是他们自古而来的传统；二则他们

远离祖国，借此作为精神寄托和心理依靠；三则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事业兴衰与这些“神仙”的保佑融成一体，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价值观。

李引桐没有这种价值观。他不相信任何“神仙”，自然对这些“异力”也就不寄予任何希望。他甚至对这些“神仙”（先圣）有大不恭之嫌。比如中国人把关公关云长奉为神灵，筑庙立坛，烧香膜拜。李引桐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关云长的“忠义”自然值得称道，但他杀人放火，盲目而行，这种人不值得崇敬。如果一个社会只以这样的人为楷模，所形成的社会规范一定充满杀机和盲从，毫无疑问，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濡染出来的人也很难有什么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德美行作为华人家族式企业，与大多数东南亚华人家族式企业的一个外在差别，就是人们在企业内部看不到任何诸如祖先牌位、天地君亲师、神坛神龛之类的东西。逢年过节，许多华人企业、商店、家庭都要烧香、祭神，举行各式各样的仪式。这些在德美行全都没有，而且从德美行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没有。李引桐不需要这些，他所需要的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开拓，去进取，去努力，去冒险，去创造……同时，李引桐相信，一个企业要发展、要成功，需要一个权威、一个精神领袖。这个权威是谁？这个精神领袖是谁？就是李引桐自己。

李引桐有一句名言：“我是德美行的邓小平！”在德美行的总部以及所有的分厂办公室的最显要位置悬挂着两幅像：泰国国王像和李引桐像。很明显，泰国国王像是给别人看的，而李引桐像则是给所有德美行职工们看的。

在德美行这个“家”里，李引桐就是“家长”、老板、企业领袖。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

不过，李引桐虽然不信神、不信鬼，不允许公司企业内有这些东西，但对职工在公司之外的信仰、兴趣一概不干涉。要烧香拜佛，信神信鬼，只要不在公司，悉听尊便。

李引桐在创建德美行之初就试图确立这样一种价值观，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这里是一个闽南人的家，我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缘何而来？为钱、为生存、为发展。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得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以企业为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共同创业，共同发达，自己帮自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靠得住。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泰国南部的条件在彼时极为恶劣，热带病在华工群体里时有发生，夜晚蝇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特别那些初到泰国的乡里乡亲，个个一贫如洗，又不习惯热带气候，有的得了病，有的失去了信心。南暹的破产对他们来说，可谓雪上加霜。李引桐建立德美行以后，首先想到那些含辛茹苦的乡亲们，他把一帮穷困潦倒的乡亲宗亲重新招到了德美行，大家同吃同住，同甘共苦。50年代初期，泰南相当落后，电刚刚用上，但电力不足，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钟之间，电灯只有一线红光，人在灯下只能显出影子。到了9点以后，才稍好一些。

这还是在城市里的情况，德美行的工厂最初有的在泰马边境的陶公，那个地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前去，那里现在依然人烟稀少，到处丛林。在当时的情况下，其条件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电是没有的。李引桐和工人们一起在简陋的工棚里生活。夜晚昏暗的油灯下，他与工人们一起蜷缩在工棚的通铺上。生活虽然艰苦，可这一伙来自中国闽南的农民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退路，何况他们的老板尚且经常同他们过着一样的日子。所以他们

并无什么怨言，只要有份工做，有口饭吃，加上大家的努力，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

李引桐非常体谅这些乡亲的难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点钱回家。开初时的工钱是按工人们努力的程度和能力的大小发的，但工资的数额很小，还得看橡胶生意好坏而定。华工们本来就有省吃俭用的传统，他们除了每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外，剩下的就都寄回老家。在泰南邮寄相当不易，他们通常是委托马来西亚檳城的乡亲们代为邮寄。每月可寄回一二百港币。到了年底，为了让工人们干了一年有一个希望的感觉，李引桐按照惯例都给每个工人“发红”。德美行创业之初，工人们在年终可以得到三四千铢。要知道，对于穷惯了的农民，这委实为一笔不小的收入。

当初那些只身外出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积蓄，很快就能达到几万元，他们可以用这些积攒下来的钱来成家了。

德美行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学者等对东南亚华人掌握了他们所在国大量资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事实极为诧异，然而，只要人们了解一下他们在创业之初的努力、团结、艰苦、忠诚、俭朴等等，一切疑团便可以迎刃而解。关于这一点，德美行就是一个范例。

而对于那些有成就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也都无例外地有一段“从苦力到巨头”的历史。1994年8月24日的《亚洲周刊》有一篇文章正是以此作标题介绍了东南亚华人企业创业和帮助东南亚国家建设的简要历史，作者援引马来西亚一位政府要员的话：“中国人最初到这里落脚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血和汗去获取面包。”关于这一点，李引桐就是一个范例。

第五章 为祖国引种橡胶的人

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孙中山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古代希腊神话留下了一个令全世界的人永远无法忘却——想忘也忘不了的悲壮故事：普罗米修斯盗火。人类之所以忘不了他，是因为他给人类的东西太多太多；正因为他给人类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他承受的苦难也太多太多……

普罗米修斯是宇宙之父提坦之子，他生来就是神，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众神仙居的奥林匹斯山上，日日与众神畅饮琼浆玉液，饱啖珍馐美味，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可他没有，也不愿意这样。

他经常来到人间，同老百姓在一起，体察民情，帮助解决人民的疾苦。

太古时期人间没有火。平日里人们捕野食果腹，在捕不到野兽的时候，总是不得不食用变质发臭的东西，人类因此生病、死亡。冬天来了，人们没有火取暖，只能龟缩在冰冷的山洞里不敢外出，很多人抵挡不住严寒冻死了。

普罗米修斯决定为人类把火种从天庭盗下人间。

天条规定：火种只属于众神，人类是不配享用的。谁要是破坏了这个规矩，谁就要受到上天最严厉的罚处。

普罗米修斯舍生取义，毅然将火种从天上偷到了人间。从此，人类便有了火。他还教会了人类用木头和石头盖房子，教人类怎样驯养牛羊，播种耕耘，开采冶炼……人间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然而，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触犯天条，主神宙斯下令将他绑缚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派一只神鹰飞来啄其肝脏，晚上又让伤口复原；第二天神鹰再来啄咬……普罗米修斯苦不堪言。他就这样倍受折磨达 999 年之久。

马克思对这位伟大的盗火英雄崇敬备至，称他为“哲学日历中最崇高的殉道者”。

对中国人民而言，李引桐也称得上是一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据国际“经济学家情报中心”的统计，中国的天然橡胶（橡胶主要有两大类：天然胶和合成胶）生产现居世界第五位，1994 年达到 26.4 万吨。从 1990 年到 1994 年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天然胶产量稳步上升。

众所周知，橡胶是工业、科技、医疗、交通、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原料。战争期间，它更是特种军事战略物质。伴随着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市场对它的需求日益扩大，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它的需求更是不言自明。

天然胶取自于橡胶树。1496 年，哥伦布在其第二次新大陆之行中，来到了一个名叫 Haiti（海地）的地方休整。在这个海岛上，他看到当地的土著人用一种树胶捏成的“胶球”在地上弹来弹去地玩耍。这使得航海冒险家们非常吃惊，因为在他们那些自诩的“文明人”当中竟没有一人见过那玩艺儿，也就不知道其为何物。好在哥伦布有一个记日志的习惯，他留下来的这段记录成了最早提及橡胶的文字。

1876 年，一个名叫亨利·威克罕姆的英国爵士（Sir Henry Wickham）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海上贸易，从巴西偷运走了一些橡胶种子。他先是企图将这些树种移植到欧洲本土，后因欧洲的自然生态与橡胶的原生地的差异太大，未能成功。经过一年多的辗转，1877 年，一部分橡胶种子被移植到了马来西亚。从此，在东南亚国家开始了种植橡胶的历史。

橡胶树虽来自所谓的“蛮夷之地”，却有着天生的“贵族品格”，它对自然条件有着特殊的需求。其原生地是亚马逊雨林地带，那里高温、多雨、潮湿、海拔低。也就是说，只有在相应的条件下才能够种植橡胶。专家曾根据天然橡胶的生长分布情况，总结出了橡胶生长的生态条件；即按正统的说法，它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 15 度的范围内，这似乎成了橡胶种植的极限。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海南岛引种橡胶树的成功，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15 度以北，大大超出了橡胶种植的极限。此事令许多学者惊叹不已。国际橡胶研究机构（IRSG）在新近谈到橡胶种植历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由于在中国的引种成功，橡胶树种植今天已经扩大到赤道以北 20 度的地区。”

人们大约只知道这个奇迹本身，鲜有人知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人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李引桐。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用政治压迫、军事干预、经济封锁等方式，试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天然胶价格上升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作为特种军需物资，橡胶自然成为帝国主义用于限制中国的重要原料。

中国当时并没有种植橡胶。急需的国防物资，如石油、橡胶等，最初只能从苏联进口，或借苏联之手到伦敦购买，再从西伯利亚转道而来。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橡胶受到德国的控制，而国际最大的橡胶市场是伦敦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当时最大的天然胶生产国要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的橡胶生产占了世界天然胶生产的 80% 以上，可是橡胶的生产和流通则由国际橡胶组织所控制，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天然胶生产和交易必须通过两三个国际橡胶市场进行。我们的国家需要橡胶，没有它，国家不能发展；我们的军队需要橡胶，没有它，飞机不能上天，大炮不能上前线；我们的人民需要橡胶，没有它，医院不能正常开诊，老百姓没有胶鞋穿……中国不能到国际橡胶市场上去买胶，只好“委托”苏联老大哥代劳，去伦敦购买。后来，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西方帝国主义也因之有了限制。

另一条途径是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断绝了同中国的交往。斯里兰卡是当时少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之一。当时斯里兰卡总理是班达拉奈克，与中国的领导人关系很好，中国可以从这个国家进口一些天然胶。但是，斯国的橡胶产量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求。

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李引桐目睹着国家的难处，心急如焚，他说：“国家现在有难，我理应分忧，不能袖手旁观。”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引桐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视之为己任的事业。一方面利用自己从事橡胶进出口业务的便利，利用东南亚国家的橡胶生意大都掌握在华人——准确地说，大都掌握在福建人手里的便利，通过各种渠道，将最急需的物资，如橡胶、医药、医疗器械等运到祖国去，其中有许多是无偿赠送的。另

一方面，他一直考虑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从根本上解决祖国缺乏天然橡胶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橡胶树引种到祖国去。他很清楚，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运到中国的物资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许能解一下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引种橡胶方为长远之策。

“ 桐字号 ” 品名

1956 年，一个由新马知名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一行 30 余人平静地飞抵北京。此事没有过多地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个工商考察团里就有李引桐。促成这次不同寻常考察的成行，事实上浸透着李引桐的大量心血，个中细节已经很难一一辨清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 50 年代初开始，李引桐就经常穿梭往来于东南亚与中国大陆之间，而且经常是各国政要、首脑的座上客。按一般的事理，商人与政治家不容易坐到一处，当商人与政治家们真正地坐在一处，必定有秘密，必定要发生一些大的事情。那么，李引桐到北京来与政治家们坐到一起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呢？简单地说，是为橡胶，为祖国在当时和未来所需要的橡胶而来。

1952 年年底，李引桐携夫人到北京。

接待他们的是中联部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按外交惯例，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总是下榻于国宾馆或高等级宾馆。然而，李引桐夫妇那次在北京期间什么宾馆也没住，却以老朋友的身份住进了廖承志家里。接待和招待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

在回忆起那次奇特的“访问”时，我们的主人公李引桐倒是遗忘了许多细节，因为在北京成为中央领导家中常客并非绝无仅有，而且他要与中国领袖们商谈有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事，生活上的许多小事他大都没有在意。反倒是李太太对发生在 40 多年前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讲述了这样一件居住在廖承志家的小事：他们夫妇因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生活惯了，去北京时没有携带足够的御寒衣什，李太太还特意追加了一句，“其实我们也没有冬天的棉衣，我们在新加坡不需要吗！”怎料想李太太到达北京以后难熬其寒，她亦不客气，大呼寒冷。何香凝阿妈（闽南语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就翻箱倒柜，到处为李太太找衣服，最后找出了一套何香凝年青时代穿过的冬装给李太太穿。末了，李太太很是认真地对我说：“何香凝阿妈为人真是好。”

这件事情本身虽与橡胶买卖、橡胶引种风马牛不相及，却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凭借着如此厚实的“关系”，李引桐要为国家做些什么，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李引桐为祖国引种橡胶之事，还有一件事有必要理清。

说中国大陆在此前没有生长任何橡胶树，这不符合事实。中国的海南岛上早就生长着一些橡胶树。更早的时候是野生，后来在人们了解到橡胶的作用后，也有过人工种植的历史，不过都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种植和生产。

1955 年，当李引桐再度来到祖国考察华南橡胶试验基地时，负责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当时的农垦局局长何昆（后来何昆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他们在广东期间，听到农垦局的人说，陈嘉庚前些时候曾在侨委领导的陪同下到海南岛去看过，说你们这样种胶树不行。因为陈嘉庚曾是橡胶大王，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没了主张。李引桐听了之后委婉地说：“陈

嘉庚老先生说得不错，但他所说的是 20 年代的种法。现在是 50 年代，橡胶种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在场的工人和干部对这个高个头的人还不熟悉，其实，这个高个头的华侨正是负责在中国引种橡胶、开辟种植基地的特殊人物。而后来所有在海南岛从事橡胶种植和生产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都与这个人的名字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农垦局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何局长等人就陪同李引桐从广州乘飞机取道湛江，飞往祖国的海南岛。

接下来就有了一系列更大的动作。1956 年，他作为一位身份特殊的新马工商考察团成员来到北京。

中共中央对新马工商考察团的到来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工商团的全体成员。中央还精心安排了工商考察团到国内参观考察。华商们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几年的艰苦努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比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还要好，因为东南亚许多国家刚刚从殖民地的压迫中摆脱出来，他们的经济基础比我国还要薄弱。特别是 1955 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人民建设祖国热情空前高涨。只是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海外华侨华人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新马工商考察团的成员经过在国内的参观考察，亲眼目睹了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形势，对海外华人真正了解祖国作用极大。

李引桐随团而来，他的主要目的与考察团其他成员不同。他不是来了解祖国建设的大好形势的，因为对于这一切，他甚至比一般的国民了解得还要多、还要透彻。他在团里的作用，除了介绍一些国内情况，引见一些中国领导人，给各个部门牵线搭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要去做，这就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为祖国引种橡胶的事——他将其视为一种天职，一种神圣的天职。因此，新马工商考察团回去时，他并没有随团返回，而是悄悄地往那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中国最南端海南岛去了。

海南岛，这个中国第二大岛屿其时还很荒凉，在大多数中国人印象里的那个大海岛除了大片的椰林、海滩外，可能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背景了。实际情况与人们的印象虽会有出入，公平地说，倒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一句话：落后！为了开发海南岛，当时农垦局的工人们勤奋艰苦地在岛上耕作。但是他们却没能使海岛上的野橡胶树生产出我们国家所急需的工业用胶。即使是人工培育的橡胶树也不能生产出本应有的数量。那实在也怨不得他们，在这一行工作的人，谁都知道像海南岛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能生产出高产量的橡胶来。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先例。

有这么一天，天高云淡，海天一色，修长的椰树婀娜多姿，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

一位个头高高的海外华侨在上级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岛上。那神态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别刻意之处，他与农垦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神侃诙谐，边打趣边了解岛上的情况。一旦作出决定，他便很快恢复了出奇的认真。他四处走动，选择胶园地址。他与技术人员一道测定土壤成分、类型。他向岛上居民了解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雨季有多长、温度有多高、空气湿度有多大……他问了很多，看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一切渐渐地趋于明朗，一切更显得胸有成竹。在李引桐看来，剩下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种子。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中国试种新的橡胶品种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它涉及到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技术、资金等因素。特别是把什么样的橡胶品种引到海南岛，怎样运进祖国，用什么样的配套技术都是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引种什么品种。当时，从世界橡胶品种来看，东南亚生长的橡胶树是最为理想的树种，一方面它的个大出胶多；另一方面，华人中从事橡胶种植和买卖的福建群对这些树胶种植技术掌握娴熟。当然，引种起来更为便利也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环节。李引桐经过多方面比较，决定首先引种 606 品种。

李引桐本人做过长时间的橡胶买卖，有着丰富的橡胶种植经验，对各个橡胶品种的特点了如指掌，对栽培过程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很熟悉。606 是当时在东南亚主要橡胶生产国种植的收益较好的品种之一。李引桐曾经花了 28 万铢，在泰国南部收购了 2400 亩橡胶园。在这个胶园，他种植的就是这个品种，而且管理胶园的就是李引桐从福建老家梅山带去的一位宗亲。李光前的胶园里也种植大量的 606 号树胶。而无论是早些时候作为南益集团总巡的李引桐，还是其时作为德美行老板的李引桐，他与那些胶园的管理人员、园工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加之李引桐为人极为豪爽、义气，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更结交了一些肝胆兄弟，要处理这样一类事情，对那些哥儿们朋友来说不过小菜一碟。

确定好橡胶的品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这些娇贵的树种弄回国。谁都知道，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日子里，且莫说是偷运橡胶这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东西到中国去难上加难，就是运一些其他次要的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串通“共匪”，如果事情败露，搞得不好，——死罪。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政府也都站在“反共”的阵线上，对共产党进行限制乃至围剿和杀戮。所以，李引桐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提着脑袋干刀尖口的营生。

李引桐偏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独敢冒险，而且懂得如何冒险。他不独喜欢冒险过程中的刺激，更想体验冒险成功后的快乐和愉悦。他不独爱国，更懂得爱国行为的技法，注重如何使爱国的行为更具有成效。他成功地将幼嫩的树胶枝条偷运到祖国这件事，可以说是他的这些特点的一个形象写照。

1956 年早春，李引桐把从胶园里精心挑选的橡胶枝条包装好，开始了安排有致的“树种旅行”。

整个旅行行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来西亚用汽车运往新加坡。他对东南亚各国海关的规矩非常了解，马来西亚海关的查检原则是查进不查出，或者勿宁说，严进宽出。李引桐本人又是马来西亚公民，所以从马来西亚运出几十根树枝条并非难事。而且新马在 50 年代还属一个联邦国家，只不过新加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邦制而已。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也不会产生任何政治上的嫌疑。第二阶段，从新加坡乘飞机运往香港。李引桐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公司和住宅，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他本人经常因生意上的需要穿梭于世界各地以外，李太太及其他家庭成员大都长期居住在新加坡。作为在新加坡、香港两地都有业务和住所的李引桐，从其中一地运一箱树枝条到另一地，两地又非共产党统治区域，引起海关注意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何况，李引桐也做好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一旦在新加坡海关被询问，可以家用花木移植搪塞之。好在过关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第三阶段，从香港以火车托运的方式运往深圳。两地一箭之遥，同属一个文化圈，香港当局事先又不知道

有人要从香港海关运到中国大陆橡胶种的“限制品”，自然，走起来也未发生什么麻烦。第四阶段，从深圳用专机运往海南岛。这一阶段是在中国大陆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是由中国政府的安全部门负责操作，树种的技术性处理则由农垦局派专人负责，加上交通部门的配合，毋庸置疑，顺当。

整个橡胶的“国际旅行”跨越了三国五地，总共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可见安排得周到妥帖。从另一角度看，周密的安排也是必需的，因为幼嫩的枝条无法承受长时间折腾，否则，冒着生命危险，运回几枝枯条死木，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批偷运回国的枝条仅有一箱，内装二十多个枝条，一条有十几二十个芽眼，又叫芽条，一个芽又可以繁殖十几株。这样，第一批苗圃所需要的树苗就从东南亚国家被移植到了中国。

如果说，偷运橡胶树苗的成功是一个创举的话，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岛这个世界橡胶种植史上超极限的地区将这些娇气的树条培养成能出胶的天然橡胶树，就是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更具历史意义的成就。

为了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树种，农垦工人们没少费心血。海南岛的早春，对橡胶树种来说，温度还显得低。工人们担心寒流，在小树苗周围烧木柴，用这种方法增加树苗周围的温度。那个时候还没有塑料薄膜，只能采取这样的人工方式。

1957年，李引桐又暗中聘请一位专家到海南岛帮助传授树胶栽培技术。这位专家原是李引桐的至交，叫邱金陵。他是殖民地时代的绅士，曾任殖民地树胶园的经理。邱金陵到海南岛时条件很差，胶园离交通要道远，他是被工人们用轿子抬进去的。他果然不负朋友之重托，言传身教，与工人们一道下胶园，把当时最先进的橡胶栽培和管理方法传授给农垦局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他为中国的橡胶事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海南岛的第一本有关橡胶栽培管理方面的书就是人们根据他在岛上那段时间的口述和传授记录下来的。

由于邱金陵卓有成效的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他和李竞敏（李引桐的二儿子）一道被邀到北京参加国宴和各种庆祝活动。这也说明人民共和国不会忘记在祖国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

在橡胶生产的工艺上，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所谓的烟胶片“RSS”，即把从橡胶树采下来的乳胶，经过简单的处理（包括滤水、压型等）后再放到烟房里去烤干。这种方式在今天仍然是橡胶生产工艺上的一种主要方法。但是，这种生产工艺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要花费大量的木材。因为用作烘烤的材料一定得是木材，迄今在东南亚国家还用木材（主要是翻种时砍掉的橡胶树）作燃料。

1962年，李引桐亲率专家到海南岛考察，他为橡胶基地的满目葱绿而高兴，却为岛上缺少足够的木材烘烤烟胶片的生产而心焦。在经过详尽的调查和专家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他果断提出在海南岛引进标准胶TTR生产方案。TTR生产是一种工艺更为先进、复杂，资金投入大的新型生产方式。农垦局的各级领导都认为对橡胶生产进行转型势在必行，李引桐所提出的改换方式也符合橡胶生产发展的要求。唯一的问题是祖国没有充足的资金。在了解到政府的难处之后，李引桐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我出资购买设备并负责全部的进口和安装，必须保证标准胶生产在祖国的推行成功。”

这项计划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便逐步开始实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计划才告中断。到了 1971 年，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李引桐在组织马来西亚考察团到中国访问时，他又特地邀请橡胶种植业专家参加。这位专家原是家乡人，当他在海南岛看到无边的橡胶种植园时大为惊奇，说：“祖国的橡胶树这么大呀！”李引桐先生风趣地说：“为什么祖国会没有呢？”在海南岛期间，专家对橡胶种植和生产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1982 年，李引桐为了帮助提高中国橡胶生产的检测水平，赠送给广东省一套价值 63 万铢的先进橡胶检测仪器。

今天，当人们踏上这个海岛的时候，看到那绿色成片的橡胶林，看到在胶工的刀下一滴滴流下来的洁白胶汁，仿佛看到一位华侨流淌着的心血。历史是一位公正的书记员，对于李引桐为中国橡胶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人民从未忘怀，他们把那些橡胶树命名为“桐一号、桐二号、桐三号……”其实，“桐字号”品名的命名始于 50 年代，而李引桐本人直到 1964 年才知道。现在，对共和国来说，对 12 亿人民来说，“桐字号”既是编码，是符号，是品种类型，更是为贡献者立下的丰碑。

第六章 衔着橄榄枝的和平使者

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民心·民意·民情

《圣经·旧约》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说是诺亚方舟在洪水中度过了150天，洪水渐退。诺亚欲知可有陆地安身，先让乌鸦飞出去寻找，乌鸦找不到停泊地，很快飞回方舟。不久，诺亚又放飞了一只鸽子，鸽子回来时嘴里衔着一枝橄榄枝，它宣告洪水已经退去，“和平”回到了人间。从此，衔着橄榄枝的鸽子遂成了和平的象征。

1993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授予李引桐先生“一等功臣”荣誉称号，并颁发给他一枚国家一级和平勋章，以表彰他在中马建交中所做的突出贡献。

“和为贵”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中，同时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终极典范。中华民族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这是事实，亦是理想。它体现于政府，更表演于民间。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其周边的邻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孤立、封锁、围攻的战略，中国人民与其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关系人为地中断。特别是那些原本从中国大陆漂流到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也因这些政治和人为的因素与祖国疏远了距离。纵然如此，东南亚各国人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和平理想的企盼和追求。更可贵的是，他们也从未停止为实现和平理想而不懈努力。

在这方面，李引桐同样鞠躬尽力。

身为马来西亚籍华人，李引桐凭借着自己商业上的地位，在中、马双方的各个阶层广交朋友。他的朋友遍及各个阶层、许多方面：上到政府首脑、外交使节、商贾大亨、电影明星、公子哥儿，下至拉车的、干苦力活的，甚至流氓地痞。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商业上的成功自然不能缺少，否则就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应付交际上的开销。但是，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有他那样广的交际面。那是因为他本人具有一种人格魅力：豪放、豁达、大方，爱玩而且会玩。

早年因商务上的需要，李引桐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不小的“根据地”，香江之滨既留下了他的汗水，也浸着他各式各样的记忆。在这个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上流社会里，他一度成为有名的“豪仔”。只要他一到香港，身边就少不了一群公子哥儿的朋友，他们豪饮纵乐、聚会跳舞、花天酒地。这种生活既是他人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某种战略的需要。在那个圈子里，李引桐花钱大方是出了名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他在场，签单付账就是他的事。有一次，李引桐从新加坡飞到香港处理一件急务，很快就得飞回去。当他到香港的消息传到他的那群公子哥儿朋友耳朵里，他们就像蝴蝶闻到花

蕊的芬芳一般围拢而来，立即约请李引桐到一家豪华酒店，并喧宾夺主地点了当时最叫价的鱼子酱。李引桐因有急事，应酬了一下，买好了单就赶他的航班去了。当飞机飞回新加坡时，他的那伙朋友还在酒店里狂喝暴饮呢。

李引桐当时在香港先后买了两大栋别墅，一个叫“湖边绿屋”，另一个叫“豪园”。这些别墅既是李引桐休憩的场所和商务办公室，有的时候也为那些上流社会的名士、外交官、商人与情人约会言情提供庇护。

香港是一个花花世界，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人士聚散的理想之地，也是不少歌星、影星发迹的地方。据说，李引桐在香港还捧红过一些歌星、影星……这些歌星、影星后来还着实起到一些作用。

对于这一切，许多局外人并不晓得其中蹊跷，仅仅将这些当作一般的公子哥儿的逢场作戏，甚至在南益集团内部，当人们讲到李引桐如何为祖国做了很多贡献，如何爱国时，个别人竟是死活不信，说，像李引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爱国，怎么可能为祖国做那么多的事呢？他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呀。

事实是，李引桐确实实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更有趣的是，如果李引桐没有那些朋友，他本人不具备那些品格，许多事情怕只能是徒有一腔爱国热情，结果却是无所作为。所以，只有在了解了他是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这些场合、这些朋友来为国家做好事之后，人们方有幡然省悟之感。

自从 50 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实施严密封锁，一度大有密不透风之势。越是如此，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越发显示出对祖国的深深情愫，爱国热情也越发高涨。比如支持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感人行动（详见第十章），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这种自发的、来自民间的和平之声更加纯朴、更为真切。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李引桐的所作所为正是顺应了民意，促进了中国与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友谊。例如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他为了中马工商界人士间的交往、商贸活动的交流费尽心机，斡旋于两国工商界的领导之间，促成马来西亚工商考察团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消除不少因长期隔阂和西方列强人为设置障碍而产生的误解，让海外华人华侨有机会真正看到祖国建设的成就和实际问题。1955 年，李引桐冲破重重阻力，在马来西亚首次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华侨工商代表团回国，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全国侨委主任廖承志的热情欢迎和款待。1956 年，他又联络组织了新马工商考察团到中国访问，并参加了 10 月 1 日的国庆观礼活动，在北京期间，他们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后（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回大陆竟如回娘家一样频繁。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古训体现着政治与民意、政治家与老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凡聪明的政治家，开明的政体在决策和行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民意。善于了解、体察、顺应民意的政治方为立国、立家之本。中马间的关系由 50 年代的紧张、60 年代的缓解到 70 年代的建交，民心、民意、民情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李引桐很善于打民意这张“牌”。作为一个商人，他最终做了很多政治家们做不到的事，而且做得漂亮极了。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已与 50 年代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双边关系开始解冻。在这种背景下，民间的交往也自然表现得更为活跃和频繁了。

1970 年，马来西亚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马国因那次水灾损失惨重。李引桐以个人的身份来到中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捐款赈灾。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马来西亚的水灾予以密切的关注，很想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赈灾捐助，无奈，当时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对马来西亚人民的灾难也就只好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李引桐的请求与中国政府的意愿不谋而合。中国政府决定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向马来西亚灾区提供5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但是，毕竟两国以往并无官方的正常交往，中国政府担心马来西亚慑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不敢接受赈灾捐款。为了使来自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能够顺利地送到灾民的手中，更为了使来自中国人民的这份情谊能够传送到马来西亚人民的心里，李引桐又多次来往于北京和吉隆坡，在他的努力下，他与他的朋友拉扎克（1970年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达成共识：不仅接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赈灾捐款，接受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且要更加致力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一切安排就绪，李引桐又飞往北京。紧接着，中国方面的救灾代表团飞抵吉隆坡。代表团团长由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张光斗担任，随团前往的还有总政治部、安全部门等方面的代表。李引桐也同机前往。

飞机徐徐在吉隆坡机场上停稳。机舱门缓缓打开。接下来的一幕着实让在场的人们费解了一番。

这是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按一般外交惯例，理应是代表团团长第一个走出飞机。可是不知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在那一刹那觉得应该由李引桐走在前面，还是认为要让此次行动更具有民间色彩、在临下舷梯时把李引桐推到了前面。这一推，把李引桐从幕后推到了台前，推到了一个他没有思想准备，也无法预料后果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反共势力在东南亚有相当的市场，马来西亚共产党在很长的时间里属于非法组织。而李引桐竟然走在了中共代表团的第一位，这样的“事实”是很难不在人们中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和猜测的。

何况，这在礼仪上也极不符合常规。堂堂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自然是政府官员。李引桐是什么？他不但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甚至不是中国公民。他不过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华人，一个做生意的商人。哎，他怎么竟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里，而且还走在第一位。这怎么不叫人迷糊？

这一个结果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地有些党派势力立刻知道李引桐与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共产党奸细。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什么党派也不是，我要做的，只是我觉得应该做，有兴趣做，而且我能够做好。”好在李引桐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然要出来为中马友好做些什么，那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各种风险。所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而是依然故我地干他要干的事情。不过，他心里有谱：他们没法把自己怎么样。你们可以误以为我李引桐是中共，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你们要是对我李引桐不恭，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恭，谁都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不是等闲之辈，谁也得罪不起。在谈及此事时他轻松地说：“他们不会逮捕我。”

他平静地做着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为了给灾区筹得更多款项，他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关系和影响，组织了一批香港演艺界的左派艺术家，包括著名演员石慧、傅旗等人，组成了一支阵容庞大、整齐的影星歌星演出团到马来西亚进行义演，艺术团的演出受到当地人民，尤其是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义演所筹款项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

艺术团在槟城演出期间还出现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小插曲。由于艺术团

的义演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不同的党派纷纷想利用此事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在檳城的华文报纸中有两家最有代表性：一家是《光华日报》，属于右翼报纸；另一家叫《星檳日报》，是左翼报纸。那一段时间里，两家报纸在竞争过程中，《光华日报》明显处于下风，主要表现在其发行量下降。反之，其竞争对手的发行量则在上升。于是，《光华日报》就想利用华人艺术团到檳城演出的机会，获得独家报道的权利。他们向义演团的负责人提出以下条件：该报为义演团提供在檳城演出期间的所有费用，同时包括宴请的开支等等，而义演团在檳城活动的报道权由其独家拥有。这些人不知道，该艺术团的活动是由李引桐一手策划和组织，并由李引桐出资的。所以，当义演团的负责人向李引桐反映这事时，李引桐给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拒绝。他不能让左派人士的劳动果实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右派势力给拿走。所以，《光华日报》原来打算宴请义演团全体成员的行动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李引桐自己掏钱请。很自然，这次活动的报道权由《星檳日报》获得。结果，不论是义演团的演出，还是左派报纸的充分报道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事后不久，右派势力恼羞成怒，向马来西亚当局告发了此事，并加油添醋、耸人听闻地捏造所谓左派势力在檳城如何如何。马来西亚当局还专门就此事到檳城进行调查。李引桐事先得知此事，赶忙通过各种渠道通知那些在这次活动中出过力的人们，让他们留神小心，并告诉他们，如果当局询问，只管说不知道那些人的政治身份，我们只是负责接待而已，再不行就把责任全部推到我李引桐的身上。

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在此期间，李引桐还策划、组织了中国南方艺术团到马来西亚演出，把祖国人民对邻邦的情谊带给了马来西亚人民。

60年代末，在日本首都举行了一次大型世界运动会，马来西亚在组团参加运动会期间，遇到了一些财政上的困难，李引桐慷慨解囊，出资为代表团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使马来西亚代表团顺利赴日本参加比赛。

在十几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了中马人民的友谊，李引桐悄悄地在两国民间做了许多好事，有些事连他本人也记不清楚了。他为此所耗费的钱财更是难以估算。更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他本人从不愿意张扬。在那样的国际背景之下，他所做的许多事无法张扬，以至于其中不少事情随着历史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地淡化了。

政体 · 政治 · 政局

中国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政体。不同的政体产生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延伸出不同的政局。

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在中国的周边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网，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与周边的东盟五国，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没有外交关系，其中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原先尚好，后因人所共知的原因，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因此中断。这样，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五国可以说就不存在任何官方往来了。

谁都知道，早先的许多东南亚国家从根本上受到美、英等国的操纵。比如1953年签定的东南亚联盟条约，美国自己没有参加，却规定东盟国家不准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东盟各国还不够强大，无论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与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对抗。它们国家小，受殖民统治时间长，虽然在东盟五国中，泰国是唯一没有真正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但是，谁都清楚，泰国不过是两大殖民帝国在历史争霸中的一个小小的侥幸。因为在历史的争霸过程中，泰国北面的印度支那半岛成了一个老牌殖民帝国法国的势力范围，而泰国南面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则是另一个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像泰国这样的富饶国家，英法两国都垂涎欲滴，实在只是双方相持不下而最终让其作为缓冲地区被搁置了下来。后来又加进了另一个更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美国，因而泰国独立的“水分”便委实很大了。泰国自己也清楚，它是生活在如虎狼般凶狠的野兽群中的羔羊，时刻都有被吞噬的危险。所以，这些国家都不敢擅自与中国发生关系，如果有哪个国家做了什么让西方势力不高兴的事情，很可能会遇到灭顶之灾。

这便是当时的政治态势，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从根本上说，东南亚那些小国在自己还没发展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是不敢贸然做出大的举动的。尽管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这个“醒来的雄狮”也表现出了友善的姿态，却不敢轻易跨出那一步。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 70 年代初就慧眼识得：“在今后的 20 年里，中国也许更有可能成为热力和影响力四射的太阳，而不是月亮。”可是他始终没敢率先走出与中国建交的一步。在谈到这一点时，他小心翼翼地说：“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地位很特别，要格外小心，如果不聪明，就无法生存。因此在决定每一项政策时，首先要肯定对本国是否有利。当然如果时机成熟，就一定会采取步骤，我们不要抢先，我们有必要让别人占第一和第二，等到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跟中国建立关系后，我们再跟中国建交，这对我们没有坏处。”他还在多种场合表示，在东盟五国中，新加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搭末班车”。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而言，作出如此抉择，自有其苦衷和难处。

不过，从这样的形势分析，东盟五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倘先迈出第一步，与中国建交，都需要超凡的勇气。反过来，对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72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第一个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这个战略性突破。此后泰国等也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中国在与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李引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引桐是做橡胶生意的，长期以来，马来西亚的天然胶生产一直占世界第一位，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后来，李引桐和他的德美行表现出了执东南亚橡胶生产牛耳的趋势。加之他特殊的活动能力，尤其是他与中国政要谁也闹不清楚缘由的特殊关系，当然，也包括他为人交友的可信赖性等，他使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希望能与之建立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关系”。

他的朋友之多，上文已经有所交待。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他与拉扎克的非同寻常的交情。拉扎克系何许人也？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只有过三任总理：拉赫曼、拉扎克和现在还在任上的马哈蒂尔。李引桐与拉扎克的关系可谓久远。李引桐早年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与拉扎克就有交情，他们经常双双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

政治家与商人的交情多多少少掺进，或多多少少被人们认为掺进了各自的利益成分，这本不足为奇。对于李引桐和拉扎克的交往，有多少情谊的成

分，有多少利用的成分，实在是很难分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李引桐为拉扎克解了不少难题，也花了不少钱。

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马来西亚组团到日本参加运动会一事，体育代表团的团长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已出任国防部长的拉扎克。李引桐提供财政资助，一方面出于对民间活动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应朋友拉扎克的请求。

在言及中马建交时，有一个因素似也不能忽略。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帝国主义看到他们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孤立的政策并没能把中国拖垮，中国反而更加强大。于是对中国的态度和方针有所改变。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也加紧在东南亚活动。这时出现了各国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较为宽松的环境。但各国仍心有余悸，谁也不敢率先跨出第一步。李引桐的努力促成了马来西亚先走出了一步。

1970年，马来西亚进行大选。在此之前，拉扎克已经长期出任政要，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和威望都很高，故他决定参加竞选。拉扎克自然少不了来征求老朋友李引桐的意见。李引桐言之凿凿地将形势进行了分析：如果拉扎克要赢得竞选胜利，必须争取获得华人的支持。因为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数排在第二位，而且华人拥有比其他族群相对更大的经济实力如果参加选举的人中间，马来人对竞选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的话，那么，争取到华人的支持，也就意味着竞选的成功。而要争取到华人的选票，就要争取改善对中国的态度。很明显，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大都属于第一、二代，他们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和割不断的关系。更何况，中国还很强大。与此同时，李引桐还给拉扎克作了更为具体的策划：如果拉扎克接受他的建议，李引桐可与其在马的各阶层的朋友共谋使之成功。李引桐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叫陈东海，身兼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两大派组织的秘书长，可以出面做两方面的工作。

拉扎克被说动了。现在他所为难的，并不是愿意不愿意与中国和好，而是不知道如何与中共发生关系。李引桐笑着说：“这件事由我去办。”

这样，李引桐开始为打开中马关系新篇章做最后且最富实质性内容的努力。他专门为此飞往北京，把马来西亚的局势和拉扎克想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意愿转达给北京。

读者或许要问，这李引桐商家一介，有什么通天的本领跑到北京就可以与中共中央领导商谈起国家大事？李引桐从解放伊始就为中国做了很多极有意义的事情，他的爱国精神、他为国家慷慨解囊的行动、他的能力等中共中央早已清楚，而且，他与国务院、中央军委、中联部、化工部、安全部、侨联等都有联系，与不少中国领导人的私交也很好。

关于李引桐与中央商谈的细节笔者只知一鳞半爪。其大致轮廓是，李引桐到北京，与军委总政治部联系。军委总政治部领导听完汇报，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很快就将李引桐的建议形成书面材料呈送上去。据说当时各个层面都有不同的反映，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拉扎克早些时候反共，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与这种人谈判。材料被一级一级往上呈送，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阅后也没有立即批复，而是转呈给毛泽东主席。结果，毛泽东的批示为：“可以谈”。

尽管一切如李引桐预期的那样，但操作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中、马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能按正常的外交程序进行。何况，此前的工作都是在极小范围内进行，还停留在秘密阶段，谁也无法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变故。于是，李引桐被破天荒地任命为中共的联络代表。他立即将中方的意思电告

拉扎克。

他马不停蹄地飞往吉隆坡，直奔国防部。

拉扎克此时如坐针毡，正急切地等待着中共代表前来谈判。李引桐一来，拉扎克就急不可耐地问：“北京的谈判代表来了没有？”

回答：“来了！”

追问：“在哪里呀？”

答：“在这里呀。”

再追：“到底是谁？”

答：“我！”

拉扎克愕然，两眼瞪得滚圆……

1970年，拉扎克果然在大选中获胜，中马建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李引桐更是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吉隆坡之间，中马双方都视之为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来西亚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马建交对中国来说，战略上是一种突破。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此期间也不愿落后，相继开始与中国的接触。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也都跟着有了相应的动作。马科斯夫人、泰国总理差猜也都跟着来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日本早已知道，田中角荣更干脆，不搞什么联络处，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走在你美国的前面……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马建交这一历史事件作如下认识：中马建交事实上成了中国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力量对中国的封锁与遏制的突破口；中马建交的成功是以中国在重重包围中自强不息，立于不败，不断强大为基础的；中马建交从根本上说又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反映了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而这一切与李引桐十几年来来的不懈努力、卓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做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第七章 我是德美行的邓小平

如果要我用一词来概括优秀管理人员的特点，那我就会说果断。你可以使用世界上最复杂的计算机，你可以绘制所有的图表、收集全部的数据，但最终你必须把所有的信息汇集起来，提出一张时间表，然后行动！

.....

不管教科书上怎么说，企业生活中的重大决策大多是由个人作出的，而不是由委员会作出的。我的方针一向是，决策之前先发扬民主，然后我便成了无情的统帅。“好了，你们的意见我都听到了，”我说，“现在我来讲我们要做些什么。”

——李·雅科卡《管理秘诀》

泰国德美行有限公司（TECKBEEHANGCO., LTD）简称 TBH。它建于 1954 年 4 月 1 日，现有 12 个分厂，分布在泰国南部的广大地区。近十几年来，泰国的天然胶生产在国际橡胶原料市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出口国。1989 年，泰国的橡胶生产首次突破 100 万吨。1991 年，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胶片（TheRubberSmokedSheet，简称 RSS）的生产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胶生产和出口国。德美行生产的标准胶（TTR）出口占整个泰国出口的 52.8%，烟胶片出口占 15.2%（根据 1993 年统计）。概而言之，泰国的天然胶生产和出口现在在世界上排在第一位，德美行在泰国的橡胶生产和出口方面又独占鳌头，是名副其实的橡胶出口的超级王国。这个橡胶王国的“国王”正是李引桐。

有人说，第一代橡胶大王，毫无疑问，陈嘉庚；第二代橡胶大王，理所当然，李光前；第三代橡胶大王，不言而喻，李引桐！有意思的是，这三代橡胶大王都是闽南人，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所长：陈嘉庚创业，培养和重用李光前；后来李光前继承了陈嘉庚创业和立业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成了橡胶行业的新“盟主”；李引桐则是在李光前的提携和重用下成长起来，并成为李氏集团中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后来他创立了德美行，进一步巩固了闽南人在这块“领地”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橡胶王国的新“霸主”。

那么，李引桐是怎样统领这个橡胶王国的呢？或者按照泰国橡胶界的一个更朴素的说法，德美行是一所“橡胶大学，我们都是这所大学的学生”。那么，李引桐又是怎样管理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的呢？

这，正是本章所试图交待的。

德美行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企业。所谓“家族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的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中，在领导层的核心位置上同一家族的成员，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典型宗法制性质，因而产生出对家族的独特的认同感。

家族企业最初的形成，打着深刻的宗法制烙印，因为其所要实现的是“我”与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海外的华人家族式企业，不论其行业差别有多大，从事何种生意，经营范围有多宽，在这一点上都具有相当的共同性，表现形式也很相似。

华人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国家，最初通常是只身一人，或同村有亲戚关系的几户人家各派一人结伴而行。每一个“我”都是一个家族的代表，肩负着使家族繁荣的历史使命。据笔者手边可备查阅的文献资料和对东

南亚华人华侨的口头采访，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创业之初，并不是某个社会团体，而是个人，所谓家族的创业自“我”开始。因此，有成就的第一代企业家，无例外地都有一段从苦力到巨头的历史。同时，家族企业对于一个宗亲氏族，尤其是千里迢迢从家乡初到南洋的人来说，“前辈”所创的基业就成了一个特殊意义的“家”了，而那个开创者也就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父亲”。所以，人们对德美行的第一个定义是：它是一个家族式企业，与之相连带，其内部的管理也就是家族式的。

试看德美行最高决策层。

公司董事会的组成（1992）：

李引桐	（董事主席）
钟宣华	（常务董事）
李竞成	（董事、李引桐三子）
李敬佳	（董事）
李才禧	（董事）
甘保良	（董事）
李文芳	（董事）
公司总经理：	李竞成
公司副总经理：	李进宝
营业部经理：	李庆年

分行的经理八成以上是李姓。

谈到公司对李姓的看法，现任总经理李竞成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德美行的职工过去有些怨言，觉得他们不姓李在公司的发展前程有限。过去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德美行的经理大都是家乡人，姓李。我们所以爱用自己人，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自己人都老实，所有姓李的都是老实人。其实李姓人也有很不老实的。但至少有一点，再不老实的自己人也会知道，公司必须要生存。在这个基础上，他的不老实也是合理的不老实。再说，如果一旦被家乡人知道他不老实，他的名声就败坏了。这也算是一种社会约制，即自己对自己的约制。名声坏了，到其他地方也不好混下去。以橡胶行业为例，只要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从事过橡胶行业，不老实就很快会传播出去。现在信息传播很快，只要你是福建人，不管姓什么，你在某个地方做过事，而你要换个地方，新的单位对你为什么会离开就会打个大问号。这就是一种约束。为什么橡胶行业能够由福建人办起来？各种籍贯的华人不能统一，他们讲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家族利益，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必然导致最后的分裂。比如美国人、英国人，他们的财力比我们大，可为什么他们办不起来呢？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乡土凝聚力。他们就无法管理，无法把盈利保存下来。

李竞成的这番话算是一个很精致的说明。对一群闽南人来说，德美行就是他们的家。对具有深厚传统积淀的中国人来说，宗法意识要求他们有一个家。但是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一个“家长”。在德美行这个“家”里，李引桐就成了家长。两种要求——“家”和“家长”——同时需要，缺一不可。

在德美行这个特殊的“家”里，李引桐是始祖——第一任家长。

现任总经理李竞成不时会开这样的玩笑：“我不过是我父亲的打工仔。”这，其实是全世界家族式企业的通则。只不过，“家”的关系和特征在有中国人的地方表现得更具有传统的封建色彩而已。

今天，德美行的高级职员的异姓比起过去已经有了增加，但以李姓为重、为多的现象仍为主导。非李姓职员的怨言多少还存在一些。

笔者曾对德美行的非李姓中、低级职员进行过一些访问，绝大多数非李姓职员对自己在公司的境遇还是满意的，个别职员对自己因非李姓得不到重用仍存芥蒂。下面的一段采访手记，是我对德美行职员所进行的采访中对自己非李姓发表过最激烈言辞的一位。我所以录之于此，是想让读者通过这一最“极端”的反映去衡量一个华人家族企业的某种特质。我曾作出承诺，不将受访者的真实姓名公诸于众，特简为“问答”。

问：作为一个非李姓职员，你是否认为在德美行的机会与李姓的一样？

答：不姓李的人发展机会较少。

问：普通职工对领导的一些做法能否提出批评？

答：提是可以提，只是觉得对自己不好。建议也不容易被接受，很难接受。

问：职工是否想在公司长期呆下去？

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多数想在公司呆下去，年轻的机会多，如果别的地方机会好他们会离开，年轻人现在白天在公司干活，晚上还去读书。

问：你觉得德美行在待遇上在社会上属于高、中还是低？

答：中上。当然也有别的公司更好，现在泰国进步很快，有些公司的条件很好。

问：你对公司的人事制度有无看法？

答：有看法在面前也不敢批评，背后批评。……

大凡成功或比较成功的政治家有两类。第一类是本人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智慧，很多事情他们更多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和成就，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经验。当然这并不妨碍听取他人的意见，纳众幕僚之谏，但他们更看重和相信自己的决断能力。邓小平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自己并没有超凡的能力，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可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优点，这就是善于用人。刘备可以做到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出山来，还要让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罗斯福所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因为他周围总围绕着一个智囊团。

李引桐，毫无疑问，属于第一类。他的一句口头禅可以为证：“我是德美行的邓小平。”

这一切都可以在德美行里得到印证。

人们一跨进德美行的门槛，就能看到李引桐的相片，总部以及所有分行办公室的最醒目的地方大都悬着泰国国王和李引桐的大幅相片，一个是泰国国家的“家长”，另一个是德美行这个家的“家长”。

当李引桐到分厂巡视的时候，那些职工，尤其是中高层职员会出现特别激动和紧张的反应。激动者，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家长”的承认，就像孩子做了一点什么，希望得到大人的表扬一样。紧张者，担心有什么工作做得不好而受到批评、指责，甚至被炒鱿鱼。

对于一个家族企业，权威绝对需要。没有权威是危险的。

不过，如果一个企业领袖一味只讲权威，甚至滥用权威，而不善于体恤下属，对下属的利益以适度的宽容，同样也是危险的。

李引桐在两者的分寸的把握上有自己独到之处。下面这件事是李引桐亲口告诉笔者的，它很能够说明李引桐在二者之间的处事风范。

德美行有一家分厂设在罗永。长期以来罗永一直是总行的一块心病；原因是这个分厂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是亏本。于是，经理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三任，却未见起色。最后换上了现任经理李斯扬。此人曾当过兵，行武气味浓烈，平时不苟言笑，少言寡语，不善辞令，管理却有一套。在所有十几家分厂当中，罗永分厂最具有军事化的气息。当人们进工厂时，那戎装整齐的守卫所行的标准式泰国军礼便足见一斑。

自打李斯扬走马上任以后，工厂开始赚钱。他一改罗永分厂 20 年不赚钱的历史。

不过，“中国式”的事情也接踵而来。

一封告发李斯扬的信送到了李引桐的手上。信中列举了几条罗永分厂经理偷吃公款的罪状：李斯扬自做经理以来私下购买了多少股票，私下购置了多少赖（泰国丈量 and 计算土地的单位——笔者注）的胶园，购买了新的奔驰车等等。“疑点”可谓不少。

这封信在李引桐手上一压就是 3 年，除了缄默还是缄默。李引桐对谁也没有提起，就是写举报信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董事长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此不敢声张。

漫长的 3 年过去了，罗永的经理不但没有受到过任何指责，甚至暗示性指责都没有，反而得到李引桐的格外器重。自然，李斯扬也更加努力地工作，罗永分厂也连续几年赚钱。突然有一天，李引桐将李斯扬叫来，若无其事地把这封压在他那儿的告发信给他看。李斯扬很是感动，说如果董事长当初将这封信给他看，他一定会离开德美行。这些年来，董事长不但没有调查追究此事，反而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年轻人表示要更加努力地为公司做事。

后来，李引桐对总经理李竞成作如是说：“罗永的前三任经理都不赚钱，李斯扬去了就赚钱。信上说他买了很多地产，可他给公司赚了那么多的钱，不能让他家里没有饭吃来为公司工作，他有本事赚 100 万，就算他吃掉了 40 万，公司也还有 60 万。他总比那些不赚钱，反而要消耗公司，白白开工资，表现平庸的经理强。”更何况，信中所反映的事真实与否还要存疑。在一个几十年不赚钱的单位忽然来了一个经理，且赚到了钱，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反映都是可能发生的，在有中国人的地方还表现得更加激烈。李引桐根本没有费精力去追究此事。他看重的是效益。这一点倒很符合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捉得老鼠就是好猫。

他留住了李斯扬，留住了一个人才，并重用之。任何一个精明的企业领袖都深谙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产业都是人创造的，也为人所消耗。用什么样的人、怎么用人是企业生存的第一秘诀。据德美行最新所做的公司领导层的调整来看，李斯扬现在肩担着负责总公司北区 4 个分厂的领导工作。更重要的，李斯扬会因此感激他的老板。李引桐在用人方面有其自己的一套。

首先，李引桐看重实际工作能力和经验。对于要挑大梁的年青人，他要求其从公司的最底层做起，熟悉和学会公司各方面的业务。对于高学历、高文凭的人他往往并不重用。他曾公开表示，博士、硕士我是不用的。记得美国福特公司的总裁李·雅科卡在《管理秘诀》中有这样一段话：“决策时感到压力太大因而举棋不定的管理人员实在太多了，尤其是那些受过太多教育的人。我曾对菲利普·考德威尔（在我离开福特公司后，他当了总裁）说过：‘菲尔，你的毛病就在于你上过哈佛大学。那儿的教授们教你取得所有事实之后才采取行动。你已经掌握了 95% 的事实，而为了取得最后的那 5% 还要

再花上半年时间。等你半年后掌握了那 5%，你的事实已经过时了，因为市场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生活的真谛就在于此——掌握时机。’ ”当然，像这样的用人原则谈不上绝对的科学，因为至少世界上也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有高文凭，他们的手上有博士学位、有 MBA 学历。不过，对于做橡胶生意的人而言，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是必需的。

其次，对于有成绩的职工，李引桐对他们可以说非常大方慷慨。他曾对他的那些经理们说，作为德美行的经理，无论你们走到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去谈生意，我都让你们住最好的酒店、享受最上等的食品、乘最好的交通工具。在德美行，高级职员收入是很可观的，一些经理级的职员每月可以得到二三十万铢，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左右。如果买卖做得好，加上年终的“花红”，收入就更为可观。话说回来，李引桐在企业的身份是资本家。不是慈善堂的主事。给你这么多的钱，你就得一心一意地为公司工作，而且要干出成效。

再次，他有着—双非常锐利的眼睛，很具有观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样的人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任何试图在他面前耍花花肠子、玩雕虫小技的人都会徒劳无功。但他又不失为人的真诚，在真诚的基础上留有余地。他很注意培养接班人，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总要寻找一个甚至多个可以替代的人选。当第一张牌打出的时候，第二张牌已经在手头上。这无形中对任何一位在任的经理都是一种压力：要做好、做好、再做好，否则，将会有新的人选来填补这个位置。

德美行的另一特点，要求对公司忠诚。这大约是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特征。在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里，亲缘、地缘和业缘的藩篱已经很牢固。某—群人、某—地人干着某—种买卖已经历史地形成。所以，在某一行业领域内的人，他们往往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某一地域，他们很多是宗亲，在如此人文背景之下，要求所有职工对公司拥有绝对的忠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合理的。至于说将来如何转型则是另外—回事。不过，对于华人家族企业，要求忠诚与事实上不忠诚的现象同时存在，这是很残酷的。

虽然在德美行有不少人说他们的老板专断独裁，甚至在公司的高层也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却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另一方面的评价：我们的老板也很善于倾听下属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只要不存私心，只要其动机是为公司的发展好，你可以找机会向他坦然提出，勿需有任何的担心。现任德美行南区经理的李文芳讲述了这样—桩事情。几年前，当他还在做—般的中级职员的时候，有—次李引桐到合艾（泰国南部重镇，德美行总部所在地——笔者注），召集高级职员开会，会后又分别约见—些经理，让他们有机会各抒己见，或有机会说出在公开场合不便谈的东西。李文芳当时向老板提出—个建议。李引桐静静地听着，对于下属所提的建议在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和找到确实可行的方案时，并不急于表态，这是李引桐的—贯风格。没想到事情已经过去整整 3 个月，李文芳本人对所提的建议都忘记得差不多了，甚至连所提内容的细节都记不起来时，突然有—天，李引桐再次来到总行，约见他，重谈他在 3 个月前所提出的建议，并对建议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通常的情况下，李引桐喜欢当机立断，他的反应很快，就是现在 80 岁高龄思维依然敏捷，丝毫不拖泥带水，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当不能百分之百地对—件事情有透彻了解，形势又迫使其不得不作出反应时，他大都能够通过“第六感官”作出准确判断。

果断是他的风格，却不妨碍他果断决策和准确运筹。

李引桐把握言辞的分寸感极佳。特别是在开会的时候，尤显其本领。通常，他先把所了解到的情况作极简练的语言表达。如果他批评什么人、什么事，通常放在前面，然后再表扬，接下来就幽默轻松地讲笑话，并不时插进一些比喻，令人捧腹。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是谁都清楚，交待了的事情，布置好的方略，大家得牢牢记住，得办好。被批评的人或事，切莫被后面的幽默轻松气氛冲掉，要时刻警惕，不能二次再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与他过长地理论，因为最终都会败下阵来，他经历过的事情太多，积累的经验太多，见过的世面太多，打过交道的人太多……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必须是个战略家，这是现代企业管理上的要求。如果对眼下的市场行情不了解，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企业领袖；如果对本行业、甚至其他行业的情况不熟悉，不能很快地根据各方面出现的趋势作出预测、评估，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更算不得一个好的企业家。所以在德美行总部小图书室的资料里有世界各大国政府首脑们的情况、国家政策的变化、国体与制度差别、军事战略史例、企业管理模式等等，当然，更少不了路透社一日 24 小时的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行情。

德美行之所以能够在泰国，乃至在世界上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领先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引桐将传统的以烟胶（RSS）为主的生产调整到标准胶（TTR）上来的战略决策有关。他曾不无自豪地说：“我这个人很喜欢创新，比如标准胶的管理方法我是创举。现在全国学我。烟胶烟熟了，热得不行，这种传统的方法必须改。后来我坚持用 TTR，改善了工作条件，现在全泰国以我为榜样，可以称为‘泰国模式’。TTR 最先是马来西亚生产，我学过来并加以改造，完全采取自己的管理方式，现在在管理上，马来西亚也反过来学我。所以人家称我们德美行为‘橡胶大学’。”

70 年代，全世界的汽车生产业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在技术上、生产工艺上、生产质量上都出现了新的要求。很自然，这种变化首先对汽车的原材料的质量、标准等也都提出了相应的新要求。为了了解国际汽车制造业的变化，李引桐专门到欧洲、日本跑了一圈，发现欧洲和日本的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出现了对进口橡胶的标准化需求，具体到对橡胶原材料，出现了普遍用标准胶的趋势。

李引桐回国以后，对德美行现存的多数烟胶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对全面技术更新、设备更新做了预算。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做出了在德美行全面将烟胶生产改成标准胶生产，将全部的烟房改成生产标准胶厂房的决定。可以想见，对于一个拥有 20 年烟胶生产经验和近 10 间烟胶生产厂房的大企业来说，一下子做出如此重大的改革，着实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举动。这一举动在一般人的眼里也是一件极具风险的大手术。事实证明，从烟胶生产向标准胶生产的转变为德美行赢得了一个重大发展的机会。

不言而喻，对于这样一个大的变革，在口头上说说并不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则可想而知。德美行是从事原料出口买卖的。在新的时期，顾客对原料会有新的要求，特别像汽车工业，在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工业是这些国家支柱性产业。70 年代，汽车工业发展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该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所以，汽车工业之间的竞争也就显得尤为激烈，对汽车原料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总体上说都有一个相应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家从事生产和出口橡胶的商家都能赚钱，因为，在同一领域竞争的对手很多，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在

国际市场出现对橡胶原料大需求的时候，却同时出现橡胶厂家倒闭的现象。同一行业的竞争，越是出现理想的机遇的时候，其竞争程度也越发激烈和残酷。

机遇永远意味着大发展和被致命一击的两种可能。能够抓住机遇，并充分地利用机遇者，便可获得大发展；相反，不能抓住机遇，甚至在机遇到来的时候决策失误，必然受到致命的打击。

面对挑战和机遇，德美行的老板作出了明智的抉择，因而公司也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标准胶是一种比原先的烟胶在各个方面要求更高的橡胶原料，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也就相应要求更高，但对初级原料的要求却可以更低。具体地说，是以生胶碎料为原料，经过碾碎、冲洗、造粒、混合、烘干等工艺程序加工而成为粒状天然橡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对初始塑性值、塑性保持率及杂质含量等都进行严格的控制，其成品质量可达到国际橡胶组织所提出的由精密仪器测定的各项标准指标的要求，故称作标准胶。

虽然，传统的烟胶片的品质等级也有国际标准的规定，但在品质测定上并不准确，因为其检测手段纯凭个人经验，即用目测的方式，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这既不利于轮胎生产厂家及天然胶用户对橡胶制品进行质量控制，又容易造成买卖双方质量索赔时各执一词，无准确标准可依。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烟胶生产的这些属性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标准胶就克服了以上的缺点。

标准胶在包装运输上更符合现代化的需要。传统的烟胶片每一捆重达 111.11 公斤，包装工序较为繁琐，要在捆头表面刷一层滑石粉。轮胎厂在使用的时候，先得对其表面的污渍进行清除，然后再将大捆的胶片进行切块，以便配合合成胶的塑炼。这种包装办法既费时又费工，无形中提高了轮胎厂的生产成本。标准胶是松软的胶粒，易于塑炼成型，节省能源，其包装为 33.33 公斤小包，轮胎厂在使用时不必切块，便于称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生产方面，传统烟胶片生产过程要消耗大量木材，特别是橡胶树木，而现在橡胶树木的用途日益广泛，价值越来越大；再者，以消耗树木为代价的生产已经对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标准胶却没有这些缺点。

这些对标准胶生产的评估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一种新产品生产的常规性评估和生产的可行性报告而已。可是，如果上推 20 年，能做出这样的评估和生产的可行性报告，应该说在某个行业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是一个很有眼光的行动。

可以说，德美行能够有今天，与其决策者在当初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调整密切相关。更可贵的是，德美行执著地、一如既往地沿着他们既定方针发展。标准胶最初并非发明于泰国，最早研究开发标准胶的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过，今天全世界最信赖的品牌却是 TTR (THAILANDTESTEDRUBBER) ——泰国标准胶。TBH (德美行) 的名称已经成为一种名品牌，世界上任何一家轮胎生产厂家都将它视为最上乘的品牌。其原因在于，德美行继续和发展了标准胶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发明了与其他国家标准胶不同的配方，创造了一整套标准胶生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难怪有人说，TTR 是标准胶领域的“无冕之王”，而 TBH 的 TTR 是泰国标准胶的“无冕之王”，因为泰国的标准胶是“标准中的标准”。

从企业形象和名品战略角度来看，尽管世界上的名品有千万，成名的经历也千差万别，最本质的特点只有一个：质量和信誉。从事橡胶生产和买卖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愚笨”者又是最精明者。说其“愚笨”，是因为它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汽车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切都得老老实实，干活得老老实实，产品得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的投机取巧。这便是质量的保证。同时，橡胶生意多为期货买卖，几个月前谈好的价格，几个月后如果橡胶市场的胶价因起伏巨大，厂家就完全可能赔本。像德美行这样的大企业，交货数额非常之巨。为了信守合同，再大数额也得赔。按照德美行老板的话，我们必须赔得起，必须老实。偏偏老实是商业界最为忌讳的，无怪乎不少人作此概括：“无商不好”。显然，这样的概括至多只说对了一半。人所共知，商品得靠品质和信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时承受风险。只有赔得起的人才能赚得起。在这方面，行业与行业有所不同。据说，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地域势力甚至英美大商家都做过插手橡胶行业的尝试，结果很快都缩手了。原因就是他们不愿做赔本买卖，哪怕是暂时的，眼前的，几次性的。是啊，有哪个老板愿做赔本的生意？德美行早就做好了赔的打算，因为他们清楚，做这档子生意就是如此。反过来说，轮胎生产厂家自然只愿意与那些赔得起、也赚得起的商家做交易。这才是信誉的基础。

说精明，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家会愿意做赔本生意，而橡胶生意的赔本概率与其他许多生意相比要大，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赔本，无形中要求他们的领袖必须有超凡的才能和果断的决策，否则连续几次亏本，再大的企业也承受不起。历史地看，德美行也经历过几次大的损失，可它毕竟承受住了。

一个企业如果有了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那么，它的产品还有什么理由不成为名品？它的企业形象还有什么理由树立不起来呢？

德美行的起家 and 立业靠的是这两条，德美行的成名和成就靠的也是这两条。德美行的品牌走遍天下靠的是这两条，德美行的客户遍天下靠的还是这两条。

进而推之：

在橡胶业，李引桐创造了橡胶生产的一个奇迹，这不是虚言。

在德美行，李引桐是名副其实的“邓小平”，这也不是虚言。

第八章 走一遭那台湾

虽然我能够忍受冬天的寒冷，但为什么要我描绘像自然疮痍的雪景呢？
——[法]雷诺阿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喜欢的季节和颜色。不同的季节会造化出各种颜色的基调：春天的绿，夏天的红，秋天的黄和冬天的白。法国的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一直讨厌冬天，他一生中虽画出了许多传世之作，一生中以各种各样的题材作过画，却从未见到过他以描绘冬天景致为题材的作品。传说他一生中只在布地根高地画过一次森林滑雪的景色，见到此作品的人却也寥寥。因此，雷诺阿一生也就得不到喜爱冬天雪景的人们的喜欢。可是，人们终究不得不承认，他一生都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死后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台湾，这个中国的第一大岛屿，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成了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政治游戏的“作品”。不仅长时间以来，两岸双边的人民相互不能往来，就连海外的华人华侨要进入这个岛屿也横生了诸多的不便。在50年代至70年代那个政治对峙的时期尤其如此。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去不去一个岛屿并不造成什么损失。因为人们可去的地方实在太多，能够到那些地方旅游的人们又太少。许多人就连离自己所居不足百里以外的地界尚且没能超越，有谁想着要去台湾瞅一瞅？更何况那是个政治“是非之地”呀。然而，“人与人不能比”，对进行橡胶出口买卖的李引桐来说，只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有生意可做，他就应该去看一看。这是一个从事国际间生意的企业家所需要的。再说，台湾与福建一水之隔，台湾与闽南的关系近得难分你我。台语就是闽南语，闽南与台湾的许多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在台湾的许多人的祖籍都在福建。李引桐是闽南人，很自然地在台湾也就有一些朋友。在他看来，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会友，去台湾都是需要的。

可是由于李引桐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亲近，为祖国大陆做了不少的事情，这一切很自然地也被台湾当局了解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也很自然被台湾当作不受欢迎的人。如果此事发生在别的人身上也就罢了，你不欢迎我去，那我不去就是了。偏偏撞到个李引桐，他还就喜欢干那种最不容易办到、最不容易干好的事，而且他还要设法把它干好。他一直认定，那些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做起来才不容易，不容易做的事做好了才显得更有价值。

哎，李引桐还就有一股子犟劲。

在他看来，台湾是值得一去的，作为人生体验，出于生意的需要（在台湾设有德美行的代理），德美行在台湾的代理陈女士也多次请他到台湾去，实地看一看，并就公司的业务发展做一个更具体的规划。再者，去台湾会会闽南旧友也一直是他的夙愿。李引桐在台湾有一位儿时朋友，打小的时候在家乡彼此就玩得很好。那个朋友叫潘文堂。后来潘文堂参加了国民党，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途中在金门与中共的部队打了一仗，在潘文堂前面和后面的人都死了，算这位老兄命大，死里逃生，捡得一条命，去了台湾。开始时这位老兄命运不济，混得好惨，几乎沦落到讨饭的地步。于是就向远在马来西亚的老朋友请求帮助，李引桐就一直在生活上接济他，直到潘文堂后来自给自足，资助才告终止。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潘文堂时不时总要写封信，打个电话，托人捎个口信什么的，一定让老朋友抽空去台湾

一趟。李引桐自然很想去看看老朋友的生活近况，叙叙旧情。

他决计要去。

李引桐是这样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敲定了的事情，就会很固执地去付诸实践。

他开始设计去台湾的计划。

其实，早在 60 年代中期，他就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过尝试。李引桐这一辈子不知道走了天底下多少地方，唯独去那小小弹丸之地好叫他费了一番心思。

李引桐第一次申请去台湾是在马来西亚，身为马来西亚公民，他希望以正常的渠道来办理手续，像所有马来西亚公民那样享有自己的公民权。那个时候吉隆坡有台湾的“领事馆”，自从他的申请送上去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他专门跑到“领事馆”，去找当时的“总领事”，询问签证出了什么问题。台湾驻吉隆坡的“总领事”倒也客气，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李引桐。李引桐直截了当地质问那位“总领事”，他的赴台签证何以长时间没有消息。对方笑容可掬地答道，李先生的签证我们已经作过慎重考虑，我遗憾地通知您，您的赴台申请没有通过。

李引桐第二次提出赴台申请是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台湾当局驻泰国的外事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特殊审查后，作出结论：不予签证。口吻就像是铁板钉了钉，没有任何可以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引桐又没有成行。

提出第三次赴台申请时，李引桐变了个法——演一出障眼法儿：以携夫人旅行为由。他一改以往的以商务为由的操作惯例。这次是向太太长期侨居的新加坡的台湾驻外机构申请。或许李引桐是吸取了以往个人前往、商务前往而不成经验，试图打着夫人的幌子。心想这种换了法子的申请多半不为对方所注意。谁料到，接下来发那个时候吉隆坡有台湾的“领事馆”，自从他的申请送上去以后，就如石沉大海。他专门跑到“领事馆”，去找当时的“总领事”，询问签证出了什么问题。台湾驻吉隆坡的“总领事”倒也客气，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李引桐。李引桐直截了当地质问那位“总领事”，他的赴台签证何以长时间没有消息。

对方笑容可掬地答道，李先生的签证我们已经作过慎重考虑，我遗憾地通知您，您的赴台申请没有通过。

李引桐第二次提出赴台申请是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台湾当局驻泰国的外事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特殊审查后，作出结论：不予签证。口吻就像是铁板钉了钉，没有任何可以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引桐又没有成行。

提出第三次赴台申请时，李引桐变了个法——演一出障眼法儿：以携夫人旅行为由。他一改以往的以商务为由的操作惯例。这次是向太太长期侨居的新加坡的台湾驻外机构申请。或许李引桐是吸取了以往个人前往、商务前往而不成经验，试图打着夫人的幌子。心想这种换了法子的申请多半不为对方所注意。谁料到，接下来发这次李引桐还真是泄气了，一件事办到这个份上，花了这么些钱，想了这么多点子，托了这么多人情，居然没办成。他此时此刻算是大彻大悟，那台湾当局是怎样地记恨我李引桐。他也算彻底明白，有些事情要是过于刻意，结果往往让人失望，去台湾的事还是搁到往后见机行事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界上的事有些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按照常规和逻辑演变和发展，每每反倒邪着生歪着长，完全没有规则，就像盆景，长规则了便不好看。盆景的美恰恰在于它生长得令人意想不到，那种意外之美才让人叫绝、让人称奇。世间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使劲费力无结果，得来全不费工夫，一派戏剧效果。

李引桐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十八般武艺，也未能上那梦寐以求的海岛。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却了了他多年的愿望——走他一遭台湾。

事情充满了戏剧性。

李引桐的大女婿早年与他的大女儿竞芳都在英国留学。毕业后，他们结为伉俪，自己出去创业，去了远在南美的巴西。他的大女婿廖博士也相当有出息，当上了巴西一所大学的物理教授。在外国当教授与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教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每届政治运动首当其冲，弄得不好还外带一个“臭老九”之名，苦了自己还得连带着亲属一串。而在许多国家，教授被视为“上流社会”的一个当然分子。李引桐的女婿也是如此。他除了从事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以外，也少不了与社会上的一些上流人士交往，其中有学者、政治家，也有外交官。凑巧的是，在他交往的圈子里，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外交官，准确地说，是台湾派驻巴西“领事馆”的“总领事”。说来也很蹊跷，这位“总领事”先前就是台湾派驻泰国宋卡的“领事”。不过李引桐事先并不认识他。后来这位外交官远到南美的巴西就职，与李引桐的大女婿廖博士成为好朋友。

1973年，李引桐夫妇到巴西去看他们的女儿女婿，在巴西小住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位“领事”先生得知自己朋友的岳父岳母来到巴西，便宴请他们。席间大家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李引桐本身很习惯如此场合，加之这位外交官早先还驻过泰国南部的宋卡“领馆”，而德美行是当时泰南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合艾就属宋卡府管辖。说着说着，不觉近乎起来。

“李先生您有没有去过台湾？”

“没有啊。”

“您应该去看看。”

“听说办签证很麻烦。”

“不麻烦！”

“是吗？！”

“您如果想去，明天来，我签给您。”

“说定了。”

“没问题。”

“一言为定。”

翌日，李引桐如约前往“领事馆”，把护照递上去，签证旋即就签了下来。他拿着签好的护照心里直犯嘀咕，这官僚主义看来在全世界到处都存在呀，要是这位“领事”查一下我李引桐的“档案”，或打个电话到台湾，怕他也不敢在护照上下手签自己的大名了。

说走就走，李引桐当机立断，否则夜长梦多，谁知道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呢？他很快就登上了飞往台湾的航班。

台北。

桃源机场。

一架由香港转道来的飞机徐徐落在停机坪上。

舷梯被轻轻地放了下来。

几分钟后，一位身材修长的旅客随着人流走下舷梯，迎接他的是老朋友潘文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自然乐，不过这一对朋友乐得很短：握手、拥抱、问候，便匆匆走人。

出租汽车把两位 20 多年未有机会谋面的老朋友拉到一家旅馆。

大堂登记处。

客人按照要求拿出了护照。小姐一脸堆着笑，职业在她的脸上残挂着不实的笑靥，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在客人全然没有介意。

登记完毕，潘文堂悄悄地把他的老朋友拉到一旁：

“引桐，你只能在这家旅馆住一晚上。”

“为什么？”

“你今天登记，明天当局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引桐就结了账。他匆匆来到旅馆门口，上了一辆 TAXI。

客人先开了口：“你这辆车包一天多少钱？”

司机答：“××钱。”

“我包你 10 天。”

司机暗喜，心想这一笔生意算捞到了。

“那我要回去拿些衣物。”

“我得马上走。你要不行，我就另找他人。”

“那我就不回去啦。”司机嘴里嘟囔着什么。

就这样，车子把李引桐从台北拉到台中，拉到台南，拉到台东。一连走了 10 天，李引桐会了朋友，办了事，观光游览了名胜。只是在住旅店时遵循一个原则：每一天换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时的台湾，有些旅店要有人担保，李引桐就找人。好在他持马来西亚护照，又满口的闽南话，一点不招人嫌疑。就是与他朝夕相处 10 天的出租汽车司机，也没看出任何破绽。本来也是，一个马来西亚籍华侨到台湾看朋友能有什么？犯得着如此这般么？

李引桐 10 天旅游，倒是一路顺风，而台北方面却火急火燎地等着这位不速之客。原来，李引桐一到台北，台湾的情报机关就知道了。他们找到了德美行在台湾的代理和朋友，询问李引桐是否到了台湾，代理说是。又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代理说不知道，他到台北的旅馆里才住一天就走了，到哪里也没告诉我……

潘文堂也被质问，他的回答也一样，实在他们真不知那李引桐跑到哪里去了。他又能对当局说些什么呢？

李引桐回到台北，一见到德美行的代理陈女士，未待开口，陈女士早已露出了惊慌之色，仿佛天已经坍塌半边。

“李先生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警备部’的人一直在找你呀。每天打电话。说你回来以后，打个电话到‘警备部’，一个姓朱的什么人要找你，电话号码在这里。”

代理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橡胶商，顶多跟大陆有些生意上的往来，一到台湾，当局就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到底是女人家，一边吓得心惊肉跳，一边却在絮絮叨叨。

李引桐好像早就知道似的，听着代理急风暴雨般的话语，倒显得格外冷静，没有流露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惊慌之状。一则他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早已有思想准备；二则他在台湾又没有干任何一件违背台湾法律的事情；三则他是一个外国公民，大不了被当局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限制时间出境，反正来台湾的事情业已办完，正打算要回去呢；四则就算你国民党知道我李引桐跟中共的关系，谅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难道跟谁好、跟谁不好还强迫得了么？以往台湾不是总不让我来，现在来了谅也不能怎样；五则李引桐也估计台湾的特务机关早把他的背景摸得清清楚楚，这样也好，他们不至于对我有什么过激行动，以免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后果；六则我来台湾又不受任何政党的遣派，更未负有什么谍报机关的使命，纯属私人造访，走到哪里讲也讲得通。

想着想着，他越发地坦然起来。拿起电话，按照代理给的号码便拨。

“ 嘟、嘟 ”，通了。

“ 喂，‘ 警备部 ’ 吗？请找朱先生。 ”

对方安静了片刻。

发话：“ 喂，你是谁？ ” 一副很阴冷的语调。

“ 我是李引桐，听说你要找我吗？ ”

“ 是啊，是啊，我们想找你谈谈。 ” 口气蓦地变得客气起来。

“ 什么时候？ ”

“ 就现在！ ”

“ 我现在没有空，我已约了朋友，要到桃源去参观一家工厂。 ”

“ 要多少时间？ ”

“ 不晓得，参观回来我再给你打电话。 ”

对方稍作迟疑，但还是同意了。

是啊，对方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李引桐他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又将他最近的安排“ 交待 ” 得清清楚楚。人家如此豁达，我们要是不同意岂不显得小气？

从桃源参观回来，李引桐果然再次打电话到“ 警备部 ”，约好当天晚上在他下榻旅店的一个套房里见面。

当天晚上 8 点左右，两个身着便装的人如约来到酒店的一个高级套房。李引桐像接待往常的客人一样打开上等酒水招待他们。双方并没有特别的拘束，也没有更多的礼节，一次特殊的“ 采访 ” 开始了。

“ 李先生，听说您去过大陆。 ”

“ 是啊。 ”

“ 您见过什么人？ ”

“ 见过的人多了，周恩来、廖承志……一时间想不全呀。 ”

“ 什么时候与他们见面的？ ”

“ 这我可记不清了，你们的记录应该更准确啊。 ”

对方哑然。

“ 你在大陆都到过什么地方？ ”

“ 到过的地方很多，北京、上海、延安、海南岛、厦门、福州、广州……算不过来呀。 ”

“ 都去干什么？ ”

“ 做生意、旅游、会朋友啊。 ”

“你这次到台湾几天了？”

“有10天了吧。”

“您在台湾看了以后，跟大陆比较一下，觉得台湾怎么样？”

“我在台湾见过的人主要是过去从福建来的，其他地方来的人我接触得不多。我就跟福建比。”

“那您认为台湾跟福建比怎么样？”

“我看差不多。”

“你会说闽南话吗？”李引桐反问。

“不会。”

“你到台湾多久了？”

“20多年了。”

“20多年还不会讲闽南话，不应该呀。应该学讲闽南话，既然你们连闽南话都不会讲，说明你们对台湾的了解也很肤浅。如果从物质上比，台湾比福建好3倍，台湾的铁路、水利设施比福建好得多。可是谁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水利是日本人修的，福建的铁路、水利是共产党修的。”

对方一时没有回应。

话说到这里，李引桐突转话锋。

“你认为中国是台湾1300万人的中国，还是6亿人的中国？”

回答：“当然是6亿人的中国。”

“你们可以逃到台湾来，我们逃不了呀，福建人逃不了呀。台湾有多大，你们比我清楚。现在南北朝鲜在私下和谈，东德西德在和谈，大陆台湾也要谈。我是一个普通的华侨，我到大陆是周恩来接待我……”

末了，那个姓朱的人说：“李先生，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我们的采访是要回去汇报的，我们的记录你可以看，你认为记录不对的地方可以改。”

李引桐把双方的谈话记录仔细地看了一遍，发现记录上有“周匪恩来”、“廖匪承志”，就用笔把“匪”字删改去，说：“他们不是匪啊。”

一次特殊的谈话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久久等在外面的朋友们一直把心提着，他们想，糟糕，这下李引桐算是完了。有的朋友还在合计，要是他被抓走怎么办。当李引桐刚和那两个人一左一右地从房间里走出来时，等在外面的朋友们还当真以为他被带走，个个脸都吓得煞白。

10天的“访问”结束了。李引桐踏上回程的航班。

飞机在白云间穿行，一簇簇白云棉花般在眼际漂浮掠过。李引桐坐在头等舱靠窗的位子上，随着眼前游动的云朵，浮想联翩。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

可以想见，当李引桐再度造访北京，大陆方面的有关部门也请了李引桐，只是与台湾的“请法”有天壤之别，一派国宾礼遇。双方都将对方视为真正的朋友。当北京方面征求他对台湾的看法时，李引桐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从政治上看，要让台湾归顺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封锁，而且只需要封锁石油。台湾的工业靠石油，封锁可以禁止其他国家的石油流入台湾，迫使台湾在石油上依赖大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至于美国的态度，他认为，美国人会把全球的利益放在高于台湾的利益之上，它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而最重要的是，大陆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大陆发展了，美国就不会“保”台湾了。

末了，李引桐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相信中国总会迎来统一的一天。
这又何尝不是海外华人华侨的心声与心愿呢！

第九章 阴霾

必须及早小心在意，把自由的命运交到永恒的真理手中，而不是交到要消逝的人的手中，使被公认的原则的光辉能够在政府一旦忘记了人民的利益或者重新落入腐败者手中的时候，按照事物的自然进程，反映出他们的叛卖行为，使所有新的政治派别只要一想到犯罪就趋于灭亡。

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人民是幸福的！因为，不管有人给人民准备些什么新的侮辱，作为自由的保证的公共理性就表现为事物秩序的巨大力量！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一个完善的社会需要一个进步和理性的公民意识来保障。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国家处在困难甚至危难之中时，他能具有这种意识水平，勇于挺身而出，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勇于为公理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样的人便是那个民族、那个社会的脊梁。这样的中国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李引桐是这样一种人，对于他的祖国，他爱得很苦，也爱得很真。为了这份圣洁的爱，他付出了很多很多，却从来未向他的祖国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这使人们想到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曾说过一句令全人类有责任心和高尚意识的人们都为之动容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李引桐做到了。

并不是说他李引桐家里就不会发生需要帮忙的情况。他是普通的人，有人情，有众多的亲戚朋友，也渴望得到政府、团体、个体的关心和照顾。60年代，他的一个外甥要到香港定居。手续办了好些年，托过很多关系都没办成。那个时代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办一张出国定居的“通行证”，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般无奈，这位亲戚求到了李引桐。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办好这件事很难，但对李引桐来说却不难。只要他有心去办。且莫言他为祖国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如果他要开口，按照常理，中国政府应该会给他这个面子。就算不要把此事推到北京，光是在福建省内，靠他的关系，有关部门也是会为之开绿灯的。更何况，由于他所干的工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多重要的职能机关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些职能部门里，他甚至与部门头面人物的关系也都极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他肯出面，将他的亲戚办往香港并不要费太大的气力。可是，他拒绝了亲戚的请求。他说，我为祖国做的事、花的钱是无代价的。如果因为自己曾为自己的祖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就时时想着要她偿还，或讨价还价，那不是我李引桐的风格。

李引桐是这样一种人，对于他的祖国，他的爱很坦荡、很坦诚，同时也很坦率。具体体现在他对祖国有高度的责任感。如果说读者在前几章里已经了解到他为祖国勇于冒险、敢做敢当的品格的话，那么襟怀坦荡、敢于直言构成了他为人的另一组成部分。为了这，他受过很多的委屈，甚至不公平对待。好在李引桐不是一个时时处处将自己的委屈挂在嘴上、写在脸上、放置心里的人，否则他也就不会这么长寿了。

60年代中期，李引桐陪李光前到大陆治病。中国政府对李光前的到来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李引桐的穿针引线之下，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会见了李光前、李引桐一行。会见中，周恩来总理多次对李光前说到了“英帝国主义”

这一个词。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的措词无懈可击。或许他要向李光前这位东南亚著名的华侨领袖表达中国对西方势力的一种强硬态度，或许他要把那些千千万万的华人华侨与殖民政府和西方的殖民政策区分开来……然而李引桐却认为，周总理在这种场合多次重复“英帝国主义”这样的词汇不妥。因为一则李光前本人是一位儒商，对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体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冲突一贯小心翼翼，更加害怕卷入政治漩涡；二则李光前本人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也持保留态度；三则李光前本人虽有爱国心，却毕竟在商务上、情感上与英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南益公司的财产被日本人作为敌国财产加以没收，李光前也被作为亲英美派代表遭到来自很多方面的威胁而在美国“避难”；四则新加坡无论从历史还是独立后的体制上看都可以说是很英国化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属于“英国体系”，且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政府若想要借李光前到中国治病的机会，使之在东南亚华人华侨之中产生一种更有利于祖国发展的影响，那么，周总理在那种场合最好不要用过尖锐激烈的政治化辞令，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他是这样想的，也就如此这般地向周总理说，最好不要总说“英帝国主义”。周总理笑着颌首。周恩来的豁达，体现了一国总理的涵养和修养。毕竟此事是发生在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李引桐的举止的确可称得上惊世骇俗。平常的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出，一个普通的华侨竟敢当面对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政府总理说不？如此胆大妄为之举在被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濡染的老百姓看来，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按古代的说法，那是“犯上”。“犯上”是要砍头的。好在人民共和国总理有一个能够容纳千山万壑的宽广胸怀；好在李引桐横竖也是为祖国着想；好在李引桐对周恩来总理从来深怀敬意和景仰。我们在上一章就描述了李引桐在台湾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笔录，他执意要将“周匪恩来”、“廖匪承志”中的“匪”字删去。其实，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当时台湾当局对大陆共产党的一种仇视性用语，也是两种政治对峙时的“平等”政治词汇。曾几何时，大陆不也称对岸为“蒋匪”么？但李引桐非要纠正，非要严正声明：“周恩来不是匪！”这一字之删的后果他并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那一句的“声明”，可能给他带来想不到的劫难。他都没有在乎。为什么呢？她李引桐又不是共产党员，又不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使命，何苦冒险？何必玩火？理由只有一条，他信任共产党，尊敬周恩来。

大跃进时期，中国进入了一个与科学和实事求是精神背道而驰的时期。在一个“左”的基调之下，人们心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在社会思潮和特定的价值体系之中，被膨胀、被放纵、被扩张。讲假话、讲虚话、做假人、做假事遂成时髦风尚。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胡言乱语满天飞。可怜那些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差。遇到自然灾害，死亡、逃荒者大有人在。

李引桐每次回国，看到祖国的发展变得如此无序、如此违反科学，看到乡亲们生活过得如此艰难，而到处看见的却是与科学大相径庭的豪言与壮语，他心急如焚。当他从各种渠道获知，彭德怀因为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进行批评而遭到排挤、打击时，更是不能遏制自己内心的不满。他在当时的各个场合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为彭德怀讲话，毫不讳言地批评那种不讲究科学规律，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历史和客观规律之上，把有条件、有限度的个人主

观能量无限制地放大的浮夸虚靡、不尊重事实的社会风气。为了这些谰言，也为了这些难得的肝胆之情，他经常得到的不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肯定和赞许，相反，有时却是不理解、不认同，甚至谩骂。当时福建侨委的领导就曾在省委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大骂李引桐，说他是反动的资本家云云。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土地上，没有人与李引桐有相同或相似的感受。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不敢说，他却要说，他要直抒胸臆。他把对祖国的爱视为一种情感，更视为一种行动——一种敢于真诚面对，也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

可能有人要说，他李引桐怎么说还是个华侨，他对国家政府以及政策路线有一些什么看法自然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人家又拿他没办法，不能将他投入牢狱，不能给他定罪等等。这固然不错，却也未必尽然。在那种人们失去了理性的时代，谁也保不定能发生什么。也有人可以说，他李引桐即使说了些什么，甚至骂了某个领导，也不至于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打击报复。然而，朋友，请别忘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几千年的宗法制的社会发展史，封建社会跨越的幅度很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深蒂固。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祸从口出的例子还算少吗？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少无辜者受到株连，甚至引来杀身之祸。是的，李引桐可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而不受伤害，可是他在梅山有那么多的亲人：姐姐、弟弟，亲戚、朋友。李引桐再怎样不考虑自己总忘不了那些无辜的亲人呀。事实上，在梅山，确有他的亲人因此受到牵连。这一切李引桐并不是没有想到过，只是相比之下，他从来将对祖国的爱和他自己珍视的责任放在第一位，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得失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段时间，李引桐还在为国家的大事而忘我地工作着。他频繁地往来于祖国和东南亚国家。回国的時候，他看到像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非常疑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抛头洒血的人一下子竟成了资产阶级？他不改初衷，在许多场合公开为这些“走资派”说话，公开表达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和抵触。他甚至说了“资本主义也不都是坏的”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毋庸置疑，他的这些言论既让关心和爱护他的朋友们捏了一把冷汗，也为那些专门靠打小报告起家的人带来了一份他们认定的“工作”。可以想见，他因此又受到了一些人的“特殊礼遇”——不少的政治高帽。不过，他从来就没有在乎。其实，细细品味，这些话原本并没有错！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社会形态，一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原本也都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吸取其滋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得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笔者无意把李引桐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来就不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许多地方、许多观点上的正确性。事实证明，从大跃进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大多数观点和主张都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无意为他的主人公贴金，更无意把李引桐说成是一个超乎时代的人物。李引桐对自己的评价既幽默又中肯：“毛泽东说他自己的功过是三七开；邓小平说他的缺点像维吾尔族姑娘头上的辫子，一抓一大把；我的功过只要能够五五开就好了。”其实，作者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去评价这个人，而是把他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告诉读者，把这个人對祖国的那一份坦荡、坦率和坦诚捧出来。

1966年，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一次浩劫。在这场灾难中，无数善良的人民受到了一次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特殊“洗礼”。

李引桐也没有例外。

李引桐成了几千万海外华侨中少有的受到“冲击”的人物。

李引桐还领受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

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没有像其他“黑五类”、“黑七类”那样被打、被斗，可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李鸿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和牵连。

说到李引桐的弟弟李鸿陵，恕笔者稍作打断，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李鸿陵，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老实、善良、纯朴。生活的憧憬全都体现在他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与收获之中。他原来生活的全部内容充其量不过是随着自然节气的变化和律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天耕种，秋天收成。在很长的时间里，虽然他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哥哥，有着一位腰缠万贯的兄长，有着一位意笃情深的手足，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农民身份。何况他本身也未有什么要改变自己境遇的企盼，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

农民从来就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结为永久性的相好。他们热爱那一块生养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李鸿陵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分子。尽管他在南洋赚到大钱的兄弟不时接济在家乡的亲人们，但他并没有想要离开那一块热土，更没想要摆脱他的农民身份。

作为弟弟，李鸿陵也知道自己的哥哥长期以来一直在为祖国做着事情，他为自己的兄长而骄傲和自豪。同时，他也最清楚自己哥哥的品格和品性，他不会因为自己为国家做了好事而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

一切都显得平静、平淡。越是如此，越像是预示着什么，越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事实还真如此。

1954年，发生了一件令兄弟二人都没有思想准备的事件。它在李家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事情的缘由迄今对笔者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事隔太久，有些当事者已不在人世。李鸿陵本人也于去年仙逝。我们只能根据来自不同方面的叙述，根据当时的情形来推测，试图勾勒出一幅大致符合历史的图画。

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好心的朋友向中央的有关部门的领导提出，鉴于李引桐为政府做了那么多的有益工作，他本人却又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过个人的要求，而他的胞弟李鸿陵还一直在家乡当农民，是否可以让李鸿陵到当地政府的侨务部门工作。

平心而论，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于是有一天，从中央直接下达了一个指示，经福建省委转到泉州地委，让李鸿陵到南安县出任副县长，负责县里的侨务工作。当时具体操办此事的泉州地区专员张连先生回忆此事时说：

“我那个时候在泉州做专员，一天，上面指示下来，要梅山的李鸿陵到南安任副县长，说是中央直接下达的任命，让我迅速办理。我就给南安的县长写了张条子，叫他亲自到梅山通告李鸿陵，请他到县里任副县长，负责侨务工作。他的任命不要讨论。南安县县长得到我的指示，就亲自去了梅山，找到了李鸿陵，说上级请他到县里做副县长。李鸿陵当时不肯去，县长把情况给他讲了，说此任命由中央直接下达，必须去。就这样，李鸿陵走马上任。”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此当上了一县的父母官。对于李鸿陵来说，有什

么办法呢？赶鸭子上架吧。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服从，即使令其去做官。对于一般官场上的人，如此福缘就像从天而降，怕要令其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可偏偏这种“福份”降临到了一个压根无意于官运仕途的人的头上。李鸿陵面对着任命着实令他大为苦恼。

如此重大的事情自然也很快地传到了李引桐的耳朵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明白，这是政府对他的关心与照顾；他也知道，让弟弟出任副县长，负责侨务工作，也体现了政府的良苦用心，毕竟李鸿陵有一个在东南亚颇为出名的华商哥哥，毕竟李鸿陵的哥哥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他的哥哥为家乡积了那么多的德……

听任自然是李引桐唯一可以做的。不过，当他再一次从马来西亚飞到北京，他好好地在北京的朋友中发了一顿牢骚：“你们这不是帮我，你们这可是在害我。”其实，一切都符合情理，一切都也在逻辑之中。对谁而言这都不是坏事。

然而，又有谁能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所有符合情理、符合逻辑的东西旋即变得不符合情理，不符合逻辑了。

历史的流逝仿佛只在片刻之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很短的时间里，在南安县城，在梅山乡下骤然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李引桐、李鸿陵被黑体字歪歪邪邪地缀于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标题上的名字还恶狠狠地打上几个红叉叉。“打倒反动资本家李引桐”，此外还有诸如“特务”、“敌特”、“反革命”之类的罪名外加诸如“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批倒、批臭”之类的文革词汇。不过，那些习惯用大字报来宣泄私愤的人们，除了用笔墨在纸上乱涂乱写以外，拿李引桐并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可怜的是，李鸿陵被戴着高帽游街示众，被人们拎上台批斗。那个岁月，李鸿陵所受到的冲击或许并不值得作更多的絮烦，那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小事几桩。况且，李鸿陵被冲击的程度和时间都有限度。说起来也与他的哥哥李引桐有干系。

“文化大革命”照样进行，李引桐却并没有因此停止他为祖国的工作。

1966年11月，李引桐夫妇、他的老朋友李成掬、李引桐的儿媳许白雪一行四人取道香港从广州入关。在广州，国家安全部门、总政治部、农业部的有关领导与李引桐一行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尔后，在一位姓蚁的小姐陪同下由广州飞往长沙。

时值冬季的湖南，天寒地冻，一行人长期生活在东南亚，耐热耐暑，竟熬不得寒冷，又没有带足衣什，其实他们也没有冬天御寒的衣物。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竟一时没有法子。完全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是红卫兵小将的“战场”，老百姓人人自危，要借一些衣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引桐一行人无奈，只得知趣地挺着。

在一家餐厅吃过晚饭后，他们被领着去看红卫兵演戏。刺骨的寒风伴着热烈、铿锵的“忠字舞”，越发使他们感到寒冷。寒冷对李引桐而言不啻是两种感受。一种是大自然带给他的寒，这种寒意尽管他的身体并不习惯，毕竟可以忍受。另一种则是发自内心的。当他看到他的祖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民众不工作，不劳动，只管搞政治运动，人人斗争，草木皆兵的地方时，他不禁迷惑：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个有着礼仪之邦美称的国家，怎么竟变得这样疯狂、这般躁动？他的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直到晚上 11 点多钟，他们才精疲力尽地回到房间，个个不由分说，打开热水，一头栽进热水浴池，让热腾腾的气、热腾腾的水驱走通体的寒冷。

他们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了京城最好的酒店华侨大厦。在那个时期，华侨大厦是首都两个顶尖级的旅店之一，另一家为北京饭店。负责接待李引桐一行的吴纪宗（现已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才 20 多岁，受中央有关部门的指派，专门负责接待李引桐。久而久之，他们成为挚友。加之吴纪宗也来自福建，老小乡亲自有一份亲切感。即使在今天，李引桐仍将这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身兼要职的政府官员称作“小吴”。

李引桐等人在北京被安排好了以后，吴纪宗早就了解到在福建老家出现了大量攻击李引桐的大字报，机灵的小吴便开着玩笑安慰他：“李先生，您家乡那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批判您，我们这边却在热烈地欢迎您，热情地接待您。”

李引桐心里清楚，尽管在北京的朋友们并没有明着说“文化大革命”的不好，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那些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大贡献的人们在心理上有一个安抚和慰藉。国内的朋友们恐怕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也只能如此，他们不能像自己一样公开地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表示不赞同，表示反对。其实，那可能仅仅是身份上的差异而已。所以当他听到小吴讲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早已经明白了许多的事理。

为了平复李引桐心灵上的伤痕，精明的小吴还通过特殊渠道将李鸿陵从遥远的闽甬接到北京，让李氏兄弟在首都团聚。见到深受心灵和肉体双重伤害的弟弟，李引桐感慨万端，潸然泪下。其时其境的心情可以想见，弟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而受累，他的内心总觉得内疚，尽管他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祖国和家乡的事，本不该使自己的亲人受到这般待遇，然形势如此，他又有何法？兄弟相见，虽有千言万语，一时也不知说什么为好，只是淡淡地相互嘱咐：保重！

所幸天下总归好人多，所幸人民的善良天性并没有因为一两次政治运动便被泯灭。一个人的善举义德终究要感动和感召周围的人们。他们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悄悄地做了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在小吴和其他朋友策划和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李鸿陵从梅山弄到香港。要知道，这样的行动发生在“文革”的十年里，委实不容易。

对于这件事，李引桐默认了。这或许是他有生以来少有的情愿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朋友善意的事。无论如何他得为自己弟弟的生命担忧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种年代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都可以发生，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了法制、消灭了法理的年代。有什么人能够算得清楚，估得明白，究竟在十年浩劫中冤了多少没有瞑目的鬼魂？

当然，那已是后话。

言归正传。

李引桐此次回国，一方面是继续他在祖国建立和发展橡胶基地的事业，另一方面，他要亲身实地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北京期间，他到了一些最能体现“文革”的地方，比如参观了王光美展览馆，还到北京的一些大学去访问，与大学生们交谈，回答红卫兵小将们的各种提问。好在一行人都是“爱国华侨”，且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陪同，小将们对他们比较客气，没有发生什么过激行为。不用说，他更少不了向中央的高层领导了解“文革”的状况。当听到周恩来总理提到武汉发生了流血事件，造反派把

军队里的大炮都拖出来了，他的震惊程度不亚于他听到在自己的家乡出现的大字报。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李引桐决定到武斗最厉害的武汉走一遭，再顺道在南方几省看一看，还要回福建“前线”具体考察一番。虽然北京的朋友一再劝阻，希望他们放弃此次“旅游”安排，却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李引桐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越是有危险的地方，对他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这倒应了“文革”时期的一句时髦用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北京方面看到劝阻起不了作用，改变不了李引桐的初衷，只得叮嘱随行人员要精心保护他们的安全。其实，随行人员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一经发生，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局势，一切只能是尽力而为，说得悲观一些，听天由命。

李引桐四人加上一位特殊的随行人员一路南下，经过武汉，他们稍事停留，所幸那两天武汉没有发生武斗。大家竟然还到长江大桥上去观看了雄伟的大桥丰姿。不时可以听到远处一两声划破长空的枪响。

接着他们到了南京、上海和杭州。所到之处，总忘不了到各地的名胜古迹和游览点畅快地游他一番。真可谓：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李引桐爱旅游是出了名的，武斗期间，人们大都蛰伏于屋里，那些享有盛名的景致尽管有些破败，却也不失冷峻之姿，料峭之美。一行人痛痛快快地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最后一站是他的故乡福建。

说来奇怪，要回福建时，反倒处处不顺，好像上苍有眼，不让这一行人回故土似的。他们在杭州买去福州的火车票，竟没有，折腾了很久也解决不了。没办法，随行人员只好向杭州铁路系统亮出上方宝剑。这一亮把那地方官给唬煞。最后采取的变通办法竟把那一行人也弄糊涂了：加挂一节车厢，专供他们五人使用。

与此同时，他们一直给福州方面打电话，却总未见回答，怎么也联系不上，直到火车开动之前还没找到人。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往福州方向去。他们倒不太担心会有什么生命之虞，想到火车抵达福州的时间是夜晚，据传福州的武斗也很厉害。没有人到车站接，他们往哪里去打发那一夜？

列车在江南大地上疾驰，冬日的午后，游动的田野、河湖港汊在暖暖的阳光照射下，挥发着特别的情致。空荡荡的车厢，装载着男女老少五个人。耳畔有节奏的“咔嚓、咔嚓”声不停地唱着催眠曲，仍唤不起大家的睡意。

“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那些朴实的农民，肯干的领导，善良的朋友是否别来无恙？”一串串问题闪过李引桐的脑际。

.....

列车到达福州已近午夜，整个福州城笼罩在黑暗之中，除了街边上的几盏发黄的路灯和行色遑遑的几个行人外，一切显得那样寂静，给人以一种心灵的震撼和威慑。

他们五人来到火车站前，竟没有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因事先没有联系上，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到车站来接他们。他们只好雇了两辆三轮车往座落在五四路方向的华侨大厦而去。

华侨大厦也是黑乎乎的，大门早已紧闭，敲了半天才把门卫叫醒。他们亮了证件才被允许进入。电梯不工作，大家只好沿着狭小的楼道往上爬，楼道上还堆满了防护物资。他们五人猫着腰、驮着背盘旋而上。李太太愤怒地

说：“我们是人不是狗，怎么能爬这样的狗洞！”他的丈夫当即拽了她一下，示意她不要乱说，免得惹出麻烦。

总算进了房间，“服务人员”在离开房间前丢下一句话：

“我们这里在搞武斗，晚上经常会打枪，你们不要睡在床上，要睡在地上；否则会把你们打倒。”

“服务人员”所言完全属实。当时的“八·二九”和“福革”处在对峙的交火状态。“福革”占据着邮电大楼，“八·二九”则以华侨大厦为据点，两派的子弹飞来飞去。整个华侨大厦成了一个作战的大掩体，所有的甬道全部被堵塞，只留下一个刚刚能够通过人体的小洞。难怪李太太称之为“狗洞”。

是夜，充满着刺激，也充满着屈辱。

他们在福州会见了几个相识的朋友，便准备启程回梅山。弟弟李鸿陵已经事先从家乡来福州接他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搭不到准时的班车。恰好南安诗山医院的救护车送一个急诊到福州，空车回去。李引桐一行就这样搭了一回便车，而且是标有红十字字样的救护车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那可真算得上是一出可圈可点的黑色幽默，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轶事。

李引桐悄悄地回到梅山，梅山小镇的上上下下贴着不少的大字报，其中包括他的侄儿贴的那一张，标题为“打倒反动资本家李引桐！”那张大字报后来被他的母亲亲手撕去。

触景生情，李引桐苦思苦恋着的故乡看来在那个时候并不欢迎他这个游子。诚然，在家乡的时候，也有不少知情达理的乡亲对他表示着同情。可李引桐一生从来就没有要过什么同情。

在生他养他的故土，李引桐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最短，头尾相加不过3天——就匆匆地离去了。

他走了，离去了。这次告别竟是那样的漫长。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他才将那已经衰老了的步履迈回故乡。13年啊13年，故乡的儿子，天涯的游子时刻在牵挂着她。

苍天可以作证，大地可以作证。此情绵绵，此意悠悠。

第十章 银行·银行·银行

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篇》

有公心必有公道。

——《傅子·通志篇》

“两行事件”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复杂得令人难辨彼此。如果事物本身确乎复杂，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所导致的复杂，那本不足为奇。问题是，有很多事情，原本并不那么复杂，而是由于人为的偏见、偏颇、偏心，导致了事件的复杂化，以至于人们不容易判断出真正的公正、公平和公心。当然，只对事实有一鳞半爪的了解就急忙作出自以为是的结论，也会导致对公正的偏离。

李引桐并不是一位金融家、银行家，一生中却与银行多有交道。本章所说的“交道”并非指因为德美行的发展需要而与银行发生的那种借贷关系，严格地说，这种交道与他本人和德美行的商务行为并无关系。也就是说，若不是出于爱国、出于公心、出于责任，他完全可以抽身而去，拂袖而走，因为他个人在其中“赚”不到任何利益，说得不好听，只有“赔”的份。常言道：“在商言商”。如果时时刻刻他李引桐想到的都是其商业利益，如果时时刻刻他李引桐都将自己的角色规定为商人，那么很难想象他会将自己纠缠到从开始到结束都不获利的事物中去，而且他一开始就清楚地明白那种结局。

看来，人并非总局限于一种角色。社会越是现代化，人的角色也就越趋于多元化。

这里介绍的是李引桐一生中三次与银行所发生的纯粹非借贷性质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两次，因为第一、二次与两家银行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60年代中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西方阵营对制约中国的战略作了一些调整，由以往那种绝对的包围封锁的“硬”手段转变为对中国实行渗透的“软”手段。在这种背景之下，东南亚国家，尤其原马来亚联邦社会中出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一方面与共产党公开决裂，一方面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中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在整个马来西亚显得空前活跃。同时，人民行动党在总体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与马来西亚政府不同的态度，并且独立行动。这无形中成了马来西亚当局的一块心病，担心有朝一日，人民行动党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将主宰整个马来西亚，那样，马来半岛就将变成华人的天下。于是出现了排挤人民行动党的政治行动。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原先与李光耀的关系甚好，也因此拉远了距离。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了1965年新加坡的最终独立。在这样的历史动荡与转折时期，各种力量在对待共产党和中国事务等问题的态度上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相对性，体现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差别和政治路线的走向。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恰又出现了极“左”思潮。加上长期对外交流的闭塞，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缺乏参照性，形成了绝对的“独立自主”性。

这一切复杂的政治背景衍生出新加坡的“中国银行事件”和“渣打银行事件”两个互有关联的连锁事件。

新加坡中国银行成立于1937年，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原本与具体某一国体和政治关系较远。然而，新加坡中国银行因为标有“中国”二字，因为其隶属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因为国际上存在反华反共势力，使之无形之中烙上了很重很浓的政治色彩。在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反华、反共战略的包围和封锁过程中，中国在海外的金融机构几乎都遭到被关闭的厄运。先是伦敦的中国银行被关闭，接着在东南亚英镑区域内的中国银行也先后遭到相同的命运。为了体现国际上反华、反共的一体化政策，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关闭了新加坡中国银行在槟城和吉隆坡的两家分行。这样，中国银行在海外非社会主义阵营的金融机构屈指算来只剩下了新加坡和香港两家。香港毕竟还是“半”中国领土，真正属于中国领土之外者，事实上独余新加坡中国银行了。中国政府对这一“最后的金融堡垒”无疑看得很重，自然会倾尽全力进行保护。

新加坡中国银行得以保存到最后，也与新加坡是除中国领土以外的100多个国家中华人最多，中华民族的民族向心力最强的国家这样一个事实密不可分。那里70%多的华人，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利益关系上都与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牵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的中国银行成了一种象征，成了一种海外华人凝聚力量的附着物。中国政府要力保，东南亚国家的绝大多数华人华侨也要力保，不少华人华侨将保护新加坡中国银行上升到捍卫祖国和中国人尊严的高度，出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感人场面。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形也与当时华人中第一代成分居多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尽管李光耀在当时的政治态度上是反共的，也可以说是反华的，但他与以马来人为主体的马来亚联邦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或许毕竟李光耀有华族血统的缘故，或许李光耀充分地了解到大多数新加坡民众对保护中国银行的决心，或许他要利用这件事情以提高自己和人民行动党在民众中的地位……总而言之，李光耀在处理新加坡中国银行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政治家手腕的高明与老道。他毅然拒绝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要求他关闭新加坡中国银行的决定。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毕竟政府要关闭中国银行的传言搞得整个新加坡社会沸沸扬扬，毕竟李光耀在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上并不能一蹴而就。事实上，整个事态已经酿成轩然大波。许多复杂的因素都已经卷入：英国政府、中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新加坡自治邦、各金融机构、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尤其是新加坡的华人及其社团等等，都以不同的心态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恰恰发生在新加坡独立的1965年。此前不久，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关闭了在槟城和吉隆坡的中国银行之后，又要求新加坡当权者关闭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那段时间风头很盛，又有前车之鉴，使原先新加坡中国银行的那些大客户们如惊树之鸦，纷纷从银行将款提走。中国银行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景堪忧。金融界的权威人士纷纷进行预测和分析，多数人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新加坡当局不采取强行关闭的方式，中国银行也很难熬过这次金融财政危机。形势显而易见，银行的主要大客户自然不会将他们的钞票存在一个前途和命运都没有保障的银行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由于与英镑系统处于敌对状态，远水救不了近火，也只能干着急。加之在那个时

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水平又很有限，更何况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封锁，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指令处于极不畅通状态，往往一个小小的指令要经过多条渠道才能最终抵达。

可以想见，面对骤然而至的变化，新加坡中国银行的经理张纪韵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凭着他的直觉和职业道德，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指令之前，他必定会采取他力所能及和在特定权限范围内的所有措施，千方百计地防止中国银行倒闭。更何况，当时从各方面都已经放出风声，如果中国银行宣布破产，一家英国的大财团愿意出大价钱收购。那样的结果必将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任何事件都是“政治事件”。此时此刻，作为总经理，他的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是要倾其全力不使中国银行垮掉。

也正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当然首先是新加坡的华人华侨，表现出了对祖国的深情厚意。他们把保护中国银行视为一种自觉的爱国行动。中国银行的大客户们将钱款提走，他们就将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零用钱存进去。有的甚至将原先存在别的银行的钱取出来，再存到中国银行里去。有的华侨还从很远的地方到新加坡来存钱。中国银行的办公楼前出现了大量华人排队存钱的景观。有的时候，天下着雨，人们仍打着伞，争先恐后为自己的祖国排忧解难。有一个例子可以为当时的情景作一个注解。新加坡当地有一家“东风百货公司”，总经理林信发甚至让公司职员提前下班，一律到中国银行存钱。说起来如此行为有些“过分”，可谁想到，所有职员竟无一人反对和不满，个个都往中国银行存钱去了。他们到底往中国银行存了多少钱已经无法统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行动已经说明了比具体存款数量更多的东西。

你们看，

人群里有踏三轮的工人，手中的钱脏兮兮；

人群里有公司经理，他们驱车几十、几百公里风尘仆仆；

人群里有家庭主妇，手中裹着平日攒下的菜金；

人群里有大学学生，书包内装着前日打工得来的报酬；

人群里甚至有未成年的孩子，小手举着平日父母给的零花钱。

中国银行保住了，它如今仍高高地耸立在太平洋之滨。当人们再次来到它的面前，看不到当年留下的凌乱脚印，也听不见往昔的各种中国东南沿海的方言土语，感受到的却是那个时代华人华侨对祖国拳拳的情和深深的爱。

尽管如此众多的华人华侨表现出了非凡的爱国热情，但毕竟中国银行的困难期并没有度过，银行也不能长时间地依靠人民采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持正常运作。张纪韵一方面十万火急地向祖国请求指示，另一方面到别的银行筹措款项来填补短时间大批钱款被提走的亏空。当时新加坡的渣打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关系不错，两个银行经理的私交甚好。中国银行出现危机，而在中国政府的指令又因通讯不畅迟迟未到达以前，中国银行“可能”向新加坡渣打银行借了一些钱以渡眼前难关，解燃眉之急。我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后来出现了新加坡渣打银行说中国银行欠了渣打银行的钱，而新加坡中国银行方面却予以否认。谁是谁非迄今仍是个未知数。在那种各个关节都极不通畅的特殊情境里，有些事情完全可能建立在个人私交的基础上，要追求细节上的完全准确已很困难。

还有一种说法：新加坡中国银行碰到了因政府要求关闭而出现的财政危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渣打银行将一些款项存入了中国银行，如果将这笔

款子作为一般客户的存款，也就不会出现在渣打银行账面上的所谓“欠单”之说。中国银行也就完全有理由拒绝承认。于是，这里的“动机”和“解释”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分歧所在。如果原先两家银行关系好，渣打是出于帮助中国银行渡难关的动机，那么按照道理，就不应该发生刚刚借给朋友钱，一觉醒来就上门索讨的情形。如果真如此，那只能说是一种圈套，属小人行为。如果两行经理交情深，那传言的“借款”更多地属于朋友间的行为，后来各出于所属国的政治利益而使事情表面化，则又是另外一种性质了。要是渣打银行在那个特定时期存入一笔款到中国银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目的是要最终将中国银行收购（当时社会上确确实实也流传渣打银行将收购中国银行的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激烈行动完全就是正当的。

总之，“两行”之间出现的那些事情，确实扑朔迷离。

接踵而来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半遮面”的政治性对立行为了。北京方面后来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指令是：“让它关！”据说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张纪韵先是认为，如果渣打银行自愿提出帮助，中国银行还是接受为好。然而，他的建议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北京方面的策略很明白，此事既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以同样的政治行为对待之。我不管什么公婆理论、街谈巷语，只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对中国银行采取行动；只要你们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就采取相应行动。于是，中国也对上海的渣打银行下手。可能中国政府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应付一下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新加坡还是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一些动作，传说关了中国银行一两天。对此新加坡报界的说法不一，各种说法都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便对英国在上海的渣打银行进行相应的威慑，找出一些罪名，抓了上海渣打银行的经理。在外人眼里，完全成了外交上的对等关系，“你逐我一名外交官，我也赶你一名外交官”。任何事情上升到国家层面，其结果必然如此。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与英国、新加坡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通过官方解决此事显然难度很大。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强硬！

正在这个时候，李引桐“出现”了。他的“出现”对事件的最终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引桐在新加坡有一位老相识，名叫李家兴。李家兴早年做过李引桐的伙计。此人英语水平很高，曾在新加坡南方公司当过英文秘书。后渣打银行有一买办退休，李家兴就补了那个缺。此人与渣打银行经理的关系甚好。

一日，李家兴找到了李引桐，说渣打银行的经理有意请李引桐吃饭。

李引桐故作惊奇状：“我与渣打银行经理素无交道，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其实，他心里早已有数。

“渣打银行跟中国闹成这个样子，人家都说李先生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好，想请先生出来帮忙，在北京方面疏通疏通。”

“我与北京只是做做橡胶生意。”

李家兴说：“马来西亚有一批‘屯胶’，中国又缺胶，你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到北京斡旋一下。”

李引桐说：“我对银行方面不熟。”

沉默一下，他接着说：“如果我遇到熟人，可以帮着说一说。”

这符合李引桐的一贯作风，在事情未进行的时候，从不虚张声势。这样可以为自己留有更多的余地。

李家兴与李引桐共过事，他心里的石头放了下来。到这个份上，只要李引桐答应赴宴，就已经算半个承诺，他也就一定会去办，而且他相信李引桐多半能够办好。怕就怕李引桐不赏脸吃这顿饭，那就得泡汤。

他冲着李引桐笑了笑，笑得那样诡秘。

有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当晚，李引桐应约赴宴。李引桐从对方身上感到了诚意，也感到英方在这件事情上有与中国妥善解决的应有态度。更重要的是，李引桐从国际形势分析，看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不像过去几年那样敌对，有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迹象，而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表现出相应的态度和灵活性。

李引桐默许了。他决定试着努力去做一些什么。他坚信这对祖国有好处。

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李引桐就对“中行”和“渣打”事件极为关注。为了了解新加坡方面对两行事件的态度，李引桐还专门约请了一位在新加坡政府谋事的朋友，请他谈一谈新加坡政府的态度。这位朋友对李引桐说，新加坡财政部长就是著名侨领陈嘉庚之后，何不去找他聊一聊。

在这位朋友的安排下，李引桐去会了这位财政部长。但第一次会见，气氛显然不好。李引桐惑然。他能做的唯一解释是自己当时去会见时的穿戴过于随便，被人误会。因为，到政府部门见高官显要，一般人总要西服革履，这已经成了某种规范。不巧，撞上李引桐偏偏既无西装，又无革履，素装简服竟跑到了政府要员的办公室。其实，李引桐一生从来不在穿着上下工夫，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是他的一贯风格。如果要以他的衣着来看，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无产者”。如果仅从这一点来判断，的确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有钱人。我们在民间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还真可以用诸李引桐其人。

第二次，李引桐领着“中行”经理张纪韵前去，这一次财政部的态度已经比第一次好了许多。或许第一次部长只将李引桐的拜会当成纯粹的个人行为，而部长先生认为两行事件纯属国家大事，个人不宜插手。而第二次，部长先生或许已经看出李引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个人行为而给了他一个“相当”的态度也未可知呢。总之，一切都是猜测而已。不过，部长的这些变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引桐了解到了新加坡政府对待中国银行的态度。一方面，李光耀拒绝了马来西亚要求他立即关闭中国银行的命令，以体现他与马来西亚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另一方面，在对待“中行”的态度上他也得迎合民众的意愿，以获取相应的政治资本。同时，他又不想由于在处理两行事件上的激烈行为而得罪英国。也就是说，新加坡的行动得首先取决于英国。而英国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李引桐后来从渣打银行经理那儿了解得相当透彻。这样，他心里已经有数。现在到了要去做北京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了。

恰在此时，马来西亚又遭受到了历史上的特大洪水，赈灾、民意、义演等都凑到了一起。有关赈灾、义演等事已经在中马建交一章中作了交待，此不赘述。这里着重介绍“两行事件”。

一切谋划妥帖，李引桐飞往北京。

对于李引桐的到来，北京方面一如既往，把他当作者朋友，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为什么不呢？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将国家的事视作自己的事，一个一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的人，国家又怎能慢待？再说，李引桐只要到北京，从不为自己的私事而来，每次必定是为了国家的大事前来出主

意、出钱。

在北京，李引桐对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说，关于渣打银行的事，新加坡中国银行也存在着技术上处理不妥的地方，但这种不妥的原因却并非完全的个人行为，因为从当时的情境来看，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不能及时地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指令，新加坡中行的职业性第一反应自然是想方设法力保银行的存在。如果说关闭不关闭中国银行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是一个银行经理力所不能及的话，那么在银行尚未被关闭以前，银行经理眼看钱款被大量取走，银行处在崩溃的边缘，他想法子进行一些填补挽救工作，则是银行经理力所能及的，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如果真的因此与政府后来的指令有所出入，或者确乎在技术上处理得不妥，应该可以得到谅解。

李引桐竭力为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辩解。

接着李引桐将来自英国方面的信息传递给了北京，进而分析道，从他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英国方面并没有有意在此事上摆出敌对架势。相反，英国方面反倒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主动找他，希望将这种意愿传达给北京。从更大的国际背景来看，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对中国的制约和遏制政策已经出现了某种分化的迹象，英国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李引桐认为，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那么，对待英国在上海的渣打银行最好可以更灵活些。

具体到“两行”事件，李引桐的意见是，在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的前提下，中国应尽可能地争取对事件的有利结果。如果中国对上海的渣打银行采取强硬措施，包括逮捕银行经理，或者冻结银行账务等手段，那么，新加坡中国银行也可能遭到相同或相等的待遇。毕竟新加坡长期以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属于英镑系统。新加坡眼下正从马来西亚联邦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它必须暂时谋求得到一个大国的保护。这个大国非英国莫属。这样，新加坡与英国的关系就会有一段时间比以往更为密切，英、新就会在一个原则下对“中行”动作，那么“中行”要最终得以保存就有相当的困难。中国何不在“中行”还没有彻底“倒”下来的时候，放了上海渣打银行的经理，以谋求最终保住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战略性结果呢？

李引桐的侃侃而谈显然赢得了他的北京朋友们的认同。但最后的决断毕竟还得由更上一级领导商议后才能作出。

报告被送往更高级决策人物，它在中国顶尖决策层里的细节人们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传说，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上，他尚不能决断，最后送达毛泽东主席手中，才得到首肯。

以后的结果便人所皆知。上海渣打银行经理被放了。新加坡中国银行在经过一段急风暴雨般的洗礼后，虽大伤元气，却总算保存了下来。原先的那些所谓的“账单”也就“私了”了。

事件的结果皆大欢喜。

事隔不久，渣打银行在伦敦的总部托人捎给李引桐一份礼物：一对精美的玉器。现在这对玉器还存放于他新加坡的住宅。与此同时，伦敦渣打银行董事会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对李引桐为圆满解决上海渣打银行一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深深的谢意。

“集友银行”

集友银行事件在新闻界已经充分“曝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发了许多的文章。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归结起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银行“吞并”集友银行，是地道的“大鱼吃小鱼”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银行是在集友银行面临困境和危机的紧要关头伸出援助之手，使集友银行免遭破产和被人收购的厄运，是完完全全的善举、义举。

孰是孰非，笔者不了解全貌，更不谙银行业务，不敢妄断。

众所周知，集友银行是在“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的倡导下创办起来的。创办集友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银行的手段筹措经费以支援祖国，主要是家乡的教育事业。此前，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的教育经费有不少是通过香港的集友银行筹措或中转。40年代末50年代初，李引桐冒着风险从美国将一大笔钱转到厦门大学，以帮助遭到日本侵略者大规模破坏的厦门大学的重建工作，那笔款项就是通过香港集友银行中转实现的。

因此，“集友银行事件”也就倍受海内外华人的关注。

不过，本书的主人公是“集友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来自他的看法和说法却从未在报端披露过。碰巧笔者又多次亲耳听到李引桐的陈述，故认为有责任将他的说法写出来，告知世人。这无论对主人公、对事件本身、对读者听众、对历史都有好处。

下面是根据李引桐本人口述所作的整理和记录。笔者将尽最大努力在叙述上保持主人公口述的连贯性和客观性，笔者本人不作任何倾向性评说。

集友银行最初建立的时候，资金只有10万元。不久增到了20万。香港政府要求注册资金为100万。集友银行一时无法筹措，董事长陈光别就到新加坡找李光前和陈六使，向他们诉说难处，请求支援。李光前、陈六使各出了30万—40万，加上原有的20万，凑成了100万元注册资金。

集友银行在开初的一段时间里，各个方面的业务开展都不大，而且主要的资金并不像一般银行以贷款方式获取利息，集友的资金主要用于集美学村的教育支出，很难做到“钱生钱”，同时还使银行出现了不少“呆账”，不能进行健康和有序的运作。

香港政府不几年就颁布新的银行法例，每一次颁布都大幅度提高政府规定的银行最低资本额。比如1964年，香港政府颁布的新银行法例明确规定，银行的最低资本额不得低于500万港元。其时集友银行只有250万港元，比政府银行法例要求整整少了一半。

那些年，每一次政府出台新的银行法规，集友银行就面临一次考验。（有关银行法规的有关详情，可参考笔者在本章后面提供的几篇参考文章。）

比如香港政府颁布将银行最低资本额从原来的100万港元上升至200万港元的那一次，集友银行就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困难。

我这个人生性爱跳舞，有一天我去跳舞，与我同去的有陈嘉庚的儿子。他把我推到舞池。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集友银行现在还差100万，你能不能支持？恰好我泰国的德美行有赚钱，就满口答应。

我心想以什么名义给呢？当时我在香港还有一家公司，叫做“南宗公司”，我就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开了一个收据。没想到后来有些人以此为借口，造成我和南益集团的误会。因为这笔钱事实上是德美行赚的。德美行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当时知道底细的人很少。而且我给集友银行的这笔钱，知道的人也不多。我并不想因为做了这样一件事就要怎么样。集美学校是国家的，

这些钱投到集美学校也等于投给国家。其实，就是集友银行知道这件事的详情的人也不多。

后来香港政府又一次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额，这一次是 1000 万港元。这次集友银行的困难就不是哪一个人有能力帮助的了。集友银行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集友不能很快地从困境中走出，那将面临破产的危险，就得拍卖。而且社会上也的确有人想要出钱收购集友银行。据我所知，有一个印尼华侨，政治上亲国民党，就传出风声，要买集友银行。我看到这种情形，急得要命，就通知侨委和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我跟他们说，集友银行是陈嘉庚一手创办起来的，前次香港的银行法例，将最低资本额从 100 万提到 200 万，我们解决了。这次看来不行。如果集友银行给国民党买去，陈嘉庚的名誉就将蒙受损失。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也将蒙受损失。开始的时候，中国银行并不想接管，可能是从经济上考虑，怕背一个大包袱。后来由国务院下了指令。

我又找到香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谈了有关情况，他也支持。而且中央也同意以中国银行接管集友银行的方案。具体的接交工作主要是由香港中国银行何敬守父子和我们一起参与做的。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非常少，我也从来没有对外说。我还可以找得出收据。

后来有的人说中国银行接管集友银行是“大鱼吃小鱼”，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实际情况是集友银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伸出援助之手，使集友银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为了使读者对“集友银行事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笔者特选择几篇案边有代表性的文章于次，似飧读者。

附：海外一些有关集友银行事件的报道和文章

《新中原报》1988 年 4 月 23 日载：

陈嘉庚前所创集美学校董事会
秘书长陈朱明谈集友事件

最近，前香港集友银行董事陈朱明，莅泰省亲，并拜访此同集美校友陈天赐，王维锦，王畅及闽属人士，渠对集友事件知之甚详，并上书中共中央委员，其呈函详情如下：

本人此次旅星探亲，途经香港，得有机会与集美校友会晤座谈。阅读《镜报》与有关报章刊载香港集友银行股权演变真相，香港集美校友为保存母校校产，组织了“维护陈嘉庚教育遗产委员会”忠义执言，讨取公道，深感钦佩。面对诸校友以及东南亚华族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多日来使我坐卧不安，良心受到深刻责备，因为本人于“文革”中 1968 年和 1969 年，在强权之下两次被迫以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签署委托书，把集友银行委托香港中行接管，当时并不了解这两份中英文委托书会导致陈嘉庚教育遗业受到损害的严重后果，实感惭愧，促使我深感责任重大，罪无旁贷，更有必要将实情发表，提供海内外关心教育的人们参考，以白真情。

一、陈嘉庚先生的意愿

（一）陈老的遗著《南侨回忆录》第 266 页 381 节云：“创办集美厦大两校，集美设在故乡以村里为名，原不望他人捐助，按自己力量负责，至厦大则不然，自倡办时在厦门开会，首先认捐四百万元，待两三年后略有规模，则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扩大厦大校务，不意理想失败，虽屡向富侨募捐，卒无效果，创办十余年间，承认四百万元经费交完后，因遭世界商业不景况，余之营业亦不能维持，不得已放弃厦大，求中央政府无条件接收，每痛不能尽国民职责，为善不终抱憾无穷。”

（二）陈老的遗嘱：（1958 年 6 月 28 日）由张其华执笔，见证人陈联辉，陈国怀，张其华，叶祖彬，在最后一部分云：“七，集美所建校舍，尚剩二千五百名的学生位，若省或市要用，基建费应照还，水产、航海每名六百元，其他五百元，包括校具在内，这部分收入可充建设集美公园、医院、卫生，美观道路，小学及其他的基金。”

（三）陈老在他亲笔署名集美学校建筑及垫费收支预算报告中写明“……如各中等学校政府要接办，我甚欢迎，其他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夜校，医院等经费，我仍负担……”。

上述文件可以证明厦门大学虽然归政府，但是陈老坚持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仍旧保持私立性质。

二、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成立前后

（一）全国解放以后，陈老先生决意定居集美故乡，亲自主持大规模发展建设集美学校，1954 年春把我从同安调回集美学校董事会，任秘书处主任，从此随侍左右，1955 年 1 月集美社公业基金理事会成立，陈老先生亲自拟定基金管理规则，并指定我任该会理事长，陈仁杰为副理事长，连同 5 名理事管理集美学校经费，于 1955 年 2 月亲笔立下遗嘱，其中云：“第五条，香港集友银行股本二百万元，其中义捐股一百七十万元。指名为集美学校基金，每月至少得利六厘，即港银一万元。申人民币四千三百左右万元（注：指旧人民币）。第六条：新加坡，香港等处如有汇来款项，指定为集美学校经费，则归入校董事会主持。如校董事会已取消，则归集美社公业主持，增设集美学校校费。”

（二）1956 年 1 月 1 日陈老先生又亲自决定

成立集美学校会，并在国内外报刊刊登成立启事，其全文如下：“本委员会由集美学校创办人陈嘉庚先生聘请陈朱明，张其华，吴藻清，陈村牧，林承志，叶振汉，俞文晨，萨兆铃，叶文佑，叶祖彬，陈颂言，陈天送，陈仁杰，陈水萍，张金兰，陈浴沂，陈礼义等委员，并指定陈朱明为主任委员，张基华为副主任委员，吴藻清为秘书，陈朱明，张其华，吴藻清，叶祖彬，陈水萍兼常务委员，并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组织成立。除函知各有关外，此时披露。福建省厦门市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

自此，上述集美社公业及集美学校委员会这两个组织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受陈嘉庚先生委托管理集美学校及集美社。

由上述这两点我们可以理解陈老先生始终认为集美学校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从来没有办理移交给政府的手续，唯一的是中等及专科学校的经费、人士由政府直接拨款及领导。周恩来总理及廖公承志生前也很尊重陈老的愿

望，1953 年陈老要求把厦门、上海的集友银行无条件献给政府，但是周总理下令保存，因为对海外有影响。集美学校在 1961 年陈老逝世以后照旧维持到 1966 年文革发生为止。

三、集美学校在陈老逝世前后的变化

（一）陈老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从 1913 年创办集美小学以后，先后创办集美中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分开为水产学校和轻工业学校），还有师范、晨校等等，并相应创立为学校服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如集美医院、科学馆、福南大会堂、电厂等等，其经费由陈老先生统筹统办。

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成立以后，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每年发款补助，或地方财政补充教育经费，仍由陈老先生安排，通过校委会会计处分发转账到各校，后来补助逐年增加感到繁琐，因此建议由各主管部门直接拨款交各中等学校，为了统一管理各校，保持集美学村美丽的面貌，陈老先生特别保留校委会作为管理各校核心，直接管辖为学校服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有如集美小学、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福南大会堂、自来水厂、电厂、印刷厂、工人俱乐部，建筑工程队园林、养殖场、归来堂、纪念碑、教职工宿舍 15000 平方米，以及集友银行股份，在龙海县石马的砖瓦厂等等，全部由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承管，这也是集美学校重要组成部分。

（二）1961 年 8 月 12 日陈老先生在京逝世，同年 10 月周总理指示，“要继续完成陈老未了事业”，由中侨委方副主任召集集美学校部分校长，校委会主任，委员，省市派代表参加，研究如何继续完成陈老未了事业。陈老先生在公业基金尚有 340 多万元，除陈老先生生前答应捐给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 50 万元，集美社公业基金留存 50 万元，其余以及香港集友银行每年股息 12 万港元，分为 5 年计划继续完成，道南、海通公园、体育馆等公共企事业单位，校委会保留“私立”性质，继续与海外联系，及统一管理集美学村，直属中央侨委领导。

四、文革中的领导权斗争

（一）1966 年文化大革命降临集美学校，首当其冲有校长。校委会主任是第二号走资派。揪斗开始后，发生红卫兵毁陈老先生的墓，砸纪念碑石雕及古董，判陈老先生为武训、砸独立王国，继而捅马蜂窝，学校关闭，校委会解散，集美族亲千人被迫迁往闽西山区，学校公共企事业单位被瓜分，图书馆分给市文化局，体育馆分给市体委，医院、福南大会堂、印刷厂分给郊区工程队引水工程指挥部，教员宿舍 15000 平方米分给市房产管理局，石码砖瓦厂送给平宁大队，陈老先生的校产任人瓜分，香港集友银行接管后，上海、厦门集友银行也相继于 1972 年接管，汽车、大批进口镀锌管与木材 800 多立方米被各单位分光，陈厥祥先生私人的珠宝与进口小型发电机也未被幸免，由市无线电台拿走，一时乌烟瘴气，一片凄凉景象。我受种种罪名，关押在暗室内与外隔绝达 3 年之久。

（二）1980 年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否定文化大革命指示后，国务院侨办非常重视集美学校平反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首先恢复香港集友银行与私立集美校委会的关系，决定撤消 1968 年的委托书，指派张其华，

陈朱明为股东代表。张其华，陈朱明，旺明坤三人为董事，经旅星族亲的支持筹资 140 万港元，合资 400 万赎回中行退还股权，保持集校股份比例恢复四十保升。

（三）1980 年 8 月国务院侨办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集美校委会与工业理事会问题，发布会议纪要（80）侨政字第 074 号文，第 4 份云：

“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建议陈嘉庚先生生前创办的集美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福南大会堂、碑林、游泳池以及工人俱乐部逐步归还校委会。由该会管理。这样有利于集美学村的统一管理和团结海外华侨。”

但是校委会已被个别别有用心领导者控制，将校委会列为“统战机构”抵制上述指示。提出种种借口不予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故 1981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侨办（81）侨政字第 010 号文再三强调：

“我们意见，集美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福南大会堂仍应收归集美校委会，这“三馆一堂”乃陈嘉庚先生生前所创建，唯属公产，但一直归校委会管理，至文革中才由其他单位使用，因此无论从落实侨务政策还是尊重陈老先生遗愿，都应予收回为好，这样做有利于团结海外广大华侨。”

（四）尽管国务院侨办三令五申，再三指示，可惜集美校委会仍被文革后期投靠造反派的个别领导人所把持，为了进一步夺权，对于敢于坚持主张落实政策，要求为陈老先生平反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对中央采取阳奉阴违，不惜违背陈老先生生前意愿，却打着陈老先生旗号，排斥异己，挑拨离间，造谣诽谤旅居海外族亲，甚至运用权力篡改集美校委会“私立”性质，最后采用市政府行文委派主任，副主任，没有委派委员，致使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成为没有“委员”的委员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我自 1980 年出任香港集友银行股东和董事，5 年期间，他们开始采用欺骗，后来施加压力，造谣诬陷，阻挠我来港，致使我无法参加历年董事会执行我的任务，完成我的使命。

综上所述，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一定要保存“私立”性质，这是陈老先生生前意愿，不容任何人篡改。集美校委会所管辖的公共事业单位，是集美学校重要组成部分，文革中被瓜分，接管事件应予彻底平反，落实校务政策，恢复陈老教育遗业原貌。

香港集友银行文革中由中行接管事件也不是孤立的。这也是因国内文革中发生反党的侨务政策而导致香港中行接管的错案。现在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真正维护陈嘉庚先生的教育遗业。这正是目前引起这场产权争论的焦点。执行党的侨务政策，是关系到党的威信，关系到要不要团结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和热爱祖国的华族人们。

我所以发表上述实情，并不是为自己推卸责任摆脱两次签字的罪责，也不是向自己面上贴金，或以祈求原谅，而是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因为我是签署委托书的当事者，也是受害者。追溯 8 年追随陈嘉庚先生受到他的“爱憎分明，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的熏陶，良心责备，谨此向坚持正义，为维护陈嘉庚先生教育遗业的人们表示忏悔。我坚决共同与广大热爱母校校友们和关心教育的海外华侨、华族人们争取陈老先生爱国教育遗业得以完善保存。这就是我的立场与愿望。

陈朱明

1988 年 2 月 22 日于曼谷

《联合早报》1987 年 11 月 15 日载：

在港集友银行股权减半集美校友
陈嘉庚后裔向中国政府争取归还

散居在本地的集美校友和陈嘉庚的后裔对香港集友银行的股份问题仍未妥善处理感到不满。他们认为，集美学校在文革期间的冤情现在已经平反，但与集美有密切关系的集友银行问题却仍悬而未决，这是不对的。

香港集友银行是在 1947 年由陈嘉庚所创办，他创办这家银行是希望在厦门所办的集美学校能有长期的经济来源，达到“以行养校”的目的。

1950 年，在陈嘉庚的促成下，由陈六使、李光前和李引桐等捐出港币 170 万元，以集美学校基金的名义参股集友银行，使集美学校在集友所占的股份达 80%。该行并由陈嘉庚次子厥祥管理，担任总经理，厥祥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克承继任总经理。

1966 年文革发生后，集美校委会代表被迫签字，委托香港中国银行管理集友银行，过后并由集友银行董事会追认核准。

文革过后，中国政府命令将集友银行股权归还给集美学校，但在 1980 年移交时却发现，集美原来在集友银行所占的 80% 股权已降至 26%，后虽争取，其股权也只增到 40%。

原来人们发现在这托管的 12 年间，香港中国银行以托管人的身份注入资金，成为集友大股东。目前，集友银行是香港中资集团中的一家银行。

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在本地的一些集美校友和陈嘉庚的后裔认为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集美校委会现既证明是被迫签字要求中国银行托管，以托管人的身份进而变成大股东，依情依理不合。

其次，在接管后，香港经济的确困难，但集友并未发生过挤兑，它的大厦还刚刚落成，并且还扩展业务，退一步来说，如需要增资，也应该征询和尊重创办人的意见，并考虑当时集友银行的庞大不动产。

据陈嘉庚的一位亲属指出，事实上，从下令接管到注资参股，这些都是文革所造成的，黑白是非是很清楚的，只是现在有人却以某些托词来为当时这种不合理的行为辩白。

这些为集友银行问题而奔走的人士指出，这件事应该加以解决，主要是因前人花上许多心血办教育，这些教育事业的利益不应受到侵占。事实上，集美学校现在完全由中国管理，即使中国银行归还集美应有权益，对中国的利益是丝毫无损的，这些为集美校产奔走的人更是丝毫沾不到好处。可是，这却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据所知，这些有关人士决定不放弃努力，他们正在考虑以不同的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争取事件获圆满解决。《联合晚报》1988 年 6 月 3 日载：

集友银行事件的真相

张立

本报周前推出“集友事件”专题报道。虽然，集友银行的股权争执问题

是发生在香港，由于它涉及陈嘉庚的教育遗业，因此备受海外华人的注目。

为了使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我们转载《香港信报月刊》（4月号）的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和立场来分析此事件。

近几个月来，有关集友银行股权争论，在香港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波。集友银行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侄儿，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及香港集美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庄重文提出，1968年夏天中国银行托管集友银行以及后来中国银行注资参股，并成了大股东的行动，均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的产物，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拨乱反正，恢复集美学校在集友银行中大股东的地位。

香港集美校友会并成立“维护陈嘉庚教育遗产特别委员会”于2月4日发表声明指出：“1968年发生的香港集友银行接管事件，导致了后来集美学校拥有之集友银行股份锐减，这是文革极左祸害造成的久悬未决的重大事件。”

“我们深信祖国政府将会迅速、妥善地纠正这一文革祸害所造成的错误，彻底落实侨务政策。”

对于这一要求，香港中银集团持慎重态度，至今未有正式表态。但集友银行现时的负责人则表示，1968年中国银行代管集友银行并非强行接管，而是因集友银行本身发生经济困难，是当时集友银行的负责人主动要求中国银行支持。中行由于维护集美学校利益，发扬陈嘉庚热爱教育的精神，支持集友银行而参与托管，此后中行加股也是应集友银行董事局力邀，在因无人愿意增资而无法达到香港政府条例的规定情况下，中行以高于实际股价一倍的友谊价格参资，以保证集友银行的运作。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时间已过去20年，一些当事人除少数外，大多或谢世或离任，这段历史公案难以断定，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文化革命期间，又涉及被称为“华侨之光”的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友银行，这件事不弄个水落石出，是无法向海外华侨交代，特别是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的今天，这场在香港发生的争论，确实触及到超出一家银行股权之外而成为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

因为倘若当年中国银行果真是用文革手法并吞集友银行这一在香港存在的私人华侨产业，而在北京政府三令五申要落实华侨政策、发还文革期间强占的侨产的今天，北京政府还不恢复集美学校在集友银行的地位，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北京落实华侨政策全是空谈，从而动摇海外人士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如果当年中行确实是出于挽救集友银行的动机而注资集友，处事合情合理合法，而今却因受到不明真相人士的压力，在求“稳定繁荣”的借口下不惜用行政干预手法要中国银行拱手交出股权，用中国银行的钱去贴集美学校，也与现时“开放政策”的原则背道而驰，那也会引起香港商界人士的信心动摇，认为北京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干预经济的框框，而这种做法正是违反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精神。

三大关键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决好集友银行股权的纷争，唯一的办法是心平气和地对集友银行这一个案进行具体分析，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集友银行股权纷争中有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关键问题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自可大白。

第一个关键问题，1968 年前后集友银行是否真正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如果当时集友银行并无出现经济困境，就不存在要求中国银行或者其他任何财团援手的需要。如果集友银行并无经济困难，1968 年北京派员到集美学校，要负责人陈朱明签发文件请中央代管集友银行，那就是完全非法的文革行动；但相反，如果当时集友银行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并主动要求中行代管以渡过难关，那么，中行的代管则是对集友银行的援助。北京派员到集美学校要求负责人签发文件即使态度粗暴，也只是方法问题。因而 1968 年集友银行是否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成为考察中行委托集友银行是否合法的关键。

第二个关键问题，中行 1968 年代管集友银行，1970 年则参资 500 万元购进集友银行 50% 的股权，成为大股东。中行由代管人成为股东的过程是否合法？中行是利用权力强行收购，抑或是应集友银行董事局的要求进行收购？中行所出的价格是否合理？这是第二个关键问题。

第三个关键问题，集友银行从 1970 年的资本额 500 万港元到 1987 年增加至 3 亿元，在增资过程中，中国银行与集美学校之间的股权比例有所变动，在股权的变动过程中是否一切依法办事，抑或有大陆行政干预行事？这是判断集友银行股权纷争的第三个关键问题。

集行有财政危机

对于集友银行在 1967 年至 1968 年是否有严重的经济困难，辩论双方各执一词。集美校友会永远名誉主席庄重文先生表示：“必须指出，香港集友银行在克承担任总经理期间，并无发生财政困难，亦无发生挤提危机。相反，在经济不景，社会动乱的 1967 年，该行总行迁入自置的集友银行大厦办公，同年还先后设立两家全资附属公司。所谓陈克承办事无能，经营不善，导致请求中国银行援助云云，纯属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翻。”

但现任集友银行董事长陈光别先生在《四十年历程回顾》一文中则说：“1965 年香港发生银行风潮，随后于 1967 年、1968 年又发生经济不景气，地产业下跌，对一些小规模银行的经营，构成极大困扰，集友不免受到波及，面对此艰险局面，陈六使董事长、李引桐、陈克承总经理及其他董事均十分担心，为了渡过这难关，董事会考虑了各种措施，包括邀请外人加入我行，我不禁想起 1964 年赴京时，明理兄意重深远地叮嘱：‘光别兄，你千万要告诫克承，若银行有困难时一定要背靠中国银行，要紧记其祖父在新之事业受某外国银行催迫致垮的惨痛教训。’大家经一番琢磨，遂决定请香港中国银行援助。”（《香港集友银行创办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由于时间过去 20 年，记忆已经模糊，且除了当时银行的最高层人士外，局外人士是无法了解一家银行的内部经济状况的。所以不能凭主观臆测去下判断，及作为论据。

笔者在了解这一事件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 1966 年 9 月政府委托香港“黄秉章、陈乙明会计师楼”到集友银行查账。

原来 1965 年香港出现银行风潮，广东信托银行因挤提而倒闭，造成存户血本无归，震动了香港的金融业及整个社会。于是政府决定加强对银行的监管，特别对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银行实行查账。当时被政府派员查账的有两间银行，一家为“有余银行”，一家即为“集友银行”。有余银行在经

政府查账之后，发现呆账大，撤账后引致股本不足，要求其股东增资，由于该行股东无法增资，结果该银行于 1966 年倒闭，客户存款分多年摊还。

至于集友银行 1966 年 9 月香港政府委派“黄秉章、陈乙明会计师楼”代表政府查账，1967 年 4 月具体负责的陈文裘会计师要求银行提存 360 万呆账准备，故当时集友银行的财政状况如表一所示。

表一 1967 年集友银行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股本	500
资本储蓄	4
法定公债	130
累积盈余	1
资产净值	635
呆账储备	360
调整后资产净值	275

资产负债表显示，集友银行在 1967 年 4 月的

实际资产净值只剩下 275 万元，已经不符合银监处规定的银行法定最低资本额 500 万元要求。于是香港政府马上要求集友银行董事局迅速填补 230 万元，否则集友银行只能步“有余银行”后尘，走上倒闭之路。

为了挽救集友银行，当时董事局几位董事只得拿出私人物业及私人股票作担保，这包括陈六使的 50 万港元定期存款，许志平（许达三之父）私人物业担保 100 万元，陈光别用私人股票担保 100 万元，共 250 万元暂时渡过这一难关，避过倒闭的厄运，但坏账包袱及资金不足的困难却未解决。

这份政府调查报告证明了集友银行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如不抢救前途堪忧。

呆账大中行迟疑接管

由于到 1967 年集友银行的资本净值只有 275 万元，亏损近五成。加上从 1965 年到 1967 年存款下跌近 25%，而当时大陆正搞文化大革命，香港因“暴动”而烽烟四起，经济极端不景，集友银行的股东对银行的前途十分担忧，从 1967 年起即四处找人增资集友银行。其中成数比较接近的印尼华侨巨商傅祥霖，条件基本谈妥，但最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协议。

但不要忘记当时的背景，60 年代的香港与现时大不相同，现时一个银行牌会有多家争夺，但 60 年代银行牌则申请不难，那时香港尚未形成金融中心的雏型，一家有严重经济困难的银行牌照并非奇货可居，相反是不易找人接手。实际上，1967 年集友银行的前任董事长陈六使以及李引桐，陈光别等人已和中国银行接触，要求中国银行出面代管及增资，但当时中国银行的反应是愿意提供援助，但未允代管，主要原因是中行认为集友银行的呆账比例大，代管及增资要付出代价，在经济上不合算。直到 1968 年，在多次磋商之后，香港中国银行将集友银行董事局的要求及集友银行的经济状况打报告请示北京，最后北京批复，为维护陈嘉庚先生热心教育精神及集校权益，要中国银行出面代管及支持集友银行。

支持集友体现周恩来路线

写到这里又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人们会问，当时正值文革高潮，中国国内打击华侨，没收华侨产业唯恐不及，怎么会发生为维护陈嘉庚的声誉而挽救集友银行的行动呢？集友银行事件的复杂性就在于中行代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一想起文化大革命，就会想起迫害华侨，没收华侨财产，无法想象北京还会维护陈嘉庚声誉。然而，文革本身亦是极复杂的事，既有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行动，亦有周恩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家民族保存一点元气的斗争。周恩来对陈嘉庚素来尊重，陈嘉庚的事，事无巨细，周恩来均直接过问亲自解决，陈嘉庚生前死后都是如此。1968年，周恩来还是国务院总理，虽然“造反派”也企图夺国务院的权，但外交，侨办及经济三个领域，周的影响力仍巨大，当年北京批复中行以维护陈嘉庚的声誉为出发点支持集友银行，这显然是周恩来的华侨政策的体现，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对“四人帮”打倒一切的对抗。

1968年11月，中国银行代管集友银行，1970年4月24日，中国银行注资500万港元购进集友银行50%股权，成为集友银行大股东。而原来的大股东集美学校基金会从原来占76.6%的股权下降为占38.25%股权。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银行由原来的代管人变为大股东？中国银行所出的股价是否合理？这是集友银行事件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上文所述，集友银行在1967年因呆账所累，资产净值只剩下275万元，低于当时银行条例法定最低资本500万元之数，后来由几位董事，用私人物业、股票作担保，才凑足500万元。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集友银行的亏损状况仍然存在。到了1968年，呆账仍有336.9元，仍然要依靠陈六使等人的私人财产担保度日，未扭转亏损局面，当时的资产净值为225万元，大大低于政府的500万元最低资本的底线。

然而更严重的考验还在后面，因为香港政府鉴于1965年银行风潮，1967年4月28日通过的新银行条例，其中第八条A项“实收资本少于一千万元的任何公司不得获发银行牌照”。也即是说，银行的最低资本额从500万提高到1000万元。该条例于1967年11月实行，但可给予过渡两年，也就是说1969年底正式实施，届时任何银行，没有1000万资本额就被取消牌照。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说明为什么1967年集友银行的负责人已四处找人增资，因为500万元之数尚未凑足，二年后又要增至1000万，他们当然着急。1969年底，到了要集足1000万最低资本额的最后期限，但集友银行尚未解决这笔款项，于是集行向港府申请延期几个月执行，得到港府同意。集友银行于1970年2月25日召开董事会，由陈光别董事长提议增资500万，并于1970年3月26日正式书面通知各股东。

招股反应冷淡

1970年3月26日致各股东的增股信原文如下：

“根据我们董事会1970年3月25日决议：‘我们注册资本港币一千万元，共分为十万股，每股港币一百元。实收资本港币五百万元，共分五万股，

每股港币一百元。现为再配合业务上需要，应该未收足资本港币五百万元如数收足。

兹拟定认购办法如下：

一、各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其认购股额超过其持有股额者，作为新股东办理。申请认购书，应于本年4月15日前送达本行。逾期当弃权论。

二、各股东可介绍其新友认购，应事先申请，经本行董事会认可，核准后，按新股东手续办理。

三、本行接受认购资本总额港币五百万元，共分五万股，每股港币一百元，先由现股东认购，如有不足，始得接受新股东。总额仍以未收资本收足为止。”

这份招股书很重要的一条是第三项中指明：

“先由现有股东认购，如有不足，始得接受新股东”，这是对原有股东利益的保障。但到截止认购时，只有两位股东认购1050股，其余的均无意认购或无力认购。

一方面是政府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额为1000万元的最后期限已近，另一方面无人愿意增资参股，怎么办？现任集友银行董事长陈光别（也是当时的董事长）说：“董事局同人不愿坐视陈嘉庚手创事业结束，于是与中国银行洽商，中行本着友好及支持的态度，虽在集行资产净值低于账面值的情况下仍按账面值计算，投资五百万元，此举……”（此处复印件不清晰——本书作者）。

中行以账面值价格认购

中国银行当时出资500万元，收购集友银行50%股份，中行出价是否合理？

当时中行曾衡量集友银行物业资产值与账面值相若。当年物业账面值如表二所示。

表二 物业资产值

（单位万元）

集友银行大厦（地库至2楼）	350
集友银行大厦3—16楼	450
湾仔星街3号	18
红磡分行	50
北角英皇道390号地下	42
总计	910

当时集友银行只有2家分行，并非有人所说的12家分行。而中行也证实了当时市值与账面值相若。

1969年底，集友银行资产净值（包括所有物业价值在内）为252万，与账面值500万元相比少了五成。亦即是说，如按正常在商言商的生意原则，按资产净值计算，中行只要出250万元，即可买到集友银行50%的股份。但这次认购中，中行是出资500万元去买50%的股份。亦即是说，虽然集友银行的资产净值低于账面值，但中行仍然以账面值的价格去认购。

从1970年中国银行加股集友银行后，分别在1978年、1982年及1987年又有三次增资行动，这三次增资导致中国银行与集美学校之间股权比例有

所变动。这三次增资及股份变动过程是否合法，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是否合情理，这是评论集友银行事件的第三个关键。

以千万元公积金注资

首先要指出的，1978、1982 及 1987 年三年增资，均是由于政府银行法例规定提高资本额所引致的，并非任何一方为自己的利益而提出。

1978 年为中国银行参股后的第一次增资，因政府银行法例规定最低资本额从 1000 万元提高到 3000 万元，即是要增资 2000 万元。而集友银行在中国银行参股及托管后，已转亏为盈，大约在 3 年左右已冲掉全部呆账，为渡过难关，陈光别等几位董事提供的私人担保也已撤回。而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集美学校尚未恢复与集友银行的联系，中行为保证集美学校的利益，增资 2000 万元，约 1000 万元是用银行盈利公积金拨入，不足部分由中行补足。而集美学校的股份，相应由原来的 38.25%，下降至 26.59%。要注意一点是，中行当时是大股东兼代管人，在集美学校无能力注资的情况下，中行大可以独立注资 2000 万，而不是动用公积金，如果这样做集美学校的比例会更少，以内行人眼光看，中行此举还是很厚道的。

二、平均存款利率贷款维持学校四成股权。第二次增资为 1982 年，这时政府再次修改银行法例，最低资本额从 3000 万大幅增至 1 亿港元。而这时集美学校已恢复与集友银行的联系，于 1980 年委派代表参加董事局。

由于这次增资幅度很大，需要注入 7000 万元现金，增资两倍半，这对非盈利的集美学校来说无疑是难题，如果中国银行依照正常手续来做，不给予“特予照顾”的话，集美学校 26.9% 的股份会下降到什么比例？这不难算出。

而这次增资，集美学校的代表向中国银行书面提出要求，希望在不拿出现金的情况下仍能占 40% 的股权，双方经协商后中国银行同意予以支持，以达到集美学校拥有 40% 的权益，中行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将公积金作红股派发；将部分资产重估作为红股派发；集美学校在获得上述红股后仍不足数额，中行借款给集美学校补足，贷款利率以银行的“平均存款利率”计。

银行贷款不是用贷款利率计，而是用“平均存款利率”计，相信是少有的例子，因为这等于说用银行拿钱津贴，因为存款利率，有定期存款，有活期存款，有支票存款（支票存款是无息的），平均存款利率肯定是低于定期存款利率。任何人如获得“平均存款利率”的贷款，再把这笔钱存“定期存款”大可赚其利息了。

三、增资至 3 亿，定例资助学校，集美学校拥有集友银行 40% 的股权一直维持到 1986 年底。到去年，即 1987 年，因 1985 年的银行风潮，政府实施风险资产比率的新规定，要求银行增加资产比率，同时为拓展银行业务需要（银监处严格要求一个集团贷款不可超过资本额的 25%），中国银行与集美学校协商后同意将资本额增至 3 亿元，在这次增资行动中又同样碰到一个问题，即集美学校无现金认购。怎么办？一种办法是中银继续以“平均存款利率”贷款，但 2 亿元的 40%，已是 8000 万港元的巨款，中国银行也是一个商业单位，这也必须有经济核算，很难长期津贴；第二，即使中银同意贷款，但非盈利的集美学校只能用集友银行股份的收入每年冲账，集美学校保持 40

%的实股，这等于说集美学校长期分不到实利。经过中国银行与集美学校之间协商，集美的股额先由中国银行出资认购，以凑足2亿元股本，但集美学校可随时买回股本，占40%的权益，亦即是说，如任何人士愿出资为集美学校出资，现时即可购回股份。在1987年增资至3亿元后，集美学校的股权为23%。

为了照顾集美学校的利益，中国银行同意从1987年起，在集友银行应派股息中，先提取10%以赞助集美学校作为教育基金，其余部分按比例分配，使学校能得到实益。预期今年会有100余万港元额外收益。而随着银行业务的增长，集美学校可望每年获益。

在三次增资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1980年集美学校恢复与集友银行联系后，集美学校方面希望保持有40%的股权，新加坡陈嘉庚的侄儿陈共存带头集资140万购回部分股权，该140万中，有30万是陈共存个人捐给集美学校，而其余110万是无息贷款，后在集友银行盈利分红中冲账。

陈共存为新加坡侨领，是陈嘉庚后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乃有伯父之风，这次捐30万元给集美学校并无任何声张。由于他本人急公好义，颇得集美校友尊敬。

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上文基本上是依实际资料撰写的，通过这些资料，大家已可了解集友银行股权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仍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待探讨。

一、陈朱明迫签事件。陈朱明为集美学校负责人，1968年7月25日，是由他代表集美学校签字委托中国银行托管集友银行。陈朱明表示，当时他本人已被揪斗为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改造。……（此处复印件不清晰——本书作者）。“霸夺”集友银行的人士视为问题的关键。

笔者有如下看法——如果集友银行在1967年不存在经济困难，集友银行当时的负责人陈六使，李引桐，陈光别等人也没有主动要求中国银行援手，那么，“迫签”自然是关键问题，是中行利用文革非法手段霸夺华侨产业，必须马上平反，退还。但如果集友银行当时确有严重困难，是主动邀请中行援手，那么“迫签事件”就是方式方法问题，因为并非这件事导致中行代管集友银行，而是集友银行本身的内部原因所致。但必须指出，处理陈朱明事件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是文革的极左行为。但又必须说明陈朱明入牛栏及挨斗，并非是因香港集友银行的事，而是文革的所为。而实际上，自1947年香港集友银行成立以来，福建集美学校名为股东，但一直没有过问香港集友银行具体事务。

表三集友银行及集美学校资产净值

年份	集友银行 资产净值 (万元)	集美学校 所占股份 (%)	集美学校 实际资产 (万元)
1966 年	252	76.45	192
1970 年	833	38.25	319
1978 年	4,271	26.59	1,136
1982 年	14,767	40	5,914
1987 年	43,500	23	10,000

*1987 年业务未公布，资产净值只能估计，但集美学校实际资产
产到 1987 年达 1 亿港元的估计应接近事实。

二、1968 年集友银行并无 12 家分行，只有 2 家分行，一在北角英皇道 390 号，一在红磡，另一物业为湾仔星街的宿舍，至 1987 年，连总行及厦门分行在内是 13 家。

三、固定资产估值，按仲量行估价，1970 年集友银行的物业市值为 900 万港元，并非 2 亿元。

四、股份比例下降实际收益增长，集友银行资产净值从 1970 年的 252 万港元到 1987 年初（未增资前）估价 2.5 亿港元。集美学校所占股份从 1969 年的 76.45% 下降到 1987 年（增资后）的 23%。但实际资产却从 192 万港元上升到 1 亿港元。

表三为历次资本增资中集美学校股本及实际收益的变化。在 17 年时间实际资产增长 50 倍，平均每年资产增 2.9 倍。

集美学校除股份外，每年可获派息总额的 10% 的优先资助。

笔者在亲自了解集友银行股权事件之前，在感情上是倾向于支持集美校友会的意见的，一来是出于对陈嘉庚先生的崇敬，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在那个年代，极左横行，冤狱遍于中国，迫害华侨，强夺侨产司空见惯，因而很自然联想，侵占集友银行的股权是不足为奇的事。

但经过一番的调查，发现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集友银行事件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因为这一争论涉及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说简单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香港，发生在银行，因而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账本、会议纪录都会保存归档，而且某些资料政府处也有纪录，这些材料自可清楚地说明事件真相。

笔者认为集友银行事件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是因为多数人不明白这件事件的来龙去脉及真相，而文革中许多不合理的做法亦使这件事的原委蒙上政治色彩，使其复杂化。要拨去种种外在的掩遮，还其本来面目何其不易，从这个角度说，这可说是革命的后遗症吧。

关于香港中国银行代管
参资香港集友银行的历史情况

香港集友银行董事长 陈光别

这两个月来香港一些报章杂志均刊登一些关于集友银行股权的文章，引起了关心集美学校的海外华侨及港澳各界人士的关注。本人虽身居新加坡，

也看到这些报道，也接到不少友好的查询。本人承蒙厥样兄错爱，于 1950 年加入集行董事局，并于 1973 年在第一任董事长陈六使先生身故后接任董事长至今。我虽一介商人，才疏学浅，但于任内每逢银行开会均赶往出席，竭尽所能，以期免污职守。集行创办至今已 40 年整，当年创业者六使先生、厥样兄均身故，现只剩下我与引桐兄两位，期间从艰辛经营至稳步发展，相信也只有我们两位当事人最为清楚，也可说是集行发展的历史见证人。集行近 20 年来的业务发展，董事局同人深感满意，也堪告慰陈嘉庚老先生当年创办的崇高旨意，但现竟有些人侃侃谈论集行当年事，引起各界人士议论，我身为当年当事人，深感有必要提供一些当年事实的经过，故于今次来港前先往泰国探访引桐兄，我俩共同回忆当年事，现将事实经过忆述如下，以敬告关心集美学校的各界人士。

香港集友银行是陈嘉庚先生在 1947 年授命其子厥祥创办的，目的是希望以银行的盈利辅助集美学校的经费（其组织与原厦门及上海集友银行是完全分开的），始创集行的资本只有 10 万元，不足应付业务需要，1949 年再由陈六使、李光前及本人与几位热心教育人士募捐及投资 90 万元参股，翌年再由李引桐经手募捐 100 万元，至此资本共达 200 万元。

1964 年香港政府颁布银行法例，规定最低资本额为港币 500 万元，集行以重估资产增资 250 万（包括现时总行大厦地皮在内），另再招集新股 50 万，共凑足 500 万元之数，以符合政府之规则。

集行创立的最初 22 年，业务发展不大，盈利微薄，期间只派发 5 次股息，集校分得 40 多万，难以达到陈嘉庚先生每月给集校 1 万元的愿望，为辅助学校费用，当时集行每年发给学校的款项均以集校挂欠账项处理，至 1968 年时集校挂欠达 130 多万元，事后成为一笔呆账，在中行参与管理后 3 年始用银行的盈利冲销。1967 年香港发生银行挤提后，香港银行业管理处到集行检查，要求对放款加提呆账，准备近 300 万元（其中包括集校挂欠 130 万元），由于集行盈利累积只有 4 万元，无法应付，故由陈六使、许志平及本人提供私人产业、股票及定单作为上述呆账的担保，始符合最低资本额规定（这些银行账册中均有详细记录）。眼前困难虽勉强度过，董事长陈六使先生仍对经营前景深为焦虑，并多次出晤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寻求援助，于 1968 年中再偕李引桐及我来港与中国银行进一步洽商后，又经厥祥嫂同意，并办理了必要的委托手续，按校委会授权指示，由当时总经理陈克承亲手将集美学校名下的集行股票移交中行。陈六使董事长并于 1968 年 11 月 2 日召开董事会，正式接纳香港中行代表集美学校参与集行的经营管理。事后陈六使董事长于 1969 年 7 月 24 日曾至函香港中行负责人廖生东、李琢之两位先生云：“蒙台端大力支持，使此次集友银行董事会顺利完成改组，其基础达于稳固。前途变得光明。至感至慰。”当时中行除派四位人员担任经理及稟理协助管理外，集行原有职工照旧留任，总经理一职，仍由陈克承先生担任，董事会并拟聘其为副董事长，奈陈克承坚以彼身体健康及个人事业为理由，决意告退，不但各人费尽唇舌挽留，港中行廖生东总稽核也致函陈六使董事长请其助喻陈克承留任，至少也要继续参加董事会。陈六使董事长发函谓：“港集行……纯为辅助集美学校经费而创立，今克承君不欲处其祖先遗志，继续担任职务，实有未妥，然士各有志，强之非益，敬请台端置董事会诸公对其遗缺另作安排。”陈克承终于 1969 年 6 月辞去董事及总经理职务，而厥样兄之长女，本行董事之一佩贞女士，至今仍留任副总经理，其婿胡赐明助理总经理，其弟

陈博清也一直继续在集行服务。

1970年，香港政府再次修改银行法例，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额为1000万元。为符合法例要求，集行于1970年2月25日召开董事会，本人提议增资500万，由各股东优先认购及可介绍亲友认购。该建议获李引桐董事和议，众议通过，并于翌日由本人签署增资函件分发各股东，但于认购截止时，绝大多数股东均无意或无力再注入资金，董事局人不愿坐视陈嘉庚先生手创事业这样结束，于是与中国银行洽商，中行本着友好及支持的态度，虽在集行资产净值低于账面值的情况下，仍按账面值计算，投资500万元，此事并于1970年4月24日由集行董事会决议通过，集行遂正式加入中银集团。

在文革期间，集校受到一定冲击。文革后集校组织机能逐步恢复。1980年初集校校委会认为该会已可委派代表直接参与集行董事会工作，并于1980年3月1日去函中行北京总行要求撤销1968年对港中行的授权委托书，并授权庄明理、张其华、陈朱明三位代表参与集行董事会工作。该撤销委托通知于1980年6月23日由中国银行总稽核室通知港中行执行，其后集校代表即直接参与集行董事会至今。

集行自改组后，业务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1969—1971年间，除以盈利冲销前期呆账外，同时退还董事私人担保呆账之抵押。由1972年至1986年15年内，每年均有派发股息，集校分得股息1362万，获派红股5524万，得利益6886万元。由于香港政府法例规定提高实收资本额，在原有股东无力增资的情况下，由中行投资参股，集校股份比例相应下降，这也是必然的，但并无损集校权益，反而大有得益，多年来集行多增资均为符合银行法例的规定及配合业务发展之需要，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议决，按照香港法律来办理，同时在法律允许下尽量兼顾集校利益，给予适当优惠，就以每年增资为例，董事会提议由1987年起，每年从应派股息中先提取10%捐予集美校会作为教育基金，同时规定：集校可随时拿回今次增资因无资金认购而暂由中行代购的股份，足见全体股东对集美学校之重视，对陈嘉庚先生之崇高敬仰。

集美学校自新中国成立后，即由人民政府承担所有经费，学校由政府管理，已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校，而集友银行也由中日银行参资及管理，业务稳步发展，当年捐资及参资创立集友银行的海外华侨看到此情景，亦感欣慰。

集友银行日常的业务，都是由于全体员工之能深明大义，在中国银行管理之下，齐心协力，克尽职守，在我任职期间内，我对银行全体人员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我谨便在此，向他们致谢。

第十一章 涉越险滩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

“德顺”不顺

德美行属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产业根本归属于一个家族。要保证产业最终属于一个家族，就必须使之具有代代相传的延续性，如香火不断。然而，有很多华人家族企业从上一代向下一代历史地传递“接力棒”的时候出了大问题，“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的例子何止千万！这样的例子实在令人不忍枚举。

很自然，也有不少华人大亨在将其庞大产业王国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时候，整个过程进行得很理想，以至于下一代继续上一代事业的“衔接”过程极为平缓，顺利交接。比如新鸿基地产主席郭得胜在安排家族第二代接班人上就很顺畅。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组成了新的“三驾马车”，事业欣欣向荣。

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于1989年宣布退休，郑家庞大的地产王国帅印由其子郑家纯接掌。开初，郑家纯虽显示出英年气盛，却操之过急，受过几次挫折。不过，后来还是能够很快出奇制胜，安然渡过难关，完成家族产业的顺利交接。

新加坡李氏（光前）家族、胡氏家族，香港李氏（兆基）家族、李氏（嘉诚）家族等都经过了或正在稳妥地进行交接过程。

德美行的老板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培养接班人的战略考虑，并让其长子李竞达出任德顺行的董事长，以图让他迅速成熟，子承父业。可惜，“德顺”不顺，最终以破产告终，使德美行也受到连累，险些将李引桐用一生的心血苦心经营的家业断送。

说到德顺行，必须先从李竞达和陈川胜两个人以及有关他们的一些故事讲开去。

让我们先从李竞达这边说起。

1939年4月9日，李引桐的大儿子李竞达呱呱落地。作为李家第一个男孩，他的降生，无疑给整个家族平添了欢乐，带来了希望。

李竞达天生聪慧，资智甚高。小学时代，他刻苦学习，兼读于英、华两所截然不同的学校。为了打好基础，他经常得先到英文学校学习，下了课又匆匆赶到华文学校，故而每每迟到。但他竟然能够同时在两所学校完成学业，自小就打下了中英文的良好基础。

他不独学业优秀，体育更为拔尖，尤其在羽毛球项目上极有天赋。以下的赛事罗列足以证明之。

1954年，他参加马来西亚檳城羽毛球少年比赛。

1955年，参加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同年，随家迁往新加坡。

1957年，获得新加坡中学羽联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全新乙组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双料冠军。

在羽毛球比赛的生涯里，他曾击败过许多世界级的羽毛球选手，并成为

羽毛球健将。他还多次出国参加国际羽毛球比赛，包括到中国参加羽毛球的比赛和组织工作。

80年代，他出任新加坡羽毛球总会会长、亚洲羽联秘书长等职。

1959年秋天，20岁的李竞达负笈英伦，就读于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物理学专业。

1972年，他以一篇题为“用超声波仪器研究液体合金如何协助原子炉的原子能发电”的物理学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他的博士答辩，被授予物理学博士学位。

在英国13年漫长的岁月里，李竞达不仅得到了他所为之努力奋斗的博士头衔，这位年轻人的整个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也几乎西方化。从李竞达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高深的物理学和科学的思辨给他带来的影响似乎远不及那13年造就他的西方思维惯力和生活方式。

1972年，学成归国的李竞达踌躇满志，他放弃了从事物理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投身商海。遗憾的是，他的经商道路与其物理学和羽毛球方面的成功却不能同日而语。

李竞达回到新加坡，先是从事鞋厂经理的工作。开始时经营业绩尚可，不久就不行了。当然，如果仅以一次成败来论英雄显然不公平道。

与此同时，李竞达的生活也出现了麻烦，婚姻出现裂痕，尽管父母竭力反对儿子把婚姻推向绝路，因为李引桐夫妇非常喜欢他们这位长媳。李引桐也清楚，李竞达的夫人可以辅弼丈夫做一番事业。偏偏自己的儿子在感情上出了问题，一切努力都没能发生作用。接着来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李竞达与妻子许白雪姻缘了结，以离婚告终。

感情方面的东西实在无法用理性去衡量。

生意不顺、情感失意、婚姻破裂等等，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原本也并非罕见的事情。到此为止，李竞达也并没有因此混灭其理想和志向。可能因为他实在过于聪明，他的思维常常出现一般人所跟不上的那种活跃和跳动。而对于普通人，面前站着一位物理学家、运动健将、富家子弟，还有一顶什么公司董事、经理之类的头衔，多数人总要仰着头来面对他。加之他本人属于年轻气盛一类，与普通百姓无形中就有了距离。

或许是书读得太多、学校呆得太久的缘故，他更多地具有了物理学家的那种“大胆设想”品性，却省略了真正科学意义上“小心求证”的过程。于是，他的想法与现实的距离越拉越大。他经常与人夸夸其谈之后，又很迅速地遁入他心爱的书堆，久久不能返回到现实。尤其在他鞋厂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之后，这种超越现实的心理倾向越发显著。

作为李家的长子，李引桐在潜意识里对竞达寄予了期望。其中不仅体现了深沉的父爱，还体现出李引桐将未来李氏家族大业的继承之厚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这样一种设想。

但是，竞达回国后的一系列表现，包括商业上的、婚姻上的、生活方式上的、与人交往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用心良苦的李引桐便经常带着他于左右，甚至李引桐与中国国家政要的会面，李竞达也不只一次地伴在身边。

70年代中期，李引桐还煞费苦心地把竞达带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去走了一圈，让他实地了解中国革命是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获得成功的。父子俩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走了长长的一截子。中国大西北的苍茫，那贫瘠的黄土地是怎样造就着中华几千年绚烂的文化和文明，那条日夜奔流的黄河是怎

样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中国革命的成功恰巧又奇迹般地在那里延续，在那里诞生。说起来有些意思，不管怎么说，李引桐是个资本家；不管怎么说，李竞达也是个少爷，而“资本家”却用了非常“革命”的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儿子，这怕是在任何一部词典里都翻不到的词条。

李引桐还带着孩子游了不少祖国的名山大川，带孩子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一切都在悄然无声中进行，一切都显得自然而不刻意。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如他所希冀的那样。

其实，李引桐真正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的人，他自己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毕竟人类无法拷贝、无法复制；毕竟时光在无情地流逝。父亲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去施教，至于能否生产出所期待的果实，只能拭目以待。

80年代初，李引桐飞往日本做生意，与往常一样，他带上了竞达。李引桐有一好友姓蔡，早先在台湾，后来去了日本。这位朋友的太太是个心理医生，在东京的一所大学任心理学教授。李引桐到日本少不了去看自己的好朋友。经朋友的盛情邀请，李氏父子就在姓蔡的朋友家里住了些日子。

一段时间的相处，蔡太太不但从各个方面了解到了自己朋友的爱子，而且观察到竞达存在着的一些心理障碍。出于职业性敏感，蔡太太对李引桐说，竞达非常非常聪明，但多少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障碍。她建议李引桐要尽可能地让儿子做事情，让他获得成就感，方能从现在的心理障碍中解脱出来，这样既可使他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找到自我，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超越。

李引桐觉得朋友的建议有道理。从日本回来以后，他就没有停止过琢磨这档子事，寻思着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让竞达去做。

当时李引桐的二儿子李竞敏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学成归国。李竞敏在美国就读的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现任台湾“总统”李登辉完全一样。说来倒有些意思。李竞敏一表人才，高大的个子，英俊的相貌，分明继承了父母亲的优点。李竞敏的独立意识极强，他不太愿意由父母来安排自己的未来，却喜欢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从美国回来后，竞敏在马来西亚做股票生意。小儿子竞成则在做鞋的生意。大概是由于李家长期从事橡胶出口生意和七八十年代鞋业生产和销售在国际上走俏，加上60年代国际上通行着一种“以商养工”的说法，李引桐也为之所趋，鬼使神差地将做生意赚来的钱拿去投到制鞋业上。李家从父亲李引桐到长子竞达、次子竞敏、三子竞成都从事过与鞋的生产和经销有关的业务。无奈，李引桐的制鞋行业做得并不成功，远不能与他的橡胶生意相提并论，充其量不过是花钱买个经历。

为了让竞达有一个事业上的追求，李引桐先是让他与三子竞成一起合作，让竞达出任鞋厂的厂长。怎奈兄弟俩的合作并没有像事先预料的那样和谐，鞋厂办得也不成功。

李引桐只好另择他途。

1980年，由于李引桐的外甥陈川胜从德美行出来，加之陈川胜又一直是李引桐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李引桐倾其心血欲培养的接班人。所以，陈川胜从德美行出来以后，李引桐为他另开一家公司，取名叫德顺行。开初，德顺行由陈川胜负责。

竞达与竞成的合作不成功，李引桐就想让竞达干一些别的工作。干什么呢？为这李引桐可是没有少费心思。后来他发现竞达与陈川胜还合得来，何不让两个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年轻人合着去做一番事业？

主意打定，李引桐满心欢畅。

经过周密的安排，李竞达坐上了“德顺行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交椅。

德顺行在刚刚开始运作的一段时间里，业绩还算不错。它虽没有做出什么商业上的惊人之举，到底也没有出现一开始便尴尬的局面。反倒是陈川胜表现出的那种商道上的稳健赢得了李引桐的欣赏。李引桐相信，总会有一天，德顺行能够异军突起，只是这一天会比人家预料的迟一些时间到来而已。

话说李竞达与弟弟竞成合作鞋业以不愉快收场，竞成自己在马来西亚有他热衷的事业，他也一直无意直接进入父亲的橡胶王国，李引桐也就依了他。问题是他的大儿子，一直是他的心病。

这个时候，远在日本的蔡太太的劝告蓦地又回荡在耳畔：“要让竞达有事做，使他有成就感……”李引桐是一个表面上很难体现父爱的人，因为，在他的树胶王国里，他是国王；在李氏家族里，他是家长。权威与尊严两边都需要。权威与尊严可能要影响他与孩子们的一般性交往，却更加增强了他隐匿于内心的对孩子们的爱，这种爱虽隐蔽，却非常深沉。这并非笔者牵强附会，在与李引桐的交谈中，谈及德顺行后来破产的结局，他并没有特别地动容，对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商场上的胜与败、得与失不过兵家常事；唯其言至对孩子的苦心和时间深沉的爱，他动容了。我所见到他为数寥寥的动情，总与孩子有关。他曾对笔者说：“钱赚来总要花，赚钱亏钱对生意人来说是常事，不足为奇。钱花在自己孩子身上，不管怎么花，不管花多少都是要花的。”

话头叙到这里，李竞达到德顺行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1985—1986年间，李竞达完成了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地域上的迁移，坐上了德顺行董事长的位置，与陈川胜并肩共事。

竞达在曼谷期间，曾邂逅一个叫阿旺的人，说起来，此人也姓李，系本家人，看上去也能干，大家觉得相处不错。川胜与竞达一谋合，决计聘阿旺到德顺行。于是，李竞达做董事长，陈川胜任副董事长，阿旺做经理，川胜之子出任财政总管。

角色分好，戏台搭起来，接下来应该到了上演好戏的时候了。

德顺行开头运作的大政方针都是由李引桐亲自制定或得到李引桐首肯后方才实行。不幸的是，李引桐于80年代初得了重病，医生甚至怀疑他得了绝症。此后又突遭脑溢血，虽经抢救，脱离了危险，身体从此大不及过去，瘫痪在医院，吃不能吃、动不能动，几乎坐以待毙。

李引桐是一个具有非凡意志的人，光看其一生两度中风，腰骨还进行过手术，可时至今日，以他83岁的高龄仍在工作，仍在世界各地旅行这一点就足够说明了。

因泰国医生对李引桐的病症无法确诊，他在病情稍微稳定后，就由竞达陪着到美国看病。在美期间，李竞达除了陪父亲以外，还时时不忘他的生意。他新官上任，想着要好好地大干一番，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瞄准国际市场，瞅准机会出击。李竞达在美国也有当年曾留学英国的一些相识同学，此次与父同行，自然少不了与旧友商谈生意，以谋求德顺行来日的发展。

当时他的美国朋友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好的点子，准确地说是机会，说是据他们所知在英国有一家拖拉机厂，因经营不善，债台高筑，被英国政府收购，将以低价出售。于是美国朋友就建议竞达将那个拖拉机厂买下，然后再作处理，从中可牟取大利，并建议与竞达合股做这笔买卖。

李竞达显然被他的美国朋友说动了心，决意做这个大生意。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李引桐不赞成，建议他慎重考虑，但李竞达似乎已经作出了选择。

恰在此时，李引桐手边有一笔闲钱，他就给了儿子。至于竞达向父亲借的那笔钱并不是德美行的，而是李引桐出卖他的一块橡胶园偿还因香港南宗公司（关于南宗公司之始末，详见下章）所欠李光前的债剩下来的。

1965—1966 年间，李引桐在香港开的南宗公司，因账务上的一些事情，最终与南益公司彻底分手。那么公司原先属于南益的那部分财产须归还南益。而李引桐曾向南益承诺抵押他的一块树胶园。

说起那块树胶园，可算是李引桐的一件心爱之物，它总计 1000 多亩，李引桐为大股东。当年李竞敏从美国留学回来，考虑到竞敏在美国学的正是农业经济，就想让他去负责管理那块胶园。

谁料竞敏无意于父亲的树胶管理，更想自己出来干。父亲也就只好强求。那块上好胶园就由一位老胶园经理管理。不久，老经理去世。物色更合适的胶园管理人员并不容易，况且南益方面又有债务在身，德美行正面临着内部的动荡和分化，公司的运作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真可谓是“漏屋偏遇连绵雨”呀。

从美国回来以后，李引桐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身体情况并未见好转。南宗方面的欠债，德美行出现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盘根错节需要理顺。最后，他决定卖掉那一块树胶园。

李竞达要向国际市场开拓的思路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积极的。问题出在他对所投资的项目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估。英国的这家拖拉机厂属于在各方面都面临穷途末路的一家破败企业，债台高筑，被国家收购。李竞达等人没有对市场及行情做出充分的估算，他更多地听信他的两个美英朋友的唆使就匆忙做出投资决定，其结果是用钱去填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

李竞达的 200 万美元一投进去，德顺行就陷入了一个拔不出来的陷阱。加之伦敦的代理经理又不谙商业，进而形成一种债务加剧的恶性循环，越欠越多。据说最后填进了 8000 万英镑。这个时候，竞达的美英朋友很快把债务包袱全都推卸到了德顺行的身上。

一时间，德顺行慌了手脚。而此时李引桐重病在身，基本上处于不能理事的状态。伦敦方面又不断地追债，迫使德顺行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决断。他们最后做出了提前卖期货的决定，以填补伦敦方面不断上升的债务。

谁料到，德顺行的期货到新加坡交易市场，当即就被扣押，成了暂时的一堆废纸，因为伦敦与新加坡方面从来就是一体的，德顺行在伦敦所欠的债被作为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对德顺行的期货进行了干扰。

德顺行更是首尾不能相顾。

如果到此为止，德顺行的领导者们能够团结一致，通力协作，还是可以渡过难关的。但是，由于阿旺本来与德顺行的关系就不像李竞达与陈川胜这样你我相融，他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仔”。公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公司，而是自己的利益。最后他做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抉择。如果阿旺仅仅是临阵逃脱倒也罢了，可恨的是，他还卷走了公司的大量钱财。根据后来的估算，他从各个方面骗走了德顺行的各类资产达 3 亿多铢。

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德顺行就被逼到了绝路，剩下的只能是宣告破

产。李竞达和陈川胜对他们眼前的道路已经看得很清楚——离开泰国，只能走这条路，没其他路可走。就这样，李竞达从泰国去了新加坡，陈川胜则回到了马来西亚。

回过头来看，德顺行倒闭的根本原因是卷进了那家英国的拖拉机厂，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公司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问题。具体表现在李竞达没有管理经验，甚至可以说不会管理；而陈川胜旁务太多，将更多管理上的事务交给阿旺，自己疏于管理。这样，一个不合适的大投资项目，加上管理上的漏洞，最终葬送了德顺行。

李引桐这下算倒了大霉，因为德顺行所有向银行借款的担保人不是别人而是他，加之，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是无处逃遁的。再说，德美行这个他惨淡经营几十年的大家当无法舍弃。他只好硬着头皮赔钱。据后来的统计，他为德顺行所赔的大笔款项如下：

新加坡中国银行 250 万美元

泰国大城银行 2.5 亿铢

泰国盘谷银行 2 亿铢

卖橡胶园款 1000 多万美元

其中卖橡胶园的钱除用于偿还南宗公司所欠李光前的 180 万美元，所剩下的 1000 多万美元也都搭上了。

德顺行的债务几乎把李引桐逼到绝境。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李引桐甚至准备将德美行卖掉。他还专门请了一家美国的债务清理和资产评估机构对德美行的财产进行了估算。按照李引桐的想法，将德美行卖掉，他就可以立即把所有的债务还清，同时还可以剩下一大笔钱供自己和孩子享用。而且当时中国石化总公司还着实准备买下德美行的一半产权，只是后来因为国内资金未能及时到位而没能最终成交。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李引桐也就失去了他的所有产业，至少失去大半产业。现在看起来，好在李引桐没有走出这一步。

德顺行所欠下的债务，李引桐一直还到了 1995 年才算基本还清。因为他所欠泰国大城银行等的债务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的。到 1995 年，德美行才算真正地解脱了。据一些橡胶专家估计，这一年德美行赚了不下于 10 亿铢，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说，李引桐直到这时，才真正地可以喘一口气了。

对于那些年的厄运与恶梦，李引桐至今耿耿于怀，历历在目。其境之悲壮，其态之狼狈，倒很像鲁迅先生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磨难与挫折对于坚强的人来说，应该视为一种财富。人们只有真正经历过艰难险阻，才能体会到到达彼岸的欣喜，也才能体悟人生的乐趣。但是，对李引桐来说，对德美行来说，德顺行的破产还不只是灾难的全部。与此同时，在德美行内部也正酝酿着一场分化，德美行遭到了来势更猛烈的急风暴雨。等待着李引桐的又是什么呢？

分化

对于商人，最为忌讳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时段里连续不断地遭到打击。可

偏偏好像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祸不单行”仿佛在商界就是一种规则。在东南亚的华人、华商当中，对于那些莫名其妙的“定数”，不少人深信不疑。难怪东南亚的华人、华商信佛拜佛的也特别多，搞迷信活动的人也特别多。身居海外的华人们把自己的前程、命运、平安等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由于商场的竞争与争斗的残酷性，而那些争斗的成败每每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家甚至是整个大家族的生活、财富、荣辱等，因而对前途把握的无助，特别在早期的创业阶段，造成了东南亚华人华侨中的许多人笃信宗教——主要为佛教的文化现象。

李引桐是标准的商人，他也要做遭受一连串打击的思想准备，因为这种可能性随时都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李引桐不信神，不拜佛，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迷信活动。从根本上看，他是一个标标准准、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那么，万一连遭劫难将依靠谁呢？

不幸，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李引桐和他的德美行还确实实地连续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其势如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德美行内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分化，整个公司几乎分崩离析。李引桐本人在此期间，连续两次中风，同时，到处有传言，说他已经身患癌病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公司上下一时人心浮动，乱哄哄一团糟。加上德顺行的破产，德美行也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这个时候，李引桐想要依靠什么，他还可以依靠什么？他从来不习惯在困难的时候去依靠谁，他早已习惯了靠自己。他没有神可以靠，他从来就不相信宇宙间有什么神仙，因此就算天上果然有一个上帝，也不会纳他为徒。他的反抗意识太浓，只怕是神仙也管理不了他。他也不习惯求朋友。综观李引桐的人生轨迹，他给过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帮助。在困难的时候，他却极少向他的朋友们坦露。他为他的祖国和家乡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却没有向祖国和家乡提出任何要求。

是的，他在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自己。靠自己，他重新赢得了财富，重新赢得了德美行的前程，也重新赢得了他生命的延续。

那是奇迹。

那是商业奇迹。换了他人可能德美行就不存在了。

那是生命的奇迹。换了他人可能早已经死过几次。

1983年，李引桐得了一场重病，体质受到极大的伤害。

1985—1986年间，他再次发病。其势比前一次更厉害。再一次中风，虽经医生抢救，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却留下了后遗症，使他不能顺畅流利地说话，且半身偏瘫，加上原先脊椎不好，医生只好给老人在腰腹上夹上固定板。从此，他开始了长时间坐轮椅的生活。然而，他不时豁达地对人们说：“我像是诸葛亮坐着轮椅，手摇鹅毛扇去出征。”其实，任何在他身边的人，无不能从他的笑容里体会到那种言不由衷的苦涩味。

不过，对于李引桐而言，最大的忧虑并非来自自己的躯体，而是由于自己长时间的患病，失去了许多的机会，失去对事物发展的详细了解，使得德美行内部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最直接的原因是董事长李引桐身染重疾，从各种渠道又传出消息，说李引桐不仅因中风，身体瘫痪，更甚者，他还得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世。这

些传言，对于一个正面临困境的公司，无疑是当头一棒。尽管德美行上上下下，工作依然，上班如旧，可人人心里都在担心着公司的命运，盘算着自己的前途。有些人已经悄悄地在寻找后路，准备有朝一日，公司万一垮台，他们可以有一条退路。即使是公司的上层领导也人心不稳。一些人开始了他们自立门户的计划。他们作此打算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自从公司由生产烟胶转而生产标准胶以来，尽管银行的借贷尚未还清，但标准胶的市场前景看好，德美行在标准胶配方上的独创性和生产工艺上的合理性举世无双，如果自己独立门户，在未来的橡胶生产和出口市场上就很快能够抢得一席之地，自己也能够很快地成为大老板。

公司恰好正在经历从生产烟胶到生产标准胶的转产阶段。虽然，决策者们都清楚，从烟胶生产向标准胶生产转型，是德美行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一步，却毕竟因此要事先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客户在使用标准胶时，也必然有一个适应期。所以标准胶在大量投产的初期，可能遇到投资大，短期回报小的风险。那段时间，公司向银行大量借贷，银行欠债多达 30 亿泰铢。而在向银行借款时，公司中的一些元老害怕承担风险，不肯出任银行的担保人，害怕有朝一日，公司破产，弄得倾家荡产。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老实说，数量还不少，他们不想承担风险，却要享受因风险而带来的丰厚利润。德美行里就有这样的人。人家不肯担保，李引桐只能自己出面担保，谁让他是董事长呢？但是，知情者都明白，其时的德美行无异于一座建在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的建筑。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德顺行又连遭打击，负债累累，最终导致破产。李竞达和陈川胜双双离开泰国。惨兮兮的李引桐，拖着病体到处还债。这种情况显然一五一十地被德美行的职工们看在眼里。更可怕的是，德美行的很多职员相信，德顺行的债务将由德美行来偿还。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可在那样的背景下，人们有此猜测也情有可原。有谁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用于为别人还债呢？

德美行从 50 年代建立到 80 年代，已经历时 30 余个春秋。那些老职工们已经纷纷从公司退了下来，他们或是养老，或是退休以后到别处去赚钱。按照规定，公司的退休职员每月要在公司领取养老金。作为老公司，德美行养老金的支出比其他公司多得多。如果一个公司发展得很健康，一大块的养老金支出并不会造成什么困难，何况那些为公司做出了贡献的老职工们本来应该享受这种保障。可是，对于一家入不敷出，面临破产的公司来说，这一笔养老金退休金无疑就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难怪李引桐在 1995 年公司大赢利的时候，进行了退休料度大改革，对公司的退休人员采取一次性的退休金领取制。

这一系列的变故和困难，让病倒在床上的李引桐意识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万一公司内部发生分裂，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这方面露出端倪，德美行何去何从？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又将由谁来主持公司工作。自己已经气息奄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在德美行任职。竞达和川胜又败走麦城。一旦德美行内部分裂，将一发不可收拾，况且公司高级领导层已经出现离心倾向。何况德美行是家族企业，是李家的产业，现在却到了后继无人、无人接班的境地。想到这里，怎不令他心急如焚。经过百虑千思，李引桐作出了一个决定，让三儿子李竞成从马来西亚到泰国，进入公司的最高领导层。

其实，李竞成从马来西亚来到泰国还有一个许多公司职员都不知晓的原

因。历史往往由许多不为人知的巧合所构成，否则它就没有那么精彩。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公司那些高层领导，李竞成此时到德美行必定是取代他们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其中尚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

1966年，李引桐在香港的南宗公司因鞋厂亏损而受到牵连，可南宗公司毕竟属于李光前南益总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加之，李引桐因与中国政府过从甚密，许多事情李光前也不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前要李引桐自己打点公司而让南宗与南益脱离关系。李引桐原以为李光前在南宗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出面帮助他，没料到李光前反而让李引桐自己清还债务。而在创办南宗公司的时候，李引桐曾以自己的橡胶园作抵押，万般无奈，李引桐只好卖地还债。南宗宣告破产。

南宗公司的的确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李引桐为祖国办事的“桥梁”，南宗倒闭后，与国内的联系也就自然中断，原先做橡胶的业务也因此没有了根据地。此外，李引桐此时也处在财政危机的关口。可以想象，要不是出现财政危机，李引桐绝对不会卖掉他那块心爱的橡胶园。

在这种情况下，李引桐原先与祖国正进行的一些事情也因为没有基地、没有金钱而不得不暂时中断。他就此飞往北京，将自己的情况告之北京的有关朋友。出乎他的意料，仅仅几天时间，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就请李引桐前去，让李引桐全权代理中国橡胶业务。其中道理虽没有人言明，从逻辑上分析大抵不外以下两个理由：第一，祖国需要像李引桐这样爱国且具有胆识的华侨为她工作。南宗破产，断了“桥梁”，中国应该将其“接”起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第二，李引桐曾为祖国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冒过那么多的风险，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他遇到困难，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因此提出任何要求，但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出一点力。于是，便有了让李引桐总代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橡胶业务的事情。

从6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的20多年中，中国的橡胶进出口业务都由李引桐代理，而当时李引桐在马来西亚收购了一家破产公司——南成公司，开始了代理工作。后来因李引桐的鞋厂出了问题，李竞成便来到南成公司具体做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的橡胶代理工作。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原先那种由国家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国内的许多部门开始拥有了对外业务上的自主权。这样，一种物质由独家经营代理的情况已经不可能。那么，李引桐在马来西亚的那个代理公司便形同虚设，于80年代中期关闭。这样，原来在南成公司干的李竞成使“闲置”起来。考虑到李竞成毕竟做过一些橡胶代理工作，对这一领域的业务不至于一窍不通，而德美行也需要人手，顺理成章，他来到德美行。

对于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老板做出这样的举动本来极其正常。综观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家族集团，大多数的第一代创业者都是将自己的产业交与第二代，交给他们的孩子。新加坡李氏集团如此，胡氏集团如此，马来西亚郭氏集团如此……所有的人都会觉得那是合理的。尽管华人家族企业这样的交接并不是例例接棒成功，家家传递平稳，华人家族产业未过三代便宣告破产者确实不少，甚至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父亲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产业并无懈可击。问题在于，李引桐长期以来太信任自己周围的人，对宗亲和乡亲采取相对的任人唯贤的方式，这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氛围，使那些人无形中养成了一种心态，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可信赖的。所以1985年，当李竞成进入德美行的时候，公司内部立即出现了某种溢于言表的抗意

和抗力，认为他们已经不再受老板器重了。这些人不仅不采取合作态度，而是相反。甚至最后选择激烈的行动——分裂。

如果德美行的一批高层领导只是认为德美行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危机，他们临阵脱逃，自谋生路，开小差，李引桐还可以原谅他们。这是李引桐后来对笔者坦言的。他说，对于那些在关键时刻离开德美行的人，如果不是他们要“抢班夺权”，我虽有不高兴，却可以原谅他们。不高兴，是因为我李引桐苦心栽培他们，信任他们。德美行对他们这些人一点不薄，这些人在离开德美行的时候，个个已经腰缠万贯。而在我垂暮之时，那些距我最近的人竟纷纷离去。再说，德美行是一家企业，总有亏有赚的时候，赚的时候，大家可以分享果实，困难的时候不能共渡难关，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这种人我看不起。但我不会勉强他们，人各有志，况且我当时确实是要死的人，主帅倒下，旗下的将士要自谋生路，虽说志短，还能说得通。可他们不，他们不仅要走，还要把我这个尚有一丝鼻息的人气死，要把处在悬崖边上的德美行推下深渊，要夺权，这一点我就永远不能原谅他们了。

在李引桐重病期间，德美行有的高层领导，原来对他只是唯唯诺诺，见他行将势去，忽而改了面孔，对已经说话困难的李引桐大施威胁，说什么德美行一直都在于违法的事情，说什么德美行欠银行的钱要他自己去还云云。李引桐气得七窍生烟，却没有能力回话。

话说李竞成，他完全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对于他的到来，一开始人们并未太多注意。主要是他没有太多从事橡胶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业务不熟悉。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到德美行不能成气候。再说，他的哥哥李竞达正在如坐针毡之时，一个大博士，一个李家长子尚且败得那么惨，李竞成能有什么作为。在很多人的眼里，李竞成并未表现出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实际情况好像也的确如此。在李家三个男孩子当中，他排行最末，读书也读得最少，长兄留英，二兄留美，都就读于世界著名学府。竞成不独没有留洋历史，甚至连大学门槛都没能跨入。少时李竞成的身体亦最弱，不如他的两个哥哥，而且经历过一次较大的身体外创。可是，他踏踏实实地在现实中努力，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积累各种各样的知识，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读各种各样的书，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反而具备了两位兄长并不具备的经历与经验，而且更具有务实精神和平易近人的品格。他的进取精神并不像他的两位哥哥那般外化，而是很含蓄地隐于内在。所以，他来到德美行后，善思善学，谦逊待人，除了少数以他为竞争对手的人不买他的账外，他与绝大多数中下层职员的关系处得很好。不少人经过认真的观察，确信李竞成与他的长兄不一样，确信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他们也就渐渐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了这位少帅的身上。

1987年，德美行内部分化终于表面化。公司上层的一些人开始脱离德美行，外出另立门户。这些人包括两个公司董事，经营部正副经理，两家分厂的经理。此外还有一批技术部门的高级职员。这批人都是公司的骨干，是技术力量最强，经验最丰富的精英。德美行瞬息之间陷入了一种真空的状态。没有办法，李引桐只好迅速从公司二线抽调一批力量补充到一线上来。现在德美行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是当时从公司二线提上来的。当然，今天他们都已经脱颖而出，干得极为出色。可是，在当时危机的关口，从李竞成到李敬佳、李文芳等无不是那个时候进入领导岗位的，不难想见，他们当时的难处，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处境，其中甘苦唯有他们自己最为清楚。

鉴于公司人才大量外流，李引桐除了火速从二线调动力量充实一线外，还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改革。其措施之一是向外招聘年轻的人才，向社会招考青年俊秀。李引桐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善一下公司职员的结构。这一招，虽不免有些令人感到捉襟见肘，但对家族企业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遗憾的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当时的那次对外招聘并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在那次招聘中，德美行一共招进了 25 名大学生，后来走了 20 个，只留下了五分之一。现在他们当中已经有 3 人当上了分厂的经理。

显然，这种结果对双方都不是最理想，所以后来德美行就再也没有通过这种形式向社会招聘人才了。要到德美行工作的人必须首先由熟人介绍，这样便造成了德美行的中高级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关系户”这样的事实。这对德美行未来的发展不见得有利。当然，我们讨论的已经属于华人家族企业如何在下一个世纪更多更好地获得人才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课题，暂时打住。言归正传。

让李竞成进入董事会，向外招聘人才其实不过是李引桐根据公司的情况所作出的战略调整而已，它却成了以李荣丰为首的上层分裂的口实。原先还停留在私下的活动彻底地公开化、表面化了。他们想利用李引桐重病不能理事之际，乘李竞成羽翼未丰之时将他们父子全都赶出董事会。这一手极为毒辣，却很不得人心。德美行是李引桐一手创立起来的，是家族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祖宗，其他人都是“打工仔”。产业归属也是李引桐。虽然德美行在创立之初出于需要，表面上隶属一家南华公司，实际上则完全独立，当时之所以作如此安排，主要是根据李引桐作为“外资”身份（李引桐迄今仍持马来西亚护照，是马来西亚籍华人身份），加之李引桐与南华公司董事长钟宣华早年关系甚好等关系而为之，完全属于技术性操作上的问题。事实上，德美行 50% 以上的股份掌握在李引桐家族的手上。所以，家族之外的人想试图谋而夺之，清理上、道义上都说不上。

1987—1988 年，德美行除了有一大批骨干力量外出自立以外，内部的争夺也表面化。以李荣丰为首的几个德美行高层人物首先发难，想把李引桐赶出董事会。李荣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可以说直到发难以前，都是最受李引桐重用的人物之一。此前他一直是德美行的董事和公司总经理，掌握着公司很大的权力。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逐渐生出外心，想另立山头。特别在李引桐病重不能理事的时期，他伙同几个公司高级职员从事“地下活动”。如果这种活动仅仅限于谋划自己如何出去，不再想在德美行继续干下去姑且罢了。可他们并不是，自己独立出去只是作为抢班夺权失败以后的第二方案。他们的第一方案是要夺取德美行为己有。

事件发生在 1988 年。

经过事先谋划，以李荣丰为首的几个人开始行动。在一次公司高级职员的例会上，李荣丰忽然一反常态，把已经成为公司事实上的规矩（即高层会议自从公司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闽南话）打破，用泰语来开场。除了少数几个知情者外，所有在场的人员都感到诧异，继而很快就明白那是一种信号，一个向李引桐公开宣战、彻底决裂的信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被李引桐当作儿子一般的李荣丰会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李荣丰的成长与发迹了如指掌。人们即使不是亲眼目睹，至少也耳熟能详。李荣丰的母亲原是李引桐的管家。当李荣丰还在幼年时，李引桐便开始培养他，供他读书。以后让他进入德美行，在各个方面为他提供条件，使他成了富人。甚

至李引桐还将德美行总经理的交椅给他坐。然而，正是这个李荣丰，此时此刻，要把他的父兄、恩师、朋友、老板融于一体的李引桐赶走，要置他于死地，要取而代之。

李引桐一直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眼前的表演使他已经意识到公司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比公司债务累累还可怕，还危险。常言道：“祸起萧墙”。来自内部的危险往往比来自外面的危险可怕得多。德美行正经历着一场考验。此时此刻，他的心在淌血。

毕竟李引桐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挫折、风险、债务风波、政治斗争，虽然他意识到眼前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但他一点也没有惊慌。无数的大脑细胞顿然活跃，与因为中风致使其面部神经迟钝形成鲜明的反差。要击溃叛逆者的阴谋，保护住属于自己的产业，直觉就这样一再提醒、提示着他。

要速战速决，快刀斩乱麻，要用心理上的强势压住对方。因为对方心理上很虚弱，干这样的事，他们有内心折磨，有愧疚，而且几个人各怀鬼胎，本质上并不团结，经受不了沉重和迅速的打击。李引桐在心里盘算着。

那个前所未有的泰语开场白结束之后，还容不得其他更多人的开口，李引桐突然用闽南话慢慢悠悠、平平稳稳、从从容容地宣布：免去李荣丰总经理职务，总经理一职由他的儿子李竞成接任。

平地一声响雷，顿时在座的所有人员都为之震动。

李引桐之所以能够处变不惊，之所以如此从容，根本原因在于他手上握有超过 50% 的股份，董事长对公司的任何决议有一票否决权。此方为致胜的法宝。李引桐是做大生意的人，懂得如何运用这些规则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李引桐又极有政治头脑，他的那些政客朋友，他所经历的政治风雨，早早就教会了他如何去面对突发性事件，如何在混杂着政治权术和阴谋的商场中生存。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立即改变了局势。那些原本就中气不足者，赶紧悬崖勒马。可怜那李荣丰，活生生成为孤立无助的人。他实在是没有想到，斗法较量的战场还没有完全摆开，他的兵将还没有点毕，旌旗还来不及扯开，就败下阵来。

在听到被就地免职的宣布时，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他竟当场哭了起来，哭得那样的伤心。

后来他对人说，没想到李引桐做得那么绝，在会上当场就免去他总经理的职务。他以前一直是那样的信任我，我实在受不了。

是啊，李荣丰倒说出了真话，讲述了事实。可是他没讲明白，为什么李引桐以往一直待他那么好，那样地信任他，他还要乘人之危，胳膊肘往外拐，甚至在老板生病的时候采取颠覆行动。对于这样的人，天底下有哪一位老板还会姑息纵容？

至此为止，德美行完成了一次迫不得已的大换血，公司高层领导重新组合。但毕竟第一线的人才走了不少，好几位新的领导是从二线被提起来的，经验不足，能力有待培养。李引桐不得不拖着病体天天上班，亲自督阵指挥。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他由于操劳过度，原先没有痊愈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医生在给他做定期检查时，发现他身体的许多器官在迅速恶化，功能也在衰退，体重不断减轻。医生怀疑他得了癌症，强令其休息。他置若罔闻，仍旧我行我素。

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向命运抗争。

有一次，南华公司的董事长钟宣华到香港，与德美行在香港一家公司的经理去见郭鹤年，郭鹤年问：“为什么你们的老板这么老了还不退休？”他怎能知道，李引桐正以他非凡的毅力在挽救公司。

新组建后的领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表现出空前的团队精神。李引桐迅速制止了公司内部管理上的漏洞，提高了大家的士气与斗志。公司很快就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不过，如果有人认为，德美行在经过一次大的调整之后就事事顺利，财运亨通，福星高照，那就大错特错了。正相反，公司经过调整以后的几年里仍挣扎于破产的边缘。其中的原因很多。仔细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美行在分化之前就一直在财政困境中，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扭转。第二，公司的一批骨干出去，他们带走了技术，带走了经验，也搅乱了军心。留下来的职工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新的领导群能否很快扭转局面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第三，从二线上来的领导，包括李竟成也还在学习和适应新的岗位，积累经验，边干边学。而这需要时间。第四，决策上也有所失误。

关于这一点，我们稍作阐述。

那些从德美行出去的人，将他们在德美行所学到的技术、管理等用到新开的公司中去了。他们所开的公司基本上也都从事橡胶原料加工出口。为了使笔者的撰写和叙述能尽可能地不局限于一面之词，调查时我们还专门多次采访了 80 年代从德美行出去的骨干现在的公司。其中之一就是黄炳添的联益公司。黄炳添从德美行分出来之前也是李引桐极为重视和重用的中坚力量之一。后来他出来自己干，成为德美行的竞争对手。从目前他所拥有的资产看，算是一家发展得相当不错的经济实体。在谈及从德美行出来一事，他说德美行带给他们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多。其中三点最为重要：第一，德美行是橡胶行业的旗帜，他的名号即是一种名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自己原来在德美行干了那么久，与德美行的客户关系很好，出来后，一些老客户仍与我们做生意，因为人家相信我们这些在德美行干过的人。第二，德美行是泰国首屈一指的橡胶出口商，信誉非常好，因而在贷款上比起人家就容易得多。第三，德美行在生产和管理方面有自己一整套东西，对开始建立公司时的帮助很大。那些原先在德美行干过，后来出去自立门户的人，不管他们对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看法有什么出入，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从内心到口头上都认为：“德美行是一所橡胶大学，我们都是它的学生。”“德美行是一所大学”几乎是那些出去的人的口头禅。

无论是李引桐，李竟成，以及一批坚守在德美行这个大碉堡里的人们，还是出去另立门户单干的人们，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过去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利益与情感将他们串在一起，现在却成了商场上的对手，竞争的对象。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国际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可能各得一杯羹，残酷的时候完全可能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虽然各橡胶公司在战术上未必将对手当作不能共荐的竞争对象，但在战略上则必定如此。

出于商业竞争上的需要，李引桐在 90 年代初试图采用对泰国原材料控制的手段，将那些从德美行出去后自创的那些树胶公司于羽翼未丰之时挤垮。德美行所采用的方法是用高价从一盘商、二盘商那儿，即从原料市场上收购大量原材料，使那些小公司因得不到充足的原料而无法进行生

结果证明，控制原料市场的一着棋收效甚微，反而使德美行自己陷入了

更大的困境之中。公司缺乏周转资金，无法买货；与中国方面所做的生意，也因中共中央的紧缩政策，款项迟迟不能到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德美行只好采取卖期货订单的应急办法。根据泰国政府规定，出卖橡胶的期货订单，由政府收购可值订单的 80%。而德美行光在出卖订单中就亏损达整整 8 亿铢。德美行之所以走出这一步败棋，主要原因或许并没出在战略制定上，而是时机选择欠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90 年代初，那些从德美行出去的人，带着经验、带着资金、带着技术、带着人才、带着客户，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搭起一个台子，很快进入角色，也就能很快在橡胶行业站稳脚跟。这与刚刚到橡胶界来淘金、来学道的人完全不同。后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炉”，也很脆弱，经受不了大的打击。可以想见，1987—1988 年出来的那些人，他们事实上更早就做了准备工作，出来就很快入道。到了 1990 年以后，经过两三年的时间，不少已经站稳了脚跟，羽翼渐丰。这个时候德美行再用相对高的价格收购原材料，以相对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如此蚀本的商业行为除非有非常雄厚的财力作后盾，否则难以持久，效果自然也就不理想，弄得不好，反将自己给套住。而此时此刻，德美行自己还没有从财政危机中解脱出来，就开始了一次不能一下将对手击垮的商业大动作，反把自身置于被动之中。如果德美行在 1988 年就走出这一步棋，速战速决，效果将好得多。可那时，李引桐自顾不暇，无法走此一着棋，待 3 年以后，德美行腾出手来的时候，走此棋的时机已经丧失。何况，按当时德美行的财力，不足以维持很长时间的打击时间，因此，德美行的此次商业行动算是一个败笔。

好在德美行的决策者们很快调整了战略，毕竟德美行是泰国橡胶行业乃至世界橡胶行业都可称得上“大哥大”。当务之急先要稳定军心，自我发展，完善公司内部的管理，保持橡胶行业的霸主地位。凭借自己牌子硬、底气足、财力雄、信誉高、经验多、关系厚等优势，迅速自我发展，恢复行业执牛耳的地位，何忧其他的小公司不俯首称臣？

这一着果然奏效，1995 年，德美行高奏凯歌，一口气赚他十几亿。在这个过程中，债务还清了；一幢 26 层的大楼正在曼谷拔地而起；李竞成和他领导层伙伴李敬佳、李文芳、李斯扬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核心集体。

此时，李引桐笑了。他笑得很开心。那是胜利后的微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又急急地去筹划新的计划……

涉过险滩的人方知彼岸的旷达；经过严寒的人方知阳光的温暖。李引桐经过了那样一次生命的洗礼和与命运的抗争，他又一次捱过来了，他又一次体验了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附：泰国《经济基础周刊》刊发的
两篇关于德美行“分化”的文章

星加坡人收回德美行，
泰籍执委几乎全被开除

（泰国《经济基础周刊》
1988 年 2 月 29 日—3 月 5 日期）

泰国之胶界巨人“德美行”对公司内之执行董事大事开刀，泰籍董事舍离职位，星加坡来之大主席李引桐推出其子和亲戚出替进行控制业务。这个原因是由于其原来在星、马之营业基础开始衰退，全球之顾客转向来泰国。

泰南胶业界向《经济基础周刊》透露称：自从二五三〇年（这里所用为佛历纪年，在佛历年数上减去 543 即为公元纪年数，二五三〇年实指 1987 年，下同。）年底以来，泰南之胶商尤其是合艾市内，都集中注视着泰国这第一号树胶出口商，德美行有限公司之内部变动，这是由于公司内之甚多位执行董事被替换，直至最后，于本年 1 月，董事经理李荣丰先生，他是德美行之重要人物，将近 40 年以来一直为公司开拓并发展业务，使之成为泰国第一号并名扬全球之公司，而没有明显之理由地离辞其职。

关于其辞职的原由，据李荣丰之亲管人士诉说，是因为德美行之董事李引桐先生叫其三子李竞成先生从马来西亚进来执行公司之总经理一职，这是一个新职位，而这职责却与李荣丰所担任之职责相互重复，致使到工作之执行上发生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该公司之二五二九年之营业结果蒙受了 13.681 百万铢之亏蚀，这是公司第一次之亏损，一反以往之传统，年年有赚，促使李引桐大不满意。

无论如何，基于上述之理由，不只是李荣丰遇到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营业部之经理，即是树胶交易上非常重要之职位，当时由乃炳（黄炳添）担当，以及其副经理，都一一于二五三〇年末辞了职，并另组织新公司，在合艾经营同类之胶业。即就在该宗辞职之同时，马上就另再委立星加坡之一位陈先生来取替，而且，还从星、马两地之德美行集团之公司调来星籍、马籍人员多人进来工作。

至于李引桐之动用其亲属与自己人入泰，除了是为了经营业务之外，另一方面还为了了解救其本身集团下在星洲之业务问题，即是 LeeRubberco.（南益），过去曾经于胶业界上特别活跃，因为星市是最大之胶交市，但现在形势已变，购者转向直接采购，不需要经过中间人，致使星市失去重要性。而马来西亚之市场，其政府开始从马来西亚退缩。所以令人深信，将来将不断召用他自己的亲属入境。

至于（李荣丰）乃他违塞本人，自从辞职离开，就亲自经营普吉联合有限公司之业务，这是他个人唯一的私营公司。但是在法律上，普吉联合有限公司是属于德美行集团的，因为李荣丰仍是其中一股东，并未进行撤出其股份。现在，泰籍之高级执事人士属下公司之执事人，或其分行合股之一个家族，而且在替德美行执事时享有声誉，现时，已转去替宋卡国际贸易公司 SICO 而执事了。

对于上述问题，《经济基础周刊》特地向李荣丰与黄炳添询问，两者都承认确实已经辞职并证实上述之执事人员之变动，但拒绝供给其它之详情，只是说并没有任何相互之关系，各人各管自己。

透视德美行过去之伟大是否已成了过去？

（《经济基础周刊》

二五三一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期）

泰南橡胶有限公司或“德美行”是泰国最古老又是交易与出口量居第一位的公司，名扬全球。在 30 多年前开始在泰国成立，名为暹罗南方有限公司。设址于宋卡府合艾县。发起人是星籍李引桐与泰籍投资家以及马来西亚籍投资家，即以下几个主要家族，例如李成旺（泰姓），李才涛（泰姓），李荣

丰（泰姓），钟宣华（泰姓），李引肯（泰姓），陈氏，梁氏和李氏。

可以说，德美行一开始就是非常庞大和老经点。但其贸易额仍居第二位，次于公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也是星加坡之陈氏来开创。德美行一向以来并不安心于处次位，一直自我改良积极开展业务，到二五〇八年优越地跃居为全泰之冠，并一直保持这个地位至今天。尤其是，在5年前，公成公司停止营业，其几间厂房落入商业银行之手中，因为几年之累积亏蚀。其中一些厂房被德美行租用，更重要的是，公成之一些老职员与德美行相互合作，合资成立一个新公司名为“扬泰德成”，现已成为其集团中之一员。

与此同时，一些同样悠久历史之树胶商行则相继停闭，因此而利于德美行阔步前进，纵横无敌。自从二五一三年以来，一味在扩大生产现出口，不断增加，从年产量几千吨增加到现在的几十万吨，或则是占据市场之40%。当时其市场主任乃盛（李成宇），前任之泰胶商会主席，他是胶业界之一能手。德美行之业绩部分出于其手，并使得合艾市成为泰南之最大胶市，又使得胶业形成了一个垄断之局面，市场为寥寥无几的大商行操纵，而以德美行为首。现在，德美行之胶市势力不仅限于合艾市，但已扩大到全国所有胶区之每一个府治，都有其分行，甚至于东部，都有树胶原料加工厂，包括烟熏、绉吊、块胶、胶汁，包罗万象，一共约37间厂房。二五二五年初，进入一个变动时代，乃盛，公司之主将辞职出来，另立一个公司名为泰产树胶公司，大力经营，在短短之两年内跃居全国第二位，出口量紧追着德美行。二五二九年德美行出口146.852吨，泰产102.271吨。但是，德美行还有其集团下之公司，即德顺，拥有第三大出口量，若两相合一，则其产量仍与泰产有相出差距。而德美行本身又从普吉联合公司调来乃他伟塞（李荣丰），其一股东，进来代替出任总经理，乃他伟塞之才能与经验并不相逊；而市场主任是乃炳，其原名为黄炳添，他是德美行主席李引桐先生之甥儿。

无论如何，二五三〇年末，德美行内发生了大变动，尤其是在营业执行方面，属于泰籍之营业执行方面大部分成员成群地辞职，他们都是属于重要的负责人，如乃炳，乃那空（陈锦荣），他是炳之助手，又另外一个技术部主任。更甚的是，二五三一年头，乃他伟塞，身为董事经理，也随着辞职，现时只为普吉联合单独一公司理事。其实在法律上，德美行将认为普吉联合公司属于其集团之内，因相互间互持股份。关于这一些营业部负责人辞职的原由，内部消息人士补充说明，是由于业务经营问题引起，因为在此之前，李引桐委立其第三子，从马来西亚来的李竞成出任总经理一职，而实际上这一职前所未有，业务经营上就发生重迭复杂。而且，又委立陈先生出任市场经理，以代替已辞职的乃炳；又从星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的南益公司之营业管理人材调动而来，因为那一间曾是德美行联号之南益的市场活动的重要性已经减低。更主要的问题是德美行之业务经营晋这第一号树胶出口之20年以来于二五二九年第一次蒙受亏损13.681百万铢，引致主席李引桐大为不满，最后必须增加资本4百万铢，使之增至50百万铢。

这些消息，营业部负责人之成团辞职，与从星马两地调来的纯属李引桐亲属之大部分新负责人，是胶业界之内轰动与谈论不休之事，各人都紧紧集中注视着德美行将何去何从，因为这一些负责人都是能手并且一直是树胶行业之先锋，尤其是乃他伟塞本身更是。在此之前，伟亦兀博士，他是负责人中泰方一边之成员，亦早已移至宋卡国际贸易做经理，这只是一个分行。直至今今天，负责人中之高级职位属于泰籍者所剩无几，例如乃宣华，董事司理

职，少有作为。

第十二章 另一种财富

一位忠实的朋友就像一顶牢固的帐篷；谁找到了这样一顶帐篷，谁就找到了一个爱人。

一位忠实的朋友是无价之宝，没有东西可以与它的价值相匹配。

生活是随同一位忠实的朋友而开始的，谁找到了他，谁就畏惧上帝。

谁畏惧上帝，就保证了正当的友谊，他本人是这样，他的朋友也是这样。

——耶稣·西拉赫书

情为重

人们通常喜欢说一句口头禅：时势造英雄。此话一点不错。一个人具有某种才华，却没能遇到合适的时机，最终还是不能成气候。法国有一部著名的小说《红与黑》，说的是一个名叫于连的外省青年，天生聪明，他崇拜拿破仑，发誓要像拿破仑一样，成为穿着红边裤子的将军。可是他没能遇到像拿破仑一样的时代。因为于连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复辟王朝时期，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能否成就，首先要视其有无贵族血统。而出生于木匠家庭的外省人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形同叫化子。政界的“红”不能出头，他就走“黑”道，到修道院去做教士，试图最终穿上黑袍，当上令人羡慕的主教。谁知教会里同样充满着肮脏的阴谋。社会最终把他推上了断头台。他的情人想救他，只要他想自救就可免于一死。然而，他放弃了。他选择了死，因为他不能选择时代，时代又不选择他。

一个人的成功不能缺少社会环境和机遇，这勿庸置疑。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朋友或缺少朋友，他想要成功同样不可能。任何工作，其社会化程度越高，要求得到帮助的概率也就越大。商业活动的社会化程度很高，那么成功商人的朋友也就要求有很多。以当代海外有成就的大华商的背景来看，哪一位不是朋友多多。李嘉诚、郭鹤年、林绍良、邵逸夫、曾宪梓等等，他们与许多国家政要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自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化与商业化已经结合得很密切。国家政治中的经济含量和比重日益提高。反过来，富豪巨亨进入政界也愈来愈平常。政治家与商人交朋友已经属于双方不可需要的需要。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论人们称为“聚会”、“party”、“沙龙”，还是干脆称之为“交易”都不妨碍。一句话，大商人要有大朋友。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李引桐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色。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李引桐与东南亚国家的许多高级政要都有着不浅的关系。尤其在中国，他更是政府的上宾。当然，这也是为祖国做了许多好事的结果。

在李引桐数十年经商生涯里，他在“上流社会”的朋友可谓多矣。不过，他与一些商人在赚了大钱后想捞取政治资本的情形完全不同。李引桐从来就无意于仕途，不想参加政党、更不想出名。他对他的商人身份很满意。他交那么多的上流朋友，一则是商务上的需要，更主要的还是“交友”、“走天下”原本为他的兴趣爱好，更符合他的本性。因为他天生为人豪爽，喜爱冒险，乐于交际，也乐于助人。

难怪他早先在香港的时候混迹于上流社会圈里，舞场上常常也少不了他那潇洒的舞姿。他在香港的别墅“豪园”、“湖边绿屋”里不时会传来自东南亚各国政府首脑们的高谈阔论，更少不了高雅的音乐、如云的美女、上

等的好酒。李引桐总是以其主人周到的应酬赢得各方宾朋、各路豪杰的好评。

在日本期间，他一如既往，利用他从事国际间橡胶买卖和商业活动的条件，凭借他个人的性格魅力，结交了不少政要朋友。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与李引桐早年的交情就是在日本结下的。

在泰国期间，他不改往常习惯，身旁总围绕着许多高朋阔友。现在德美行驻曼谷办事处沙拉玲路 77—5 号原本是美军司令部在越南战争期间作为高级军官休憩养身的场所，是美国军中贵族聚会的场所。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撤走，李引桐买下了那一块地产，使之成为一处高级的休闲之所。那里设有私人游泳池、酒吧，有服务设施完备的客房。许多国家政要、大商贾到曼谷办事，他们不喜欢住酒店，而乐意选择李引桐为他们准备好的休闲、养身的住所。谁不愿意在豪友、佳丽、美酒的陪伴下度过他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呢。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拉玲路 77—5 号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标志。

如果读者认为李引桐是一个专好交上流社会朋友的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如上所述，交友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需要，勿宁说是一种爱好和本性。平心而论，在他好交朋友的本性之中，他更偏爱于交平民百姓的朋友。他是一个将友情视作比其他许多东西都珍贵得多的人。如果人们用心检索一下他这一辈子所交的朋友，所费的精力，所耗的钱财，人们会发现，他的平民朋友远远多于他的上流朋友。他与那些平民百姓的交往经历更感人、更有人情味。

南宗公司便为一范例。南宗公司原为南益公司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它的成立原是为了适应祖国的抗美援朝需要，以及便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而建立的。公司虽然以“南”字头冠之（李光前南益公司下属的子公司以前都以“南”字打头），实则完全由李引桐一手操办起来。其中还有一个迄今无人知晓的理由，这就是为他的好友李昆良而为之。

少年时代，李引桐有三个好朋友，他们是李昆良、陈启舟和谢真。后来他们自诩为“四人帮”。对这些旧友，李引桐可谓情意弥深。李昆良解放前夕在闽南老家的一所小学当校长，解放初期他到香港来找好友李引桐，严格地说也算是一种投奔吧。李引桐与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万分，但考虑到李昆良一介书生，在香港这样的世界商贸中心要立足立业实属不易，加之，香港同时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其消费程度比之闽南乡下可谓天渊之别。若没有一份好的工作，没有一份好的薪金，要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艰其难可知矣。经过缜密的考虑，加之以上所说的那些理由确实有必要在香港开一家公司。这样李昆良在挚友的精心安排和策划下，坐上了南宗公司总经理的交椅。

虽然南宗公司后来的商业业绩不甚理想，但李引桐却一直在各方面给予老朋友以关心和照顾。

后来，“四人帮”中间的另一友人谢真也辗转来到香港找李引桐，李引桐又专门为他开了一家公司——建中行。

南宗与建中在数十年的奋斗历程中都为祖国的建设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它们应有的贡献，许多事情至今鲜为人知，就是笔者也所知寥寥。然而，从这两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人们不难看出李引桐对待他的朋友，可谓尽心尽力，仁至义至。

南宗和建中后来虽都以破产而告终，李引桐也因此与李光前在 1966 年酿

成不快的结局，根子上是为了祖国，为了那些朋友，准确地说是为了祖国和那些穷朋友而得罪富朋友。

陈启舟——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年青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泉州的一所农业学校当校长。后来，他又调到福州，成为福建农业大学（原为福建农学院）的农学专家。在中国实行长达十几年的极“左”路线期间，尤其十年浩劫，两位朋友一度中断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当李引桐再一次踏上福州的土地，他在与福建省商谈有关项目时，就向福建省的有关领导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请尽快为我找到在福建农业大学工作的陈启舟先生。”当两位朋友聚首的时候，他们感慨万端，心潮澎湃。两个老人产生了孩子般的冲动。现在，每当李引桐回到故乡，陈启舟总是最频繁地出现在他身旁。两个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常久久地坐在一起，喃喃低语，情意绵绵。他们在诉说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友情意，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悟到的人生真谛。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友谊，为了朋友他可牺牲很多很多东西。

一般的人很难做到。

一般的人也不容易理解。

平民意

从财富方面讲，李引桐的名字虽上不了《福布斯》杂志统计出的全球华人亿万富翁的名单，但无论如何他都算是一个大富翁。他可以过奢侈的生活，住高级的别墅，开着奔驰、宝马等名牌车，享受着平凡百姓所无法企及的贵人生活。若以享受物质条件而论，共和国的部长也未必能够企及。

大概是第一代创业者的缘故，李引桐少年时代曾备尝生活之艰辛，忍过饥、挨过饿，更体察过黎民百姓的清贫与困苦。记得在孩提时代他曾以能够吃上红烧猪蹄和白米饭作为他未来追求的宏伟目标。他曾发誓，有朝一日他如果发迹，他要让梅山的乡亲们也过上能够吃红烧猪蹄配白米饭的幸福生活。他兑现了。即使在今天，每当他返回故里，总要在他的宅子里让厨师做很多很多的可口饭菜，让乡亲们来享用。每当他回故乡时，他总要不断地提醒厨师：“饭菜一定要做足做够，吃不完没关系，可以喂猪。但决不能发生乡亲们来了饭菜不够的情况。”从骨子里看，李引桐至今仍有一颗平民心，仍有一份平常情。

如果说，李引桐有很多富家朋友，那么，相对于他的平民朋友而言，富家朋友的数量就微乎其微了。这里介绍几则他与穷人交朋友，帮助他们解脱困境的趣闻轶事。许多人在他的资助下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幸福生活。

70年代初期，在沙拉玲路77—5号德美行曼谷办事处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上任两年的曼谷办事处经理杜某某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房间。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每到夜晚或假日，公司职员都不愿单独呆在大楼里。德美行只好出钱请外人看守。

作为董事长的李引桐生活中有一个习惯，用餐选择的饭店、看病所去的医院等等都是相对固定的。当时李引桐理发也总是固定在一个理发店里。一日，李引桐像往常一样到理发店理发，这一次他发现为他修指甲的人是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泰族贫家妇女。在妇女为他服务期间，李引桐关切地询问

了她的一些情况，从何而来、以前干什么工作、家庭情况等等，泰国妇女一五一十将她的故事细细道来。

原来这是一位离了婚被婆家赶出家门的泰国妇女，膝下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得到曼谷来寻找她的两个妹妹，谁知她在曼谷的两个妹妹不仅不能为她和孩子提供栖身之所和果腹之物，连她们自己的生活也时常有了上顿没下顿。万般无奈，她只得去找工作，最后总算找了为人修指甲这份活。而她此时在上班的时候，她的孩子还在街头的某个地方等待。

李引桐听罢，顿起侧隐之心。他要帮助这位可怜的妇女，至少要让她的孩子在生活上有保障。他心里这样想着。尽管只是邂逅，但李引桐已习惯性地就把救她们出苦海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理发完毕，他问这位泰国妇女愿不愿意到德美行工作。泰国妇女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她弄清楚真实意思的时候，竟踌躇不决，她不知道在那个闻名遐迩的公司里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来的妇女能干什么。

李引桐看出了她的内心顾虑，宽慰她说：“你什么都不要干，只需带着你的孩子住在我的公司里，我每个月给你开一份工资，让你的孩子去上学，将来把他培养成为有用的人。”中年妇女听罢，真以为得沐佛恩，上天显灵，竟双手合十，匍匐于地，久久不起，以感谢这位一面之交的大恩人。

第二天，这位泰国妇女高高兴兴地带着孩子住进了公司的一个房间。李引桐看着母子的行李物什顿生感慨：两个破碗外加几件破旧衣服，就是她们家当的全部。他立即吩咐德美行的管事上街为母子添置衣被物品。从此这个在马路上认识的泰国贫穷妇女就成了德美行里一个很奇特的员工。

谁知没过多久，平日里少言寡语的泰国妇女竟找到李引桐，希望他能够同意让她在曼谷的两个妹妹一并前来与自己同住。李引桐在了解她的两个妹妹的详细情况后，确认她们生活在贫困中便点头应允。又过几日，当李引桐再次看望这位泰国妇女时，看到三姐妹已共同生活在一起。两姐妹来的时候亦无任何财产，李引桐也如同上次一般为她们一一做了安排。

李引桐虽然同情她们姐妹仨，但对她们的父母情况一概不了解，询问多次，她们总是讳莫如深，后来她们才支支吾吾地说父亲就在曼谷附近。李引桐要求她们带他一起去见她们的父亲，姐妹三人尽管内心再不愿意却也无法拒绝恩人的要求。

到了周末，姐妹三人领着李引桐上了探望父亲的路。他们乘车来到郊外，渡过湄南河，又经过一段陆路，再过一截水路，曼谷城已离他们很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一群黑灰色的楼前，楼顶上布满铁丝网，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嘿，原来这是一座大监狱，在这之前李引桐怎么也没想到他今天造访的是一个囚犯。

见过姐妹们的父亲以后，李引桐才从她们的嘴中了解到，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家里的六个孩子，全是女的，都由父亲一人抚养。其父因生活所迫做起大麻生意，不料被警方捉获，投入牢狱，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涯。从此六个女孩浪迹社会，自谋生路，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李引桐在了解她们的身世以后，决计帮助这几个贫苦孩子。他花钱供她们上学学技术。老四从学校毕业后，学得一份裁缝的手艺，一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到曼谷郊区的一个发廊帮工，为人看店。一到夜晚，小姑娘孤单一人守在店里，非常害怕，却不敢告诉阿公（那些得到李引桐帮助过的穷

人,后来大也都讲得一些闽南话,他们也学着李引桐家里人,称他为“阿公”),只能自己硬撑着在那儿。每当阿公问起,她总强作欢颜说很好。有一次李引桐专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郊外的那个小发廊实地了解情况,他这才发现老四所在的这个发廊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一到晚上周围四处空无一人,黑暗一片。据说时不时还有强人打劫。小姑娘晚上独自一人在发廊里守店,她的床头上方放置着一具棺材。每天晚上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

李引桐见她非常可怜,又很懂事,当即就问她愿不愿意到泰南的德美行总部去工作,老四大喜过望。就这样她到了德美行总部所在地合艾,在公司学习财务。经过她本人的刻苦努力,她很快胜任了公司的财务工作,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后来她嫁给一位警察,现在她的公公是合艾的警察局局长。她也因此成了富家里的成员。

六姐妹中现在仍有两人在德美行工作,另有一个在曼谷做珠宝生意,一人在美国,全家都很好,所有的人都很发达,而这六姐妹有今天,全靠李引桐一手提携。

其实,受到李引桐帮助过的并非只是这几个贫苦的泰国妇女。在李引桐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直接得到过李引桐帮助、资助、培养、提携的穷人何止成百!

或许因为少时曾经贫困,或许因为自己曾经是贫民,李引桐总将儿时的经历视为他为人处事的一种价值取向。小的时候,他就从父母那里承袭了一整套与穷人同甘共苦的思想。所以他一生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越是穷人越要帮,越穷才越要帮。他常说:“锦上添花不如无,雪中送炭方才好。”他小时候就发誓,以后有了钱一定要帮助穷人。当时就有不少朋友反驳他,说他以后真正有了钱未必会这么做。然而,事实证明,李引桐一直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实践着小时候许下的诺言。他曾经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如果有钱人向你们借300万,你们不如把这300万分散帮助那些更多更需要用钱的穷人。”难怪在李引桐的家乡梅山到处风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李引桐花钱是“天女散花”。这些钱如果集中起来用于少数几样,那么,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怕也少不了刻有李引桐大名的什么建筑、机构等等。事实却没有,因为那与李引桐的用钱方式不同,他总是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使数不清的贫苦人民真正受益。

李引桐虽是居住在泰国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但对泰国的穷人、弱者同样尽其所能予以帮助。在合艾,因看到当地的医院条件设备落后而使不少穷人患者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治疗,他就捐钱、捐物、捐医疗器材给当地的医院和老百姓。他因此还得到当时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的接见和表彰。其实,对他而言,他不过尽力帮了一些穷人而已。

他乐意这样想。

他乐意这样做。

很多人不解其行为,是因为他们不具有这样的贫民意识。

父母心

少年时代,李引桐曾经饱尝过人间的种种酸楚,因此他能够充分体谅穷

人的难处，知道穷人们时时刻刻受着生活的煎熬。况且，从本质上说，李引桐一直在心里贮存着因贫困而积沉下来的情结，具有明显的贫民意识。

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地道叫化子一般的货色，竟终日里想看法子“做派”。他们没能抛去贫困，却早早地把贫民意识丢到九霄云外。相反，有些人来自平民，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进取，赢得了财富，然而一直没舍得将先前已经造就了的贫民意识抛弃。当他有了钱，总忘不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贫民和朋友。自己也时时处处以平常心去面对平常事。

李引桐属于第二种人。他穿着随便，从不刻意。一套简简单单的便装，经常一上身就好几天。有一次他邀笔者一起到桂林、昆明、大理游了一大圈，整整一周，笔者发现，先生除了每天换内衣外，外装却是老一套，就是那件外套也与街上路人身上着装并无什么明显档次上的不同。难怪，他一生中多次因为服装问题被一些官家或轻浮之人误以为是乡巴佬而受到冷遇。

他对饮食也从不计较，除了商业上必要的应酬，他个人从不在饮食方面花费过多的时间。外出办事旅游，他喜欢到一些平贱的小馆子里用餐。

回到家乡，乡亲们从来不用在为李先生准备饭菜的问题上过多担心，实在是因为太容易在这方面“打发”这位大富翁了。关于这方面，闽南籍海外第一代华人，不论其后来在财富上是多么值得炫耀和自豪，生活上大都非常简朴。这似乎成了一种传统。以三代橡胶巨子陈嘉庚、李光前和李引桐为例，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大富翁，或曾经是大富翁，可他们在生活上一直都极为朴素。陈嘉庚穿过的打补丁的鞋、旧衣服等迄今仍摆放在集美的陈嘉庚纪念馆里，看了令人感慨，也生崇敬。李光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大富大贵，可当他晚年在上海治病手术时，医生竟说他“营养不良”。谁不知道，那李光前不是百万富翁，不是千万富翁，乃亿万富翁者也！陈嘉庚、李光前、李引桐是一条线上的三代人。不论这艰苦朴素是第一代海外闽南籍华商的传统美德，抑或是这一线的传统美德，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然而，如果读者以为我在这里是要刻意勾勒李引桐的日常衣着饮食之类，那就错了。笔者并不过多留意那些显在外面的东西，而更在意于那些隐在具体的人和事后面的指导思想、潜在意识和拧在他心底的那根弦。

李引桐对待他的那些穷亲戚、落魄朋友、街头流浪的穷人，他尽其所能予以帮助，他的指导思想是贫民意识。他对自己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待孩子，李引桐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对孩子的兴趣、爱好、婚姻等不过多干涉，不制约孩子的个性发展。二是教育孩子要有平常心，朋友情，尤其要交穷朋友，帮穷人。在孩子的择偶问题上，他明确地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找穷人子弟，不找富家子弟。可是，父亲毕竟不能代替孩子去选择。再说，他对孩子的婚姻又不作硬性干涉，于是就自然地要出现矛盾甚至悖论。对最终的结果，他也时常无可奈何。大儿子竞达的婚事便充分表露出他的这种心理失衡，可从这件事情上却不难窥见他的拳拳之情。

1959年秋天，刚满20岁的长子李竞达，带着青春的热血和对未来的憧憬远涉重洋，去往那“日不落”帝国的英伦求学，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物理学专业。对于孩子的志趣和追求，身为父亲的李引桐自然满心欢喜，企盼着长子将来能够学成回家助自己一臂之力。

竞达时值怀春年岁，风华正茂，免不了少年意气。其实，早在李竞达飞往英伦之前，李引桐的大女儿竞芳已经就读于伦敦大学。同学中还有一位后来成为李引桐大女婿的廖先生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许白雪小姐。二者都是中国

同学会的成员和追求上进的活跃分子，放大家玩得很好。李竞达的到来，更为中国同学会增添了不少活力。李竞达原本聪明过人，思想又极为活跃，加上他那出类拔萃的羽毛球技艺，很快成为一个人物，尤其在华裔学生圈内。

当时李竞芳与许白雪小姐同居一室，二人情同手足，日出而读，日落而寝。哥哥竞达少不了时常到妹妹处探望，跟许小姐自然也混得很熟。

不多久，两人双双堕入爱河。

少男少女，男才女貌，又身处异乡，同为天涯人，此情此景，他们同浴爱河，完全合情合理，令天下听客为之击掌叫好。但是，大凡好事总会生出些枝节，否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好事多磨之类的说法了。

要说两位爱侣遭到多么大的阻力，如“梁祝”、似“张生与崔莺莺”那般生生死死的爱，倒也不是事实。主要的阻力不过来自两点：一是双方都是富家子弟。原本门当户对，正好一双。谁知道那李引桐偏偏有言在先，“找媳妇要找穷家女子，富家的姑娘找不得，不但来日难以侍候，事业上也难成气候”。二是许小姐原在香港有男朋友。这样竞达与白雪相好多少有些不妥。

爱情与理性常常总是相背，李竞达与许白雪才不管那些，他们照爱不误。再说，这一对钟情少年远在欧洲，谁又能拿他们怎么样？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呀。

妹妹竞芳将哥哥的爱情告知了父母，李引桐夫妇陷入左右为难之中。可到底他们都是极明白事理之人。尽管夫妇二人从心底里希望自己的长子能讨得一位贤惠的贫家姑娘做媳妇，孩子的终身大事还得由孩子自己做主。毕竟未来的生活道路要由孩子自己去走。因此李引桐只能采取缄默的态度。

倒是许小姐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女儿在英国另有所爱，很是恼火，她立即打点行装，飞往伦敦，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许母究竟是富贾人家的主妇，许小姐一直被视作许家的掌上明珠，对女儿的前程牵挂担忧皆属常情常理。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希望孩子未来能有出息。特别是姑娘的家长，谁不想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靠得住的人和人家呢？再说，许家从来就是一大户人家，与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不独同宗，且为不远的亲戚。那许家在闽南的泉州地区可称得上名贵之户，有多少人家想与之攀亲而不得呢。在如此的家庭背景下，养尊处优的许家产生出的那种高贵与派头倒也合理。所以，在得知自己的女儿与人“拍拖”，想起以前女儿在香港交一男友，许家父母就很不满意，此番女儿远在英国，谁知道她交得一个什么样的男青年？她越想越急，想尽快地看看女儿，看看女儿的对象。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女儿所爱的男青年不理想，她便要坚决予以制止，甚至不惜中断女儿在英国的学业，把女儿带回香港，以免天天为她操心。

打定主意，许母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对李竞达进行了了解。不料，当许母得知她女儿所谈的对象是李引桐的长子，很快转忧为喜。原来，许家与李引桐早也认识，李引桐在香港宴请上流社会的名人时，双方曾见过面。相互虽无商业上的往来，可都是同一圈内的人。因此，稍作打听，便很快对李家的资产、商业系统、交往圈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李家的背景，许母很是满意。再加上两家都是闽南人，老乡之间便多出了一份格外的亲切感。先前锁在眉宇间的疑愁已消解大半。再说，那李竞达一表人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口齿伶俐，礼貌有加，体魄健美，本人又在世界著名学府就读，前程似锦。原想来做女儿英伦之爱“掘墓人”的许母，不想在多方打探以后，

“掘墓人”反成了“护花者”，行撮合之为。许白雪小姐倒是一个貌美、品佳、才优、境高的女子。不过，这一切都是李引桐后来才了解到的。

话说回来，李引桐人在东南亚，他兴许觉得孩子的婚姻大事最终还得由他自己选择，父母不便过多在行动上介入，不好因此飞到英国去干预。但这并不意味李引桐对孩子的终身大事不闻不问。其实，情势恰恰相反，在李引桐表面平静的背后隐匿着深深的担忧。最关键的还是，李引桐夫妇一直认定，他们李家的孩子应该讨一个贫家女子为妻。而这个许家小姐将来对竞达的事业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她在李家将扮演什么角色，李引桐心里一点都没有谱，横竖放不下心。说到底，还是他那个贫民意识在作怪。在他对孩子的潜意识的设计中，竞达的妻子，他李引桐的长媳就应该是出自穷人家门，忠厚老实，孝敬贤惠，勤劳朴素，任劳任怨。

哎，谁知道现在的这个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会把李家搞成什么样。

婚后不久，许白雪就回到新加坡，竞达没有回来，继续他博士阶段的学习。

儿媳妇回到公公婆婆身边生活，她在英国完成的一个阶段的学习后无意再往下读，宁可到社会上去工作，去积累经验。

与公公婆婆生活一段时间后，大出李引桐夫妇的意料之外，这个富家来的媳妇竟是如此的乖巧。她既有穷家子弟的那般孝顺和勤勉，又兼富家方有条件培养出的那种才干和能力，加之天生聪明美丽，故而很快就深得李引桐夫妇的喜欢。许白雪在公公的公司里任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引桐总是把儿媳妇带在身边，他为祖国做的好事中有不少也凝聚了许白雪的劳动和心血。

虽然，李竞达与许白雪的情缘没能善终，他们最后离了婚，许白雪后来嫁与影视巨富邵逸夫的公子为妻，竞达也又成了家。为了竞达和白雪的离异，李引桐夫妇心痛之极，李太太在那些日子里，成天哭泣，把眼睛都给哭坏了，足见二老疼爱许白雪之深。

不论结局发生了怎样戏剧性的变化，李引桐今生今世怕是改变不了他那执拗的贫民意识。他乐意帮助穷人，明白应该最大限度地把钱资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他不愿“锦上添花”，独想“雪里送炭”。他喜欢结交下里巴人，与黎民百姓共享欢乐。他穿也随意，吃也随便，保持着自幼带来的习惯。他自己出生穷家，讨的妻也是贫家姑娘，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穷人的孩子结缘……

这就是李引桐的为人风范和贫民品格。

第十三章 特区情结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

譬如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们这样说说吧），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污染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

——鲁迅《拿来主义》

开放的意识

据说美国的卫星在天上拍摄到地球上人造工程图像最为清晰可见者为长城。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荣耀。华夏祖先 2000 多年前建造的一项浩大工程竟然于 20 世纪末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不过，这仅仅说明了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面，那最大最为清晰的图像还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沉着某种封闭的东西，按精神分析学界的一个说法，叫做集体无意识。长城其实就是一扇门，一扇寰宇间独一无二的大门。秦始皇成就霸业之后所做的可以彪炳后世的几桩事情中，恰恰就有修城造门。那目的为了什么？为了把“我者”与“他者”分割开来，把自己关闭起来。“我”懒得与“你”噜嗦，“你”也少来讨我的厌，我们互不搭界。一言以蔽之，长城工程的伟大之中嵌着中华民族深重的封闭意识。

到国内旅游，免不了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城市越大，历史越悠久，门也就越多。咱们中国的首都北京便通城是门，说它是“门城”也不为过。天安门、地安门、广安门、前门、崇文门、建国门、复兴门、西直门、东直门……北京门多，西安、开封、南京等古城古都也到处见“门”。因为有城必要有城门，城越大则门越多，城越老则门越多。城有家的含义，它是众人之家的缩影。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老祖宗在理解和设计“家”的意义时，构造出了“关起门来养猪”、“猪在屋下门内”的图像，“豕”者，猪也。看来我们的祖先早已习惯把门关起来，把自给自足、自我生产、自我满足看作最完美、最理想的“家”了。再推而广之，一国即一“家”，我们常说“冲出国门”便是这番道理。中国的国门是什么呢？长城可以视为一种象征性国门。

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形是所谓的“一点四方”结构。“一点”者，中心、中央也，中华、中国、中州、中原皆循此意而衍出。所谓“四方”（亦作“四海”）者，是相对“一点”而言的。《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一点四方”既是古代文化在方位上的建构，又是一种行政制度。东西南北中，中为元、为原、为源。其余四方为次，为派生、为亚类。《尔雅》有注：“四

方为次”。据说黄帝是一个长着四张脸的怪物，他坐镇中央，统领四方。“一点四方”的文化结构是稳定的，不变的，封闭的，这其实也就是封建“大一统”的文化滥觞。加之几千年农业生产的缓慢节奏，和着自然四季的规律性运动，囿于一方土地的固步自封，恰好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内陆农业文明和静态的文化追求相吻合。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福建，看看厦门。

由于地处边远，与“中原”、“中心”、“中央”的文化背景差距甚大，福建早早就被确定为“蛮夷之地”。福建最早称作“闽”。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闽在海中，西北多山”。《国语》更有把闽当作“蛮”的说法，归属于南蛮中的一种。由于闽地多蛇，当地的土著又有崇拜蛇、将蛇作为图腾的旧俗，故被人说成“东越蛇种”。

从“闽”字的构成似乎也能看出一些文化上的意味。门中一虫，此图像极为生动。一则说明闽地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体制上属于“非我族类”，与其他“四方”中的夷（从羊）、戎（从甲）、狄（从犬）、蛮（从虫）相一致，都从动物。又因为其属南蛮一支，故与“蛮”一样，闽也从虫。二则说明闽是一隅封闭的地域。仿佛自然地域如同一扇天然的大门，将那个“虫”关在其中。于是，直接的解释为：闽地是封闭的，闽人亦是封闭的。三则说明，虽然闽地多山，自然屏障多，却毕竟没有完全封死，因为它还留着一个“口子”。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它可以诠释为出海口；从人文精神上说，东南之“闽”比之中原之“国”来得还要开放一些。后者是完全的封闭，关起门来就万事大吉，一切皆好（玉）。“闽”中虽虫，却为自己留着一个开口。它可以解释为闽人并非绝对的封闭，它尚有其封闭中的开放一面。这既是大海造就的人文品质，又是闽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在精髓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人类学称之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只要看一看那些福建人是怎样经过千辛万苦，背井离乡，远到异国他乡去创业，去谋生，去做生意，去经商，而且干得如此出色，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中原人想着法子制造以农业为本、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沿海的福建人（包括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如广东、海南等地人）却要漂洋过海去开创新的天地。有些人将这种品质归于地域上靠近海洋的优势。其实并不尽然。中国的海岸线很长，用历史的眼光看实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的历史岁月中，由北方海域“出洋”者相对少得多。从现在海外华人祖籍地的调查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闽、粤、琼等地。即使是文化相对于这些地方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反而不及闽、粤、琼诸地，为什么？乃是因为东南沿海在文化传统上与中原文化比较江浙一带的差距更大。其文化品质从根本上说也更开放一些。

“厦门”一名也与“门”息息相关。据当地人说，厦门、金门原本是海上的一大门户。此说一点不假。到过厦门的人立即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厦门、金门一如东南海口“咽喉”之双腭，紧紧地挟持着入海口。当年郑成功起兵收复台湾，正是以金门、厦门为大本营；出有“口”，守有扼，一派海上军事的方略图。加之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血脉相连。近年来考古研究证明，历史上从福建的东山、澎湖岩滩到台湾西部之间，横亘着一座“东山陆桥”。而在台湾左镇、关庙等地第四纪沉积层中发现许多动物化石与闽陆所发现的毫无二致，证明这些动物是通过原先的那座陆桥互相往来的。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厦门、金门自古以来就是大海之“门”，而大海之“门”与中原之“门”根本上说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比以华夏文化

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体系更为开放。历史上是如此，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也一直如此。

不用说，开放的文化、开放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其自然的造化。从地理状况看，厦门是个天然的深水良港，位于金门湾内九龙入海处，外围有大、小金门，大担、二担、青屿等岛屿为屏障。海岸线全长 230 公里，其中本岛海岸线为 56.2 公里。港区陆域宽度为 800 米—1000 米，可供充足的一线仓库和交通用地。厦门港湾宽阔，主航道水深在 12 米左右，避风、少雾，常年不冻，基本不淤，5 万吨级轮船可以随时出入。厦门处于海路交通的要冲，距香港 287 海里，距马尼拉 677 海里，距高雄 156 海里，距长崎 816 海里。厦门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口岸。它位于上海与香港航线中心，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然而，开放的港口城市不“开放”，这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实。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厦门成了众所周知的前线，碉堡对垒，炮声隆隆，政治标语两岸飞，政治口号朗朗地喊。没有城市建设，没有工业基础。厦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军事禁区。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厦门那扇关闭的大门到了要大敞大开的时候了。

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正式批准厦门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同时批准设立特区的还有广东省的三个城市：深圳、珠海和汕头。事实上，建立特区的思路和酝酿始于 70 年代末。中央关于经济特区的政策实在是英明之举，它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东南沿海文化传统中那种开放的禀性。

经济特区的政策赢得了国内亿万人民的由衷赞许，也获得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支持。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是粤籍和闽籍的海外华人，他们除了在理性上认为经济特区的政策是一个极佳的历史性选择外，更多了一份沉积于心底的浓浓乡情。他们从各个方面为特区建设出力。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华侨显得非常特别，他为经济特区（主要是厦门经济特区）所做的事情可以载入史册。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李引桐。

开放就是把门打开，让外面的人、外面的东西可以进来；里面的人、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出去。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不仅其本身必须具有开放的各种特点，而且对其他地方有着示范作用，对外国人来说也有着测试作用。但是，严格地说，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伊始只选择沿海的四个小城市（比如厦门、汕头、珠海），小村镇（深圳），涉及范围窄，人口少，即使出了“乱子”要收起来也很容易。允许试验，允许失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走经济特区这一步棋时本来并无绝对把握，只是形势确实逼着中国必须动大的手术方可见效，否则，其结果必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真是那样，中国被“开除球籍”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所以，改革开放从任何一个角度说都是顺应民心的好事。

邓小平是伟大的，他不仅说了，而且付诸实践——一种风险很大的实践，一种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伟大实践。

李引桐很钦佩邓小平的魄力和胆识，难怪他经常以“我是德美行的邓小平”自诩，道理就在于此。

李引桐是一个动于其外胜过言于其表的人。既然他认定祖国的改革开放

是一个历史性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按照他的一贯作风，就去干。为什么要去干呢？因为他将其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其实，谁也没有赋予他这种责任，准确地说，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

他觉得，开放首先并不见得是一种行为，重要的还是一种意识。没有开放的意识，改革开放永远是挂着“羊头”的“狗肉”。要使家乡的领导和乡亲们具有开放的意识，就得让这些人出去看一看，开开眼界。毕竟中国封闭了几十年，毕竟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不让领导改革开放的人出去换换脑子，怕改革开放永远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乌托邦。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又一次开始了他的“倒贴钱”行为：陆陆续续将福建省委的有关领导请到国外去看一看，考察考察，让他们在具体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时有一个参照的对象，知道哪些是资本主义好的东西需要学习，哪些是资本主义坏的东西需要剔除。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的今天，好几任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绝大多数副省长级的领导，一些具体的省部级单位的领导，比如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福建省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教育部门的部分领导和专家、教授、学者等都被他邀请到东南亚国家（主要是泰国）去访问考察，有些还多次被邀请前往。只要福建省认为需要，他都欢迎前去。由福建省组织的各类团队和由南安、梅山乡亲组成的各种名目的访问团，近十几年来多达五六十个，以至于个别德美行的接待人员私下抱怨：“德美行好像成了旅行社，我们成了兼职导游。”事实上，德美行个别职员的埋怨，平心而论，并不为过。不用说，那数也数不过来的经费是他个人掏的。德美行在泰国的总部和各所在城市的分行都有规模相当的招待设备，用于接待来自家乡的领导和乡亲。

如果说邀请福建省的领导到国外访问考察，是为了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中提高决策能力，具体操作中又有可比较的事例的话，那么，邀请乡亲们出去的目的，哪怕是让他们玩一玩，看一看，一则算是李引桐的某种类似于“慈善”的举动，另一层意思，而且是更重要的意思，是要通过出国观光游览，让乡亲们身临其境地接受人家优秀的东西，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和素质。此足见李引桐的良苦用心。他一直有这样一种思想：要改变祖国和家乡的面貌，至为重要的还未必是金钱和所谓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第一指标应该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则又要看其接受教育的程度、公民道德的水平、知法守法的程度、社会文明的程度等等。没有用现代化意识武装的人，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李引桐希望通过他的这些努力，提高他的乡亲们的文化和文明素质。如果认真读一下以他为主制定的《梅山基金会章程》，我们就会发现，在章程的开章条款中就有一项是“提高梅山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

李引桐对祖国的情形了如指掌。他太了解国人因为贫穷所形成的那些坏习气，太了解因为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给社会造成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而他在这方面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他自己的亲身调查和体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的80年代初期，一次，他邀请闽南的一些乡亲到泰国旅游，可是，过了很久，护照都办不下来。经过询问，才知道问题出在县一级办理出国的公安局外事部门。恰好其时他回到故乡，遂详尽地了解其中原委。原来那些具体办事的人员以国外外事部门没有“文件”（指签证）而不予“受理”。李引桐大为恼怒，向上级有关部门呈诉说，办出国旅游

手续，只要外国的邀请方提出邀请，并提供经济担保等相应文件，国内就得首先发放护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再到外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去办理签证事宜，这是一般的常识性知识。然而，公安部门竟然要人家外国使馆先签证他才办护照，岂有此理。你让人家外国使领馆的签证钢印往哪儿去敲？莫非敲到一张白纸上去？办具体事情者如此不懂事理，专业知识如此欠缺的例子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可谓多矣。这桩“小事”使李引桐深感改革开放的困难，原因并不在于中央的大政方针，实在是下面具体办事水平（包括业务能力、文化水平、思想道德、办事效率等）太低。一句话，太保守，太封闭。

另一件事说起来也很小，对他的触动却不小。

有一次，他到厦门考察，厦门市安排他到享誉海内外的鼓浪屿岛上观光，所到之处，杂物遍地，狼藉一地，海面上漂浮着垃圾。李引桐当即就与陪同他的外事办官员开玩笑说，现在开放了，国内外的游客都来了，鼓浪屿这么脏，要用什么“脸面”去给人家看？

这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小事。笔者两度赴泰国调访，都听到李引桐讲过同一句话。据经常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人说，福建省的领导访问泰国的时候，他也不只一次地对他们讲过这句话：“我们中国一直被称为是礼仪之邦，古代把泰国的这些民族称作‘蕃那’（即汉语中所说的‘蕃仔’，未开化的土著——笔者注），可是今天把两国的管理水平和公民道德比较起来，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比不上‘蕃仔’的泰族人。”这番话大抵是不错的，只要到过泰国这个佛教国度的人，亲身感受一下那泰族人民对你行的佛礼，那份礼节，看看街边的鲜花绿地，服务人员的微笑等等，应该对李引桐那些话能够产生认同感。

大凡事物总是在比较之中方能显示出孰好孰坏，孰优孰劣，著以国家而论，要进行比较，首先得以开放作为前提。闭门锁国，坎井之蛙，夜郎永远自大。曾记否，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总把自己视作天底下日子过得最好的族类，动不动就要一本正经地履行“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出苦海”之类的历史使命。不独把自己的领袖视作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而且把他愣是当作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是啊，人无交流，永远将自己看成人类的精英，国门不开，国人永远以为他们是其他族类的救星。

还是言归正传，继续李引桐的鼓浪屿之行吧。

往返于厦门与鼓浪屿岛的轮渡拥挤不堪。船一靠岸，那些龙腾虎跃的少年后生早早就夺门而入，摧枯拉朽般地把寥寥两排座位给臀覆完毕，两旁的座椅上坐满了年轻力壮的男女，皓首银丝的老者、佝偻姬妇反而惨兮兮地站在小年轻的旁边。李引桐实在看不下去，他对同行的官员们说，这轮渡上人多座位少，现在的民众又达不到主动让座的道德水平，“老弱病残孕专位”形同虚设，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与建设特区所要达到的要求相去甚远。在李引桐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来不可须臾分开，抛弃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理想，事实上等于扼杀了物质文明。

对于福建省的改革开放，李引桐可谓是情有独钟。有一件事情，距离改革开放的80年代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李引桐对那件事情却一直耿耿于怀，久久不能忘却。那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李引桐夫妇、李成掬、许白雪一行四人回到祖国，广州、北京、湖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走了一遭（此行的详述参见本书第九章），当他们一行到福州的时候，欲打电

话与广州、香港等方面联络行程的有关安排，怎奈在堂堂的一省首府福州，竟找不到可以挂长途（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民用电话，那次可算是把他给弄惨了，为了打那几个电话，一行人后来硬是从福州乘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广州才算最后打通。呜呼！这可称得上是“万里长征”式的打电话了。怪不得李引桐的印象这么深。虽说此事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一个沿海省份居然缺乏基本的通讯设施，实在够寒酸了。

改革开放以后，李引桐又多次回到福建，“文革”期间的那次经历总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同时一个想法也很自然地出现于他的脑际：福建作为沿海省份和对台交流的前驿站，应该首先考虑将远远滞后于发展的邮电通讯事业搞上去。为此他向福建省委的主要领导项南和福建省的有关部门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亲自与当时的邮电通讯的一些主管讨论此事，希望福建省能够将改善邮电通讯事业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行业来发展。道理很简单，外商到福建来投资，没有通畅的邮电通讯，简直就可以说无法做生意，特别对那些在国外用惯了便捷的通讯工具的商家，倘若跑到你福建做生意还要采用原始的通讯方式，那钱大约是赚不到的。

李引桐的“游说”显然是起作用了。福建省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果然以发展邮电通讯作为第一战略目标来着重发展。而广东省的第一战略目标则是发展交通。所以在80年代的一个很长时间内，福建省的通讯水平（包括程控交换设备的先进性、电话的使用数量、通讯效果等）列中国各大省区和各大城市之首位。曾有一段时间，报界对福建省大力发展邮电通讯事业予以充分的褒扬。

哦，“自由港”

李引桐从来就不属于那种脑子里浮出一点什么就和盘托出，虎头蛇尾的人，也不是走一处就胡乱做随感随想式的指示，不负责任地品头论足的人，更不是那种装模作样到基层，前呼后拥地围一大群人，摄像机前面指点江山，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人。他的决断前提是缜密的调查，他的思维特征是通盘考虑，一脉相贯。这一点，读者只要看一下本章附件就一定会同意笔者所作的如此评说。

或许有很多人并不知道，1980年厦门被中央辟为特区时，真正实施全方位特区运作，即全部享受特区政策的地方并非厦门全岛，而仅限于一个2.5平方公里的市郊，按现在的说法是城乡结合部，那个被称作“湖里”的小地方。严格地说，湖里不过是一隅农村，没有基本的工业体系，没有良好的交通，没有与特区相适应的合格通讯设备，不过是圈出两平方公里的半荒地，然后标上一个“特区”的名字而已。任何在那时到过湖里的人心里都明白，那鬼地方不过是一块“实验田”，“实验”好了算是一个范例，“实验”不好，也就是那一下点的事。

1979年，李引桐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将厦门辟为特区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抽空回到故乡，并专门到厦门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当李引桐在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的领导陪同下去到那个被叫做湖里的小地方转了一圈后，大为失望：“嘿，一个2.5平方公里的特区。难道这就是特区？还不够人家一间大工厂大。门开得不够，门槛太高。开放开放，开而不放。”讲到这里，他显得有些激动，为什么老人会这样呢？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对

于祖国的挚爱他从来不是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在他一生中，祖国有两件事情最令他高兴：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人；二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第一件事，祖国独立，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第二件事使祖国真正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得到彻底改变成为可能。老人对改革开放的期待如此之高，却不料经济特区仅是这样一块弹丸之地，着实很令他失望。这是李引桐在看了湖里以后的感受，他也如实地告诉了在场的福建省及厦门市的领导。当时与他同往湖里的是厦门市一位姓汪的副市长，李引桐向这位汪副市长建议：“你们应该到国外去看一看，了解人家在办特区、办自由港方面的经验。”他还强调，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对他的说法当时就有人持不同的看法。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做出今天这样的决策非常英明，你李引桐普通华侨一个竟然对特区不以为然。我们无意对任何人进行指责，完全可以想象，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不久的时间内，人们脑子里残留着一些“左”的观念十分正常，倘若有人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未卜先知者，仿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今天的观念，显然并不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场的人们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对李引桐的观点不以为然，反倒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讳言，改革开放之初，福建省的许多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的开放意识远不及李引桐。好在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很清楚这些事实，故而对像李引桐这样既有爱国热忱，又富有决策眼光和运作经验的企业家的意见非常重视。因此，尽管有一些人对李引桐的观点不以为然，却也没敢过分流露，毕竟省委书记在后面为这个华侨老头撑着呢。

李引桐在厦门经过一些日子的详细调查和了解，果断地提出了一个“在厦门实行自由港”的设想。特区不能只搞两平方公里，要把全岛126平方公里全部囊括之（这是80年代初的厦门面积，今天，厦门的总面积已经为1516平方公里，下辖六区一县，人口也由当时的20多万升至120多万——笔者注）。自由港是什么概念，其时敢说偌大的中国知道什么叫作自由港的人委实不多。尤其是那“自由”二字早把许多人的魂都吓没了。李引桐似乎觉得有必要讲述清楚，干脆甩了一个类比：“就是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老人家一语即出，掷地有声，轰轰作响，立即在上上下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李引桐边调查边对厦门特区进行构想，并对特区向自由港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了许多可操作的条款、包括保税、落地签证、货币流通、自由兑换等等。他认为，厦门面对台湾，闽台又同属一个文化区，两岸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完全一致，如果在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构想得以实现，那么无形中便增加了两岸交流的可能性。政治上，两个绝对对峙的政体因此有了一个缓冲的区域，这对最终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很有利。

在管理方面，鉴于国内缺乏对自由港的了解和管理经验，李引桐设想在建立特区的开初阶段，具体的管理方法可以引进香港的管理经验，包括请一些有经验的专门管理人才来，把桥头封起来，入口就设在集美。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特别行政区，地理上很容易操作，因为厦门本来就是一个半岛，与大陆连接靠的只是一个集美长堤，只需在集美入口处设一关卡就行了，比深圳方便得多。这样，厦门就成了一个“中国大陆上的香港”，届时所有进厦门的人都得办特区通行证，便于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很适宜进行特区的各项特殊政策的实施。他进而引证说，“我刚从巴西回来，巴西就有一个自由港，叫板浪（音译），由人家来养，受益最大的却是巴西。”此外，他

还把香港、澳门、意大利的热那亚（历史上也被当作自由港）等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建的自由港一一加以罗列，对自由港建设的经验和认识娓娓道来，像是在讲《天方夜谭》里的迷人故事，又似在勾勒明日特区的蓝图。

为了打消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的一些顾虑，他进而解释说，所谓自由港无非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一些罢了。厦门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小城市，加上长时间一直作为军事上对付台湾的前线，国家也没有在此进行什么大的建设，没有重要的工业、科学技术基地，没有现代化的建筑，除了那些用坚固的钢筋水泥筑起来的堡垒和漫长的海岸线外，还有就是因军事对峙给人们带来的草木皆兵的政治氛围和心理感受。据原泉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连先生介绍，那个时候，厦门沿海一带经常发生两岸的炮击事件，连母猪听到炮弹飞行的声音都知道迅速卧倒。可见，在这样的地方搞一些特殊的東西，共产党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且，从厦门的地域来看，即使自由港真正建立起来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大量涌入，共产党也因此多了一种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机会和经验。万一局势控制不了，尚可很快收缩，共产党很容易加以控制。再退一万步，就算一个小小的厦门“烂掉”——彻底失败，对中国共产党，对大陆也无碍大局。

李引桐一路调查，一路设计，一路视察，一路风趣。不少同行者在钦佩其眼光、才能、经验的同时，不时被老人家的幽默逗得乐颠颠的。一位名叫王克风的政府行政干部一路跟随着，亲身感受、亲眼目睹李引桐的特殊才智，忍不住说，他跟随过许多省委领导视察过厦门，听到过不少人对厦门特区所作的未来设想，从未听到过一个人对厦门特区做如此细致的规划。王克风非常认真地对李引桐说：“李先生，您应该把这次在厦门所做的调查和您的设想完整地写出来。”

李引桐回答：“我可不会写呀。”

“我来写。”王说。

李引桐默许。

“找一次机会，我详细地听您把对厦门特区的构想完整地叙述一遍，由我来执笔，写好了再给您看，不同意的地方您修改……”

果然不久以后，在1981年7月，王克风等人受德美行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引桐的邀请赴泰国考察，他们再度就建设厦门特区的一些问题拜会了李引桐。李引桐把对厦门特区的构想一一作了描绘。7月8日，由王克风、陈俱等人整理，一份《李引桐先生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形成了书面文字。不久，这份材料便被打印成了铅字，同时还配有红头文件，在福建省和厦门市的会议上，领导的案头上频频出现，时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它对福建省的决策部门和决策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83年，福建省发生了一件挺稀奇的事情。就在新年伊始的元月，省委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曰省委扩大会。奇怪的是，此次大会，在会场的中心位置旁边出现了一个以往从来不曾露过脸的老者。会议代表都到齐入座后，省委书记项南站起来主持会议。与往常不同，在介绍与会代表的时候，项南说，今天，我们专门邀请李引桐先生参加我们的会议。李引桐先生是我国的爱国侨领，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自从厦门被中央划为特区以来，李引桐先生多次亲临厦门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他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建议，特别是李先生“自由港”的设想，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了我与厦门

市委书记周尔均的汇报，在了解了李先生将厦门特区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港”的设想后，对这个主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邓小平说：“这个华侨提得好。”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福建省委、厦门市委以及福建省的一些厅级部门都先后下发了文件，印发了李引桐关于在厦门特区建设自由港的意见。

从 80 年代中期到 1995 年的一段时间内，福建省，尤其是特区厦门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自由港”大讨论，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出现大量的报道和专门文章，街头也随之出现了“自由港”字样的宣传广告。不少商家亦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大规模商业上的策划攻势。一时间整个社会，很是热闹。老百姓甚至纷纷传言，厦门岛很快就要实行“封港”，集美大桥边上的那个金字塔式的关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修建完成，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那匆匆建起的建筑物不是为了别的，正是“封港”时的新海关。其实，人们只要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眼，便会很自然地相信那些风风火火在民间传扬的说法并非缺乏想象力，还真是那么回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一传说，那一目睹，更加助长的原本就沸沸扬扬的“封港”可信度。许多人因此加快了调入厦门的步骤，托亲拜友的、走后门的、送礼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不想早些进入厦门，谁知道“封港”以后还能不能进入。民间传言还更有甚者，说是共产党打算在厦门建设一个比香港还要开放的自由港。国内其他一些城市的新闻媒介也竞相进行了报道，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

然而，这个“热点”的起因是什么？它缘何而起等等一些问题，多数国人并不十分了解。至于政府在谈及“自由港”时也有不甚明朗的地方，进入 90 年代中期，“自由港”讨论好像突然“冷”了下来。

对于这一系列事情的变故，知情者并不多，笔者亦不敢说全盘了解。但是，有一点很明确，这就是：“自由港”的设想首先由李引桐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时福建省、厦门市主要领导的支持，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里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

1982 年，邓小平到厦门视察，听取了省市各级领导的汇报。邓小平并没有急于做什么指示。当时集美区的陆书记，因年纪轻，比较敢讲话，他瞅准机会对邓小平说，有一位海外华侨对厦门有一个全面的建议，要把厦门建成像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并乘机将有关细节也一一加以叙述。邓小平当时只管耳听，久久未作反应。末了，邓小平才说了这样一句话：“明天我们乘车转一转。”其实，此前邓小平就从福建省委、厦门市委领导那儿听取了有关李引桐将厦门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港的构想的汇报。人们相信总设计师也已经看到了由王克风、陈俱两人合作整理的《李引桐先生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对于李引桐的厦门特区构想，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次厦门之行，邓小平就是来实地进行考察也未尝可知呢？！因为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这事理的逻辑定然就是如此了。因为事实明摆着就是那样。

第二天，省、市领导陪同邓小平乘车视察整个厦门。车队到了集美大桥桥头处，邓小平招呼把车停下，随后他下了车，眼看着一条长龙般的大桥将厦门岛连接起来，大桥旁边那修建于 50 年代的长堤横卧于身边，邓小平似顿然有悟，他像是在对周围的人说，又像在自言自语：“厦门是个岛屿呀。”

仅此一转，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清晰了许多。

仅此一语，决定了厦门特区未来的整个思路和脉络。

再一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离开了厦门，离开了这个曾作为前线的岛

屿。一个更宏伟的设想已经形成。

不久，从北京传来电文指示：厦门可以实行某些自由港政策。

又据说，邓小平还未离开厦门的时候就作过类似的指示。此间细节已经不是笔者有能力一一核实的了。但是，厦门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经由邓小平首肯一事则千真万确。

从此，整个福建省，特别是厦门市立刻展开了为期不少于 10 年的轰轰烈烈的“自由港”大讨论，并在全国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海外也有了一定范围的波及。

据说，历史发展到 90 年代初，10 年的“自由港”大讨论方兴未艾。后来，中央有一位领导来到厦门也作了一个指示，自由港还是不要提，提厦门港就行了，厦门可以实行某些特殊政策。这样，原先更多流于理论的讨论，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

哦，历史的岁月如流水，缠缠绵绵地逝去。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各样的观点、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中国在变化中迅速地进步，特区在如梭的时光中变得更加美丽。今天，当人们再度来到厦门，一定会惊诧地发现，她好娇美。原先的丰姿依旧，鹭岛的凤凰花如火般热烈，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群展示着现代化的风采。过去与现在一并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特区的故事；也悄悄讲述着一个人的故事：李引桐的特区情结。

附：李引桐先生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

（1981 年 7 月 8 日于泰国曼谷）

泰国德美行公司董事长李引桐先生，是陈嘉庚先生、李光前财团中有见识、有创业经验的实业界侨领。1979 年 5 月，曾应省革委会、华福公司的邀请回到福州，毕际昌、张遗副省长向他咨询关于特区建设的意见。李先生建议：特区建设不宜脱离省情与福建在外华人的实际情况及习惯，要求又大又洋是一时办不到的，应该先抓可行易办的事业，使外籍华人、港澳同胞可得现利的合营中小企业，抓紧交通电讯的建设，抓紧体制和作风的改革，切忌空谈。

这两个月来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省来泰考察组。当李先生听到省委项南同志有关厦门特区建设的看法，十分高兴，特地向考察组谈了他对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现摘要整理如下：

一、根据中共中央“大胆引进外资侨资，勇敢进入国际市场”的指示，厦门特区应是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港口城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共产党领导和有效控制下的一个“自由港”和加工区。厦门特区应充分体现它的“特”字，其做法类似于英国对香港、葡萄牙对澳门，好处在于可以大大加快经济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厦门不是殖民地，而是由福建省派员直接管理的特区。根据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办特区的经验，根据厦门市（包括鼓浪屿）本身的建设历史经验，厦门市应该成为共产党领导下与节制下的外国资本、华侨和港澳同胞资本、独立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以及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并存的多种经济港口城市。多种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同有利的。为了安置劳动力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外资和华侨、港澳投资者的门户应该是敞开的。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是有保障的，其利益应不低于或略高于

其他地区的利益。

二、厦门特区在几年内应首先把本岛（包括鼓浪屿）建设好，待几年后有条件再行扩大。先是岛内原有居民进行登记，发给特区居民证，采取类似香港的做法，实行户口管理、征收人口税、所得税，都由特区政府来办理。内陆来的工作人员应申请入境身份证件，有限期地在此工作。所有外国及港澳投资者、旅游者，凭其旅行证件进入厦门特区，不必事先申请，但到厦门时都得依法办理入境手续，严禁非法偷渡与移民。

三、厦门特区政府管理地皮、金融、税收，可以迅速获利，以扩大市政建设。建议允许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投资者租地建筑，办企业，租期 10 年、20 年不等，到期可续租或收回。如欲拍卖，可以投标，原有者有优先权，可享八、九折优待。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外来投资，另方面可加速城市建设。特区政府的收入，除规定比例上交中央和省之外，作为扩大特区建设的资金。

金融要控制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手中，流通货币可使用外汇券或另发只限于厦门特区流通的货币。对外国银行应该欢迎，藉以支持我国银行。

四、外资、侨资、港澳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雇佣中国方面的人员、劳动力，可以由厦门特区政府人事部门、劳动部门推荐，外资企业选用，或由外资企业提名，特区政府调给。华侨投资者为了安排他们的故乡亲友，应适当优先使用。

工资待遇，特区政府应有大体章程，由外资企业与雇员、劳动者具体双方议定。总之，外资企业有按特区政府规定用人，付给工资之权力。

五、厦门特区设置港口海关，是“自由港”性质的海关。大致是：除烟、酒外，不予课税；毒品、武器、黄色书刊物品要严禁。集美设立海关，特区货物进入非特区，要在集美报关纳税。特区人员、居民、外国人进入非特区，也要经申报、批准。外国人限一日可以往返漳泉地区旅游，应予方便。特区政府鼓励居民到岛外郊游，方便申请，验证放行。

六、外国货物及闽台两省的货物交流，通过香港转运十分困难。厦门港变为自由港后，经过外商、侨商、港商之手转运于高雄、台中、基隆自由港，既合法又方便，台湾商家必定欢迎。福建沿海十分丰富的而台湾又十分缺乏的海盐、非金属矿物可以销台，台湾过剩的化肥、水泥、纺织品、电器等，可以销闽。海峡两岸的海运距离（150 海里以内）近，是有利于双方的，台湾人如来厦门投资，应该欢迎。

七、要从举办旅游业入手。凡事必由小到大发展，海外华人创业无一不是由小到大，特区建设也不例外，办旅游应先因陋就简。泰国虽拥有举世第一流的大旅社，而其海滨新兴旅游区则盖有很多简陋平房草屋，收费便宜、实用，吸引了许多国外游客。厦门特区仍可仿行，也可设游览船，客人住在船上，登岛游览。旅游既可创汇，更是敞开让人观瞻，而后资金技术才有可能接踵而来。办好旅游业，先要解决好食、住、玩、拉（厕所），就是说要办好服务行业，重视清洁卫生，搞好污水处理，保护环境。

八、教育文化工作，都应划归特区政府直接管理领导。允许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来厦门大中学校就读。国内外各种书刊一般也应允许在特区内发行，特区年可以多办几份报纸，至少应有一二份英文报刊。厦门大学应办成广泛吸引世界上科学文化，开展国际交流的高等学府，类似目前的香港大学。

九、广办特区，可以利用与香港、澳门相邻的深圳、珠海，变为“自由港”，作为通往国际市场的走廊。福建办特区的条件不如广东，没有类似港澳这种现成的自由港可以利用，因此，厦门比之深圳、珠海，门要敞得更宽一些，对投资者的利益应该优厚一些，取得利益可能要迟缓一些。要从小、从简，从几百万华侨工作做起，使他们爱国爱乡的夙愿可以得偿，他们的利益可以获得，他们故乡子弟可以适当安置。应该是以侨资带外资，先以方便探亲旅游工作带动工商业投资，先从侨务工作、旅游工作、投资指导工作做起。当然，水、电、交通、通讯等都要抓紧建设好。

十、李先生最后说：诚如中共中央所说，建设特区引进资金应该大胆。厦门特区政权在共产党手上，办一个阶段以后，发现不妥之处可以改进，也可以收下来不办。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办特区的成功经验很多，都是华人经手办起来的。现在中共中央、福建省委下决心要办好特区，我们海外华人是十分关心的。厦门地区（包括漳泉地区）20年代、30年代的建设也是海外华人帮助当时的政府办起来的，而且卓有成效。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老年爱国华侨，十分高兴与愿意全力支持厦门特区建设。

李先生说，以上只是个轮廓，许多具体细节应请有关专家介绍港澳的做法，详细研究。省政府如欢迎，他可以再回去，将他几十年国际贸易的经验，对建设厦门特区的意见，提供给省政府参考。

（王克风、陈俱整理）

第十四章 乡里乡亲

当我们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弱者并使他们成为和我们同样的人时，当我们公正地给予强者以感谢和尊敬而不致于使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时，当我们即使是以交换的名义从我们的邻人、朋友和与我们同样的人接受任何东西而向他们致意时，我们就能感到这种合理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享受。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1996年9月。

厦门。

天高气爽，云裹着夏日的余热，释放着人们压在心底的热情。

84岁高龄的李引桐再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故里。

他，这一次来干什么？来投资？来办厂？来省亲？

有人忖度，有人猜测……

集美，这个因陈嘉庚的故乡而扬名天下的海滨小镇，还是那样秀丽，还是这般旖旎。绵延的海岸线曲曲弯弯，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热热闹闹。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正大门已经挂上了“集美大学”的牌匾。据说将集美学村建成一所大学一直是陈嘉庚先生生前的愿望。这个愿望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总算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写的校名赫然树立。历史在悄悄地延续，一切都在无声中得到某种阐释。

李引桐来了。

他是来捐资的。

少数知情者感到诧异：集美并不是李引桐的故乡呀。更何况历史上还发生过迄今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集友银行”事件，更不是所有人都对它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和看法。误解、揣度、评说还在继续。他李引桐怎么就如此多事？对于他捐资集美大学一事，甚至他的家人都不是个个理解，那与到梅山办学毕竟不一样。

李引桐果真来捐钱了！

许多历史的恩恩怨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无数个人的利害得失被他排除开去。有什么比办教育的事情更大？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可以比教育下一代的事情更重要？何况，这里是陈嘉庚的故乡，是李光前的半个“故乡”，是海外闽南籍华人实业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理想、实现梦想的附着地。

1996年9月6日《厦门日报》在头版以“李引桐先生向集美大学捐赠人民币300万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本报讯（梁振坤）：旅外乡亲、集美大学高级顾问李引桐先生9月3日到集美大学参观，并捐赠人民币300万元。林敏基副校长代表学校对李先生这种捐资兴学的义举表示感谢。

李先生祖籍福建省南安县梅山乡，早年曾是李光前先生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李光前继承陈嘉庚爱国兴学的传统，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复兴集美大学、厦门大学作出过巨大贡献。而李引桐先生正是光前先生办学思想的

支持者和具体执行者……

李先生十分景仰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精神。他对遵循陈老先生遗愿创办的集美大学十分关注，此前曾两次应邀到集美大学参观。

1996年9月26日《泉州晚报》也以此事为引子，刊登了李斯安、刘坤来的文章：

身是异乡客 肩挑故乡月
——爱国侨胞李引桐先生桑梓情

今年9月上旬，正回乡探亲的爱国侨胞李引桐先生前往集美大学参观并捐赠人民币300万元，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9月9日，李先生参加了集美大学首届校董会成立大会。当天下午，省委书记贾庆林，省长陈明义，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等省市领导亲切接见了李引桐先生，盛赞他再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李先生祖籍南安县梅山乡，早年曾是著名侨领李光前先生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对李光前先生十分敬重，对“光前学村”为祖国培养人才，为家乡人民谋幸福的创举十分敬佩并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他一直十分关心光前先生所创建的“光前学村”的发展，积极主动地为学村添砖加瓦。多年来他先后捐资100多万元为学村兴建教学楼、宿舍楼、礼堂和购置教学仪器、交通、医疗器材等设备。

为了让家乡学子更多地考入高等学府、多出人才，从1982年开始，他率先在家乡竞丰村设立常年奖学金，每年捐资人民币4万元，奖励该村中、小学的“三好学生”以及升入中、高学校的学生；后来，李先生把奖学范围扩大到全南安市，设立“李引桐奖学基金”，奖励市、镇每年高考成绩名列前10名的优秀生，负责这20名优秀生进入高等学校完成学业的奖学金，每年每人2500元人民币。目前，已发放奖学金近100万元……

好些农民，一辈子识不得半斗的字，受尽了因没有文化而带来的愚昧和无知的痛苦，甚至受尽欺侮。他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为了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多读一些书，再不至于像自己一样在文化与知识面前做个睁眼瞎。好些农家的孩子倒也争气，虽然乡下的读书条件比不得城市，可他们却有比城里小孩更多一份的吃苦精神，因此，书也读得呱呱叫。然而，中国的广大农村，物质条件极差，好些争气的农家子弟，考上了大学、中专却无缘进入学府高墙。他们交不起那其实并不昂贵的一丁点学费、杂费、生活费。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何止百千。

虽说梅山是侨乡，它并没有因此改变其封闭落后的农村性质。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没有因此改变那里农民的贫困状况。当然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或者改变农家子弟们考上更高级学校却无法继续就读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每当李引桐回到故里，总不免听到这些来自乡里乡亲们的声音。1989年，李引桐除了在原先奖励小学“三好学生”的基础上，实行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系统性资助外，还将原先单纯对梅山镇学校的资助扩大到了整个南安市的更大范围。

这样，南安市和梅山镇的孩子们，只要是最优秀的学子，最争气的学生，就不用再担心自己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了。

农家子弟是朴实的。一当他们得人以惠，受人以恩，便知道如何去加倍努力，知道如何去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们也忘不了以各

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李引桐的感激之情。这一切又洋溢着另一种同样令人感慨的情致。笔者随意撷取几束奉献给读者。

1995年9月3日,《梅山乡讯》刊载了一封邮自青岛海洋大学的信。

尊敬的引桐先生:

我是梅山芸塘村人,第二届“引桐奖学金”获得者之一。1992年我考入了青岛海洋大学,这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奖学金,对于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的我来说,如及时雨一般,使我能够进入大学并安心学习。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此时满怀感激之情的我,多么想当面对您说声“谢谢”!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到书店买本《新华字典》,当时精装本是一元一本,简装本是八角一本,还不太懂事的,我,盯着精装本不离开哭着要买。我妈在那里犹豫了半天,为了节省两毛钱,最后还是不顾我的哭闹,买了简装本。每逢交学费,我都要苦恼好些天。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学费才10元,然而我还是交不起。借惯了钱的母亲,不好意思再去借了。为了念书,我只得可怜巴巴地自个儿去向邻居借了5元。上了中学以后,虽然经济有所好转,然而学费却成倍增加,我就更为交学费发愁了。1992年我考上了大学,这实在是让人喜欢让人忧。正当我发愁的时候,传来了令我振奋的消息——我获得了“引桐奖学金”。从来就不信神的我,破例烧了一回香——谢谢上帝!——不,谢谢您,引桐先生!

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您,慷慨解囊!我从小就懂得钱来得很不容易,我要对得起这笔奖学金,不能辜负您爱国爱乡之心!三年来的大学生活,在学习等方面,我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就说外语吧,刚进校时老是考不及格,名次一直是位于班级后列,想起了先生的赞助,我才有深造的机会,因而有一股刻苦学习的劲头,经过三年的努力,已赶上并超过了别人。我的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我所取得的这一切,是与这一笔奖学金分不开的。让

我再说声:“谢谢,引桐先生!”

谨致谢意!

陈佳丁敬上

1995年8月10日

这是一封文采平平,却感人至深的信。说起来可称得上是一封无法投递的心笺。一介青年学子,远在祖国北方,内心却深藏一份一直无法向他的恩人表述的感激。他只得将它保留在内心深处,将它化作学习的动力。他做到了,如同信里所说的那样。由于没有机会诉说压在心底里的那句话:“引桐先生,谢谢您!”于是,他只好借助这《梅山小报》,了却自己的心愿。

去年岁末,李引桐回到梅山,笔者前往看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少不了在梅山小住几天。一日傍晚,我只身一人徜徉于梅山的山水之间,体悟着这块土地所蒸腾出的那股子灵性,感受着此隅地理人文的异样魅力。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叉道口,一张稍呈退色的红纸吸引了我,借着夕阳,我看出这是一封类似于“感谢信”的文字,这不是一封正规的感谢信,它没有标准的格式,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人情味。我当即拍下了这张很不起眼的红纸。

上面的内容是这样的:

宗叔引桐美名传遍五洲四海。他老人家爱国爱乡,热心家乡的公益教育事业。宗叔虽身居海外,但心怀故里。自一九九四年开始又加重奖本后田村

荣升大、中专的子弟。我们后田村众乡亲衷心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在此并向为争取奖学金而不辞劳苦的香港梅山办事处的先生女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后田村乡亲

10月17日

红纸上的短短几行字里就出现了一些错字错标点现象，说明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可是，人们绝对相信，红纸上所表达的朴素情感的自发性。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人都在内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张贴在公告栏、墙头上的大红纸上的内容多数都是政府行为，不乏令人生厌的东西，尽管文字优美、文采飞扬。笔者本人看过太多这样的东西。但眼前的这张红纸却让我感动，因为它全部都是真实的。语词虽不美，情感则沁人心腑。

那是老百姓的真。

那是后田村乡民简单的表达方式！

他们或许觉得他们的这些积淀于内心的情感不便当面向李引桐先生——他们的宗叔表达，或许他们认定自己的嘴太笨太钝，羞于启口，或许自然，胆子大些的也有。

1995年，梅山的一位李氏宗亲家里忽传喜讯，孩子中的姐弟两人在同一年高考中考进了梅山中学的前10名，姐弟俩同时获得“李引桐奖学金”。全家人喜笑颜开。入学的前一天，父母带着两个争气的孩子去感谢李引桐，说：“宗叔，谢谢您帮助我们的孩子读大学。”

李引桐说：“我要感谢你们才是呀。”

孩子的父母哑然。

李引桐笑着继续说：“我感谢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孩子带头得到这笔奖学金。这就像抢炮花。炮花挂在空中抛来摔去，大家都想点着那炮花。你们的孩子就是点着那炮花的人。我怎么不要感谢你们呢？”

天下的道理千万万，人人口一张。李引桐资助了人家，还要感谢受到资助的人。岂有此理？哎，他偏有此理，而且说得还头头是道；没有一点矫揉，没有一丝造作。

这，正是李引桐的人格魅力。他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其兴趣所至。他自己没有任何负担，也不需要其他人有任何的负担。有负担对双方就都不自然，也就不自由了。许多人体会不到个中道理。

不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尽管孩子的家长可能没有彻底明白其中的奥妙，却没有妨碍双方情感的真诚表达。都是自然的，因而也都是美好的。

说起李引桐为家乡教育事业所做的事情，他本人早已经忘却了大部分。只怕是梅山乡亲也无法一一叙说清楚。数十载的岁月，他投了多少的财力，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别人名下的，有谁能够一笔一笔地算得清清楚楚？又有多少乡亲受其恩惠？大学的、大专的、中专的、中学的、小学的、幼儿园的，又有谁能够细细缕述？下面的统计亦只是个梗概。

年代	捐资梅山 教育经费 (万元)	修建学校及工程 (平方米)	赠送物品
1975		6900	
	50	(包括国专小学一、二、三、 四校及幼儿园教学楼、宿舍、 礼堂等)	彩电、收录机 等
1981			
	62	4000	
1982		“泰华楼”一栋	赠国光中学
	10	维修国专礼堂	汽车 2 部、电
	20	解决中学供水设备	影放映机及
1993	50	1982 年起每年 4 万元奖学金	电化教学仪
1994	2000 (港币) 3	与其弟李鸿陵建立梅山基金	器一批 20 余
至今	亿铢 (约合 1 亿 多人民币)	会	吨进口口管

此外他还对兰园中学、兰园小学、泉州培元中学、华侨大学、黎明大学等进行捐资办学。此次又捐款 300 万元给集美大学。如果将他早年对厦门大学那无法命名和计算的钱也一并归入，李引桐花费于福建省的教育开支不少于人民币数以亿元计。李引桐对家乡的教育捐资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他个人对其所有义举从没有记录，亦未委托他人记录。加之，一如我们曾经叙述的那样，李引桐花钱属于典型的“天女散花型”，以至于迄今已经很难准确地统计出在梅山、南安、泉州、厦门、闽南乃至福建省，究竟在教育事业上他总共花去多少。

时光悠悠，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几十载耳。别说在其他方面还做出过那么多的贡献，单他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所做的一项，便足以彪炳后世了。然而，当福建人提起为家乡兴学办教育的楷模时，总是提到陈嘉庚、李光前，李引桐则没有人提及。“李引桐”这个名字长期沉寂的事实却恰恰从另一个侧面托起了一个同样伟大的人格。他愿意将自己的钱财化入陈嘉庚、李光前两位闽南先辈和师长的英名之中，愿意永远当一位无名英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6 年，当李引桐再度携家人回乡，他带着孩子们来到矗立于国光中学的“光前堂”前谆谆告诫他们，继承光前先生兴学传统是我们李氏家族的责任。

人的襟怀如果已经达到只做好事而不计名利的境界，窃以为这样的人离完人已经不遥远了。

来自社会 造福社会

1996 年中秋。

梅山。

金色的原野披上了丰收的橙黄。

天高云淡，入秋后那残留的热风将小镇四处悬挂的彩旗吹得“哗哗”作响。

中小學生身着节日的盛装，敲打着少年先锋队的队鼓，整齐地排列在主街的两侧。幼儿园的孩童，脸蛋被抹得红红的，只管一味兴奋，满心欢喜地以为在过他们自己的节日。

梅山的各主要街区、道口、学校等都贴上了醒目的标语。

南安市、梅山镇党、政主要领导人个个盛装含笑，排立于道口……

不要以为闽南人的中秋习惯是如此这般。不要以为将有上级官员莅临到访。

人们等候的不是政府官员，这般装束打扮亦不为过节。中秋在闽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过法并无二致，自管在家里屋内乐其合府团圆，不必到处张灯结彩，人潮涌进街头巷尾去凑热闹。

那么，乡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他们在迎候什么样的大人物？

李引桐以及全家，还有德美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天哪，这是笔者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群众自发的行动。这种自发行动并不是说没有组织性，没有人负责筹划和指挥，而是说行动本身出自人们心中的真诚意愿。只要身临其境，如此感受便可以旋即得到。

大约 11 点半，满载着数十名德美行高级职员的车队缓缓驶进梅山镇。一时间，彩旗飘扬，人声鼎沸，鼓乐齐鸣。“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锣鼓声不绝于耳。

车队沿着梅山主街缓缓而行。“热烈欢迎李引桐先生返回桑梓”之类的大幅标语在车队上空掠过，音乐声此起彼伏，延绵好几里。远远半山腰，依稀可见屋顶上的人影在晃动。

车队来到梅山后田李引桐居宅门前停了下来。李引桐从第一辆车里出来，早已经迎候在那儿的南安市以及梅山镇的两级领导与他亲切握手。厦门电视台、泉州电视台、广播电台、当地报刊的记者纷纷拍照，镁光灯接连不断地闪着。全体德美行人员到齐后，当地领导与李引桐全家以及德美行的主要高级职员合影留念。之后，大家进入梅山基金会新近竣工的“引桐楼”内。

欢迎仪式结束了。镇子里的人群并没有就此散去。很多人成群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议论，他们在赞誉，他们在传递着一种真挚的情感和深深的谢忱。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梅山乡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分享着刚才从眼前过去的这位老人——他们的海外乡亲李引桐所给予他们的益处和德泽：

他们走的路这位老人出资筑过；

他们过的桥这位老人花钱修过；他们饮用的清水来自于水库，而水库是这位老人出资兴建的；

他们生病到国专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不少医疗设备是老人花钱购买的；

人们到镇侨联的娱乐中心去玩耍，那娱乐中心是老人捐款盖起来的；

镇里的老人在晚年有自己聚会的活动中心，那经费是由这位老人提供

的；

孩子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学，也都享受着老人的捐款，甚至上大学的学生也有一些享受着他的奖学金；

人们坐在电影院里欣赏着艺术，而“国专礼堂”的维修费老人亦花了不少钱；

乡亲们吃的某种水果品种，也是老人从泰国移植来的；

夜晚照明的供电系统，老人出过钱；

当地人读的《梅山乡讯》是老人赠款办起来的；

甚至镇上的一些商店也是老人捐资盖的，从人们身边驶过的拖拉机、呼啸而去的汽车有些也是老人赠送的；

善良的梅山人又怎能忘记这一切。他们记得住、他们数得清，甚至比李引桐本人记得还要清晰。

人群还没有散尽，彩旗仍在飘扬，感激之情漫遍了山野。

朴实的乡下人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当面陈诉对李引桐先生的感谢，但这份情感已长久地留驻于心田。此时此刻，他们正是以这种久久的聚合方式静静地让时空传达情意。

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表达方式，乡下人的表达方式更质朴、更率真。

熠熠生辉的“引桐楼”在秋日的华阳下显得具有贵族气派。大红色的基调仿佛宣扬着梅山儿子的业绩，也诉说着第一代海外华人华侨对故乡的那份亲情。

对于李引桐千里故乡省亲，政府有关部门予以高度的重视，军委总政治部、国家安全部，福建省委、省政府都专门派了人来。在“引桐楼”的二楼大厅中央悬挂着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专门为其制作的大面锦旗，锦旗上绣着“共和国的功臣”六个大字。李引桐胸前佩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和平勋章的大幅照片悬挂于侧。如此高规格的各种奖誉同集于一个海外华人之身，其本身就说明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奥秘。

84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会客厅里，高朋满座，厅外还簇拥着不少的人。他仍是那样的谈笑风生。时光在飞逝，两个小时过去，老人还在说笑。往昔的朋友，北京的、广东的、福州的、泉州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岁月早在这些人的脸上画上了重重的皱纹。李引桐则一律称他们为“小某”。这些“小某”们其实现在大都是政府的要员大官，有的甚至已经退休。他们在诉说着过去的历史，共叙着长长的友谊。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此时此刻，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倒让在场的人们糊涂了。没有客主的区分，反少了许多的拘束，多出了几分自在。好在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身份与场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能够天南海北地聚到一起。这是多么不容易呀，它使时间停滞了，使老人年轻了。

凡事万物总有其道理。对于一个垂暮之人，对于一个海外华人，在他暮年之际回到自己的故乡，原本含有“落叶归根”的人之常情。此种纯属个人的行为却惊动了这么多的人们，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绝大多数民众，以至于成了事实上的公众和政府行为。这一转变的本身，我们找不出别的理由，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对于李引桐在过去所做的那些个事情，政府感谢他，民众感激他。

其实，李引桐此次返乡，并不是来领取政府和民众对他的感谢和感激的，

更不是来出席如此高规格欢迎仪式的。毫无疑问，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到来，当地政府一定会劳师动众。平心而论，李引桐很不忍心让乡亲放下手中的工作来迎接自己这样一位老人。他回乡时总是悄悄地来，把该办的事办完，静静地走。所以，并不是每次回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被告知。以1996年来说，李引桐从海外回闽南故乡的次数多达八九次。然真正知其归来的人寥寥无几。他曾对笔者说：“我回家乡只是来做些事情，不想打搅那些领导和乡亲。事情做完就好了。”有一次，李引桐从梅山到厦门，准备飞回泰国。不知怎地走漏了“风声”，让厦门市政府知道了。厦门市侨务办公室的领导嘱咐知情者，务必请李引桐到厦门时住在厦门宾馆，并准备安排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会见事宜。然而，李引桐谢绝了。他知道厦门的市长和书记都忙，自己此次不过是顺道路过厦门，并无其他专务，何必有劳这些领导。后来，他果然悄悄地到厦门，住进了一家自己联系的旅馆，第二天就飞往泰国去了。连那位先前还知道一些信息的知情者都全然蒙在鼓里。

可是此次不同。他首肯了各级领导进行隆重欢迎的建议，并将自己回乡的信息告诉给了他的朋友们。为什么李引桐此次一反常态？为什么此次他要违背自己的一贯风格？

谜团在我的心中膨胀、放大。

疑雾在我的脑海扩张、挥发。

或许也有一些人和笔者一样在纳闷……

夜幕默默地从天穹盖下来，宛若一块大黑布。

近处远处的灯火闪着亮着，在黑暗的世界里如同萤火虫。

这一夜，乡民们奔走相告，喜上眉梢。大家三五成群地结伴，手拿着小凳子来到“引桐楼”前的平场。今晚在这里将上演一出由泉州一地方剧团演出的古装戏。这是李引桐花钱请来的，他要让乡亲们有机会看一出高水平的地方戏。

锣鼓声热热闹闹地敲打了好一阵，演员们粉墨登场。

笔者不谙亦不爱戏剧，只管与来自天南地北的客人海侃。但是，心中的谜团尚未索解，大有骨鲠在喉的感觉。

外面“依依呀呀”还在唱着，情节只管被“戏”推着在高潮去。

时针已经指到了9时，照例到晚上8点多9点的时候，李引桐要去休息了。老人有老人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客厅的门虚掩着，我把门悄悄地推开。好家伙，里面依然坐着人，李引桐还在说说笑笑，没有流露出丝毫倦意。见我进门，李引桐招呼我在他身边坐下。老人似乎觉察到我内心的活动。

一些人在告辞，我并未起身。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举动做得太多，心里也明白，这样有些失礼了。不过，我早就宽宥了自己。因为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问，错过了机会，以后就不容易找回。

我的问题还未出口，李引桐好像已经知道我所要提的问题。他倒先开了腔：“彭教授，我这次所以要把我的小孩和德美行的所有高级职员叫到梅山来，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现在海外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有不少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我知道，要让他们跟我们这一代一样是办不到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也不能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是一个要死的人了。我这次带这么多的人回来，目的就是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下自己祖宗和故乡的情况。我并不期望我的孩子和德美行的所有高级职员都跟我一样，为家乡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力气。但要是这些人中有那么几个，就

算只有一个两个在以后仍然可以延续，帮助家乡做事情，出些钱、出点力也好啊。

这次梅山领导对我说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我答应，目的是要让我的孩子和德美行的这些高层领导亲眼看一下家乡的情况，亲身感受一下乡亲们对我们的情谊。让他们多少能够在以后尽一些帮助家乡建设的义务。

这次德美行的高级职员分两批回国，除了到梅山以外，我还让他们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旅游。他们中间虽然大多数祖籍是闽南，可是真正回国还是第一次。让他们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看看祖国正在起着巨大变化，对他们年轻一代有好处。

光是组织这一次回乡和旅游，就要花费几百万块钱。这个钱我认为值得花，需要花……”

老人还在诉说着，他的眼睛放着光。我心里的疙瘩已经被解开。听着老人吃力的叙述，体会着他的良苦用心，在我眼前老人的形象在不断地放大、放大。

夜，无情地往深处播散。外面的戏腔戏调不知何时停歇下来，通亮的灯火顿时暗了下来。人群已经散尽，遗剩的全是寂静。

人世间的行为总是各有各的道理。李引桐为祖国做了许多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于是，祖国也就自然会给予他许多其他人所得不到的荣誉。李引桐为家乡和乡亲们做了许多其他人做不到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家乡的乡亲们也自然会以其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虽然，任何事情不可能有绝对的划一，任何人也不可能得到公众完全一致的认同。然而，少数人的行为，个别人的有意诋毁，是遮掩不住民众的心声的。

人世间毕竟还是公理多。历史到底讨得到公道。

如果一个局外人突然置身于那样一种情境之中，可能会一时间陷入到迷茫之中，因为他一时间会感到有些问题无从解释。这些可爱的乡民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去表达对某一个人的崇敬之情？好像“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来自群众性的活动和场面人们就很不容易再看到了。不过，只要人们认真仔细地去了解这个人为家乡和乡亲们所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地用心去做，那么，他就再也不会为眼前出现这样自发的热烈场面而疑惑不解了。

除了我们在上面枚举的李引桐先生为家乡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以外，他在梅山家乡还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笔者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作一个轮廓式的统计，难免挂一漏万。目的不是为李引桐作统计，只想给读者一个公众行为的解释。

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实行不久，中国在各个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农村，条件就更差。比如基本的医疗卫生设备陈旧，人们在患了重病以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身体甚至生命有时会受到严重的危害。李引桐回到家乡，了解到国专医院的医疗设备需要更新，一些先进的仪器也需要购进。在详细了解情况以后，他决定一次性捐资为国专医院进口一批设备，计有：

进口X光仪器1台	价值人民币10万元
救护车1部	价值人民币10万元
“钴60”仪器1套	价值人民币70万元
其他医疗设备	价值人民币10万元

这一次他为家乡的医疗事业捐资 100 万元。李引桐先生每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桩事就是与梅山的领导和父老乡亲们交谈，了解亲情与乡情，真正做到想乡亲们之所想、急乡亲们之所急，力求能够做到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当他得知梅山水利建设跟不上发展的要求，农田无法年年做到旱涝保收，人民在生活用水方面亦多不便时，他就出钱为家乡兴办水利，解决老百姓饮用水困难。历年来，他为竞丰、蓉中修建起了“竞蓉大坝”、竞丰二级抽水机站，修筑竞丰龙头水库等大小水利设施 20 多处，农田受益面积达 600 余亩，耗资人民币 20 多万元。同时，他还捐资 10 万元为竞丰开垦茶园 20 多亩，陆续赠送手扶拖拉机 3 台。他出资为家乡建牛棚、盖仓库、架设供电线路、修架桥梁、建筑道路、兴建商店……还出资赠钱给《梅山乡讯》社作为常年经费以及给梅山竞丰老人协会慈善基金和活动经费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开

凡是社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只要他能做到，他都慷慨解囊，热情帮助。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李引桐为了促进家乡内地的经济发展，在深圳购买 4 组楼房，赠送给南安市、泉州市作为驻地办事处，以沟通与香港及海外的经济信息。他因此花费港币 400 万元。他还捐资人民币 210 万元在梅山镇兴建日产量为 3000 万吨的自来水厂，为梅山镇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解决供水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还为梅山侨联会建造楼房 2 栋，赠送轿车 2 部，耗费港币 50 多万元。几十年来，李引桐的踪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经常捐钱捐物，无法一一细录。他在广州、厦门、福州、北京、杭州、泉州等地的政府机关、侨联会、华侨大厦、华侨旅行社、高等学校、农业科学研究单位等捐钱赠物，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到国外考察，包括帮助中央有关部门、福建省的有关部门筹建与橡胶有关的公司等的花费数以亿计。

可以相信，没有人能够把那一笔笔的开销算得清楚。说实在的，也不需要算清楚。李引桐本人并不在乎、并不计较。他满心认定，自己赚来的钱能花在祖国、花在家乡、花到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上，那钱就花得其所，他花起来也就格外开心。至于具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单位、什么人身上花了多少之类的“问题”，他从来就不会去考虑。他从一开始做这些事情，就压根没有想到回报，也压根没有想到索取什么，甚至连“名”都不要。他是一个绝对淡泊名利的人。

对于历史，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一些什么。对于普通的人们，数据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什么。李引桐不是普通人，数据显得那样苍白，那样无力。他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做的好事，他积下的德行，只有让苍天去作证，由大地去评说！

李引桐，

祖国记得你！

人民记得你！

家乡记得你！

附：梅山基金会有限公司章程

- 1、公司名称：“梅山基金会有限公司”
- 2、公司注册地点在香港
- 3、公司成立的目的是：
 - (a) 辅助、资助受灾、穷苦的人和救济贫困的幼、老人使之自食其力。
 - (b) 建立、管理非盈利的学校,让学生得到免费的教育或受资助的教育。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组织讲座、展览、会议等来提高平时的或假日的教育,建立推广图书馆、阅览室并供给书籍、周刊、杂志、报纸等。
 - (c) 为福建梅山和其他地方人民推广公共福利事业和资助慈善活动。
 - (d) 培养福建梅山和其他地方人民的个体精神。
 - (e) 为使学生和青年人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精英并提高生活水平,推广教育、学习、娱乐、体育、文化和艺术等一切可以促进学生和青年人德、智、体发展的活动。
 - (f) 进行和协助进行建立、经营、维持、改进、管理和监督为公众服务的医院、产妇院、保健院、医疗所、医疗队等。
 - (g) 建立、负责、监督、管理或捐助任何慈善基金用来捐赠或贷款给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和机构或项目。
 - (h) 作为受托人或管理人为任何的慈善机构、协会管理任何的财产和基金。
 - (i) 为本基金会的目的认捐或其他合法的方法筹集资金。
 - (j) 为达到以上全部或部分的目的,以当事人、代理人、合约人、受托人等方式进行活动,或通过其他受托人、代理人进行活动。
 - (k) 接受为以上提供、支持的项目、机构所作的捐赠。
 - (l) 捐赠给当地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慈善团体或批准捐款给慈善目的。
 - (m) 颁发奖学金,研究基金或用其他方式来资助任何人和机构。
 - (n) 土地、建筑、证券、艺术品等方式捐赠给与本基金会目的相似的机构。
 - (o) 以购买、租赁、交换等形式获取土地、建筑物、遗产、任何期限的地产、物业或与之相关的权利,并在便利时将其转入本基金会的账下。
 - (p) 为了本基金会的目的,建筑、维修、改建任何房屋、工厂等。
 - (q) 进行变卖、管理、租出、抵押,处理全部或部分本基金会的财产的活动。
 - (r) 建立、维持或获得任何的基金使之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本基金会的目标。
 - (s) 为第三者(包括公司在内)担保其执行和完成任何合同的责任。
 - (t) 在本基金会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借取和筹集资金。
 - (u) 以认购、购置或以其他方式获取和接受、持有、售卖、转让、抵押、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处理香港或其他国家任何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证券等。
 - (v) 以基金会的资金投资购买任何公司、机构以任何形式发行或担保的股份、股票、债券,抵押或其他形式的证券,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参与政府、地方部门、基金会,其他授权部门所发行、担保盈利的产业或其他相似的文件。

(w) 为任何公司或个人保险使其损失或债务不至于影响基金会。

(x) 使用本基金会暂时闲置的资金进行投资。

(y) 进行对本基金会的目的有利的一切合法活动。

4、本基金会无论用何种形式获得的收益和财产只能完全用于本章程规定的目的，而不准以股息、花红或其他任何盈利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分付给基金会的成员（股东）。只要本基金会不限制，可付给本基金会的职员或实际对本基金会提供服务的会员合理的适当的费用。亦可向本基金会的会员按通常的利息率支付他们借给本会的资金的利息，或按合理、适当的租率支付他们租给本会的房厂的租金。除了实际费用的报销的上述利息、租金的付出，本基金会的董事和管理人员不能被指派为受薪的职员、或收受费用的职位。不准向本会的董事或管理人员支付任何金钱或等值的报酬。这一报酬亦不准支付给本会董事或管理人员持有超出 1% 股权的任何公司。

5、如果本基金会结束经营，在偿还一切债务之后，所余下的财产不准分给其会员，而必须将这些财产送给与本会宗旨相似的机构。受赠的机构亦应符合本章程第 4 点的要求，不准将资金或财产分给其成员。这样的机构必须在本会解散前还定。否则将由香港最高法院判定给予有关的慈善基金或用于某些慈善项目。

6、本基金会必须有正确的账目记载资金的退出，使用的项目、财产、债权和债务。这些账目要公开给会员查阅，以便限制违反本会规定的欺诈行为发生。这些账目每年至少要由一至两家会计师核对，确认一次。

7、本基金会的会员（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

8、本基金会的资本为 5000000 港元，分为 5000000 股，每股 1 港元。

后 记

1994年，我从内地调入厦门大学工作。此前，我一直从事跨境民族的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像苗、瑶这样的民族。由于研究上的需要和从事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要求，我有机会多次到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半岛的一些国家进行民族调查，自然对东南亚华人问题也有所接触和了解。自从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和继续从事少数民族国际化问题研究已经失去了基本条件等原因，我在研究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考虑到厦门大学的区域特色和历史传统——这是一所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由华人华侨捐资、后来归为政府的大学，它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非国内其他大学可以相比，于是我把自己的研究转到东南亚华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来。

尽管理性上要求我进行学术转向，内心却完全没有谱，因为此前我对这一领域没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同年，我冒昧拟作一个“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性走向——东南亚华人社区经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研究”的所谓项目，不料，这一项目受到了当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蒋炳钊教授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向厦门大学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支持，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还欣然答应出任本项目的顾问。

然而，一个空头项目，严格地说，只是“纸上谈兵”，没有经费，徒有虚名。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弄钱。这时我才发现，一个教书匠可以在纸上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在讲坛上侃侃而谈、纵横捭阖，一旦让他去“弄钱”立马有“生杀”他的感觉。一派“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风范。当然，除了要有经费外，还得要寻找到一个可以进行东南亚华人经济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地点、案例等等，方可有的放矢，使项目进行下去。

愁苦万端之际，我隐约记得与我家有过十几年邻居历史的陈启舟先生（我父亲是福建农学院教授，陈先生是原福建农学院总场场长，两家关系极好。加之本人与陈启舟之子系少时好友，陈先生一家待我一直很好）好像有一个什么泰国华侨朋友之类，于是我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将“项目”通过我的好友，即陈先生之子交与他的父亲。

不料，几天以后，陈启舟先生（其实我称他为“陈伯伯”）从泉州黎明大学打电话来，说是他已经将项目与李引桐先生讲了，李先生过几天正好要回家乡，他会专门到厦门大学商谈研究课题事宜，并希望到厦门大学的时候，可以见到李先生的同乡，原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维三先生。

1994年10月里的一天，厦门大学逸夫楼会客厅。李引桐一行（包括他的二儿子李竟敏等）、陈启舟先生、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叶品樵、原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维三、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蒋炳钊教授及所内几位学者聚集一处。李引桐先生爽快地答应资助课题的经费，并答应帮助办理赴泰学者的所需手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引桐先生，而且因为自己“太年轻”，当时连与之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课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资助着实是我始料未及的。

1995年新年伊始，以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专家的专家学者为主的赴泰调研组一行7人经香港飞往泰国。在曼谷，调研组全体成员受到李引桐先生的热情款待。之后，我们前往泰国南部合艾，开始了人类学的应用性调查。当然，

问卷、抽样、访谈等准备工作事先已经做好。

严格地说，我们的调研一开始与李引桐和德美行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的调查分成两部分进行：一是调查泰国华人华侨的民俗与宗教信仰变迁情况；二是调查华人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泰南的闽南籍华人社区的经济文化与橡胶业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东南亚华人的经济问题、社会结构问题、行业问题等无不与“地缘—业缘”连在一起，而德美行本身不正是一个极有代表性、极具说服力的范例和个案么？大家真有“蓦然回首”的感觉。

在得到李引桐和总经理李竞成的同意之后，我们原先从事华人社区经济社会结构调研的一组转入了集中对德美行的调研。

这一次调查工作持续两个多月，连春节都是在泰国南部过的。在泰期间，恰逢来自梅山的李成发先生也在泰国，他长时间陪伴着我们。从他那儿我开始了解一些李引桐先生鲜为人知的经历，并阅读了由李成发先生等人搜集整理的一些关于李引桐先生的材料。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也有机会观察李引桐先生的为人处事。我开始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从心底钦佩这样一位海外爱国华人。我忽然生出了要写他的念头——将他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来写。不过，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因为我听陈启舟先生说过，曾经有很多人，包括知名作家、政府部门、家乡亲友要写李引桐，都被他谢绝。更何况李先生现在已经83岁高龄，且因脑溢血之故，言语有些吃力，加上自己并非闽南人，闽南话只识得“皮毛”，难度可想而知。

访泰归来，调查组成员根据原先设计好的方案分头进行资料筛选、统计、撰写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原先想要在此基础上完成两部书稿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对此，我深感愧疚。

1995年5月，李引桐携家人到国内旅游，他邀笔者和同事郭志超同往。同行者中还有李先生的好友，来自广州的郑先生。

在云南大理洱海的游船上，我将自己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托出来。李先生很礼貌地谢绝。但我心不死，便将自己为什么想写他的理由一一说出，我说：“李老，我知道您不沽名誉，谢绝了不少人想写您的好意。然而，我以为，在您身上发生过的许多事情，您为国家和家乡所做的那些好事，您一生与共和国历史上的关联，都已经超越了您个人范围，您没有理由将它们永远埋藏。况且，我虽尊敬您，但我与您非亲非故，我不会只为您树碑立传，我是把您当作我的一个研究案例，我看重的是我了解到的历史事实，至少是事实的一部分。而作为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了解到的东西写出来……”显然，李引桐被我说服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被说服。我赢得了写他的机会。

可真正开始着手准备，我才觉得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困难得多，比我做习惯了的学术研究困难得多。首先，有关李引桐的材料太少太少。据人介绍，国内除了在闽南地区的小报上有一些有关李引桐的“豆腐块”介绍文章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文字资料了。听说以前在南安的一个炮团里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因在当地了解到一些关于李引桐的传说，写过一篇小文章刊于上海的《文汇月刊》，何年何月却没数，我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其次，李引桐成就并非限于经商、办企业，这与目下充斥于图书市场的那些材料相对单一的大富豪、大商贾的传记大不一样，写他们更多地只需在一个企业王国，一个专门领域就行了，调查起来也比较方便。写李引桐就大不一样，其历史的涉及面太宽。

再次，李引桐走过的地方太多（至少几个主要的地方，如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是要写到的；在中国，北京、福建、广东、海南、上海是要写到的；在福建，福州、厦门、集美、泉州、南安、梅山是要写到的……）。又再次，李引桐经历的时间近一个世纪，与之有关系的人物不计其数，特别是那些政府首脑、高官要人、商贾大亨、歌星影星等等，我是无法遍访，无缘遍访的，而且其中不少已经谢世。又再次，李引桐的所作所为不少属于“机密”级资料，我这个青年学者自然无法获取。总之，一切比我预想的困难得多。

好在一旦李引桐答应我写他，他就非常配合。他可以与我长谈到深夜，可以为我安排凭我能力无法谋面的人物的会谈。我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得到甚至是德美行秘密的文字和数据材料。甚至他可以为我在境外的调查。而且，他从来干涉我的调查和写作。印象中李引桐只提出一个要求：“写出事实”。所以，当我去采访当年从德美行出去的人时，他没有阻止；当我向个别南益公司的老职工调查的时候，他没有阻止；当我引用对他作一面评价的材料时，他没有阻止……

为了写这一本书，我再一次前往泰国、香港、并利用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当然，到北京、广东、福州、泉州、南安、梅山等地就方便得多了。

当我将耗时一年多的调查和初稿交与李引桐过目的时候，他用了整整4天时间认真地读毕，除了对少数人名、地名及不准确的细节进行修改外（他是亲自用颤抖的手提笔逐字逐句地改在扉页上），并未对作者的观点进行任何修改。看完初稿以后，他用简单的语句讲出了当今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新观点：“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我，作者是彭教授，书出版以后还有读者。我只讲述事实。”这意味着，作者、读者拥有自己的写作权、阅读权、阐释权和批评权。

讲到“事实”，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些说明。

由于上面说到的诸条困难，加之李引桐本人凭记忆回顾，有些细节，诸如时间、地点、参与的人数等或许并非绝对精确，但是事件大体是真实的。这里的“真实”大致有三种意思：一，李引桐阐述的事实。二，笔者对他所阐述的事实的核实——包括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配合了诸如问卷、访谈、搜集数据等手段。三，文字材料——包括有关的文件、报章、历史书籍的说明等等。当然，既然这是笔者所作，少不了注入了作者一些感性上的因素。其实，任何历史的陈述都包含了作者的感性色彩，哪怕它再隐蔽也不能例外，否则历史学家就都要失业了。你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对象、选择这些事件、选择这些措辞，本身就渗透了个人的因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因人而异，否则就不会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流传了。再说，人类自诞生以来，从未间断过误会；人类自从创造了语言，从未间断过误解；人类自从发明了文字，从未间断过误读。所以，书中主人公讲的述的，作者记的写的，文献中引的证的，充其量多出一些东西让人去误会、误解和误读。但是，笔者同时相信，人世间毕竟有真实、真情和真理。

最后，真诚感谢在我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所有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

作者

1996年12月初稿

